



全国中文核心期刊
中国期刊方阵双效期刊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
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来源期刊

目 录

文本·文献研究

- 3 史思谦 / 论《古史纪年》中的古罗斯帝国形象构建
- 21 И.Т·弗罗洛夫 安启念(译) / 回首改革—И.Т·弗罗洛夫与日本《朝日新闻》记者的谈话(1993年2月)

苏联外交

- 82 刘国菊 /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与古巴关系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 106 刘名望 / 浅析苏联在1961年果阿事件中的角色

俄罗斯经济

- 125 陈宇 / 俄罗斯本国收入的资本化与经济增长
- 150 宋博 / 试论俄罗斯央地关系治理的非常规工具选择—能源治理

中亚安全

- 179 张杰 / 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利益与公民的安全保护

主管单位: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单位:

华东师范大学

出版单位:

《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主 编: 冯绍雷

副 主 编: 陈大维(常务)

杨 成

刘 军

本期执编: 张 昕、王海燕

封面设计: 王 洪

编辑部地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A403
电话: 021-62233816; 62238113

Email: russiastudies@163.net

邮政编码: 200062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

ISSN 1009—721X

印刷: 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 2016年10月28日

俄羅斯研究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2016年第5期(双月刊)

Оглавление

Ши Сыцян

О создании образа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в «Повести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 (3)

И.Т.Фролов Перевод Ань Цинянь

Назад к Перестройке---Переговоры с японским корреспондентом «Асахи симбун» (февраль 1993г.)..... (21)

Лю Гоцзюнь

Эволюция и влияющие на неё факторы отношений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с Кубой во времена Хрущёва (82)

Лю Минван

О рол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событиях в Гоа в 1961 г..... (106)

Чэнь Юй

Капитализац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дохода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рост в России (125)

Сун Бо

О выборе нетрадиционных инструментов в управлении отношениями между центром и местными органами власти в России - Управление энергией (150)

Чжан Цзе

Защита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интересов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граждан Китая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179)

俄羅斯研究

RUSSIAN STUDIES

2016 年第 5 期 (双月刊)

Contents

Shi Siqian

On the Image Construction of Ancient Rus in *Primary Chronicle*..... (3)

I.T. Frolov, translated by An Qi'nian

Revisiting the Reform: Interview between Frolov and Journalist of Japanese Newspaper of Asahi Shimbun (Feb, 1993)..... (21)

Liu Guoju

The Evolution of Soviet-Cuban Relations during the Khrushchev Period and Its Influential Factors..... (82)

Liu Mingwang

On Soviet Role in the 1961 Goa Event (106)

Chen Yu

Capitalization of National Income and Economic Growth in Russia..... (125)

Song Bo

On Unconventional Choice in Russian Governance of Relations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Energy Governance (150)

Zhang Jie

Chinese 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 and Security Protection of Chinese Citizens..... (179)

文本·文献研究

论《古史纪年》中的古罗斯帝国形象构建*

史思谦**

【内容提要】古罗斯编年史汇编《古史纪年》，可谓俄罗斯民族群体想象认同中的重要一环。其被视为构建与维系古罗斯帝国形象的初始文学文本，以史书形式展现了古罗斯国家的民族生态、权力更迭、对外交往与宗教视野，呈现了罗斯族裔实现民族融合与国家建立的历史图景。《古史纪年》试图赋予古罗斯帝国以神性起源、合理版图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自我定位，以此构建初始的古罗斯帝国形象。

【关键词】《古史纪年》 古罗斯帝国 自我-他者形象

【中图分类号】D851.2; I512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6)05-0003(18)

爱尔兰裔社会学家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民族”定义为一种凭借想象以形成群体认同的政治共同体^①。对俄罗斯民族而言，其现存最古老的古罗斯编年史汇编《古史纪年》（*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其首个版本约出现于

* 本文系黑龙江大学研究生创新科研项目资金“俄罗斯古代编年史文学作品《古史纪年》研究”（项目批准号：YJSCX2015-008HLJU）的阶段性成果。非常感谢匿名审稿人的意见，文责自负。

** 史思谦，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博士研究生。

①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原定义如下：“遵循着人类学的精神，我主张对民族作如下的界定：它是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并且，它是被想象为本质上有限的（limited），同时也享有主权的共同体。……区别不同的共同体的基础，并非他们的虚假/真实性，而是他们被想象的方式。”参见[美]安德森（B. Anderson）：《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叟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5-6页。

1113年), 可谓其民族群体想象认同中的重要一环。在特定的时代文化语境中, 民族主义常常会转化为帝国意识。这是普世价值观的逻辑必然结果, 也是其民族、族裔形成国家形象之身份认同的必由之路。“作为政治共同体, 民族国家一方面依靠国家机器维护其政治统一, 另一方面, 作为想象共同体, 它又必须依赖本民族的文化遗产, 确保其文化统一。这包括每一个民族独有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文学叙事、文化象征、宗教仪式等等。”^① 《古史纪年》即可被视为构建与维系古罗斯帝国形象的初始文学文本, 其以史书形式^②展现了古罗斯帝国^③的民族生态、权力更迭、对外交往与宗教视野, 呈现了罗斯族裔实现民族融合与国家建立的历史、文学、政治及宗教的文本景观, 构建了初始的古罗斯帝国形象^④。

① 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西方文论关键词》,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6年,第469页。

② 尽管《古史纪年》属于古罗斯史学典籍,其文本叙事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文学虚构的因子,“编年史”其本身即是文学与史学两相结合的体裁。近年来,历史文本的文学特性越来越多地受到了世界各国学者的重视与研究,如罗兰·巴特、海登·怀特等学者均对此有过论述。

③ 目前国内外学界对“帝国”一词的定义颇为多元;本文作者赞同《一战帝国:1911-1923》一书所引述的“帝国”概念定义:“查尔斯·梅尔将帝国定义为超国家实体,其特征可由‘规模’大小、是否存在‘民族等级化’、是否有‘一个体现了社会和(或)民族精英进行管理的权力集中的政体’来鉴别。”(参见[德]格沃特、[美]曼尼拉:《一战帝国:1911-1923》,钟厚涛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5年,第3页。)《古史纪年》所载古罗斯国家的诸多特征,诸如古罗斯的广阔疆域、其中多个民族对国家建构的共同参与、罗斯人对异族人的民族优越感与文明程度对比、编年史家对罗斯统治阶级的着重记载等,都证明在上述“帝国”定义框架内,古罗斯可被称为“古罗斯帝国”。

④ 我国学者国春雷认为,古罗斯存在的时间比基辅罗斯存在的时间要更为长久,其《基辅罗斯外交浅析》一文对“古罗斯”、“基辅罗斯”等概念进行了界定(参见《俄罗斯研究》2010年第4期)。本文所述主体“古罗斯帝国”,其历史范畴与时空承载建立在《古史纪年》所载古罗斯各阶段国家形态基础之上,包括斯拉夫人的氏族部落、最初的罗斯国、基辅罗斯、基辅罗斯分裂后的各小公国,以及由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王公重新统一的罗斯国家。在俄语语言图景中,Русь指罗斯国家,русь则往往指罗斯民族,即东斯拉夫各部族的统称。

一、古罗斯帝国之起源构建

西方各民族的古代编年史，其时间建构往往与《圣经》的始末时间两相接轨：“任何一个中世纪西方编年史都自创世记和亚当起，而其编年史家停驻之笔亦总是最后审判。”^①与之不同的是，《古史纪年》是以《圣经》中洪水灭世后挪亚三子（闪、含和雅弗）划分世界的场景为开端的。有关斯拉夫人的记载在关于雅弗后裔的记载中首次出现：

上帝毁塔和划分种族后，闪的后代占领东方土地，含的后代占领南方土地，而雅弗的后代则占领西方和北方土地，从这 72 个族中分出斯拉夫族，这是从雅弗的一支，即所谓的诺里克人发展而来。许多年后，斯拉夫人定居在多瑙河流域，即现在乌果尔和保加利亚地区。有一部分斯拉夫人迁到各地，并且根据他们的所在地有了各自的名称。^②

“Иафет(雅弗)”一词源于古希伯来语 יָפֶֿתֿ (拉Iafeth, 希Ιάφεθ, 阿يافث), 为“神的扩张”之意。在圣经语境中，划分土地之后，在挪亚三子间出现了有关未来图景的分野。雅弗曾为醉酒赤身的父亲披上遮盖的外衣，挪亚醒来后对他祝福道：“愿神使雅弗扩张，使他住在闪的帐篷里，又愿迦南作他的奴仆。”（创世记 9: 27）^③“持预示论观点的基督教释经家们把被嘲讽酒醉后露出私处酣睡的挪亚理解为耶稣在受难前被剥去外套。”^④雅弗被认为承继了挪亚之“义”，而这是挪亚方舟（即拯救与避难）得以成立的最重要的神性背景：“惟有挪亚在耶和华眼前蒙恩。挪亚是个义人，在当时的世代是个完全人。挪亚与神同行。挪亚生了三个儿子，就是闪、含、雅弗。”（创世记 6: 8-10）

罗斯人将雅弗视为其族裔的始祖，隐性地证明罗斯人不具有圣经所述的

① Шайкин А.А. 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 История и Поэтика. М.: НПД Русская панорама, 2011. С.27.

② 王松亭译注：《古史纪年：古俄语—汉语对照》，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 年，第 3 页。

③ 对《古史纪年》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与《圣经》相关。本文以括注形式标注的引文均来自《圣经》，标注形式为（各章名称+章节数：该章节内句序）。

④ [德]汉斯·彼得曼：《世界文化象征词典》，刘玉红等译，桂林：漓江出版社，2000 年，第 244 页。

大洪水之前人类的“狂暴与罪孽”，他们是上帝灭世后“新天新地”之子民，是上帝所称赞、信赖的义人后裔。挪亚三子对世界的重新划分^①，将罗斯族裔的原初史纳入到《圣经》所构建的神性世界开端系统之中，罗斯人呈现了清晰的种族承继，拥有了挪亚-雅弗-诺里克人-斯拉夫人-罗斯人的合法种族承继链条。我国学者郑永旺认为，“俄罗斯人在《圣经》中发现了自己民族不同凡响的源文本和前逻辑，反过来该文本和该逻辑又为自己的神圣使命披上了一层合法的外套。”^②

基辅在古罗斯帝国史中一度占有统治中心地位。“罗斯国家原先是头几个基辅王公将各个不同种族机械地拼凑成的一个政治整体；现在，它丧失了那个政治整体性，开始感到自己是完整民族或国土的组成部分。后世人民想到基辅罗斯就想到它是俄罗斯民族的摇篮。”^③奥列格王公有关基辅“将为罗斯众城之母”（Се буди мати градомъ русьскимъ）的话语在斯拉夫地区流传至今。有关基辅这座城市建立本身的传说，为罗斯国家的神性起源提供了一个建立在斯拉夫民间传说基础上的神话前文本：“初始俄罗斯编年史上有关在罗斯的基督教的第一篇传奇讲述的是圣徒安德烈·别尔沃兹万内从希诺皮亚和科尔苏尼亚（赫尔涅索斯）沿着‘从瓦兰吉亚人至希腊人’大路——沿着第聂伯河、洛瓦季河、沃尔霍夫河至波罗的海，然后环游欧洲和罗马的旅行记。”^④这一传说被古罗斯编年史家纳入到其有关帝国起源构建的叙事系统中：

安德烈在锡诺普一带传经布道时，来到赫尔松，得知不远处即是第聂伯河河口，于是他决定去罗马，在河口乘船沿第聂伯河逆流而行，途中发生了一件事：安德烈在一座大山脚下上了岸，早晨起来对同行的圣

① 《古史纪年》有关挪亚三子划分土地的叙述远比《圣经》所述详细得多。据俄罗斯学界考证，这是古罗斯编年史家所刻意添加的片段。《圣经》并未明确记载雅弗后裔所占土地的确切位置，仅记载道：“（雅弗之子）这些人的后裔，将各国的土地、海岛，分开居住，各随各的方言、宗族立国。”（创世记 10：5）

② 郑永旺：“俄罗斯民族性格与 1812 年卫国战争的胜利”，《俄罗斯文艺》，2012 年第 4 期，第 38 页。

③ [俄]瓦·奥·克柳切夫斯基：《俄国史》（第一卷），张草纫、浦允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年，第 175 页。

④ [俄]德·谢·利哈乔夫著：《解读俄罗斯》，吴晓都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 年，第 47 页。

徒们说：“你们看到大山了吧？山上将出现上帝的恩赐：这里将有一座大城市，上帝将在这里建许多教堂。”安德烈登上山峰，行祝福仪式，竖起十字架，祈祷上帝，然后下山继续溯第聂伯河上行。后来这里出现了基辅城。^①

该传说显示了由圣徒安德烈所联结与象征的重要联系——拜占庭与罗斯在基督教启蒙层面的同源与重合，以及罗斯所承基督教与拜占庭基督教间的亲缘维系。“在 11 世纪的拜占庭，很多人都坚信安德烈曾访问过罗斯国家。”^②在拜占庭皇帝米哈伊尔七世（Михаил VII）写给弗谢沃洛德·雅罗斯拉维奇（即弗拉基米尔·莫诺马赫王公之父）的一封信中，曾提及拜占庭和罗斯的传教士正是最先研习《圣经》的同一批人。米哈伊尔七世写道：“我们两国具有共同的来源与根基，有同样的拯救言辞在两国之间传扬，还有共同的神之秘密的见证者和福音宣讲者。”^③俄罗斯学者认为这一传说其历史真实性在很大程度上有待研究，然而我们可以确定的是，很多传说、故事已借由史书、文学作品或口口相传等形式进入其民族潜意识的架构，参与了整个国家民族精神史的构建；从某种程度上说，该传说本身已然成为随时间流逝而尘埃落定的“真实”史料。

基辅建城于高山之上，其形态“涉及比寻常的生存要更高一级的生存状态。”^④有关基辅城市的建造，使人联想到伊甸园中的生命树，或者上帝所毁的通天塔，其建城地点之选择，折射出罗斯人欲与天国和上帝构成联系的思想：“人们设计神庙或塔梯的形状，总是指向天上，象征着最后可以进入天国。”^⑤基辅是神在毁塔之后给予罗斯人的另一种祝福，是另一座矗立于人间的、形态学意义上的通天塔，其不再意味着因神的不满而造成的人类世界的大混乱（Babel源自babal，意即“混乱”），而是以东正教未来在此处的繁盛隐喻了其虔诚、温和与普世的性质，以取代因大洪水和通天塔被毁而消失的

① 王松亭译注：《古史纪年：古俄语—汉语对照》，第 4 页。

② [俄]拉夫连季编：《往年纪事》，朱寰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年，第 289 页。

③ Васильевский В.Г. Труды В. Г. Васильевского. Т.2. Русско-византийские отрывки. Вып.1. СПб.:Изд. Имп. Акад. Наук, 1909. С.11.

④ [加]诺思洛普·弗莱著：《神力的语言——“圣经与文学”研究续篇》，吴持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 年，第 170 页。

⑤ 同上，第 169 页。

罪城。我国学者认为，圣徒安德烈的故事“充分显示出神选理念”^①。

安德烈沿海行进的这条贯通罗斯南北的重要水路，点明了罗斯国家建立过程中的信息来源、邦交走向与贸易渠道。“这条水路为古罗斯国家的建立提供了极好的历史机遇，因为它北方连接着斯堪的纳维亚人，南方连接着拜占庭帝国。斯堪的纳维亚人给古罗斯带来了军事部落体制，拜占庭帝国则不但给古罗斯带来了先进的基督教文化，还带来了极大的国际商贸机遇。”^②基辅的重要地理位置，无论在宗教、文化层面，抑或在军事、贸易方面，都为罗斯国家的构建预设了重要的地缘背景。

古罗斯编年史家记载了一系列随斯拉夫文字的创制而出现的史实，如古罗斯受洗、首座圣母大教堂的建成、第一批修道院与僧侣的出现及罗斯孩童初次接受启蒙教育等。罗斯人获拜占庭皇帝亲派使者前往创制字母表并翻译《圣经》系列典籍（如《使徒行传》、《福音书》等）。当时有人反对，认为“除了犹太人、希腊人和拉丁人外，任何民族都不该有自己的文字，因为彼拉多就是用这三种文字在圣十字架上题词的。”^③此举受到罗马教皇的驳斥，声称“如果谁再敢诋毁斯拉夫文字，将被开除教籍。”^④在古罗斯编年史家看来，其所获语言是神所赐予的特殊赠礼，是受到“第一罗马”与“第二罗马”郑重认可的合法文字，“在此之前，罗斯人得不到教化，上帝根据自己的意愿降福给他们。”^⑤文字不仅被视为罗斯接受基督教化的必要条件，更被视为上帝对罗斯优待的象征及罗斯受正统教会合法承认的暗示，其本族文字是《圣经》所载继希伯来、罗马和希利尼三种文字^⑥之外的另一种神圣、合法之文字。

古罗斯编年史家力图将罗斯历史纳入到圣经叙事的视阈之中，“其作者

① 郭小丽、孙静莹：“俄罗斯弥赛亚意识的结构及其流变”，《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2期，第118页。

② 齐嘉、曹维安：“‘罗斯’名称的起源与古罗斯国家的形成”，《历史研究》，2012年第3期，第122页。

③ 王松亭译注：《古史纪年：古俄语—汉语对照》，第14页。

④ 同上，第14页。

⑤ 同上，第64页。

⑥ 据《圣经》记载：彼拉多又用牌子写了一个名号，安在十字架上；写的是，“犹太人的王，拿撒勒人耶稣。”有许多犹太人念这名号，因为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地方与城相近，并且是用希伯来、罗马、希利尼三样文字写的。（约翰福音 19：19-20）

按照这种思路，一直叙述到他本人所在的莫诺马赫时代，造成《旧约》中的耶和华上帝、福音书宣扬的圣子、以及东方正教会不断‘合法地’介入古罗斯‘历史’。”^①圣经观念已融入俄罗斯历史构建的血脉，被纳入有关其民族与国家起源的“集体无意识”精神构建。《古史纪年》有关古罗斯帝国起源的构建，显示了古罗斯族裔的民族定位和神选意识，其试图在圣经中寻找造就其民族起源的伟大始祖，以此为古罗斯帝国的历史与版图盖上神之印记及其被纳入世界历史的合法性。“罗斯是神圣的国家，罗斯人民是上帝的选民，罗斯的历史是‘神选民族的历史’。”^②《古史纪年》被认为是俄罗斯的福音书。^③

二、古罗斯帝国之时空构建

«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全称为«Се повести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 откуда есть пошла Русская земля, кто в Киеве начал первее княжити и откуда Русская земля стала есть»,即“这是逝去年代的故事，讲的是罗斯大地从何而来，谁是基辅的开国大公以及罗斯国是如何建成的”，其全称的关键词之一为“土地”（земля）。在圣经语境中，人类始祖亚当被逐出伊甸园后，首先依赖大地得以生存，土地是其产生的本源：“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创世记3:19）“俄语中的‘Земля’一词来自原始斯拉夫语‘земля’，其源头是印欧语中的‘ghem-’，它有‘地段、地区，领土的一部分’和‘国家、政权’的语义。在俄罗斯的民族意识中，土地可以视为‘领土的一部分’，乃至与‘国家和政权’等同。”^④

① 林精华：“圣经的（俄）罗斯化：古罗斯文学及其向现代俄罗斯文学的转化”，《圣经文学研究》，第8辑，第135页。

② 郭小丽：“俄罗斯弥赛亚意识的结构及其流变”，《俄罗斯研究》，2009年第2期，第118页。

③ 参见林精华：“圣经的（俄）罗斯化：古罗斯文学及其向现代俄罗斯文学的转化”，第135页。

④ 姜磊：“俄罗斯文学中民族思想表象下的‘帝国意识’研究”，《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第190页。

《古史纪年》记载了古罗斯强硬中央集权产生的历史背景。“从外在的、实证科学的观点来看，辽阔的俄罗斯空间便是俄罗斯历史的地理动因。”^①古罗斯国家的雏形即起源于广阔的东欧平原。“根据他们的历史生活和地理状况，斯拉夫人在这个平原上并不是用繁殖的方法逐渐扩展的，不是分布开来，而是迁居各地，像飞鸟般从一端迁居到另一端”。^②最初的罗斯居民——波利安人（Поляне），意为“草原居民”。而罗斯人的劲敌、来自黑海沿岸的草原突厥游牧民族波洛韦茨人（Половцы），最初来自位于世界东北方的耶特利夫沙漠，其民族名称皆来源于生存空间的广袤无边。在 12 世纪末罗斯史诗性作品《伊戈尔出征记》（Слово о полку Игореве）中，有 копие приломити конецъ Поля половецького（于波洛韦茨人原野之末折断长矛）的表述，俄罗斯学者尼基京（Никитин Л. А.）认为，Поля一词表明伊戈尔公的作战地点并非田野边缘，而是波洛韦茨人的国界^③；我国学者魏荒弩亦将此句译为“在波洛夫草原的边境，折断自己的长矛”^④。在古俄文学中，“俄罗斯大地”（Русская земля）往往作为国名出现，其意义等同于“古罗斯国家”。Поля与земля意义类似，均表示空间、疆域，有“领土”、“国土”的意思。“斯拉夫人比与其相邻的日耳曼人等种族更为提早地消散了血亲集群，而以领土集群代之。”^⑤古罗斯广袤的空间，在相当程度上为权力关系所笼罩，对辽阔空间的难以驾驭与永恒追寻，构成了罗斯人独特的统治方式与守卫使命。“俄罗斯国家的无界性与俄罗斯土地的无界性进入了它的心理结构。俄罗斯灵魂被辽阔所重创，它看不到边界，这种无界性不是解放，而是

① [俄]别尔嘉耶夫著：《俄罗斯的命运》，汪剑钊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年，第 56 页。

② [俄]瓦·奥·克柳切夫斯基著：《俄国史》（第一卷），第 23 页。

③ Андрей Н. Половецкая Русь. 28.08.2008. http://modernlib.ru/books/nikitin_andrey/poloveckaya_rus/read_3/

④ 魏荒弩译：《伊戈尔远征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 年，第 3 页。

⑤ Кузьмин А.Г. Откуда есть пошла Русская земля-Века VI-X(Книга 1). <http://bookre.org/reader?file=134432>. 在《往年纪事》中指出，有关基易三兄弟建立基辅城的传说，其产生根源可能是罗斯初始的部落联盟形态。这一历史传说被认为具有政治功能与意味（参见第 292 页）。笔者认为，古罗斯统治阶级之间的血缘联系，有可能是古罗斯编年史家所特意添加或改编的，其目的在于以此弥补因领土集群的建立而产生的某些统治弊端，加深其统治阶级网络之间的联系与羁绊。

奴役着它。”^①《古史纪年》中对罗斯全面受洗的记载即充满强制气息，罗斯人曾虔诚信奉的、银首金须的庇隆木像惨遭残酷对待：“昨天雷神还受到人们的敬拜，而今天则受唾骂。当人们沿鲁奇耶河将雷神庇隆的木像拖到第聂伯河边时，一些还没受洗的多神教徒为雷神而哭泣。”^②

在古罗斯编年史家的信仰视阈中，广阔无垠的空间是神对罗斯显示神迹的重要处所。据《古史纪年》记载，在尚未“罗斯受洗”之际，罗斯向察里格勒大肆进军，攻占了苏德城并大肆屠杀基督教徒。希腊米哈伊尔大帝与总主教在弗拉赫尔纳教堂向圣母祈祷了一夜，“他们唱着赞歌，手捧圣母像的金衣来到海边，用海水浸湿金衣下摆。当时万籁俱寂，海上风平浪静，刹那间风雨大作，海浪滔天，席卷了罗斯异教徒的战船，把他们在岸边摔个粉碎，只有少数人保住性命，逃回家乡。”^③

古罗斯编年史家挑选该事件列入记载，显然具有一定的用意，因为其出人意料地暴露了对罗斯颇为不利的因素：由于圣母显灵，这一片海上空间成为杀害基督徒、劫掠异邦的罗斯异教徒的葬身之地。利哈乔夫（Лихачев Д. С.）认为，这一事件反而可被视为圣母对罗斯予以特殊庇护的象征：“在当时的人们看来，上帝的惩罚——这是上帝对被惩罚者特别关怀的标志。所有这一切可以使人们理解殒布、圣母升天和弗拉赫尔涅修道院对于罗斯所具有的特殊的‘军事的’、‘防护的’意义。还应当注意到当风暴把俄罗斯船只驱散的时候，对俄罗斯人的胜利完成于天和地之间，在空间自然中，按照当时的观念，那里处于圣母的独特权力之下。”^④这一事件成为罗斯在未受洗前即受到圣母庇护的前逻辑文本，隐喻了俄罗斯民族的神选意义。这种以惩戒表达神恩的思想亦体现于异族对罗斯的入侵层面：“上帝使异邦进攻我们，并不是降福于波洛韦茨人，而是以此来惩罚我们，使我们远离邪恶之事。”^⑤

“在俄罗斯民族，与土地相联系的宗教是有强大势力的，它深深扎根于俄罗斯农奴阶层。土地——这是他们最终的庇护者。母性——这是最基本的范

① [俄]别尔嘉耶夫著：《俄罗斯的命运》，第 55 页。

② 王松亭译注：《古史纪年：古俄语—汉语对照》，第 63 页。

③ 同上，第 10-11 页。

④ [俄]德·谢·利哈乔夫著：《解读俄罗斯》，第 153 页。

⑤ 王松亭译注：《古史纪年：古俄语—汉语对照》，第 117 页。

畴。”^①在罗斯接受基督教之前，至少有六位神祇的偶像矗立在罗斯大地上：雷神庇隆（Перун）、太阳神（火神）大日博格（Даждьбог）、风神司特利博格（Стрибог）、西玛尔戈尔（Симаргл）、畜神维列斯，以及莫克什（Мокошь）。“莫克什强大的力量并不次于庇隆，她身兼命运、繁衍和收获三个职位，她也是人和大地之间的纽带，在这个意义上莫克什就是‘大地——润泽的母亲’（Мать Сырая Земля）的人格形态。”^②多神教深刻地影响了罗斯人的世界观，其圣母崇拜意识在一定程度上怀有莫科什崇拜的踪影，“土地”被认为是罗斯的庇护者与生存之源所在。《古史纪年》第 6505（997）年项下的一则记载点明了罗斯人对大地的依恋与寻求庇护之情：在佩切涅格人包围别尔哥罗德致使全城饥馑断粮之际，一位老人靠搜集仅剩粮食制成了“来自大地的”面羹与甜浆，蒙骗佩切涅格王公以使敌退兵。

圣经叙事构成了《古史纪年》叙事的重要部分，使其呈现出“现世—永世”、“当下一无限”的时空图景，这在标题“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中已有暗示：временный与лето都与时间（время）有关，временный为“过往的”、“临时、暂时的”之意，而лето在这里指“时期、时代、年代”，其组合呈现了“当下”与“永恒”两相结合的时间图景。俄罗斯学者沙伊金（Шайкин А. А.）认为，《古史纪年》实现了从神话向历史的转向，“填补这一时间流的正是俄罗斯大地的历史。”^③《古史纪年》以教历时间流淌出罗斯历史^④，将整个罗斯历史纳入圣经叙事的视阈之中，以罗斯史实传达出“上帝创世”、“该隐杀兄”和“世界末日”等超时空圣经图景，其时间流结合了历史与神话、开端与终结、现世与永恒，以编年史家的圣经思维为依托，如《圣经》言：“我是阿尔法，我是俄梅戛；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启示录 22：13）从某种程度上说，《古史纪年》所记载的罗斯历史流逝，是由圣经时空所预判与缔造的，以使有形的罗斯历史披上永恒的神性之

① [俄]尼·别尔嘉耶夫著：《俄罗斯思想：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雷永生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5年，第6页。

② 郑永旺：“从民族的集体无意识看俄罗斯思想的文学之维”，《俄罗斯文艺》，2009年第1期，第76页。

③ Шайкин А.А. 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 История и Поэтика. С.341.

④ 在《古史纪年》记载中，公历时间被置于括号内放于教历时间之后，其首先以教历时间记录罗斯历史。

纱，成为“神圣之史”，“正是圣经在古罗斯的地方化过程，直接决定了古俄语文学的成长状态。”^①

三、古罗斯帝国之“自我”与“他者”形象构建

《古史纪年》共记载有 70 余个国名及 90 余个民族名称，“将古罗斯历史同世界史及斯拉夫民族史联系起来”^②，记载了斯拉夫民族各部落及部落联盟的地理分布、习俗异同和交往作战，罗斯国家的建立史，以及罗斯同异邦（异族）间的战争、传教、联姻、和约签订、对外贸易、文化交流等情况，构建了古罗斯帝国“自我”与“他者”的国别形象长廊：斯拉夫人-异族人的自我-他者形象，罗斯人-斯拉夫人的自我-他者形象，以及罗斯-异邦的自我-他者形象。

古罗斯编年史家明确引用了拜占庭史书《年代记》（Хроника），其中对印度人的吃人习俗、迦勒底人和巴比伦人的乱伦习俗、吉利亚人的母系氏族习俗、亚马逊女人与外族随意交媾并杀害初生男婴的生育习俗等记载，与对叙利亚人、巴克特里亚人的文明习俗的记载构成了鲜明对比：

每个种族，要么有书面的法令，要么有一定的风俗习惯，即他们祖先定下的规矩。这要首推住在世界边缘的叙利亚人。他们将祖先制定的规矩作为法律：不淫乱，不偷盗，不诬蔑，不杀人，尤其重要的是不作恶。巴克特里亚人也恪守这种规矩，这些人又称为拉赫曼人或奥斯特罗维吉安人。这些人遵守先辈的古训，不食肉，不饮酒，不淫乱，不作恶，并且敬畏神。^③

古罗斯编年史家亦将习俗描写作为区分罗斯人与异族人的文明程度之重要手段，其将波利安人同拉迪米奇人、维亚迪奇人、塞维利安人的饮食、婚娶、丧葬等习俗进行了对比，突出了波利安人的文明先进：“波利安人性情温和，恪守祖制，姑嫂妯娌，兄弟姐妹，父母儿女以及亲戚之间关系分明，长幼有序，不乱伦，他们也有婚娶的习俗：女婿不去女方领新娘，而是让人

① 林精华：“圣经的（俄）罗斯化：古罗斯文学及其向现代俄罗斯文学的转化”，第 126 页。

② 王松亭译注：《古史纪年：古俄语—汉语对照》（译者前言），第 13 页。

③ 王松亭译注：《古史纪年：古俄语—汉语对照》，第 7 页。

在婚前一天将新娘领来，次日带彩礼而归。”^①波利安人被认为是最初的罗斯人。据罗斯民间传说，基辅（基易之城）建城者基易（Кий）即自称波利安人。斯拉夫人的一支德列夫利安人被古罗斯编年史家认为是野蛮落后的：“德列夫利安人风俗野蛮，像牲畜一样群居，相互残杀，吃不洁的食物，无婚娶之习俗，喜欢在近水的地方抢姑娘做妻子。”^②编年史家亦记载了波洛韦茨人对其祖先恶习的承继：“纵然是现在，波洛韦茨人依然保持其祖先的习俗：随意杀人，并以此为荣；吃人，吃不洁的食物——狷鼠和黄鼠等；与母辈或晚辈乱伦等等。”^③有关波利安人、其他斯拉夫族裔及异族人习俗的记载，确立了一道罗斯人—斯拉夫人—异族人的文明划分弧线。

持有共同印欧语系的斯拉夫世界历来被划分为三个世界：南斯拉夫世界（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马其顿人、黑山人、波斯尼亚人），东斯拉夫世界（俄罗斯人、白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及西斯拉夫世界（波兰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卢日支人）。《古史纪年》对罗斯人与斯拉夫人的身份区分与形象分野，显示了东斯拉夫世界在整个斯拉夫世界的重要位置，可谓 16 世纪“神圣罗斯”（其意义堪比“神圣罗马”）理念的萌芽。编年史家评价道：“斯拉夫人和罗斯人是同一民族，只是在瓦兰人来到之后我们才称罗斯，而以前也本是斯拉夫人。”^④罗斯人被视为斯拉夫人的统治者：“奥列格为罗斯王公坐镇基辅，实行统治，并说：‘基辅将成为罗斯众城之母。’当时在他的统治下有瓦兰人、斯拉夫人和其他部族的人，统称为罗斯人。”^⑤按照俄罗斯史学家阿克萨科夫（Аксаков К. С.）的观点，在直至彼得一世之前的俄罗斯，其人民与国家是和谐共存的，而在西欧，这两种力量是不合理地混在一起的。“斯拉夫人保存有真正的基督教及适合其意义的村社制度（这是人类理想联盟的体现），国家并不是由其所刻意建立的，而是自发形成的。”^⑥俄罗斯史学家克柳切夫斯基（Ключевский В. О.）

① 王松亭译注：《古史纪年：古俄语—汉语对照》，第 6 页。

② 同上。

③ 同上，第 8 页。

④ 同上，第 14 页。

⑤ 同上，第 12 页。

⑥ Платонов О. А. Святая Русь. Энциклопе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М.: Православ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рус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 2000. С.24.

将罗斯人与斯拉夫人之间的关系界定为“为命运所决定在同一个国家联盟中过共同生活的、一个对另一个占优势的两个部落，分成了不同等级。”^①第6420（912）年项下有关罗希战争和约的记载说明了罗斯人在整个斯拉夫民族中的优越地位：按照罗斯王公奥列格的要求，希腊给罗斯人的船只提供了优质的锦缎船帆，而提供给斯拉夫人的船帆却用亚麻布制成，在航行中风一吹就会破损。

瓦兰人（即现今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古罗斯国家形成过程中一度起着领导作用，被认为与罗斯人源自同一先祖：“雅弗的后裔包括：瓦兰人、瑞典人、诺曼人、哥特人、罗斯人、盎格鲁人、高卢人、沃洛赫人、罗马人、日耳曼人、卡尔利亚兹人、威尼斯人、格努埃兹人等等。”^②有关罗斯人与瓦兰人曾经的紧密关系，在其所信奉的异教神庇隆形象中亦可得到证明：其被史学家认为是斯堪的纳维亚神索尔（Thor）的翻版。瓦兰人是受邀前来管理罗斯，最初将北方的诺夫哥罗德视为中心城市：“瓦兰人到后，这块土地始称罗斯国。现今诺夫哥罗德人，正是瓦兰人的后代，而以前在这里居住的则是斯拉夫人。”^③但斯拉夫史学界对这一记载普遍持怀疑态度。“大多数历史学家在解读这段文献时并没有只看表面，他们认为斯堪的纳维亚人并不是受到邀请，而是为了寻找资源（如毛皮和贵金属）并控制通往君士坦丁堡和中东的水路，例如第聂伯河（注入黑海）与伏尔加河（注入里海）。”^④古罗斯编年史家显然对这段初始罗斯史进行了文学性重构，希图为瓦兰人最初对罗斯土地的统治提供有利于罗斯人、罗斯国家的合法注解。

保加利亚与罗斯同属斯拉夫世界。在历史上，保加利亚曾一度被认为是国力最为强盛、文化最为先进的斯拉夫国家。在《古史纪年》的记载中，保加利亚人的先祖被认为是不伦的、不受神之护佑的：“赫瓦利斯人是摩押的后裔，而保加利亚人是亚扪的后裔。罗得与他的两个女儿同居生下摩押和亚扪，其子孙繁衍发展为赫瓦利斯人和保加利亚人，所以说这些部落是不洁净

① [俄]瓦·奥·克柳切夫斯基著：《俄国史》（第一卷），第143页。

② 王松亭译注：《古史纪年：古俄语—汉语对照》，第2页。

③ 同上，第10页。

④ [乌]库比塞克著：《乌克兰史》，颜震译，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9年，第22页。

的。”^①编年史家认为，斯拉夫人从多瑙河流域迁往别处，是由于保加利亚人的驱赶：“当斯拉夫人居住在多瑙河流域时，从斯基泰人，即从可萨人那里迁来所谓的保加利亚人，定居在多瑙河流域，排挤斯拉夫人。”^②保加利亚人的骚扰、驱赶被认为是造成斯拉夫人流浪与迁徙生活的外族动因之一。

在宗教层面上，保加利亚人比罗斯人更早接受了基督之光的烛照。然而，古罗斯编年史家试图以对保加利亚受洗过程的记载阐明其被迫受洗的态度。第 6366（858）年项下记载道：“米哈伊尔大帝率领大军从海陆两路进攻保加利亚。保加利亚人闻讯，不敢抵抗，请求米哈伊尔大帝为他们施洗，并答应投降希腊。”^③随后在第 6377（869）年项下记载道：“保加利亚人全体接受洗礼，信奉基督教。”^④编年史家并未否认保加利亚在斯拉夫世界中最先受洗的史实，但其以另外的形式点明了罗斯人乃自愿靠近上帝及罗斯应被认为是斯拉夫世界正统基督教承继者的地位。

有关罗斯王公斯维亚托斯拉夫对其迁都愿望的描述，反映了保加利亚周边国度的发展程度与物产分布：“从希腊送去黄金、锦缎、名酒、多种水果；从捷克和乌果尔送去白银和宝马；从罗斯送去毛皮、蜂蜡、蜂蜜和奴仆。”^⑤艳丽的绸缎被认为是拜占庭的代表物产：“从拜占庭和东方国家输入的绸缎，色泽华丽，花纹精美。达尼尔·扎托奇尼克的《祈祷》一书中说：‘绸面鲜红，花样繁多。’绸缎在罗斯特受器重：凡谈到与拜占庭贸易的，到处都提及贵重的织物。有时，它还用作价值的尺度。”^⑥森林被认为是罗斯人生存和贸易的主要来源，在《古史纪年》的记载中，罗斯王公对希腊使者的赏赐即包括毛皮、蜂蜡等物；斯拉夫人被征收的贡赋除武器、钱币（如格利夫纳、谢略克等），还包括毛皮（如灰鼠皮、黑貂皮）、蜜酒等。

编年史家着重点明了武器意象所反映的罗斯民族性格：可萨人根据波利安人上贡的双刃锋利之剑认定，“将来他们会向我们和其他部族收取贡赋”^⑦；

① 王松亭译注：《古史纪年：古俄语—汉语对照》，第 123 页。

② 同上，第 5 页。

③ 同上，第 9 页。

④ 同上，第 11 页。

⑤ 同上，第 35-36 页。

⑥ [俄]拉夫连季编：《往年纪事》，第 344 页。

⑦ 王松亭译注：《古史纪年：古俄语—汉语对照》，第 8 页。

希腊人亦凭借斯维亚托斯拉夫不爱金帛爱武器这一点，认定只能向其纳贡的事实。罗斯王公在宣誓守约时，在神像前放置的是盾牌、武器及金饰，由此可见武器在整个罗斯国家精神与物质层面所占地位。有关罗斯人武器的描写，或可被看作是一种民族的象征。在《古史纪年》中，有关此类象征的描写并不鲜见，如德列夫利安人的扣襻、保加利亚人的靴子^①、佩切涅格人的马刀、弓箭和头颅酒器、希腊人的一应教堂物事（黄金、锦缎、宝石，耶稣受难的遗物，包括荆冠、铁钉、绛袍、圣徒遗骨）等。

古罗斯编年史家称受洗的罗斯人为“新的基督徒，是上帝的选民”，“我们罗斯人，受圣灵照耀的新人”^②。“罗斯受洗”成为《圣经》所载上帝将另选信民的尘世表征，成为上帝与之另立新约的现世证明。《古史纪年》着重讲述了犹太民族因亚伯拉罕被选、又因信奉可融化的金牛犊、殴打先知而被弃的民族史，犹太社会因而成为离散社会的象征^③。编年史家试图以罗斯历史映衬《圣经》所述的犹太民族史，“这些传说中的犹太的历史事件在编年史中用来和罗斯史事件相对比”^④，凸显上帝对罗斯民族更甚于犹太民族的独特青睐。尽管在其所述罗斯史中，不乏其对异教偶像的崇拜与献祭、最初对基督教的抵制（如杀害瓦兰基督徒父子）及王公间内讧杀戮等罪过^⑤的记载，但罗斯依旧被认为是最后接近上帝的全新选民。罗斯人获得以本族语认识上帝的权利，罗斯得以最后受洗，罗斯大地上出现的一系列圣徒、神迹等皆为证明（如在全罗斯首度封圣的鲍里斯格列布兄弟、第 6605 年项下在瓦西里科军队上方闪现的大十字架、第 6618 年项下在基辅洞穴修道院内出现的一道连接天地的火柱，其被编年史家视为是天使降临）。这一思想在罗斯首任都主教伊拉里昂（Иларион）的《法与神赐说》（Слово о Законе и Благодати）中得到了明确表述。

① 据《古史纪年》第 6493（985）年项下记载，弗拉基米尔王公的舅父多布雷尼亚凭借保加利亚俘虏所穿的靴子断定他们不会向罗斯交纳贡赋，认为应该去找穿树皮鞋的队伍。

② 王松亭译注：《古史纪年：古俄语—汉语对照》，第 65、71 页。

③ 《古史纪年》还记载了因不被上帝保佑而致灭绝的民族，如奥布尔人，以及被马其顿王用铜门封在山内的 8 支异族人，这 8 支异族人被认为将在世界末日的时候迁出。

④ [俄]拉夫连季编：《往年纪事》，第 299 页。

⑤ 在古罗斯编年史家看来，这些邪恶、内讧事件的发生都是由于魔鬼从中挑拨与作祟，最终都会被上帝之力所击溃、瓦解。

最后，有关弗拉基米尔王公选择宗教的传说，就像是展示世界宗教群像的一座长廊，如保加利亚人的伊斯兰教^①、罗马人的天主教、可萨人的犹太教以及希腊人的东方正教。有关罗斯使臣被希腊金碧辉煌的教堂与完美的祈祷仪式所折服、不愿信奉任何其他宗教的书写，“即使编年史上的这则故事只是个传奇，但它的产生本身就是基督教给予俄罗斯人灵魂的赠礼的一个宝贵的证明。”^②罗斯人坚信其所信宗教是神之赐予，“但文献刻意回避罗斯从拜占庭那里接受基督教的事实，非但如此，反而强调罗斯的信仰来自上帝本身的思想。”^③

可以说，罗斯使者在拜占庭东正教礼拜仪式中看到了隐约的天堂影踪及与上帝沟通的可能，而这正是罗斯民族所虔诚寻觅之物。“宗教源于对内在世界和超验世界之间的差距的感觉和对超验世界强烈的向往：人在宗教里孜孜不倦地寻找上帝，而天国以回吻的方式贴近人间。为了让宗教不仅成为渴望与问题，还要成为满足与答案，必须让这种对立、这种紧张让位于充实，以使超验之物吸收内在的现实，变成能被感受的，而不只是未知的。”^④东正教美好灿烂的礼拜仪式显然与罗马天主教严格、禁欲的礼拜仪式有很大的区别，其更符合罗斯民族的宗教审美期待。《古史纪年》有关罗斯宗教拣选的传说，意在证明罗斯人注重的并非尘世短暂的欢愉，而是末日审判的宽恕与未来世界的极乐，如俄罗斯思想家别尔嘉耶夫（Бердяев Н. А.）所认为的，“俄罗斯民族就其形而上学的本性，就其所担负的世界使命而言是一个终极的民族。”^⑤

① 在保加利亚境内至少有两种宗教存在，即基督教和伊斯兰教。

② [俄]瓦·瓦·津科夫斯基著：《俄国哲学史》，张冰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页。

③ 郭小丽：“俄罗斯认同中‘我-他’身份构建的历史流变”，《俄罗斯研究》，2013年第3期，第123页。

④ [俄]布尔加科夫著：《亘古不灭之光——观察与思辩》，王志耕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第67-68页。

⑤ [俄]尼·别尔嘉耶夫著：《俄罗斯思想：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俄罗斯思想的主要问题》，第190页。

结 语

《古史纪年》力图以对罗斯国家的起源、时空与自我—他者形象的文本构建,赋予古罗斯帝国以神性起源、合理版图及其在世界历史中的自我定位,其既是承载古罗斯自我形象认知的重要载体,也是罗斯族裔对初始古罗斯帝国的身份与权力认同历程之关键见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包括《古史纪年》在内的古罗斯典籍将《圣经》中有关罗斯的模糊记载予以清晰化,为古罗斯帝国的精神、文化与物质构建提供了合法注解。“帝国关系的维持,需要大力仰仗文学文本”^①。由《古史纪年》所开启的古罗斯帝国精神构建,今天已然成为俄罗斯民族“文化的集体想象”的重要一环,“它与一切社会、文化组织都无法分开,因为一个社会正是通过它来反视自我、书写自我、反思和想象的。”^②

【Abstract】 Ancient Rus *Primary Chronicle* could be described as an important part of Russian ethnic groups' imagination and identity. It is regarded as the initial literary text to construct and maintain the image of ancient Rus Empire. As a historical book, it presents the national ecology, power alternation, foreign exchanges and religious visions, showing the historical integration of nations and state-building by Rus ethnic groups. *Primary Chronicle* attempts to empower the ancient Rus Empire with divine origins, rational territory and its self-orientation in world history in order to build the initial image of ancient Rus Empire.

【Key Words】 *Primary Chronicle*, Ancient Rus Empire, Self-Other Image

【Аннотация】 Сборник исторических записей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 можно охарактеризовать как важную часть представлений об идентичности этнического русск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 считается первоначальным литературным текстом, описывающим

① 赵一凡、张中载、李德恩：《西方文论关键词》，第207页。

② 孟华主编：《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24页。

создание и поддержание образа империи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в форме исторической книги описывает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уклад жизни, смену власти, внешние связи и религию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собой исторический взгляд на древнерусскую этническую историю достиже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строительства. «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 изображая божественное происхождение империи Древней Руси, разумность территориального расположения и собственного позиционирования в мировой истории, пыталась создать начальный образ древнерусской империи.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Повесть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 древнерусская империя, образ я-другой

(责任编辑 阎德学)

回首改革

——И.Т·弗罗洛夫与日本《朝日新闻》记者的谈话
(1993年2月)

И.Т·弗罗洛夫* 安启念** 译

译者前言:

И.Т·弗罗洛夫(1929-1999)是俄罗斯著名哲学家,科学院院士,哲学学会会长。去世于我国杭州。早年因与李森科伪科学坚决斗争和生物学哲学问题研究成果卓著而享誉学术界。在苏联率先从事全球性问题研究和人的综合研究,一手创建人研究所和《人》杂志。曾任《哲学问题》、《共产党人》、《真理报》主编,以及苏共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委员,1987-1989年担任戈尔巴乔夫助手。其思想对戈尔巴乔夫产生重大影响,是苏联剧变的关键人物之一。1989年起与日本《朝日新闻》建立并保持密切联系,1993年2月与《朝日新闻》特派记者在莫斯科就个人生平事业和苏联时期一系列重大事件做了谈话,时间长达一周。谈话主要内容与苏联改革有关。他作为改革的直接参与者、领导者,在谈话中披露了大量重要细节,特别是以切身经历说明了戈尔巴乔夫民主人道的社会主义思想的由来和改革期间苏联思想理论领域的激烈斗争。他对苏联剧变教训的总结也因其哲学家、思想家的特殊身份而别具一格。访谈的部分内容曾在日本和俄罗斯报刊发表,在俄罗斯发表时与戈尔巴乔夫有关的内容多数被删。2005年10月弗罗洛夫的夫人别尔金娜女士把访谈的完整录音整理稿交给译者。这次翻译时对关于弗罗洛夫个人生平的内容以及少量其他内容作了删节,涉及苏联剧变的内容基本上

* 本文是根据弗罗洛夫的夫人别尔金娜(Г.Л. Белкина)交给译者的访谈录音,整理成稿。

** 安启念,中国人民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全部保留。翻译量约占原稿的 80%。标题是译者加的。

【内容提要】 俄罗斯的命运取决于俄罗斯社会和俄罗斯文化。自由和物质丰裕的两难论题贯穿俄罗斯的全部历史。在某种意义上，戈尔巴乔夫改革带来了自由，但是夺走了俄罗斯人的面包，俄罗斯也就不需要改革带来的自由。离开这个两难论题，不能理解俄罗斯发生的事。“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个词组是弗罗洛夫想出来的。他提出来，戈尔巴乔夫同意了。改革的反对者是教条主义者，他们认为戈尔巴乔夫背离了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是一个非常善变的人，最大的缺点是懦弱，容忍权力的丧失。戈尔巴乔夫把精力集中在做总统上，把党扔给了其他人，党的发展失去控制。党就像一个原子反应堆，它在工作，而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戈尔巴乔夫等为反应堆服务的人跑掉了。没有人调节、控制，反应堆发生了爆炸。

【关键词】 苏联解体 戈尔巴乔夫改革 改革失败的教训

【中图分类号】 D851.2; K512.5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16)05-0021(61)

记者：本报组织这次谈话，目的是为了把您介绍给广大的日本读者，让他们像对戈尔巴乔夫一样对您也有很好的了解，让他们明白谁是戈尔巴乔夫最重要的助手。此外想要说明 1991 年“8·19”政变前苏联的情况，以及现在正在发生什么事。不过我们不想用现在报纸上流行的语言讲述这些事，而是提供另外一种关于它们的观点。

弗罗洛夫：我觉得谈话一开始最好不要谈“俄罗斯的局势”，而是要谈“俄罗斯的命运”。俄罗斯的命运，与此相关的俄罗斯的、人民的命运，愿意的话还有知识分子的命运，历史上的和现在的情况，我个人的命运，接下来是改革和它在俄罗斯以及世界的革新中的作用。可以把我个人的某些回忆放在这个一般性的思想基础上，放在这个背景中。因为我不想按照您的提问来讲述自己的生活。在普遍性问题的背景下并联系这些问题来讲述——这样会更有趣一些。只在这样的联系中讲，为了不把我个人的历史放在第一位。

我们就从这里开始。俄罗斯的命运……，我总是，对我来说是最主要的，

把俄罗斯的命运与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人类对全世界的、普遍的团结一致的要求”联系在一起。这是我的基本思想。我认为，俄罗斯的命运，不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只有像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表达的这样，即和“人类对全世界的、普遍的团结一致的要求”相联系，才能得到解决与确认。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样就与今天不断增长着的把俄罗斯与某些其他国家对立起来的民族—爱国主义倾向划清了界限。

两种倾向。一种倾向（可以称作“西欧主义的倾向”）是完全融入发达国家正在发生的各种事情之中，事实上是终止俄罗斯作为超级大国的存在。一些人说得非常好：俄罗斯成为殖民地，落入对美国和西方的紧密依赖之中。不少人认为这很好。我们可以请求借贷，包括向世界银行等借贷。它们会给我们贷款，俄罗斯则会融入西方的发展之中。这是一种倾向或者方向。

第二个方向是对第一个方向的反作用。现在社会—爱国主义情绪在不断增长。这可以和过去的“西欧主义者”、“乡土主义者”作比较。有这种情绪的人认为，俄罗斯应该确认自己的独立性，既和西方对比，也和东方对比，确定自己的伟大和不可重复性，从周围世界独立出来。

我，与此相反，像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样，认为只有通过实现走向全世界的普遍的团结这种总体趋势，俄罗斯在今天才能实现自己的伟大。我就是想让这样的思想在我们那里被人们接受。

因此，我想把注意力转向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关于宗教大法官的传说”。大家知道，在小说中，是伊万·卡拉马佐夫讲述这个传说的。传说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两难论题：人的自由和他的物质丰裕。故事发生在宗教裁判时期的西班牙。基督再次现身。人们把他投入监牢。他和宗教大法官进行了一次谈话。宗教大法官对基督说：“你在我面前现身，给人们带来自由，说人不是单靠面包活着，他应该是自由的。”接下来说：“在15个世纪中，人们为这个自由而吃苦头。现在我们夺走了他们的自由，但是他们活得很好，他们有面包。”于是就出现了一个两难选择：或者是自由，或者是面包。因为，如宗教大法官所认为的，人自己就其本性而言，是暴乱者，应该把他驯服。当你驯服他，也就是剥夺他的自由的时候，他就开始工作，开始过好日子。于是宗教大法官说：“我们纠正你的事业，为了给

人们自由而献身的基督的事业。你离开了高傲的人们，回到驯顺的人这里。你离开了高傲的人们，来到吃饱了的人们这里。因为我们纠正了你，消灭了自由。现在我们需要你。甚至即便你是真正的基督，我们也不需要你。我相信你真的是基督，但我们明天将把你作为异教徒烧死，因为你使人们成为不幸的。”

离开上面的说法，不能理解俄罗斯。这是一个自由和物质丰裕的两难论题，它贯穿俄罗斯的全部历史。我认为，离开这个两难论题，也不能理解我们今天发生的事。没有它，不能理解改革在我国历史中的地位和作用。在某种意义上，戈尔巴乔夫处在基督的地位上，与改革一道，他带来了自由。但是您看，这是怎么收场的。叶利钦，像是恶魔或者敌基督。但是他和戈尔巴乔夫联系在一起。他继续了戈尔巴乔夫开始的过程。他们是统一的，虽然一个消灭了另一个，叶利钦消灭了戈尔巴乔夫。

您看，现在俄罗斯有许多人，就像宗教大法官那样说话：当改革和戈尔巴乔夫从我们这里夺走了面包，也就是物质丰裕的时候，为什么我们还需要它们带来的自由？不错，在改革和戈尔巴乔夫之前，在停滞的年代和斯大林时期，没有自由，有残酷的镇压，等等。但是，不管怎样，我们过得比现在好。很遗憾，这也是现代思想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轴心。我认为，离开它不可能懂得俄罗斯当前的情况。这不是抽象的哲学思考，这是政治斗争的中心问题。这不是抽象议论，因为如果这个两难论题的解决得出我们需要面包而不需要自由的结论，那就可能会有内战。

十月革命后就是这种情况，同样的情况也可能在现在存在。政治家们想，不论现在的政治家还是过去的政治家，是他们在决定俄罗斯的命运。但俄罗斯的命运是由其历史发展的普遍的命定结果决定的。俄罗斯的命运来自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来自那些俄罗斯社会、俄罗斯文化所饱含的思想。正是这种情况，不论西方，还是日本，应该搞清楚。完全不是金钱，不是借贷，不是物质的东西，在决定着俄罗斯现在的状况及其未来的命运。不如说是相反：这些物质的东西是由某些植根于文化中、俄罗斯文化中的东西决定的。

这是一种在其他文明中不会被理解的东西。在西方国家和东方国家，包括日本，不会被理解。我去过那里，并且看到了这种情况不会被理解。对这

个最主要问题的不理解，导致日本人经常说：“不错，我们不理解为什么这种情况发生在俄罗斯。应该这样做，而不是那样做，是很清楚的。但是为什么在俄罗斯人们不这样做？是不是他们是一些笨人。可能还有其他原因，例如他们不喜欢工作，等等。”

要明白这是最主要的东西，然后就会以另一种方式判定和评价俄罗斯人的行为，包括俄罗斯政治家的行为。这里没有任何神秘的东西，这是现实。这就是丘特切夫为什么说：“理智不能理解俄罗斯”……。理智说的是理性，西方文明的严格的理性。这里可能有不少丘特切夫作为诗人的夸大，但不管怎么说，情况确实如此。

我带来一位俄罗斯思想家的几本书给你们看。他是尼古拉·别尔嘉耶夫。这些书都是关于我们现在说的这种情况的。别尔嘉耶夫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发生的事作了思考。革命后，从1922年起，他生活在国外。他也是在外国去世的。在这些书里，他对俄罗斯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等的命运作了思考。一切都是由很复杂的情况在俄罗斯造成的，并不像政论作家们现在说的那样。这是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的命运》，这是他的《俄罗斯思想》。

还有一种看法，认为俄罗斯思想的定义、俄罗斯的命运，是同一个东西。与它相关联的还有一种情况，不考虑这种情况就不可能理解俄罗斯社会思想的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在俄罗斯的发展。没有它，在俄罗斯什么都不能理解。叶利钦现在禁止俄罗斯共产党，实际上被禁止的是共产主义意识形态。任何替代它的东西都没有提出来。但是在我们的出版物上，尤其是在电视上，到处在传，共产党被禁止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被禁止了。大家立刻松了一口气。为什么？因为它们好像是被布尔什维克、共产党人、列宁强加在俄罗斯身上的。它们和俄罗斯没有连在一起，它们会很快烟消云散。它们不是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在描述当前的形势时，现在俄罗斯的出版物就是这样说的。

但问题是，这一思想本身，这种态度本身，在政治上就是不正确的。既然它不正确，就可能导致不正确的政治结论。要知道，还是这位别尔嘉耶夫，在他的另外一本书《俄罗斯共产主义的由来与意义》里指出（他对共产主义持否定态度），共产主义思想在俄罗斯有着深刻的民族基础。它是俄罗斯文

化的一部分，它和俄罗斯文化发展中的革命路线，包括“西欧主义”路线，有着深刻的继承性联系，从拉吉舍夫、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别林斯基等人开始，到列宁。民粹派，然后是列宁。深刻的历史联系，导致列宁说（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思想）：“俄罗斯历经痛苦获得了马克思主义”。俄罗斯不是简单地从西方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是从深处接受了它，好像是它生出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思想落在已经准备好了的土壤上。因此马克思主义就像是俄罗斯文化历史的一个部分，有深刻的历史根源。普列汉诺夫、列宁在后来的出现，是非常自然的事。他们都是俄罗斯知识分子。普列汉诺夫起初是作为民粹派，也就是革命民主主义者登上舞台的，后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是俄罗斯知识分子历史的脉络之一。

另外一条脉络是与君主专制制度、国家相联系的宗教—哲学。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在这条线索上。陀思妥耶夫斯基有个老朋友叫巴别达诺斯采夫（他在长达 20 年的时间里领导了圣教公会），这个人就有宗教大法官的某些特点。他是一个非常反动的人，是宗教大法官的原型。自由主义的俄罗斯知识分子捍卫的正是宗教大法官传说的另一面——自由。他们合乎逻辑地走向了革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别尔嘉耶夫在年轻时也曾是马克思主义者。俄国曾有所谓的“合法的马克思主义”，别尔嘉耶夫就曾经是这种合法的马克思主义者。他和许多俄罗斯知识分子—思想家一样，后来，在十月革命后，移民到西方。就像在宗教大法官的传说中一样，他们渴望自由。他们渴望自由和革命。而这种自由，这种革命，压制他们，抛弃了他们。陀思妥耶夫斯基采取了另外一种立场。他在小说《群魔》中，对革命者们，还有后来出现的现象，作了描绘。他对他们作了漫画式的描绘，嘲笑他们，在很多方面预见到后来发生在这些参加了革命的俄罗斯知识分子身上发生的事情。

我再重复一遍，今天俄罗斯在思想和政治领域发生的事，如果不考察它们的历史根源，就不可能理解。主要的是，这种考察告诉我们，叶利钦和所谓的“民主派”，这些现在掌权的人，对这一历史趋势的破坏是多么的错误、不明智和愚蠢。这一趋势不可能被摧毁。无论如何，再过一年、两年，再过五十年，它还会让人们知道自己。思想是不能被消灭的。叶利钦这些人想，可以把和共产党有关的东西消灭掉，把那些似乎是从外部强加给俄罗斯的东西

西消灭掉。但是，这些东西实际上是从多少个世纪的深处走来的。它们在很长的时间里抓住了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头脑。因此它们是不可能被根除的。

这是一颗叶利钦和“民主派”放在自己脚下的具有爆炸性危险的地雷。因为不能这么做。这也是当前形势的特征。这是必须予以考虑的客观因素，不论我们对待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还是马克思主义，都必须如此。我们可以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思想和马克思主义与俄罗斯历史的内在联系持否定性态度。我没有断定这是积极因素，但它是历史事实。因此，当今天的“民主派”不想考虑这个事实时，他们制造了一种非常危险的局势，一种精神性的局势。

骤然取消苏维埃政权和马克思主义，是一颗政治地雷。因此 1991 年 8 月的事件，这些突如其来的改变，导致了巨大的社会—政治变化，导致了经济恶化、生产下降。这呼唤出苏联解体和种族之间的战争，其中也包括引发了非常严重的精神变形。这造成了俄罗斯的局势不稳。广大民众，政治家（包括日本的），我觉得应该不是从一个个侧面去看俄罗斯：这是经济问题，谁在那里相互斗——叶利钦和哈斯拉托夫。当然分析这些问题也很重要，但是政治家和民众应当有一个总体性的理解，有一个系统性的看法，有一个关于俄罗斯过去发生的和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的完整的看法。通过历史解释现实，这就是我所说的。应该从这样的观点出发。

改革开始时，我们最先考虑的就是关于总体性发展的看法。我们把注意力转向历史，包括苏联时期的历史。我总是对戈尔巴乔夫说：现在，在改革的最初阶段，应该进行大量分析性的历史工作。我提出了这样的方法。如果我们从这样的认识出发，即历史（像列宁所说的）是按照螺旋形曲线发展的，那么改革的任务，我们的任务，将是使螺旋的第一圈尽可能地接近地面。我们应该向后，也就是回顾我们的历史。在历史中一切都在和解、结合。“红军”和“白匪军”和解。要让我们手中有已经不止是最近 70 年的历史，而是无条件地把这 70 年包含在内的俄罗斯一千年的历史。按我的理解，任务就在于此，包括改革的任务。

戈尔巴乔夫同意了。因为当时我国社会被矛盾撕裂了。“民主派”是一种声音，保守派完全是另一种。这是根本不可调和的矛盾。别尔嘉耶夫是反

共主义者，我是共产主义者。但是我研究别尔嘉耶夫不止是为了了解他。我爱别尔嘉耶夫，我把他当作思想家看待，对他的许多东西都很重视。

大家看，这就是和解：把全部文化统一在一起。因此早在 1986 年，当时我是《共产党人》杂志主编，给苏共中央写了一封便函，建议出版 19 世纪末—20 世纪初俄罗斯宗教哲学家的著作，包括别尔嘉耶夫的著作。政治局采纳了我的建议，著作出版了。

成为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以后，我做的第一件事，是安排了戈尔巴乔夫与东正教全俄罗斯大牧首及圣公会成员的历史性会见。在此之前只有斯大林会见过大牧首。斯大林之后，戈尔巴乔夫是第一个会见大牧首、圣公会成员的人。这是在 1988 年。这次会见后，开放了 800 多座教堂。

我不认为哲学会引起您的很大兴趣。当然，有些事情应该说一说，因为现在我们俄罗斯的主要问题之一，如您所知，就是意识形态—精神的真空，思想—哲学的真空。这可以作如下解释：我们现在宣传的基督教—东正教未能提供一些内涵广泛的哲学原理，比如说，像天主教在基督教领域所做的那样。从另一个方面看，是因为那种粗鲁的斯大林主义的教条主义式的马克思主义被否定了。现在，这种马克思主义总是在被否定，人们总是在说我们多么不喜欢它，我们怎样拒绝它。但问题是，这种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早就被我们的许多哲学—意识形态专家否定了。我们所有的人，其中包括我，可以说信奉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解释，一般来说就是人道主义哲学。在西方，在西欧，这被称作向马克思本来思想的回归。

这些“六十年代人哲学家”^①一直在做这项工作，这成为他们生命中最主要的事业。但是，看起来广大民众对此几乎一无所知，而官方的意识形态又几乎不接受它。我觉得，戈尔巴乔夫发动的改革开始以后，作为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才逐渐被接受。由于这个原因，戈尔巴乔夫才邀请我去工作。但是后来发现，这种人道主义马克思主义的根基很不深厚，它与改革一起被取消了，也被戈尔巴乔夫本人取消了。

记者：这就是改革的结果？

^① “六十年代人哲学家”（шестидесятник）指 20 世纪 60 年代开始在苏联社会舞台扮演重要角色的进步活动家，他们基本上都是 50 年代的大学毕业生——译者注

弗罗洛夫：不，这是与改革的终结一道发生的。戈尔巴乔夫也参与了这个过程。这些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的这种解释，不是他自己想出来的。我们对他做了某些工作，他接受了，而当形势发生变化时，这种解释立即失去了意义。

我经常被人问：“为什么他的这篇、那篇文章，或者著作，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你的著作中的话？”我的著作用英文、德文发表，这是大家都知道的。现在我开始思考与分析过去的情况，发现包含人道主义哲学和对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解释的著作在我们这里很少。我想，原因是我们的时间太少了，我们能做的事情太少。在我们那里有国家意识形态，宣传，还有相应的哲学教学。只是在1989年，我们才成功地编写并出版了新的哲学教科书——《哲学导论》，而到1991年，已经发生了改变。

但是我相信，等一切都平静下来，人们还会回到这个问题上，因为做这些事非常难。这个方向上的研究工作需要几十年的时间。如果这本教科书哪怕使用上5—10年……。我们已经想要出更新后的第二版了。正是在这里，在人道主义方面，我们想继续努力。但是现在这已经不可能了。为出新版而重新修订的这本教科书第一卷的手稿，已经在我手上，但是谁都不接受，不愿意出版。总之，这就是那种空虚，意识形态真空。

那些现在和叶利钦一道掌握政权的人，其中有布尔布利斯等思想家，但他们从来不是“第一梯队”的高水平的哲学家。他们这些人我都认识。他们是从外省来的，而在我们那里，莫斯科和各省有很大的区别。

如果你们对我国的哲学生活有兴趣，想一想60—80年代哲学在我国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啊，而现在又成了什么样子！我在《哲学问题》（1992年——译者）第10期发表了一篇文章，《哲学导论》这本教材的所有作者都参加了文章的写作。这是一篇概览性的文章——《科学的人道的哲学原理在60—80年代的发展》（题目是《科学的人道的哲学原理在60—80年代的发展：总结与前瞻》——译者）。但是在我们那里人们也不怎么宣传它。

你们看，这方面的情况如何？当改革结束以后，也就是在1991年8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科学的人道主义的原理的发展，在我们俄罗斯，被终止了（现在，在这个时候，我这样认为）。

但是，不久前我在中国讲了两周课，但是在那里我说的完全是另外一套。中国翻译出版了我的两本书，是关于人的问题和关于辩证法的。但他们认为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或者顶多是修正主义者。

记者：您在那里是作为修正主义者发言的吗？

弗罗洛夫：我从来不说假话，这是我的一个大缺点。从来不说迎合某个人的话。家里人叫我“诚实的日本人”。我的妻子，嘉利娜·列奥尼多芙娜，对我说：“人们不问你的时候，你别说话。”不过我应该对你说，在中国事情没有这么简单，从这个观点看。尽管我被当作修正主义者，那里有我的学生，他们写了关于我，关于我的著作的学位论文。我对他们产生了一定影响，我自己感觉到了。例如在北京大学现在建立了人学中心。《人的前景》这本书在中国也出了两版。

记者：有人批评你吗？

弗罗洛夫：大家看，我的处境如何？我国的所谓“民主派”认为，因为我为马克思、马克思主义辩护，并且曾经从事党的工作，所以对对他们而言我是不可接受的，是保守派。而那些现在正在恢复中的共产党，它们不接受我是因为，在他们看来，我是反马克思主义者，修正主义者，与戈尔巴乔夫在一起。

其实，就是和戈尔巴乔夫，我也分手了。完全是因为他后退得太远，抛弃了原来坚守的观点。他放弃了这些观点。但我不为所动。我现在持自我中心主义的观点：有我，也有所有其他人。这只是因为我毕生都在工作，并且研究出了一点东西，某些观点、某些立场。现在他们想把他们自己的东西全都强加给我，可我不愿意。

我只是一个俄罗斯人，我是一个有几分狡猾的俄罗斯庄稼汉。我有时会这样说话，让你不会立即明白，或者用开玩笑的方式，或者严肃地说。哲学本来就是这样的。这被称作“哲学的狡猾”。现在有许多人想让我站在某个人的立场上说话，也许是新共产党人，也许是叶利钦身边的人。让我放弃自己原先的立场。很多人都在等着我，其中也有戈尔巴乔夫，他也想让我像他一样谴责苏共，谴责马克思主义，但我不做这种事。不做这样的事，所以我是孤家寡人。但是现在已经没有任何人公开地请我做任何事，因为他们都非常

了解我。我不进行自我装饰。可能这是我的缺点——固执，等等。但他们知道我不会放弃。我只会说，这在于我不是固执。不，不是固执。我用许多许多年的研究形成了这些观点，相信这些观点，虽然做了不少修正。不过还因为我有我自己所说的“尊严感”，什么的。

我非常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表达自己思想的方法。我依据文学材料，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等人，做了很多工作。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里有这样一个说法，我非常喜欢。记得吧，伊万·卡拉马佐夫说，如果我拒绝这张通往美好未来的门票，那是因为，假如在那条路上哪怕有孩子的一滴眼泪，我也不能跨过它。简单地说，手段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就这样，陀思妥耶夫斯基把思想推进到极端，有时甚至到了荒谬的地步。把思想推到极端是为了更有力地表达这一思想。然后，突然地出人意料地结束了：“虽然可能我并不正确”。这样的一种方法：一直都在极端地强调这个思想，然后在结束时说：“虽然可能我并不正确”。

或者再看看托尔斯泰论艺术的文章。他应该证明，对人来讲，主要的和起决定作用的是道德哲学问题。他想说生命的意义，等等。他需要不断地解决这些问题。不然他活不下去。可是，记得吧，他这样说：“人不是死于肝病，不是死于心脏病，甚至不是死于炸弹，他死亡是因为他没有活下去的理由了，他不知道为什么活着。”这不是科学方法，但是是强有力的文学方法。这是非常典型的俄罗斯式思维。

为什么我反对简单地抛弃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观点？在给大学生讲课时，我对他们说：“陀思妥耶夫斯基说：‘如果在路上哪怕有孩子的一滴眼泪，我也不能跨过去’。或者是生活在物质满足中，而他一样要杀死自己，如果他不能回答‘生活的意义何在？’这样的问题。”但是能提出这样的问题：在现实中，有多少人，居民，能这样想？多少人不会提出这个问题，又有多少人，对他们来说主要的东西是富裕，是好生活？当有人指责马克思主义不把这些问题、生命的意义等等，当作主要的东西，那么可以这样说，马克思主义关心的是广大人民群众，是为了他们能享有现实的幸福，享有现实的繁荣，而不是关心精英。因为马克思主义在寻求怎样使所有的人都幸福，等等问题的答案。可能马克思主义找到的答案不正确，这是另外一回事，但

是不能以此就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反人道主义。为什么？我想的是人民的大多数，而您是精英，只关心和您类似的人。

托尔斯泰在自己最后的笔记、论文、书信中说：“我太痛苦了，很快准备自杀，如果我找不到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他是伯爵，生活在自己的庄园里，而他的周围是农民。几千、几百万个农民。对这些农民来说，这个问题不存在不仅是因为他们没有受过教育，还因为他们的生活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列夫·托尔斯泰的痛苦，可以给出肯定的评价，这很重要。但是为什么要指责那些主张为了一切人过上好日子而应该改变现有制度的人？为什么要指责？不，不能指责。

记者：我想起格瓦拉的话：“人民不理解我”。

弗罗洛夫：您知道，托尔斯泰有一本秘密日记，谁都不知道有这本日记，他总是把它藏起来，因为他怕他的妻子，索菲亚，找到它、阅读它。可是她整个日记都读过了，什么都知道了。像托尔斯泰那样的人，不能隐瞒什么或者藏匿什么。他整个人都让人一目了然。他把那些秘密思想写在这本日记本里。这样索菲亚就知道了，托尔斯泰直到岁数很大了还一直念念不忘，他曾经有一个女性的农民，阿克西尼亚。索菲亚因托尔斯泰与阿克西尼亚交往而疯狂吃醋。而托尔斯泰在她身上，在阿克西尼亚身上，看到了女性特征的体现，看到了那种彻底的无私。他把这写进了小说《女地主的早晨》。这是一段插曲。

托尔斯泰到农民那里，给他们讲解，做宣传，包括讲生命的意义。可他在日记里写道：“到了农民的木屋里，关于上帝、关于灵魂的非常令人感动的心灵的交谈……从房子里出来以后，我哭了。因为在这次高尚的心灵的交谈结束时，他们哽咽着向我要钱”。以羞辱收场。可托尔斯泰想，他已经那样理解农民了，而布道以要钱结束。由此我想，对托尔斯泰那样的人，对我们大家这样的人，这些问题可能有决定性的意义，可大多数人在以另外一种方式生活。人道主义就在于，一切都服务于大多数人，而不是针对精英，对吗？基督教和基督的学说获胜的秘密，就在这里。

但托尔斯泰本人（要知道，这是他的主要矛盾）因此从自己的庄园出走了。因为总有人给他写信，说他说一套，做一套，有财产，不与别人分享。

他痛苦。

1987年，我在当时那一届政治局会议上做记录。我刚刚开始做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会上所有政治局成员的发言都主张，不能从旧体制急剧地转向市场经济，应该小心翼翼地进行，不声不响地进行。和我坐在一起的还有戈尔巴乔夫国际事务方面的助手，切尔尼亚耶夫。他对我说：“你看，都这样说。现在，改革，主要的改革方案，将被取消。”后来戈尔巴乔夫发言了。那时还有严格的纪律，党的纪律。戈尔巴乔夫长时间地、激烈地发言，捍卫经济改革。大家都同意了，至少是不说话了。谁都没有捍卫自己的观点，大家都同意了戈尔巴乔夫。

记者：戈尔巴乔夫发言提出的观点是什么？

弗罗洛夫：进行改革。改变行政指挥的方法。取消集中化，引入市场关系。我和切尔尼亚耶夫非常高兴。戈尔巴乔夫真是好样的！现在我想，当时我是多么幼稚的傻瓜啊。当然，这里不需要任何革命性的改造。应该先在原有的框架内把经济搞好，然后再接着往前走。要是1987年开始这样做，那就不会是现在这样的情况了。这种观点不是利加乔夫的，这是邓小平的观点。

不久前我读了中国共产党最近一届全会上总书记的报告。那里非常清楚地阐述了这种看法。后来我也开始持这种看法了。甚至语词上的吻合令我吃惊。那些年我对戈尔巴乔夫说：“米哈伊尔·谢尔盖耶维奇，不要拒绝使用这些词——‘社会主义’、‘国家’、‘计划’，等等，不要拒绝这些词。同时在做的时候，可以像列宁在新经济政策时期那样。一切形式的所有制，包括私有制。让它们都存在。但把这叫作‘社会主义的市场关系’。至于那里有没有社会主义，这不重要。市场关系就是市场关系，不是社会主义的，也不是资本主义的，反正把它们叫作社会主义市场关系。因为人民不需要在思想意识中犯这样的‘错误’”

有这样一个东方谚语：“不要威胁一个你不能消灭的人”。当我们制定新党纲草案的时候，我是这个起草小组的领导人，我们在草案上写了（这在我的书里也可以找到反映），实际上我国没有社会主义。你们看，这也是哲学的狡猾。先说“社会主义的新人道主义面貌”，然后开始说“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个词组是我想出来的。我提出

来，戈尔巴乔夫同意了。后来戈尔巴乔夫的反对者，教条主义者，反对这一提法，他们说，怎么，我们需要建立人道主义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要知道，社会主义究其本质而言就是人道主义社会。是不是说，你们断言我们还没有社会主义？对此我作了非常简单的回答：“想一想吧，做个三段论推理”。对我来说很清楚，还没有社会主义。但是我没有断言，没有社会主义。我不认为学者应该这样做：他们就像埃及的祭司，他们知道某个东西并把它作为秘密。一些口号被抛给人民，人民相信它们。但从另一个方面，我也不认为需要把实际情况与人们在我们之前的看法一刀两断。我们现在想得一样了。好吧。可是制造一些傻瓜，愚弄我们以前的人，也不应该。过去的条件不一样，意识水平不一样，知识水平也不一样。他们是另外的一类人，其中有许多卑鄙下流的人，残酷的人。

不能让一切都沿着直线走。不能让历史走直线。民主派说，社会主义建设的 75 年遭到失败。当我们起草党纲的时候，我总是提出这样的问题：发生了革命，然后是国内战争，军事共产主义政策。这一时期建设的是什么？社会主义？不。发生了国内战争，新经济政策，这很清楚。相反，引进了资本主义关系。这就是说，我们从 1917 年一步步走到列宁去世，走到 1924 年，在任何地方都没有开始建设社会主义。后来开始了工业化和集体化，它们是什么？工业化是在解决所有文明都要遇到的问题。国家应当从落后状况，从沙皇俄国的结构上升到以经济为基础的关系。没有这些变化，就没有任何社会主义。如果没有各种工厂，不会有社会主义。俄罗斯曾经是一个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应该把她建成先进国家。这里还要加上一个极为重要的任务：俄罗斯曾经处在敌对势力的包围之中——资本主义的、敌对力量的包围。她为战争作了准备。工业化是对战争的准备。建设了拖拉机工厂。在拖拉机工厂，既可以生产拖拉机，也可以生产坦克。制造坦克，就是准备战争。科学技术曾经有一个充满发现的时期，例如在铝的生产方面。工业需要铝，飞机机身是铝，也包括战斗机的机身。在开始修建工厂等等的时候，人们涌进城市，工人阶级形成了。可是在农村没有作为商品的粮食，也就是国家可以拿在手裡卖给工人的粮食。斯大林“解决了”这个问题，用粗暴的、暴力的方法。他镇压、驱赶了所谓“富农”，就是优秀的自耕农，这些人生产了粮食，但

想把它们卖掉。斯大林建了集体农庄，在农庄里他可以直接把这些粮食拿走。用暴力强迫工作。但这已经是斯大林的集体化。从历史的角度也产生了问题：还有别的道路可走吗？

再后来就是那场开始得过早的战争。那些开始做的事——工业化、战争准备等等，没有来得及做完。因此在战争初期遭受了严重的失败。

斯大林习惯于使用暴力方法和残酷的手段做事，在战争时期他做了此前工业化时期所做的事，只是形式更加残酷。他收到了效果，在战争中获胜了。但是，战争不是社会主义建设。然后是经济恢复。1947年，在莫斯科，我经历了可怕的饥饿。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我不接受现在我们那里正在发生的事。不是因为我比别人富有。我不接受它们是因为那个莫斯科，战争时期的莫斯科，历历在目。1947年，那时的饥饿是名副其实的。我对它记得很清楚：人们穿什么衣服，他们看起来怎么样。大家都穿短棉袄。直到斯大林去世，国家的恢复还在继续。嗯，这里有什么社会主义？

后来就是赫鲁晓夫时期。那时，首次开始了人民物质生活的改善，像战前一样。但这仍然不是社会主义。如果有人有可能吃饱饭了，这也不是社会主义。这是赫鲁晓夫做的事。但是这些人的水平，斯大林和赫鲁晓夫，在理论方面的水平，太低了，比如说，和列宁无法相比，以至于他们开始说：这就是社会主义。赫鲁晓夫甚至声称，到80年代将会建成共产主义。大家都笑话他。在勃列日涅夫时期，人们开始说，建成了发达社会主义。同样大家都笑了。如果什么都没有，这是什么发达社会主义？再后来改革就开始了。我想说什么呢？我想说，在我描绘的历史中，按照我的计算，结论是：就没有什么时间用来建设社会主义。所有的时期，大家都在做别的事。事实上，我认为，社会主义建设就没有进行。

.....

弗罗洛夫：和戈尔巴乔夫一起工作，尤其是在《真理报》工作，对我是一个艰难的选择。我选择这份工作并不是出于贪图虚荣，我有充分的证据说明，当时我已经享有比后来多得多的赞扬。所有的评论、意见都在赞扬我。但不管怎么说，我决定在那里工作几年。这些民主派，我们在电视上经常看到他们，他们和我年纪相仿，不过是在改革那几年出名的，甚至还要迟一些，

在 1989 年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我去戈尔巴乔夫那里工作是在自己声誉达到顶峰的时候，那时还没有人知道他们。而戈尔巴乔夫在我名气最大的时候把我弄去了。他们只是得到了出名的可能，而我拒绝出名，想要在戈尔巴乔夫那里作为助手安安静静地工作。哪里都不去，不发表言论。

但是，因为我一贯地——我自己认为——和诚实地捍卫戈尔巴乔夫的路线与政策，而他和党联系在一起，所以后来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我得到了许多党内的十分重要的位置。这些人，他们现在极为风光。他们是“自由主义者”、“民主派”，等等。因为他们推翻了戈尔巴乔夫，而我任何时候都捍卫戈尔巴乔夫（包括保护戈尔巴乔夫不受他们的攻击）。所以现在我的作用发生了变化。当我出名的时候，我是自由主义者、民主派，而他们当时还不为人知，他们那时无声无息。我当时因为自己的立场遭到很多不愉快。现在全都倒过来了。因为我捍卫戈尔巴乔夫，而他们推翻了他，我成了保守派，他们成了民主派。这很可笑，但是这就是生活。

最后，甚至在戈尔巴乔夫身上也出现了这种情况。因为他把当初他吸引我，吸引我参加党的工作的东西，全都放弃了，而我没有放弃。因此，甚至是他，我想，也认为我是个过于正统的人。从政治上看，和我来往对他不利，因为这些民主派说：“弗罗洛夫固守保守主义立场，戈尔巴乔夫像过去一样和他搞在一起。”而戈尔巴乔夫性格有这样的特点——他是一个非常善变的人。不过我对他也不怎么好，因为他纵容了瓦解国家、联盟解体、禁止党的活动。

您知道戈尔巴乔夫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吗？不管可能听起来多么离奇，是懦弱。当他掌权的时候，他表现出是一个强有力的人。正是权力对他是一个考验，考验的结果是，暴露出他是个懦弱的人。这种懦弱的表现，是他把权力丢掉了。由于自己的懦弱，他容忍了丧失权力。当然，所有这些是很复杂的，然而懦弱是重要原因。

1986 年年初，A.H.雅科夫列夫给我打电话（我和他很熟），以戈尔巴乔夫的名义邀请我担任《共产党人》杂志主编，就是说，从科学院系统转做党的工作，当中央委员。我当即问他（因为看到了戈尔巴乔夫，还有他，开始了一项相当激进的大事业，正在遇到或者可能遇到来自保守派方面的抵

制)：“请你告诉我，戈尔巴乔夫的人里面，谁在控制克格勃？”因为大家都知道赫鲁晓夫身上发生的事：是克格勃推翻了他。我是这样想的：“我是激进派，将改变一切，要进行改革，等等，这是很容易的。然而他怎样保证自己不被推翻？”我毕生认为，问题不在发布某种激进的东西，而在于能够把它贯彻到生活中去。为此就应该保持拥有权力。这是规律。雅科夫列夫甚至有几分慌乱。想了想，说：“卢基扬诺夫控制克格勃”。我不认识卢基扬诺夫，但是知道他是和戈尔巴乔夫很亲近的人（您知道，卢基扬诺夫实际上是个什么样的人）。戈尔巴乔夫和卢基扬诺夫一起在莫斯科大学学习。他们早就认识。

1991年八月政变之前一年或者一年半，我几次，两次或者三次，单独和戈尔巴乔夫谈，让他换掉克留奇科夫——克格勃主席。我直接说，这是一个不值得信赖的人。“他将背叛你”。克留奇科夫说了很多话，各种极为不同的反对戈尔巴乔夫的话。戈尔巴乔夫说：“我也这样想，但不是现在。”这是戈尔巴乔夫的极大的懦弱。他行动过于迟缓，作了过多的让步。他想，他用自己的个人魅力把人吸引到自己这里。应该贯彻更坚决的路线。这里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个国务活动家的懦弱。行动应该更坚决。他不应该当总统。他一次又一次地要求赋予他全权。全权不是请求来的，是夺取来的。当他开始请求巩固他的地位时，事情就变得清楚了，只有懦弱的人才这样做事。我立即就感觉到了这一点。

我出生在利佩茨克州多布罗耶村。它在俄罗斯的中心，是个大村，在扎顿斯基修道院旁边。所有的教堂、所有的庙宇，都被毁坏了。在和圣公会会见后，我回自己的故乡（我经常去）。和我一起去的有地方官员——州的、区的党的和苏维埃的官员。在村里，很多人把我围起来，他们请求开放教堂。他们说：瓦纽什卡，你就是在这里受洗的。过了不多的时间，教堂开了，开始修复。我请求都主教比基利姆（他自己原籍米丘林斯克，与利佩茨克相邻），派个好神甫来，原来的神甫不好，是个酒鬼。我请他派个新的来。现在这个神甫服务得很好。作为感谢，我向他赠送了三卷本的圣经，还有十二卷本的福音书讲解。神甫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书，而我对它们做了研究，就像专业人士。它们是牧首所在的教堂送给我的。我为牧首教堂做了很多事。“哲学谈

话”节目是我和都主教比基利姆一起在电视上做的。我是第一个邀请神职人员上电视的人。此前他们从来没有上过电视。我大概应该当神甫。

我结束了自己在生物学和遗传学哲学问题方面的工作，我把它们彻底中断了。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我写了一本总结性的书——《生命与认识》。这是对全部自然科学哲学方面工作的总结，在遗传学方面，这本书是总结。为了对这方面的工作做最后的整理，1989年出版了《论人和人道主义》，它以《人的前景》一书为基础。《论人和人道主义》是一本做了完善加工的著作。它的第二章是“人与人的世界。通往现实人道主义的社会，通往新人——理性的人道的人”。改革和社会主义问题，我对未来的社会主义、未来社会等等的看法，都在这一章。这非常重要。美国出的版本中没有这一章。我交给戈尔巴乔夫的东西，我写在党的文件中的思想，都在这一章，我把它们作为自己的知识产权，收集在这里。这本书还补充了有关哲学史的一章。

戈尔巴乔夫掌权后，直到关于加快科学技术进步的会议以前，我没有注意他。会议后我立即写了文章《决定性转变的时刻》，发表在《哲学问题》上（1985年第8期）。我就是这样评价改革的开始和戈尔巴乔夫上台的。我没有把它们当作重要的政治改变。对我来说，这不是主要的。重要的是经济问题。应该从经济问题开始。为了改变经济形势，为了这，需要在加快科学技术进步方面完成根本性转变。我当时这样认为，现在还这样认为。科学技术进步是根本问题。过去的领导和现在的领导，全部错误都在这个问题上。在这篇文章里，我率先引用了日本的例子，日本因为掌握了最新的高技术，电子技术等等，完成了巨大的跃进。

1984年，（1983年安德罗波夫上台，他注意到了我）在多年遭受冷遇之后，我去巴黎参加了学术会议。安德罗波夫后来编了一本文集，其中有他自己关于马克思的文章，也有我的几篇文章。文章是他自己选的。于是我活了，决定不再谈论死亡。这体现在我的文章中，开始活了，因为我的思想有人需要了。

还在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掌权的时候，我的思想就有人需要了。不多，但有人要。我是在和您谈论科学、科学技术进步，谈论我是怎样走向改革的。我们说了，在此之前我从事科学技术及科学技术进步的哲学和社会学问题研

究。后来我就转向了政治。转向政治，而不是转向理论、哲学。

1984年，我和H.H·莫伊谢耶夫院士合写了一篇文章——《高度协作》^①，发表在《哲学问题》上。我们在文章里讨论了科学技术革命的新阶段：微电子、信息、生物工程。这对我国是很新的，因为正是对这些方面，人们没有关注。我们还说，社会主义应该完成这样的革命，这样它就不会落后。社会主义应该这样做，美国和日本已经这样做了。而“高度协作”这一概念本身，意味着高技术应该有社会的高度发展、社会关系的高度发展与之相适应，有社会与自然、社会与人的高度协调。这就是我指出的那种联系，我把这叫作“高度协作”。这被人们广泛地理解了。这篇文章是我按照苏联俄罗斯联邦“知识”协会的路线第一次访问日本之后写的。甚至“高度协作(high touch)”这个概念，也是我在日本，在横滨市一个生产电子产品的工厂听来的。

我深受对新技术工艺的这种理解的鼓舞，就它们对社会主义，对我们国家，对一般的社会主义所具有的意义，作了论证。但是文章丝毫没有引起我国政治家们的注意。不过在一些国家，在保加利亚，不论多么匪夷所思，我的文章广为流传。在保加利亚，国家领导人会见我。文章被从俄文翻译过来，推荐人们阅读。不久前保加利亚成为经互会各国在这一政策方面的协调国，在新技术领域。他们开始在自己国家建设新的工厂企业。他们对此作了思考。我不说是因为我他们才这样做的，但是他们利用了我文章中的思想。我成为他们的顾问。可是在我们国家……。我国危机的根源，社会主义彻底失败的根源，就在这里。因为当时的领导人没有对发展新思想、新技术的必要性做出反应。这是在1984年，是我对政治的最初的态度。

1985年关于科学技术进步的大会开后，我“抛出”这篇对大会作总结的文章。甚至认为这是一个决定性转变的时刻。为什么当初人们否定遗传学而接受了愚昧的魔鬼李森科？为什么反对李森科的斗争如此重要？

遗传学领域的主要情况在新技术方面得到了重复。我学习了日本的经验，并把它们从日本带回来。我去了日本，去了劳动生产力中心。他们给了

^① “高度协作”（Высокое прикосновение），该术语来自弗罗洛夫对日本的一次访问，日方用英语说“高技术工艺”，弗罗洛夫英语不大灵，误听为“高度接触”或“高度契合”，进而引申为“人的发展应该与技术工艺的发展保持高度一致”。——译者注

我大量关于如何提高劳动生产率的著作。他们教授这方面的知识。我从日本回来，这些资料无处可放。谁都不从我这里取这些资料，谁都不需要。这就是当时的情况。李森科，一直在迫害遗传学。什么是对遗传学的迫害？遗传学是育种学的基础，而育种学是提高产量的基础。这是对粮食问题的解决。而我们，因为毁掉了遗传学，在粮食生产方面把自己的国家抛在了后面。又一次的机会。高技术。我认为由于这个原因，社会主义思想在我国遭到了失败。我国出现的危机，也由此而来。因为，如果时间不是在 1984 年，而是，当然了，假如像日本一样更早些开始学习新技术，那么我们会改造全部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质量。现在耗费了太多的资源用来走出危机，比那时掌握新技术所需要的投入多得多。早动手 5-10 年就更好了。你投入 10 戈比，经过 10-20 年，可以收获几百万。不学无术的低智能的人，他就这样工作：“怎么？我，还有什么电子学？”起初戈尔巴乔夫也持我这种观点，后来他们不给他钱，开始批评他。当讨论所有这些问题的时候，我在政治局。他害怕了。要知道，开始时曾提出机器制造方面的纲领。机器制造离不开微电子学的发展。纲领通过了。一个与我同姓的人，K.B. 弗罗洛夫院士，被任命为纲领的负责人。后来一切都只能踩着刹车往前走。纲领成为报复手段。

记者：怎么，所有政治局委员都那么短视？

弗罗洛夫：有人支持戈尔巴乔夫，但是满腔热情地热衷于这件事的人几乎没有。这样的人只有在学者、工程师等中间才有。要知道，我也是来自科学界。那里有维利霍夫、莫伊谢耶夫。想要多少名字，我都可以叫出来。生物技术方面是巴叶夫、彼得罗夫。但谁都不管用。结果是，我们在处于拖拉机、康拜因水平的知识的指导下进入新世纪，进入高科技的世纪。

在西方，你们知道，为什么能采用高科技？因为那里已经有了发达的市场。而市场是推动者。竞争，就要提高生产率。我们没有这种情况。那时应该补上这一环，首先引入市场。应该用领导人的和广大民众的高智商和自觉性，补上市场这一环。可能这是乌托邦，但是社会主义就是建立在这上面的。可是没有出现这样的情况。

列宁说，我们将建设社会主义，将会形成新的人，受过更高教育的、人道的人，等等。这些人将带来新的东西。不是因为竞争，不是因为想挣更多

的钱，而是因为他们觉悟更高，有更高的理解力，更高的道德激励。看来，这不是为了人的利益。更正确地说，我们目前还不是人。说到底，积极的東西在于，我们过去的政治结构持有高的标准。我们在这里忙忙碌碌，搏斗。但是任何时候都能看到这个标准。有人看不到，但许多人看到了。当前情况的特点是，标准垮掉了。

这种不平衡的情况不会维持多久，因为人们不会安于这种情况。有人会胜出。或者是某个纳粹—法西斯，或者是独裁，或者是东正教国家。那时教会将给我们这些高标准。但是这不会维持很长时间。一年、两年、三年。力量耗尽了。人们，整个社会，会感到不能这样生活。人不值得这样生活。

一切都开始于勃列日涅夫时期，所有这些肮脏的东西。

您知道科学技术革命应该在什么时候开始吗？应该在勃列日涅夫刚刚开始掌权的时候。甚至还在那个时候，我就给勃列日涅夫递过关于科学技术进步的必要性的条子。

1985年戈尔巴乔夫上台了，举行了这个关于科学技术进步的会议。我评价它是决定性的改变。在那时发表的文章里，从本质上说，我已经提出了那种应该被称作“改革”的政策。我对它作了设想。文章谈到了全新的发展，谈到我们正在进入决定性改变的时期，这些改变决定着21世纪到来时社会主义的面貌。

对于我们，对于大家和对于我们的社会，必须革新，必须通过科学技术进步和引入新的高级技术工艺，微电子、生物技术等等，革新经济，革新社会结构，发展公开性、民主，等等。革新人与自然、生态的联系，也就是引入生态标准。革新人本身、人的道德、人的道德操守。而为此就应该研究人。我建议建立人研究所，后来我自己把它建立起来了。最后，我建议所有这一切都应该由本身也应该革新的党来进行。人本身应该得到研究。我认为，应该由党来领导这些变革。党本身也应该变革。为了党是睿智的、灵活的、像我一样。这里包含着个人的东西。这里以如下的形式潜在地包含着个人的东西：党和我息息相关的时候，我会接受她。

有迹象告诉我，戈尔巴乔夫的意思是：好，我们接受这些想法！当我获得这样的信号之后，我就到他们那里工作了。因为我原先是站在对立面的立

场上的。我作为哲学家，基本上从批判的角度评价一切。你看，这里出现了与我的高度契合。但是只是我自己在想，党是这样的，形势是这样的，戈尔巴乔夫是这样的。过了5年，我深深地失望了。在那个时候我着了迷。我把他当作什么人接受了？但是我毕竟不是机器，也不是像他们那样的人。我知道这些是谁说的。这在我的笔记中有所反映：全部生活就是这样进行的——从着迷走向失望，然后是新的着迷……。这就像与妇女打交道。如果你的血管里甚至不是血，而是火，你可以这样爱上一位妇女或者男子，你将认为：这是最最好的，世上没有更好的了。要知道这是一种迷误。人们将对你说，我也可以给你列举那些更聪明、更有趣、更漂亮的人的名字。不过这对着了迷的人是没有任何意义的。你记得列斯科夫的《着了迷的云游者》吗？那里有一些人从兴高采烈到无比失望，然后又来一次，这就是他们的生活。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嗯，什么，这不好？可能不好，不过对我来说，好。

今天我在《文学报》上读了对戈尔巴乔夫的专访。对于这样的戈尔巴乔夫（从专访来看）我不屑一顾。这是一个愁眉苦脸的、乏味的、缺少文化知识的人。一个浅薄、狡猾的政治家。专访中没有想象力。过去他是有的。可能这些话不是出自他的本意，是别人授意的，包括受了我的影响。我喜欢他那种想象力。

我成为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之前整整一年，关于我和他的关系，已经有许多人说：“伊万，你怎么，秘密地给他当助手了？”“怎么这么说？”“因为你的书里，你的文章里，有的内容常常一字不差地出现在他的发言里——‘全球性问题’、‘人类共同价值’”。的确，这些都是我的术语。人们开始给我打电话，他们猜测我真的是在为他工作。实际上，这些都是没有的事。他的助手们把所有属于我的东西列了个清单。我的东西是他们那时著作的基本源泉。这是我的书，《人的前景》。它出版于1983年，第二版。戈尔巴乔夫关于全球性问题、全人类价值所写的全部东西，基本上都出自这本书。

戈尔巴乔夫自己不隐瞒（他对我说）他早就通过《哲学问题》杂志，通过我的书，追踪我的著作。他了解这些著作，在我到他那里工作之前利用这些著作。但我不大相信他。他喜欢夸大其词。我不太相信他研究过或者了解我的著作。关于我的著作他可能听说过些什么，为了恭维我说些好听的话。

我现在相信，他只是读了那些为了发言需要人们给他提供的材料。或者是谈话中听到了什么，或者赖莎·马克西莫夫娜给他说了些什么。难以设想他阅读了、研究了著作，不，我不信。他不是这样的文化人。他是党的工作者。我了解这些党的工作者。他没有时间做这些事。他们只读来自下面的报告。还有那些需要他们宣读的发言稿。再有就是大量的密码电报。

……我打心里不相信他。他那时应该是另外一个人，更有文化的、更有学识的人。在交往中立即可以看出，他不是这样的人。他可以连连称是，但是当他开始自己发挥这些题目时，那么他就像钻到桌子底下，或者装聋作哑了。他是一个有能力的州一级的党的工作者，水平不会再高了。

因此我赋予这本书以这样的意义。这些年，在写作《人的前景》的时候，我的状态很好。有一段很消沉，但我是在很好的状态中走近改革的。一个人在那时写了这样一本书，处于我们在这里描绘的状况下，如果对他说，你去写本传记吧，我会鄙视对我说这话的人。这是对我的贬低。因为我的座右铭始终是普希金的话：“心生活在未来”，而勃洛克（Блок）说得更有力量：生命只能是未来式的。而他们对我说——“传记”，怎么？回到过去？只能向前，只能向前。这完全是另外一个人。生活只能是未来式的。

在这个时候意识形态控制很严厉，当知识分子们想要批评某个人时，他们只能用伊索式的语言。您要记住普希金的话，“心生活在未来”。我这样想：嗯，当然了，每个知识分子、每个读者，在读我这行字的时候。可这是我的原则立场——面向未来。面向未来是对当下的批判，乌托邦批判当下。

现在许多人在写回忆录，甚至戈尔巴乔夫。回忆录通常有两种。在垂暮之年写回忆录，类似忏悔。另外一种回忆录是为了继续政治工作、政治活动，为了吸引人们注意。我大致属于第一种情况。我急于想要说话，因为现在谎言太多。每个人都在为自己工作，想要展示自己。

比如利加乔夫。我知道利加乔夫出版了回忆录，包括在日本。说的是假话。利加乔夫从来没有和戈尔巴乔夫站在一起。我曾和戈尔巴乔夫站在一起，雅科夫列夫也是。而利加乔夫不了解戈尔巴乔夫。他写“戈尔巴乔夫之谜”，他不了解戈尔巴乔夫，因为他没有参与过我上面所说的党的最重要文件的起草。区别就在这里。除此而外，还有其他区别。我曾是戈尔巴乔夫的私人助

手，有很多时间是我和他两个人一起度过的。只有我们两个人。讨论和加工某个文件。因此我可以这样说，有些成果是我个人和戈尔巴乔夫共同工作取得的。戈尔巴乔夫非常不喜欢和很多人一起工作。就算他知道我召集了一些人，他也只和我共事。这样工作的成果是文件。除了我，谁都没有起草过这样的文件，只有我。如果苏共没有被禁止活动并解散，如果戈尔巴乔夫没有抗议性地辞去党的总书记，所有这些文件都是党的最高机密。它们会保存在档案里，或者被销毁。在现在这种情况下，这些文件是我的知识产权，因为“民主派”把它们全都解密了。

为什么我现在同意回忆某些事情？我为什么这样做？我这样做是因为现在建立了这样的条件，我可以公开反驳那些在出版物上，在电视上，诽谤党，诽谤改革的人。他们歪曲党，污蔑党。我是所有这些的直接参加者，可是我没有说话。我可以继续保持沉默，因为这些是私房话，是秘密。但是现在，这些档案和材料在“民主派”手中，他们写有关这些文件的文章，对改革横加污蔑。其中有很多错，不过我告诉了您，改革是如何开始的。怎么，这是肮脏的事？这是高尚的事业。

与民主派不同，这些年我一直掌握这些材料。因为和戈尔巴乔夫在一起，我没有说话的权利，现在我将捍卫改革。我甚至都没有被人请到宪法法庭作证。我猜到了这是为什么。因为他们需要的是叛徒，或者是没有头脑的人。而我会告诉他们，在改革的最后几年党是如何行事的。这和他们说的完全不一样。我们最早开始了对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的批判。官方、党、我们，包括我，还有戈尔巴乔夫。而不是这些现在把这一切记在自己名下的人。有过一个法庭，他们在法庭上亮出了材料，但是他们中谁都没有说，是党自己开始了这个过程。正是在改革时期开始的。这是改革的主要思想。由于这个原因，他们不让我上法庭。我从未做过违法的事。我有思想，其他的一概没有。思想不归法庭管。

在这个时候他们很熟悉我的观点。如果我在法庭上发言，讲了我对您讲的这番话，对他们不利。对他们不利，是因为那样会使党处于另外一种色彩之中。这也就是我为什么现在对您讲这些话并将继续讲下去的原因。同时我批评了戈尔巴乔夫本人，因为他是倒退者，等等。我也犯过错误，将会做自

我批评。不过这是思想方面的事情。这是精神领域的事情，不是刑事问题，他们正是想把它弄成刑事问题。可以以不同的态度对待党，对待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但只是必须看到，有各种各样的人。至于我们所说的从1985年开始的改革，已经是另外一个阶段了。还在这之前我就认为，应该有新的党。我没有开始做这件事。这只是因为我死死抱定一些思想。现在也一样。我不需要其他东西了。我有思想。

到底是谁开的头？党自己开始了这种批判。不过我们不是第一个，因为我们是在继续赫鲁晓夫开始的事业。勃列日涅夫使批判夭折了。为什么我感到我的时候到了？是为了镇压什么吗？完全相反。

这些人是我们把他们呼唤出来的。他们1989年登上舞台。这些民主派。我们自己呼唤出了索布恰克、波波夫。这不是叶利钦开始的。我们下面再说叶利钦。他们现在把我们也列入斯大林、勃列日涅夫的队伍。我想为改革辩护。我甚至想把自己的一个报告叫作《为改革辩护》。现在所有这些都放到引号里，说到改革时，人们说“所谓的改革”。

我想证明改革是需要的。她是由党的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主张改革的那个部分从高尚的目标出发推动的。改革的首倡者既不是叶利钦，也不是民主派。他们想把什么功劳都记在自己头上。因此他们把我们大家，其中包括我，都赶到保守派、斯大林主义者的队伍中。我将让你们看，难道我当过保守派或斯大林主义者吗？但是他们对此一言不发，而污蔑我的文章很多。

改革不是由戈尔巴乔夫想出来的，它在思想上酝酿了很久了。这里也有我的贡献。民主派认为是他们开始了根本性的变革，在1991年。我将向你们介绍，社会内部和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内部的人道主义倾向是怎样成熟起来的。这发生在戈尔巴乔夫上台之前，我参与了这个过程。只是在结束时我们才明白了本来应该在开始时就明白的东西。

1985年发表了题为《决定性转变的时刻》的文章。我在文章中说：必须用新的方法思考与工作。我们应该有新思维，还应该有根本性的转变。这篇文章是对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会议反应。后来戈尔巴乔夫把这称作“改革”。如果领导这些过程的不是戈尔巴乔夫，而是我，我不会把这叫作改革，而是叫作决定性转变的时刻。

我们在历史中寻找机会。有一个非常合适的机会。十月革命 70 周年帮了我们大忙。我们利用了戈尔巴乔夫做报告的机会。我将拿出一些文件，说明报告的准备工作是如何进行的。这应该是领导人的发言，这位领导人应该对政策做出明确阐述。这是一个非常折磨人的工作过程。用了好几个月。戈尔巴乔夫自己也工作了好几个月。我可以说说关于改革的观点是如何制定的。在纪念十月革命 70 周年的报告中，戈尔巴乔夫表述了与重新认识历史相关的重要思想。批评了斯大林主义。下一个阶段是制定对改革本身的看法。不仅仅是经济上的彻底改造，而且也是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彻底改造。这是在确定国家的前进道路。我们的出发点是，它应该是国家发展和从种种扭曲中解放出来的道路。但它是社会主义道路。改革是对社会主义的改革，而不是像今天这样，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转变。接下来，我们开始谈社会主义的新的、人道的面貌。到 28 大以前，我们制定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个术语是我提出的）的行动纲领。其内容都包含在 1991 年 8 月公布的新党纲里了。

回到十月革命 70 周年的报告上来。起初戈尔巴乔夫要求写出报告的观点。我们讨论了这个观点。这是戈尔巴乔夫的意见。我只是指出工作如何紧张。叶利钦说，这个报告将成为我们的教科书。谢瓦尔德纳泽肯定了叶利钦的意见。雅科夫列夫在自己的发言中说：“我们要重建什么？重建灵魂和人”。谢尔比茨基表示肯定。有意思的是关于操作性问题的讨论。亚佐夫发了言，杰米切夫也发了言。戈尔巴乔夫作了总结。在讨论过程中有许多有趣的评价。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然后准备了供中央全会用的简写本。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全会上读了这个本子，做了报告：《十月革命与改革。革命在继续》。这是大量工作的结果。

经过讨论，做出决定：通过报告，由戈尔巴乔夫定稿并提交中央全会。可是在全会上，就是这个叶利钦，使会议改变了重点。召集中央全会是为了讨论报告。叶利钦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意见。后来叶利钦退党（在中央全会上），开始不再谈报告，而是谈自己的问题。但是他的发言没有公布。各种各样的投机冒险开始了。应该公布。后来公布以后，人们看到了：为什么吵吵嚷嚷？看吧，他说了些什么，说的是他自己。没有立即公布他的发言，

帮了他的大忙。神话开始了。

起初戈尔巴乔夫积极参与了新党纲的制定，但后来我发现，他的计划逐渐发生了变化。我坚持早一些公布新党纲和召开代表大会，以便党能够得到更新。我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并觉得可能会出什么问题。应该快一点把这些事做完，剔除党内的反动力量，让进步的改革的力量留下来。这些力量围绕戈尔巴乔夫团结在一起。我本人在中央全会上和政治局会议上发言捍卫戈尔巴乔夫，并且争取党能得到更新与发展。

当总统这件事，对戈尔巴乔夫影响非常大。他把党推到一边去了。我对他说，这是很危险的。宪法第六条作了改变。这很好，但是应该在党的建设上用力，更新党。否则局势会爆炸。在这个时期，雅科夫列夫对戈尔巴乔夫施加了非常重大的影响。在 1990 年的 28 大（录音原文为 27 大，有误——译者）上，雅科夫列夫没有被选进党的任何机构，对党充满怨恨。除了促使党被取消，他找不到更好的发泄途径了，而这导致了“8·19”政变和局势爆炸，等等。戈尔巴乔夫这时成了旁观者。他把精力集中在总统机构、总统会议的事务上，把党扔给了伊万什科和其他人。党的发展失去了控制，逐渐站到了戈尔巴乔夫的对立面。重要的是戈尔巴乔夫自己不再过问党的事情了，甚至连党的纲领他都不管了。他休假去了。可是在 8 月 5 日，我们在他缺席的情况下举行了党纲委员会的会议。他去休假了，去了福罗斯，因此遭到报应。我说过，党就像一个原子反应堆。它在工作，而你们这些人，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我没有对戈尔巴乔夫明说，他也一样），你们这些为这个反应堆服务的人，已经跑掉了。没有人调节、控制，它会爆炸的。

你们可以唾骂党，可以随便对它怎么样。你们可以想：我现在和它无关，过去属于它，因为我在它那里“捞”够了。但是一个现实主义的政治家应当本着理性做事，不能被情绪支配。雅科夫列夫情绪不小，但是他，戈尔巴乔夫，作为总书记，不应该跑掉。他应该工作，哪怕这是违背他的本意的。可是他们都跑掉了。戈尔巴乔夫 8 月 4 号就到了福罗斯，8 月 5 号我和扎索霍夫举行了党纲委员会的会议，敲定了党纲的最后文稿，把它公布出来。过了两个星期，局势爆炸了。他们指责党，说党在很大程度上参与了政变，同情这场政变。那还用说，正是这样！戈尔巴乔夫和雅科夫列夫就是这样一起唾

骂党。接下来如何呢？政变发生后，戈尔巴乔夫开始指责党，他说：“这个党背叛了我”。啊！1500 万人背叛了一个人。这个人甚至都不想一想，是他先背叛了这些人，不和他们一道工作。

有两个问题在党的新党纲中得到展开。这就是世界的发展前景问题和在党的纲领草案中我努力最大限度地要表达的问题。在对问题的回答中，表述了我们得出的结论，我们认识到必须改革。其中包括对全球性问题的分析。试图把社会主义纳入世界的发展中，把它作为世界发展的一个部分。揭示出某种人类共同的文明过程，并把社会主义有机地纳入其中。也就是说，代替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的冲突，提出了统一的社会，在那里，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应该共同存在。于是，我写过的、构成我的著作的内容的那些思想，在改革过程中，在“新政治思维”的名称下，获得了政治上的发展。这些思想具有了最后的政治的和实践的形式，而在这个基础上，戈尔巴乔夫开始制定与推行自己的政策。他积极参与了新政治思维的制定，但是，正如他自己强调的，是在一定的思想与理论的基础上制定的，这些思想和理论此前已经存在。他本人，我和他一道，在改革中发展了这些思想和理论。这已经深入到了与美国、德国以及过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的具体政策层面。新政治思维是改革的成就之一。它获得新的具体的形式，成为政治实践。叶利钦和其他一些人试图奉行同样的政策，但是他们现在从来不提这个新政治思维，从来不提戈尔巴乔夫和其他人的名字。他们把这一切都据为己有，同时甚至嘲笑新政治思维。新政治思维是一个巨大的成就，它使我们以新的面貌出现在世界面前。从此以后，人们将开始以新的方式看待我们，即不再把我们看作危险的敌人，而是看作需要与之对话的可能的伙伴。这就是新政治思维的全部意义。

这是现在人们想要从改革中夺走据为己有的东西。做出个样子，好像一切都是重新开始的。实际上这里有什么新东西？为了好歹做个论证，说明这是新东西，他们说：“俄罗斯第一次有了总统……”。嗯，很清楚，过去是苏联，现在是俄罗斯。这里有什么新东西？！俄罗斯，什么是俄罗斯？在什么意义上是俄罗斯？俄罗斯，可能是说和过去一样，指“恢复俄罗斯”。恢复俄罗斯，什么意思？恢复帝国？要知道我们过去没有俄罗斯，有俄罗斯帝

国。俄罗斯帝国有省，没有共和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等等共和国，各个边疆区，过去它们全都被沙皇政府吞并了。啊哈，不是这样？那是怎么样？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也就是俄罗斯共和国。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意味着把过去争取到的东西又从俄罗斯夺走了。

我认为世界正在走向统一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这一过程存在于社会主义国家，但是同样的过程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也在进行。我们就是这样认为的。正因为如此，建立人道的、民主的社会才是可能的。主要的东西已经存在了。这就是消灭资本主义体系和社会主义体系的对抗；全人类的、全球的价值与问题的优先地位，它们相对于阶级的价值与问题具有优先地位。这也就是和平与裁军问题、生态问题、人口问题，最后，人及其未来的优先地位。这种情况在改革以前已经存在，但是遇到了阻力。因为在改革以前，我们的意识形态提出了阶级的价值，而不是全人类的价值，具有优先地位。由于提出并在生活中贯彻了这种新的政治思维，戈尔巴乔夫获得了诺贝尔奖。改革的功劳在于：把全球性问题、全人类共同的问题提升到政治层面，因此提出了新政治思维。

戈尔巴乔夫的功劳，改革的功劳，是把把这些全球性问题、全人类问题提升到政治的层面。新政治思维是确立人在社会和自然整个系统中的优势地位。对我来讲这特别重要。最重要的是共同文明的过程对社会形态过程占有优势地位。其意义在于，那些对于整个文明具有全球性意义的过程、事物，是存在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不重要。例如科学技术进步、新的技术工艺、生态、人口，等等。文化的发展。有的是和社会形态相联系的，社会形态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有些东西过去是现在仍然是社会主义的，也有一些东西则是资本主义的。现在各种过程开始这样发展，主要的东西不是社会形态的冲突，不是社会形态的关系与联系，而是站在它们之上的东西，以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共有的东西。这是从我的全球性问题思想中合乎逻辑地推导出来的。全球性问题占优势地位，导致涉及整个文明的过程，也即规律，具有了优先地位。这意味着不同体系之间的阶级对抗，也即社会形态，正在退到第二位。上升到第一位的，是把人们在文明的框架内联结为一体的东西。从这里可以得出非常重要的结论。主要的结论是：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

的对抗或趋同，而是那些涉及整个文明的过程对于各种社会形态过程具有优先地位。

这就是我们已经接近了的主要的东西，它被记录在党纲草案中。不是对抗或者趋同。在西方，人们说：需要趋同；萨哈罗夫说：需要趋同。出现了处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发展规律之上的规律，它们高于这两种制度，把全人类联系在一起。因此我们在新党纲中得出结论：社会的发展将以新的方式实现。世界在走向统一的新的文明——人道的、民主的文明，它将不是资本主义，不是社会主义，是新事物。它的基础是新的技术工艺、生态标准和人的、人道主义的、民主的优先地位。

我说的内容，在党的新的纲领中得到反映。强调这一点是很重要的。他们，戈尔巴乔夫和沙赫纳扎罗夫，他们邀请了我，做出样子好像这是他们的问题，是他们想出了这些问题。他们两个人和这个新文明的问题没有任何关系。工作是党的纲领委员会做的，学者们参加了工作。思想都是由他们表述的，戈尔巴乔夫把它们作为自己的东西接受下来，沙赫纳扎罗夫就更过分了。他们不论那个人在这方面都没有任何著作。曾经有过一次相关的学术会议，很不凑巧，我当时不在国内，不过我从来没有离开过这些问题。

《论人和人道主义》这本书里的新的文明、全人类价值优先等等思想，在很早以前就得到充分发展了，在这本《人的前景》里。

戈尔巴乔夫开始摆出领导人的姿态。他总是把助手们做的一切都归为己有。不过他现在忘记了，我的工作已经和他没有关系了。不管怎么说，在一定意义上这些思想是属于我的。现在它们已经成了公共财产，但同时总是有某个人最先把它们表述出来。我甚至因为这些思想而获得了联合国环境规划奖。

戈尔巴乔夫开始使用这种表述——“全人类价值优先”。起点是列宁的思想。我给您看文件。这是戈尔巴乔夫在我们去舒申斯科耶——列宁的流放地——旅行时的发言。戈尔巴乔夫（是我写的）对所有相关情况作了解释。似乎这一思想产生于列宁在舒申斯科耶流放的时候。他说，我们利用了它，把它发展为新的政治思维。后来，在这次访问中，电视摄影师记录了我们的谈话——戈尔巴乔夫和弗罗洛夫院士，自己的助手，交谈。谈话中我们关于

这个问题什么都谈到了：它是如何产生的，工作是如何进行的。

在戈尔巴乔夫那里，全人类价值高于阶级价值的思想是在 1986 年年底首次确切表述的。这是新思维的基础。1986 年 10 月，伊塞克湖（吉尔吉斯斯坦城市）举行了论坛，是钦吉斯·阿依特玛托夫组织的。那里汇集了全世界的文化活动家，真正的精英人物。1986 年 10 月 20 日，戈尔巴乔夫会见了他们，进行了谈话。这时我在《共产党人》杂志当主编。我们准备了谈话的记录，打算在《共产党人》上发表。在编辑过程中我和戈尔巴乔夫发生了很多争论，在电话上交谈。这是我初次和戈尔巴乔夫打交道。在这些交谈过程中产生了关于全人类价值高于阶级价值的思想。这一思想还引用了列宁的话，他谈到了无产阶级的斗争的全民族利益。我们把这一表述做了改动，后来就不再引用列宁了。如戈尔巴乔夫所说，把这个句子“转动”一下，这样、这样。后来让它见诸于《真理报》，再后来已经是在《共产党人》杂志上了。我和他共同做了这件事，总之是这个思想问世了。它没有引用列宁，因为列宁的那些话听起来和它对不上。它的表述没有引文，主要是用于当前的条件。

接下来戈尔巴乔夫在舒申斯科耶讲述了“新政治思维观念的诞生秘密”。我强调，他说的正是新政治思维观念的诞生。您看，理论思考是怎样和实践交织在一起的。对我来说，这一过渡没有任何问题。我在从事全人类问题、全球性问题的研究，总是说我们的全部问题，社会主义问题，应当放在全人类问题、全球性问题的背景下来看。对我而言，这没有任何特别之处。不过应该对戈尔巴乔夫的敏锐与机智，同时还有他的与我不同的思维风格，给予正面评价。我是从全球性的、全人类的问题出发，而他是从列宁出发。他需要借助列宁的力量。

列宁的这段引文是多勃雷宁写进去的。我对他说：“请把这段话删掉”，因为戈尔巴乔夫借助这段引文，正在形成一个完整的观念。多勃雷宁删掉了。可是戈尔巴乔已经在报告中使用了这段引文。国际问题专家们还找到了这段引文，甚至向他提问。戈尔巴乔夫脑子转得很快，他把列宁的这些话改头换面，作了新的解释，把它运用于现在的条件，作为新政治思维思想的基础。我的依据是什么呢？我多少有些越权。我们一起编辑了伊塞克湖论坛的材料。对我来讲这很自然，我有关于全球性问题的书。而对他来讲，这是一个

很复杂的转变。在这个过程中，他表现出很大的洞察力和敏锐，并得出了炸毁世界的结论。

起初我们添加了一些东西，这样表述：“在核武器时代，全人类价值高于阶级价值。”这很重要，因为面临的是核威胁。我是从爱因斯坦和罗素出发的。他们正是这样说的：“在核武器时代应当学会以新的方式思维。”每一个人都应该明白，我们是整个人类的代表。应当把内部的纷争忘掉，因为我们遇到的是普遍的毁灭一切人的威胁。我的一切思想都来源于此。而戈尔巴乔夫从引用列宁出发。这就是他在《共产党人》上的文章。1986年。他在文章中第一次说：“时代要求新思维。”这就是“秘密”，新政治思维的来源。

谈谈戈尔巴乔夫的一篇文章（1989年11月），真理报上的文章。戈尔巴乔夫在《社会主义思想和革命性改革》这篇文章中，表达了那些“似乎”属于他的观点、见解。他在文章中讨论了一些带有根本性的问题：（1）我们走向何方？改革的任务与前提；（2）马克思列宁主义和社会主义理论；（3）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实践；（4）改革与新的社会主义观。戈尔巴乔夫在最近一段时间里一系列发言中阐述的思想，在这篇文章中得到综合与发展。就是说，这是对他在这重大的基本的问题上的思考所做的总结。

我和我的助手们准备了一篇进行这种总结的理论文章，把它交给戈尔巴乔夫。这就是带有戈尔巴乔夫的修改的那篇文章。对于分析戈尔巴乔夫观点的演化，这很有意义。

人们问我现在的观点。改革是由共产党人准备并推进的。它得到不同程度的支持。开始时它唤起了人们的热情，后来人们离它而去。对俄罗斯和俄罗斯思维来说，它表现为某种多余的、超前的东西。俄罗斯需要的是简单一些的、更有分量的东西，比如香肠、面包，等等。而这是发生在头脑中的转折，这是知识分子的发明。它没有被民众接受，因为它没有经济上的成就与自己相伴。

知识分子不支持改革，后来他们投向了叶利钦的怀抱。大众传播媒体中，尤其是电视上，反戈尔巴乔夫的、反改革的、反共产主义的歇斯底里，现在是由知识分子组织的，他们中的大部分人此前为戈尔巴乔夫服务。他们现在

批评叶利钦。因为叶利钦也不能使他们满意，给他们的报酬不多，他们觉得应该再去找另外一个人。因为他们只想自己，只想自己的好处。他们几乎不考虑国家，不考虑人民。他们也没有能力做这些事，因为它们的智力水平很低。他们没有广博的文化修养。他们只想着自己，但是自以为他们这时是在考虑人类、人民。谈话开始时我给您引用了别尔嘉耶夫的话。还记得“苏联政权的突然垮台将是一场悲剧，会造成许多不幸”这句引文吗？但是我们的知识分子搞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不支持戈尔巴乔夫。

带着这些社会主义的概念本来可以走得很远。它们不碍事，这些概念。这只是一些语词，重要的是赋予它们什么含义。本来可以继续往前走，不搞政变，不支持叶利钦，不对他鼓掌。而他现在也不是好人。要是知识分子哪怕稍微再聪明一点点，他们可以带着社会主义概念往前走。这些没有头脑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雅科夫列夫，给戈尔巴乔夫施加压力。他们压制他，为了使他改变自己关于社会主义的意义、改革的意义、党的意义的观点。他们给他施加压力，导致了崩溃，一切都崩溃了。

我是一个有坚定信念的人，政治家可能没有这样的坚定信念，比如说对社会主义思想等等没有坚定信念，这不重要。但是作为一个政治家，他应该懂得，突然间发生改变只能给国家带来不幸。所以，作为政治家，戈尔巴乔夫就身败名裂了。需要多动脑筋，不要造成突发性的转折。中国就是例子。邓小平没有改变意识形态。他推行了经济改革，转向了市场经济，等等。我们向戈尔巴乔夫建议的就是这。戈尔巴乔夫自己说：采取某种与新经济政策类似的做法，允许各种形式的所有制。党的纲领草案就是从过渡时期允许一切形式的所有制出发的。在这里，社会主义是什么样子的？只有社会主义吗？随便你怎么叫：“混合型社会”、“混合经济”、“过渡性社会”，等等。为什么不用这些词呢？邓小平没有拒绝使用这些词，没有拒绝党，而他们掌握着国家。向市场的过渡在掌控中进行，没有无政府状态，没有人民的贫困。相反，他们生活得越来越好。意识形态对他们有什么妨碍？而如果他们现在就开始改变意识形态会产生什么情况？结果只有一个，这就是——国家的毁灭。就像在我们那里发生的一样。中国人很聪明。戈尔巴乔夫不聪明。他胆子大，他开始了改革，领导了改革。可是当了总统以后，他开始限制共

产党。应该谨慎从事，遵循进化的方针。生活本身将改变一切，就像在中国人那里引起的改变一样。生活本身会改变一切，不需要人去推。你们看，戈尔巴乔夫推了一下，一切都垮台了。叶利钦上台了。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野蛮的、不自由的社会里，那里什么都没有——没有真正的自由，没有面包，什么都没有。我们回到了宗教大法官的两难处境。我们获得了一大堆自由，似乎是这样，可是面包没有。

1991年8月发生的政变和后来发生的一切，是后改革（пост-перестройка）。如果说1917年10月发生了革命，那么1991年8月发生的是反革命。有意思的是，如果改革是共产党员中的改革派进行的，那么政变，后改革，则是以叶利钦这位前共产党员、政治局候补委员、州委书记为首的前共产党员们进行的。他们的一切都和戈尔巴乔夫很像，只是扮演了次要的角色。我本人和他们没有任何关系。雅科夫列夫在党中央机关工作了30多年。叶利钦在党的系统工作了几十年，戈尔巴乔夫也工作了几十年。他们是职业的机关工作人员。这一点决定了我如何观察叶利钦这个前共产党员，如何观察戈尔巴乔夫，他现在也是前共产党员了。我对他们一视同仁。对我来说，这是一些从内部背叛了自己毕生为之奉献的事业的人。局势提供的一切都被利用了。他们纯粹是一些不中用的政治家。对我这个他们的评价者、哲学家来说，他们都是些应该被鄙视的人。我认为，观点可以改变，但是要适应他们那里的新条件而发生改变。他们当中要是有人改变了观点并因此像布鲁诺那样走向火刑架被烧死就好了，不，他们因“厚颜无耻”而改变了自己的观点，雅科夫列夫现在已经获得部长级别的位置，叶利钦已经是国家总统。戈尔巴乔夫当时也正在往上爬，以便捞到点什么。在今天与《文学报》的访谈中，他说可能很快他就要投身巨大的政治事业之中。谁会信他？一些让人蔑视的人。这就是当前俄罗斯发生的最可怕的事。他们当中谁都不能相信。什么时候能出现可靠的、诚实的人，可靠的、诚实的政治家？这只能希望和等待，但是不能相信这些人。其中包括被他们提拔为接班人的人。这样的人一辈子都在惦记一个东西，即某个位置。这和提拔他们的那些人一样。

……这是现阶段俄罗斯最大的悲剧。所有这一切都是前共产党员们造成的。没有其他人。共产党员中的那些坏透了的人，成为前共产党员。正是他

们是现今制度的首脑。

.....

经济改革导致经济垮塌。禁止苏联共产党活动是对民主的破坏。苏联解体，导致国际冲突和战争，最终走向内战。所有这一切，都是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爆炸性政策带来的后果，而本来是可以一切都以进化的方式合乎逻辑地改变的，这样的后果在改革进程中就被预见到了。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为了什么？本来就没有社会主义。是什么在这里起了妨碍作用？本来应该从事经济改造，等等，可这里在各种报纸上进行反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斗争。这种斗争是如何起妨碍作用的？以这样的形式起作用，像我描述的那样。我们希望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等等，可是这里在进行如此狂暴的斗争，激起了人民中的敌对情绪、冲突，而这只能导致内战。不会带来任何好的结果。重要的是，人们现在已经觉悟了，已经断绝了与叶利钦，与所有那些人的联系。因为过去进行一种斗争，现在又进行另一种斗争，什么时候生活？什么时候工作？现在的局势就是这样。

当然，现在不是再回到过去，也不需要回到过去。但是这种反对社会主义的斗争，禁止苏联共产党活动，苏联解体，能够导致破坏民主，导致独裁，导致内战。

现在，社会中正在出现非常严重的社会性紧张。产生了对社会主义成就的拒绝。在其他国家，可能这些成就不是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取得的，可在我们俄罗斯不是。在我们这里它们是和社会主义联系在一起的。现在社会主义被抛弃，但遗憾的是也出现如下情况：文化遭到彻底毁灭，科学遭到彻底毁灭。

或者，这个统一的国家，苏联，遭到彻底毁灭。我们曾设想，可以通过不断进化建立新的联盟。原先的共和国可以成为独立国家并得到发展，某种邦联，.....只要觉得合适就行。现在发展着的独联体显然不能促进联合。谁的罪过？应该承担责任的既有戈尔巴乔夫，也有叶利钦，还有所有那些使得妄自尊大和民族主义情绪占据上风的人。对最近 70 年的历史的仇恨在不断培育。但是，要知道这 70 年也是俄罗斯历史的一部分。正在产生不仅仅是民族主义的危险，而且是沙文主义的危险。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这可以导

致非常大的政治复杂性，导致内战。俄罗斯人套车慢，但走得快。当他“套好车的时候”会发生什么？全部历史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在《真理报》。以什么收场的？杜塞尔多夫？惊心动魄的手术？人不能一天接一天、一周接一周、一月接一月地工作，没有休息日，没有假期。在5年半的时间里，我在戈尔巴乔夫那里就是这样工作的。怎么，人是机器？我不是机器。您也不是机器。这样高强度的工作您受不了，您受不了的。在我们的接触中我看出来了。我63岁了（弗罗洛夫生于1929年9月1日，谈话时间是1993年2月——译者注）。也许您能和我一道以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的速度工作，您受不了的。我是一个病人，已经63岁了，现在您也受不了的。拼命工作的结果是一身病。我不是非去《真理报》工作不可，可是戈尔巴乔夫要求我去。为什么？因为他信任我。戈尔巴乔夫信任我，想让我控制《真理报》，想让《真理报》做他认为正确的事、我认为正确的事。这引起了知识分子、卖身求荣者，很大的负面反应。现在他们后悔了，当《真理报》号召克制，号召分析、冷静的时候，他们开始理解了。主张理性地分析和冷静，是我思维和行动的特点。可那个时候，右派共产党员们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弗罗洛夫不抨击叶利钦，不揭露波波夫，他做得不对。民主派呢？如果我没有在《真理报》抨击伯罗茨科夫、卢基扬诺夫，也认为我也做得不对。可是我认为，应该理性地分析，渐进式地前进。这是一条正确的道路。现在，您看，叶利钦号召什么？和谐友好！他禁止共产党活动，是为了共产党员们同意和他站在一起？愚蠢透顶！现在，他大权在握的时候，也号召人们和谐友好，不要参加群众集会，游行示威。可这正是我在《真理报》宣传的东西。他们当时为什么上街？为了推翻戈尔巴乔夫。可我反对这样做。现在他们说：不应该上街，因为人们上街要推翻谁？推翻叶利钦。他们说，不要参加街头活动，推翻叶利钦。他们在那个时候抨击我，说我执行了错误路线，可现在他们自己也在执行这条路线。人民开始觉悟了，因此在离开叶利钦。说呀、说呀，承诺呀、承诺呀，结果如何？情况比戈尔巴乔夫时期更糟。

这有什么奇怪的？没什么好说的了。所以我不在意人们这样看我。可能现在还有人这样看，和我有什么关系？我知道老百姓中有很多糊涂人，这个世界上糊涂人多的是，今后很长时间都将如此。不止是今后十年，今后一百

年也将有很多糊涂人。

现在可以再次回到宗教大法官。自由和面包，谁将取胜？俄罗斯的命运取决于此。有条件地说：既有自由，也有面包。这种和谐是可能的吗？原则上讲，可能。但现在存在断裂。类似于有自由，但没有面包。或者相反。这种和谐在原则上讲是可能的吗？在我们这里，不可能。这种不和谐使社会四分五裂。再次套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可以说，俄罗斯的命运在“全世界的普遍团结”中，在精神因素和物质因素的结合中。现在，这是主要的。

为此，现在需要做文明教化方面的、经济的、科学技术的、文化方面的工作。包括与人有关的工作。这应该是一项渐进性的工作，在许多年都要考虑物质领域、精神领域的变化。不然就会给人民带来痛苦。由于叶利钦、盖达尔在经济改革领域推行激进的政策，这样的痛苦我们已经看到了。否则就可能发生社会爆炸。这是反作用力，不好。

当然，我看到了当初预想的和后来在改革中实现的东西之间的巨大不平衡。对我来讲这里存在很大的矛盾。当然了，一切强有力的人，我认为自己也是强有力的人，任何时候都保持某种希望。但是我想这样说：在我身上占主导的是对什么都不报强烈希望的悲观主义。对我来说，在个人方面，改革的不成功与终结不是悲剧。作为现实主义者，我看到而且明白，任何理想都不可能百分之百在生活中实现。历史这样告诉我。我自己关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关于社会主义、现实人道主义的新文明的思想，我早就在各种著作中把它们与马克思主义，与俄罗斯人道主义哲学传统，联系起来作了发展。在许多年中，做这件事时得到了外界帮助，更多的情况下是违背占统治地位的政治方针与政策做这件事的。

现在，我不想通过政治而是通过科学表达自己的思想，我致力于建构新的人道主义哲学。我可以把自己的观点确定为“新的（现实的）人道主义哲学”。这一哲学的基础与出发点是马克思的观点，特别是青年马克思的观点。当然了，还有哲学史上（可以说，我正在清理）和现代哲学中的一切人道主义传统。尤其是弗洛姆和哈克斯利的思想，俄罗斯古典哲学的传统我也很喜欢。特别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索洛维约夫等人。

至于说到实践，我认为新人道主义指向全人类的和全球性的问题占优先

地位的新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我把这种社会叫作“现实人道主义社会”，新文明的社会，也即人道的、民主的、文明的社会。我感觉到，这将是人类的命运。我正是以它为价值取向，期待着它。这意味着必然会有社会主义方向。社会主义方向，我不说“社会主义”。方向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要知道，这对我是主要的。

在我的领导下为苏联共产党准备的那个党纲，实际上是站在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的立场上为共产党起草的纲领。我就是这样想的。现在俄罗斯有许多个党，名称各异。其中也有共产党，为数不少。现有的这些共产党中，没有一个采用我们制定的党纲。因此我不参加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党。没有站在我们制定的党纲的立场上的政党。没有苏联共产党。我没有退党，到现在为止我不想加入任何一个其他的党。我不满意它们的纲领。对我来讲，通过科学，通过哲学，实现人道民主的社会主义思想，包括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新的现实的人道主义思想，但不是通过政治，比较好。我对政治深感失望，深恶痛绝。可能，这种失望和厌恶感会成为过去。不知道。到现在还没有。政治——那样一些肮脏的人……

当初，五年以前，我大力支持“人道主义党国际”运动。他们了解了关于人、人道主义的著作，到我这里来了。“国际”团结了世界上 40 多个国家的政党。该国际的纲领有的地方直引用了我的著作。他们到我这里来是为了谈话，当时我还在《共产党人》杂志工作。他们问我对在苏联建立人道主义党的态度。这基本上是一些年轻人。我说，没有这个必要，因为我们正是这样想，即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建设自己的党，共产党。事实上这就是人道主义的党，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再建立这样的党。我理解共产党就是人道主义党。

1990 年 7 月苏共 28 大结束，我被选为政治局委员，这时戈尔巴乔夫建议我担任负责意识形态、科学、教育问题的中央书记。我拒绝了，因为这是在中央机关的工作，于我不合适。要是接受了这份工作，我就没有时间关于人的科学中心、人学研究所等等机构工作了。

在党的 28 大召开前，我被选为政治局委员前，政治局在奥卡廖沃开了个会，讨论政治局成员中的哪一个人将在代表大会上被提名就任戈尔巴乔夫

的副手，即副书记。除了雅科夫列夫以外，全体政治局成员一致表示支持我被提名。但是在 28 大上戈尔巴乔夫会见了来自各共和国和各州党的领导人及工作人员。在这次会见中他们决定，需要提名乌克兰的伊万什科。后来在代表大会上人们提名我作候选人，但是由于事情已经做了决定，副书记将由伊万什科来当，我就高兴地请求撤销我的候选人资格。对我来讲，如果当选将是很不幸的事情。但问题是，在此之前，当时的政治局已经提名了我。不过很清楚，从代表大会参加人员的构成来看，这一题名是完全不现实的。

不仅我进入中央委员会很艰难，戈尔巴乔夫本人和许多改革派成员，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改革派共产党人，进入中央委员会也颇为不易。我们一共得到了一千多张反对票，我们称自己是“有上千资产的富翁”，以戈尔巴乔夫为首。这是一次非常保守的代表大会，当时党内的局势已经很清楚了。

当时我已经不大正面看待叶利钦、波波夫一类民主派的活动。我认为，他们是局势稳定的破坏者，急于掌权。这很清楚。实质上他们造成了这样的局势：以进步开局的改革可能被一笔勾销。

对他们的批评是通过《真理报》进行的，但是我顶住了《真理报》内部一些人的压力，这些人想要把民主派撕成碎片。在中央全会上对我提出很多批评，罪名是《真理报》对民主派采取了克制的态度。我本人认为，应该支持改革路线，支持戈尔巴乔夫。需要有能够进行经济和政治改良的稳定的局势。由于这个原因，他们把我叫作“保守派”。我认为，“左派”和“右派”一样危险，他们也反对改革。我努力巩固戈尔巴乔夫作为改革过程领导人的地位。我认为这样做是对的。我在中央全会上的全部发言都是在捍卫戈尔巴乔夫，并且批判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右派力量，这些发言都发表了。

我和右派力量之间有着明显的具有对抗性的矛盾，包括党内的右派力量。这正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成立的时候。我认为它是一种右倾力量，反动、保守的力量。他们成功地搞掉了戈尔巴乔夫，但是我在中央全会上发言捍卫戈尔巴乔夫，同时批评右派力量。这个党的领袖是伊万·波洛兹科夫。现在，在宪法法院的发言中，他说：“弗罗洛夫反对成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真的是这样。因为我认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把一切保守派都团结起来了。事实确实如此。他们开始更起劲地反对戈尔巴乔夫，而舍宁甚至参加了政变。

不论是右派，还是左派即所谓的“民主派”，因为都仇恨戈尔巴乔夫而聚集在一起。而对我的仇恨，则是因为我捍卫戈尔巴乔夫的路线。所谓的“民主派”，努力通过在出版物上忽视、歪曲、隐瞒我所做的事来破坏我和《真理报》的声誉。他们中的每个人都是在改革开始后成为民主派、进步人士的。而我在很早以前就是民主派和进步人士。党内的右派，其中有波洛兹科夫，在中央全会上和政治局会议上组织发言反对我，反对《真理报》。波洛兹科夫给中央写报告，说《真理报》的立场不正确，等等。在中央委员会，一些书记秘密支持《真理报》中与我作对的破坏性力量。我碍了这些人的事。作为贯彻戈尔巴乔夫路线的人，我妨碍了这些人或那些人的事。他们的污蔑不择手段，奇怪的是，他们，这些人和那些人，联起手来了。28 天后到“8·19”政变之前，形成的形势就是这样。在党的内部，出现了早已准备好的爆炸要最终爆发的危险局面。民主派应为此负责，从根本上说，党内的右派力量，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那些领导人，利加乔夫、久加诺夫等人，也有责任。戈尔巴乔夫经常问我：“你认为我们这里的主要危险是什么？”我总是回答：“右派，也就是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他不说话，但同意我的看法。事实正是我说的这样。俄罗斯联邦共产党重建（利加乔夫、波洛兹科夫、久加诺夫等等，这些人在重建俄罗斯联邦共产党）的时候我不参与，原因就在这里。我不能参与。

当时党内的紧张局势就是这样。现在日本翻译出版了利加乔夫的书，人们会根据它来判断共产党人。但这是不可靠的。书的全部内容都指向反对改革。自由、公开性，全都被称作“戈尔巴乔夫主义”（горбачевщина）。他们从来都反对改革。

只是由于戈尔巴乔夫，我才把自己和党的组织联系在一起。直到 1989—1990 年，戈尔巴乔夫和我想象的一样，后来他就变了。所有这些“右派”，那个时候就背叛了共产主义思想，现在也一样。不过现在只是个别谈话，我有整整一桌子的相关材料。

我在《真理报》开辟了争论性的栏目，在那里展开党内争论。例如“党与改革”，等等。这种栏目在《真理报》首次出现是在布哈林当总编辑的时候，存在了很长时间，后来斯大林把它取消了。我开辟了争论性栏目，它存

在到叶利钦上台，到“8·19”政变。党内争论，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努力使所有的观点都在《真理报》上得到反映。我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结果是，一切问题都集中在我这里。当然，基本上集中到戈尔巴乔夫身上，也集中在我这里。1990年10月，在某些中央书记的支持下，他们在报纸上组织了反对我的表演。但我那时还在《真理报》，把他们打退了。此后一切正常。虽然我曾给戈尔巴乔夫写条子，说我想离开《真理报》，但是他说需要我留下。1991年8月，当时我在杜塞尔多夫，他们利用了这一机会，选举了另外的主编。他们改变了报纸的面貌。这发生在我不在场的时候。他们急不可耐，虽然我很快就会回来。他们说波尔托拉宁等“民主派施加了压力”，要我离开《真理报》。因为已经没有了戈尔巴乔夫，没有了中央委员会，党被禁止了，当然，他们得手了。

形势不断发展，现在我已经以学者的身份出现了。在我看来，迄今为止，谁都没有揭示政变是怎样在党内酝酿成熟的这一秘密。这一切都发生在党内，而我曾经是政治局委员。那些人，比如利加乔夫，在这件事上什么都不可能知道，因为他甚至都没有进入政治局。我的其他同事，大多数人对此没有了解，我不管怎么说是非常接近戈尔巴乔夫的人，这与很多人不一样。当起草党纲的时候，我继续做戈尔巴乔夫的助手。有几个人，两三个人，到现在为止一言不发。严肃的人们到现在保持沉默。可能戈尔巴乔夫在自己的书里就这件事说了些什么，但我怀疑他会把什么都说出来。都说出来对他也没有好处。我可以把我知道的说出来。但是有许多事我可能不知道。

现在《消息报》发表了波波夫的文章。他感觉到1991年6月有一场政变正在准备之中。亚佐夫、克留奇科夫、巴甫洛夫在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发言。他自己用咖啡渣占卜，但是他把这种情况报告了布什，通知了他。他和美国大使馆，和马特洛克，保持密切联系（他认为这样做是正确的）。他去了美国大使馆，悄悄地交给了马特洛克一些东西。这是一篇有意思的文章。但是这个时间我在戈尔巴乔夫身边，我知道他作何反应。我可以对此加以评论，但是我不准备做这件事。为什么？因为我没有和戈尔巴乔夫讨论，只有他一个人可以说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不错，戈尔巴乔夫和巴甫洛夫谈话时我在场。对于事情的真相，我有自己的印象。而波波夫对此一无所知。不过我

也不是知道事情的全部。我可以说：我听到了什么什么。我参与了什么什么。但这并不意味着这是事件的客观图景。可能有些情况我不知道。

在准备纪念十月革命 70 周年的报告时，我在为布哈林平反方面做了一定贡献。赫鲁晓夫就想做这件事，但是没有下决心。这件事不那么简单。赫鲁晓夫被免职以后，很惋惜没有做这件事。戈尔巴乔夫做了，我很高兴为他提供了帮助。纪念十月革命 70 周年的报告为赫鲁晓夫平了反。所有关于苏共 20 大后开始的这个时期以及关于赫鲁晓夫的论述，都是出自我的手，它们一字未改，公布了。

但这只是个别情况。它们全都是在当时所做工作的一定背景下发生的。应该考虑到，并非布哈林的一切都是可以在今天恢复名誉的。布哈林的许多观点、立场（在思想方面的），我很不赞成。但是这丝毫没有使我对在布哈林问题上所做事情的公正性产生怀疑。虽然他的很多立场是我完全不能接受的。例如在使用暴力等等问题上。但是我考虑到，所有这些都是特定的时间说的和做的。我希望将来人们在评价我的时候也考虑到我生活和工作的时代。应该对局势做出评价。可能人们会具体分析，也可能不会。这对我不重要。

最主要的是与我们现在的题目有关的事。布哈林说，当我们谈论共产主义的时候，必须要“用模具冲压出”知识分子干部。他就是这样说的。他说：我出身于知识分子，对他们非常了解，我自己拥有的优势或者不足都在于此。可是我认为，他并不是很了解知识分子。要记住，他说的话对我们非常非常有害。在布哈林那里更多的是什么？自信还是无知？那些聪明人甚至在当年已经讨论过这些问题。

不久前我重读了扎米亚金的小说《我们》（出版于 1922 年），正是在那里讨论了“用模具冲压”。说到了如何“用模具冲压”人，就像布哈林所说的那样。但是扎米亚金把“用模具冲压”人搞到荒谬的地步，而布哈林在 1925 年又说出了这种蠢话。或者是奥威尔，他的《1984 年》。他们已经对此进行了嘲笑，说“用模具冲压”人是不可能的。很遗憾，这条路线在很多方面决定了有关新人形成的政策。虽然事先就有警告，虽然形式上不那么令人厌恶，但用模具冲压发生了。这是在斯大林时代。兵营式的共产主义，等

等。斯大林和其他人对布哈林的想法予以支持，虽然他们消灭了布哈林。布哈林话语中的愚蠢，斯大林他们进一步放大了。布哈林不过是个坦诚的人。

现在做一点总结。我谈了我自己，自己的生活，我在什么样条件下工作，如何工作，现在做一些概括。

国内曾经有过那样的情况，那时我还没有出生。我来到了这个“工厂”。他们开始“用模具冲压”我。我在做结论。您怎么想，我纯粹是在说布哈林？我扯上他只是为了让他用他的那段引文帮助我。问题在于，“用模具冲压”成功了吗？也成功了，也没有成功。说成功是因为我们变得畸形了。我变得畸形了，而您，可能没有。瞧，我的生活就是这样形成的。但是又没有成功。为什么？因为我最终开始反对这种做法，从事人的问题研究，我到底还是激烈地批判了这种“用模具冲压”的做法。这是我对所说的话的总结，包括关于政治、科学等等所说的话。我觉得这很有趣。这样的转变，让我觉得很有趣。这是个基本问题，结论中最基本的问题。

我可以谈谈萨哈罗夫，不过不是把他作为我遇到的、有交往的什么人来讲。我脑子里没有萨哈罗夫。萨哈罗夫不是和我关系密切的人，虽然我早就知道他了。戈尔巴乔夫把他从高尔基市释放回莫斯科后（高尔基市是他的流放地，虽然那也是他工作的地方。高尔基市有一个保密单位，他在那里从事热核炸弹的制造。这是一种非常有效率的流放），我问戈尔巴乔夫：“在今后的工作中怎样利用萨哈罗夫？”当时萨哈罗夫还没有独立地发表意见，还没有人民代表大会。我们想要有一个社会委员会，讨论各种问题。那里有一些杰出的科学活动家，知识分子、学者，其中包括萨哈罗夫。我写了相关建议，但是这件事没有搞成。而后来，萨哈罗夫开始在人民代表跨地区小组独立发表意见。当然了，我不支持他。我在党中央工作，不能支持他。在科学院我看见他，听了他的发言。发言的许多内容让我喜欢，但是他作为跨地区小组领导人的活动，我当然不喜欢。我更多的是关心应该在党内采取什么措施，党的更新与民主化，等等。流放萨哈罗夫发生在我不在苏联的那些年，我在捷克斯洛伐克。这段历史是我不在场时发生的。我本人，如果说没有被流放到高尔基，那也是被贬到捷克斯洛伐克了。萨哈罗夫努力利用自己的威望，就像利用工具。民主派指引他反对戈尔巴乔夫，虽然他本人认为戈尔巴

乔夫的能量还没有完全释放出来。我是戈尔巴乔夫的助手，严格遵守游戏规则，没有和萨哈罗夫见面、会谈。如果戈尔巴乔夫不会见萨哈罗夫，那我就不会参与到这件事情中来。然后是选举，萨哈罗夫开始作为人民代表与戈尔巴乔夫见面，我没有参加。

我有时想，要是萨哈罗夫还活着，我不相信他会赞同后来掌了权的民主派现在的所作所为。很可能相反。他未必会赞同他们的作为。萨哈罗夫谈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趋同。他没有说我们应该从社会主义走向资本主义。这意味着他的出发点是，社会主义将发生改变，但它毕竟将会存在。这是和现在那些自称“民主派”的人的立场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立场。

记者：在你做《真理报》主编的时候，日本流传着一种说法，说你试图改革这份报纸，但是完全没有成功，因为你周围有一些克格勃的间谍。是这样吗？日本学者坚持认为，事情就是这样。

弗罗洛夫：你们就说弗罗洛夫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他想了想，什么也没有说。

最好还是接着说萨哈罗夫。萨哈罗夫去世以后，就是在第二天（这时正在举行最高人民代表大会），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叶夫图申科来找我，我不在，他通过坐在我旁边席位上的人（我也是人民代表）交给我一首纪念萨哈罗夫的诗。诗是这样的……，叶夫图申科……。

休息的时候，我把它给戈尔巴乔夫看，他又给主席团的其他人看。许多人说：不应该发表。叶夫图申科转来这首诗是为了在《真理报》发表的。戈尔巴乔夫问我：“你会作何处理？”我说：立即发表。“嗯，好吧，发表吧。”第二天就把它发表了。正是在《真理报》上，发表了纪念萨哈罗夫的诗。

我应该说，这完全出乎叶夫图申科的预料。他当然会想：“我是这样的革命者，把这样的诗给了他们的《真理报》，《真理报》当然不会发表它。”可我们在第二天就发表了。事实是这样的，戈尔巴乔夫也看过了。有人说不应该。另外一些人这样看我：“唔，随他去吧，一个怪人”。而我事先就说了：“当然了，是的。”我什么都没对叶夫图申科说，只是晚上回到编辑部，把诗交付发表。

这段历史能从一个小小的角度反映我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我当《真理

报》主编的时候，戈尔巴乔夫从来不对我说：“你要发表这个，而这一个，不要发表。”我们的关系从来不是这样的。在这种情况下，他既不说要这样，也不说不能这样。他要是不同意，他会说的。你决定了要发表，那就发表。戈尔巴乔夫不会“施加压力”，而是给你很大的独立性，这是他的风格。对我尤其如此。从来没有对我做过指示。“自己做决定，啊，好样的。”

在改革的那些年，我们努力让什么都能发表，也包括别尔嘉耶夫。《真理报》是党报，其他报纸反映其他观点。人道主义原理的发展，在我国，不论在实践中，还是在政治活动中、在哲学中，今天已经闭口不谈了。今天在俄罗斯发生的，是一种意识形态方针取代另一种意识形态方针，但不是民主，不是多元化。可在改革的那些年，我们尝试着做工作，使各种意见都能发表。我们做过努力了。

我不希望再发生什么革命。因为革命往往只是使人民的情况更糟。叶利钦或者哈斯布拉托夫，有什么区别！？对我们大家反正都不是好事。他们像是在银行吸金的管道，斗来斗去，结果又会怎样？人民从中能得到什么？不停的全民公决、斗争，代替了做事、工作，代替了需要耐心的具体工作。这会给人民带来什么？情况越来越糟。

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在我看来，主要是因为这些人没有工作能力。我们拿叶利钦来看。他只知道与人斗，什么时候停过？他曾经当过建筑委员会主席，做了什么？我们的建筑事业发展了吗？谁都见不到他的人影，也听不到他的声音。可这里需要人工作。思想、建议是正面的，他们缺少工作能力。

再看看这些年轻人，盖达尔、涅恰耶夫，他们没有工作能力，因为没有工作经验。谁都没有考察过他们的工作，他们得到推举不是因为通过了工作考察，而只是因为他们是年轻人，与盖达尔的一帮人一起来自研究所。但是研究所是一回事，政府总理是另一回事。为了学会领导国家的经济，需要首先学会领导一个企业的经济，可能要经过几个台阶：联合企业—州或者区的经济—国家的经济。可是他们没有这样的经历，为了领导国家，必须走过所有这些台阶。

我说这些，是因为我曾两次为盖达尔安排工作。一次是把他安排到《共产党人》杂志，另一次是安排到《真理报》。盖达尔是在我的安排下成为领

导人的。我推举了他，但是我没有推举他领导政府。当他成为政府领导人时，我大吃一惊。我很了解他。作为一位经济学者，作为记者，他很棒。在《共产党人》杂志，在《真理报》，在我看来，他写得很好。虽然人们不喜欢他。但是为什么把他推举为政府领导人！？我曾经在政治局工作，见过真正的部长、政府成员。人们骂他们，但对我来说，雷日科夫、巴甫洛夫，和这些小孩子比，他们是巨人。为什么？因为他们所有的台阶都经历了。雷日科夫当过多年的乌拉尔重型机械制造厂的厂长。您知道这是个什么单位吗？这是个微型的国家。人们首先学习管理微型国家，然后其中的一些人接着往前冲。

当然机遇在这里起着作用，什么人看上他了。戈尔巴乔夫或者还是什么人。发现了他。盖达尔就是这样。要知道，我把他搞到《共产党人》、《真理报》，这也是机遇。我把他介绍给戈尔巴乔夫。他被人们发现了。我们有大量聪明能干的在智力和身份上不逊于盖达尔的经济学博士。盖达尔不过是运气好，他被人发现了。仅此而已，岂有他哉。我们的悲剧就在这里。是他们这些人把我们带到了现在的地步。

人们指责雷日科夫，说他缺少决断。什么是缺少决断？他是个谨慎的人。他害怕不顾一切的激烈行动会导致不良后果，而人们不怕这个。他盖达尔知道什么是害怕吗？因为他不知道可能的后果，不懂生活。他是海军将军的儿子，祖父是作家。他怎么会懂得生活？

我们顺便看看西方人是怎么做的。福特是何许人？美国的大亨巨贾们是从做书记员开始的。从做最简单的工作开始。不过要是他是聪明人，教育……。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就没有受过教育，因为经验给予人的更多，经验比学院式的教育给予人的更多。他们中的一些人没有受过专门教育。这不好。现在我们的活动家受过教育，但这什么都说明不了。教育还不足以使人出类拔萃。人们在获得一般性的教育以后，凭借智力，主要是经验，脱颖而出。我为盖达尔感到惋惜。他可以成为一个好学者，可不论什么时候都成不了好的国务活动家。这一下子就看出来。国务活动家需要有特殊的智力结构。学者的智力结构和实践家的智力结构。实践家想出各种办法，在行动以前要反复斟酌：这样做在人们身上会产生什么样的反应？在这里起作用的不是知识，不是教育，是经验。然后他考虑来考虑去，说：“可以这样做，但

这样做会以人们的贫穷、失业等等结束。”于是不做了。

我认为这里体现的智慧比你获得某个思想所体现的更多。因为智慧不仅仅是你找到某个东西，找到某个思想。人的大智慧还在于拒绝某些思想，如果这些思想会带来不好的后果。福音书说：“智慧多，忧患多。增加知识的人，也增加不幸。”福音书中甚至专门有这样的词组——“善的理智”。这也就是智慧。也有恶的理智。我（还有许多其他人）把这种理智称作“疯狂的理智”。人能对理智加以控制，能够给它一定的限制，赋予科学以人的、人道主义的尺度，把它置于控制之中，以保证把人置于首位，第二位才是知识，这就是智慧。这意味着必须拒绝什么，不能什么都接受。要是有什么会带来有害的结果，那就拒绝它。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这样做的。我们再看我给您说过的话。还记得吗？孩子的眼泪，是对人们往前走——哪怕进天堂——的阻碍。不！要是必须以孩子的眼泪为代价才能进天堂，——不要这样的天堂！伊万·卡拉马佐夫就是这样说的。但是很遗憾，历史在前进，而人们不善于学习。

我想把意思表达得再准确一些。说到与戈尔巴乔夫一起工作时，我曾经说“我们”，列举了戈尔巴乔夫身边与他亲近的人。就是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博尔金、麦德维杰夫、切尔尼亚耶夫，还有我。后来又有沙赫纳扎罗夫，在一个不长的时期有彼得拉科夫，有时，相当罕见，还有比克宁，比克宁更多地是和雅科夫列夫一起工作。他是通过雅科夫列夫到我们这里来的。比克宁不能算到这里所说的“我们”之中，但我不能不提到他。要知道，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团队，在做什么事情之前。要知道，我不是自己一个人写东西的。我把这帮人召集在一起。有人准备各种材料。这个比克宁，他往往是通过雅科夫列夫参加到这件事的。他为雅科夫列夫准备材料，只是由雅科夫列夫把材料提供给我们这个团队。不过有时比克宁也自己到我们这里来。这是因为雅科夫列夫在理论思维方面不太行。

记者：你和戈尔巴乔夫——“分手了”。可是在5年里你们一起工作，齐心协力。

弗罗洛夫：到最后，戈尔巴乔夫的观点发生了显著的改变。但是，我认为这不仅是在发生了政变、暴乱以后。在此之前他的观点就明显地改变了。

和我有了分歧。他的观点离我而去。他离开了我，采取了另外的观点。我觉得他已经对使用“共产主义”、“社会主义”这些词感到难为情，虽然“关于列宁的话”他说得还和过去一样。

我们的区别在于：我，如有些人所说，是“教条主义者”，比较教条、保守，等等。要是有人喜欢这样认为，那就请便吧。可戈尔巴乔夫，是那樣的灵活、善变。雅科夫列夫比戈尔巴乔夫还要灵活、善变。总的说来，雅科夫列夫咒骂一切：自己的过去、党、历史。他不仅抛弃了斯大林主义，而且抛弃了马克思主义。事实上在雅科夫列夫和其他人的影响下，戈尔巴乔夫身上也发生了这样的变化。但实际上区别并不在这里。

我和戈尔巴乔夫之间的区别在下面所说的情况。我是作为学者、哲学家，对待所有这一切的。对我来说，这些观点是我的全部生命得来的。我学习、探索，写了大量著作，在这些著作中我从事研究。这是我的主要工作。可能在一些年里是我唯一的工作。我研究遗传学、伦理学问题、优生学……。基本上是作为学者、哲学家在工作。在某个时候我与戈尔巴乔夫有了共同点，从了政。他想要用哲学文本等东西填充政治。然而在我国，与日本不同，政治总是和意识形态联系在一起。现在他们说，应该有政治的意识形态化。我们就是在思想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的。

可是戈尔巴乔夫和我不同，他主要是政治家。因此这些观点不是他的毕生事业。虽然他真诚地相信这些观点。但是在政治家那里和在思想家那里，所有这一切是以不同方式呈现出来并被接受的。看起来，它们在戈尔巴乔夫那里没有扎根。我经过一番痛苦才获得它们，而他在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工作，是边疆区党委书记，从事农业和工业。这个时候我是在读书。他既没有读过黑格尔，也没有读过弗洛姆，所有这些人他都没有读过。他需要我，是为了用唯理智主义填充他的路线。他感觉到了我的价值，他是个非常聪明的人。

政治家选了一个研究思想、科学的人，他自己不会为思想而赴汤蹈火。他只不过或者改变这些观点，或者更换它们。那么多人就是这样做的。他们曾经是共产党人，马克思主义者，可现在——时过境迁了。戈尔巴乔夫是个极端的例子，看得很清楚。他占据了国家的最高位置，其他人是小人物，

在研究所工作，在科学院等地方工作。您知道，他昨天是怎样大喊大叫鼓动所有人的，可是今天他放弃了。戈尔巴乔夫身上发生的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况。我们的区别就在这里。我现在没有和戈尔巴乔夫在一起，秘密就在这里。因为他作为政治家，改变了自己的观点。他没有去赴汤蹈火。

他应该怎么做？叶利钦禁止共产党活动，戈尔巴乔夫应该说：“我不同意，我抗议”。这意味着赴汤蹈火。要是这样做了，他现在就是一个伟大的政治人物。因为党会获得重生，在戈尔巴乔夫的旗帜下获得重生。这个党会很快成为人数最多的党，而戈尔巴乔夫会是一面旗帜。还不仅仅是旗帜，这会成为他的政治支柱。这是他的错误，要受惩罚的。

我已经说过自己对共产党的态度。不过到现在为止，我还可以认为自己是苏联共产党党员，我至今没有声明退党。现在的情况是，党已经被消灭了，相应地也就没有了对党的责任和党内的职务，等等。但是我自己在这里始终是消极被动的，而戈尔巴乔夫表现出了主动性，这就是我们的不同。他拒绝了党，而我没有。我被排挤出来了，被抛弃了，但是我自己没有表现出主动性，戈尔巴乔夫是积极主动的。他是作为政治家行事的，而我是作为一个忠于和他一道工作时曾经效忠的那些思想的人行事的。这些思想在我身上深深地扎了根，是我的根本。由于这一点，我被从政治中排挤出来了。

我现在不搞政治。从总体上说，我认为政治是肮脏的事情。我对戈尔巴乔夫，作为一个人，所感到的失望，就包含在这里面。我以为他是另外的一个人，会为这些思想赴汤蹈火。他的表现告诉我，他是一个政治家。今天是一种观点，明天是另一种观点。今天相信上帝，明天相信敌基督。只要能留在政治的上层。

雅科夫列夫也一样。于是就得到一个部长级的小职务。而我现在没有任何职务，我也没有为改变自己的境况做任何事。嗯，拉倒吧！升上去，掉下来，我一辈子见得多了。

在人和人的关系上，我和戈尔巴乔夫曾经非常亲近。可是，看着我的眼睛他将感到羞愧。因为他把我作为有思想的人领到自己身边，而他本人却这样做事。

我可以和戈尔巴乔夫谈一谈，内容谁都不告诉。如果我想写关于和戈尔

巴乔夫关系的书，我就会这样做。因为在《真理报》工作过，我会说到一些，但不会专门谈。我和他的关系应该谈，可能需要不止一个星期的时间。只有这样才能明白我和戈尔巴乔夫的关系。我们之间的区别，我已经说过，是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区别。对于日本人，这是可以明白的。我是武士，不过不会切腹自杀。但是我是武士，有自己关于操守的观念。我不认为戈尔巴乔夫是武士，他是政治家。我说过政治对我来说是什么东西。肮脏的事情，就像我看到的。我想，可能政治是讲道德的。起初戈尔巴乔夫的言行让我不能不这样想。现在我对这些人失望了，雅科夫列夫之流，其中包括戈尔巴乔夫。我对这些人失望了。问题不在于你对还是我对，我不知道这些我曾经那样相信的人会如此地没有道德，在我看来是如此。

戈尔巴乔夫现在说他想回归大政治，但我觉得，甚至只是说这些话，从他那方面来看，都是大错误。因为他不仅在我这里，而且是在我国人民的大多数身上，引起了上面所说的那种感觉。问题不在于他犯了什么样的错误，所有这些，人们都可以原谅他。尤其是我国人民，他们善良而宽容。我国人民曾经原谅了许多活动家的其他错误。可是现在谁都不相信戈尔巴乔夫。我说的是人民。至于说他身边的人，哪个正经人和他一起工作？除了那些追名逐利、拍马屁的人，谁愿意和他共事？我不相信正经人现在会同意和他一起工作。因为他们会知道，戈尔巴乔夫任何时候都会这样做。这不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和印象，在我身上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只是发生在广阔的社会舞台上。他败坏了自己作为人的声誉，谁都不相信他了。

他的错误在于，他太自信了。这是外省人的自信，不学无术之人在许多情况下的自信。这种情况在排球、足球运动中常有……。有人独自包揽比赛，其他人都应该做他的陪练。把整个比赛揽在一个人身上，这是拙劣的比赛策略。他非常自信。他想他是那么杰出的选手，比赛需要由他一个人承担。没有的事！一个不很懂得比赛规律的人的自信，导致戈尔巴乔夫失去权力。足球的传球是一种艺术。传球，把其他选手纳入比赛，有时起着重要作用。破坏了这些规律，任何时候都不会有好结果。因为他太自信，对发生暴乱的危险估计不足。

现在人们（包括波波夫）开始猜测：戈尔巴乔夫知道这种危险吗？卢基

扬诺夫声明，戈尔巴乔夫知道暴乱以及宣布进入非常状态正在准备之中。但是怎么能这样模棱两可地推测一个领导人？

现在叶利钦犯了很多错误，他的个人成就率正在急剧下降。他承诺了一些事情，可是不做。但他的知名度很高。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叶利钦不是戈尔巴乔夫。在叶利钦那里，可以找到一千个对他不利的特点。在机智、教养、智力等等方面，戈尔巴乔夫比叶利钦强。但是叶利钦有个性。他有行事的规矩、原则。和戈尔巴乔夫比，叶利钦强在哪里，您知道吗？在性格。人们看重领导人（其他人也一样）观点明确，始终如一。他们更愿意相信这样的人，不愿意相信那种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的人。还有那种态度模棱两可的人。他今天对你彬彬有礼，让你着迷，戈尔巴乔夫就是这样，可是明天他就目中无人，目空一切。一些人，比如我，为他做了奉献，可对他来说，一切都是另外一回事。他邀请了一些反对他的人到他的基金会。这些人直到现在对改革持否定态度，可他以为他可以摆平他们。谈上半个小时，这个人就是他的人了。哪里有这样的事！他们过去怎样以否定的态度对待他，现在也一样。可他以为他什么都能办到。这正是外省人的自信。

为什么一开始我没有对戈尔巴乔夫做出反应？因为我是在电视上见到他的，心想：“一个来自外省的值班员”。他们拖出了一个值班的州委会工作人员。只是在后来，开始了某种精神生活方面的步骤，召开了关于科学技术进步的会议，我写了文章，等等。现在，在这段历史过去之后，在戈尔巴乔夫变来变去的表演结束之后，我对他的看法与，在（1985年）3月，和在关于科学技术进步的会议以前，都是一样的。人们说：第一眼的印象是最正确的。他担负起了那么宏伟的事业，应该还行。可实际表现是：一个外省人。

当戈尔巴乔夫上台掌权的时候，我问一个熟人（我不提他的姓，他给戈尔巴乔夫写过发言稿，常到法国）：“我说，这个戈尔巴乔夫是什么样的人？”“嗯，怎么和你说呢？不是天才。哈、哈、哈！”我们就这样笑了。现在我们有时还回想起这个场景。

我相信，如果不是天才，那就是个强有力的人物。内敛的人。他的一切都藏而不露。心里有数。原来是个政治家，一切都很肤浅。他输给了那些粗鲁的、残忍的、不学无术的人。叶利钦也有这些特点。

在我们为党的 28 大做准备的时候，当我们准备十月革命 70 周年的报告的时候，一切都在戈尔巴乔夫的积极参与下进行。在一个很小的范围里进行。您知道工作是怎么进行的吗？我们有了某个文本，一部分是我准备的，一部分是其他人准备的，分量或多或少，取决于事先的安排。作为规则，委托我和大家一起把它们加以整合。在奥加列夫或者沃伦斯基，大家坐在桌子旁，一个星期，有时两个星期，从早上到晚上 9-10 点钟。我们坐着。戈尔巴乔夫说：“这一句，嗯，你们怎么看？”从工作方法的角度看，这很有趣。雅科夫列夫说：“我认为，这里需要怎么怎么，怎么怎么”。我说：“怎么怎么”。取决于戈尔巴乔夫更喜欢什么，他时而对这个人说，时而对那个人说：“你口述，让他们记下来。”作为规矩，我不是播音员。我问：“需要我写什么？”我任何时候都需要写，写作是我的职业。就这样，一个星期，有时两三个星期，准备代表大会的报告。这时有一个人和另一个人的“高频率接触”。我和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和戈尔巴乔夫，以及所有身边的人，包括博尔金。

在戈尔巴乔夫当了总统，同时最重要的文件，新党纲草案，着手制定的时候，戈尔巴乔夫不仅离开了党，专注于总统事务，而且在这个时候，看得出来，他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对他来说，可以看得出来，占第一位的已经是总统的职责。联盟，联盟条约。这些我都理解。但是在这个时候，我感到戈尔巴乔夫对意识形态、党、理论等等问题，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感兴趣了。他刻意对我表现出很大的信任，但是请您注意，在准备新党纲草案的集体中，直到新党纲公布以前，他一次也没有露面。以前不会这样。

我们已经不再像以前那样工作了。所有的事都推给了我。对我来说，这是巨大的荣誉，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可是从另一方面看，我看出来了，什么都没有了，戈尔巴乔夫犯了大错误。他 8 月 4 号外出休假，8 月 5 号纲领委员会开会，所有相关问题都在会上讨论了。纲领草案有些细小的改动。他们想背着我否定最后的草案。后来恢复了原先的文本。但是这些过程中那个戈尔巴乔夫已经见不到了。

现在我认为，在思想见解方面，戈尔巴乔夫没有起什么作用。8 月 8 号纲领草案在《真理报》发表。可以说，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参与，与以往准备

最重要的文件时不同，几乎为零。我们打算接下来展开讨论，然后就是代表大会。为戈尔巴乔夫辩解的理由，要多少有多少。但是在以前，在 1987、1988、1989 年，这样对待如此重要的文件，不经加工就允许发表，不积极参与这些文件的制定，从未有过。与他做了些什么以及如何自处相比，我和他的个人关系并不重要。这和过去的情况有根本的区别，这表明，戈尔巴乔夫变了。我提出了事实，它们所说明的不是我和戈尔巴乔夫之间的个人关系，而是对他的演变的客观描述。

我当过各种杂志的主编。从记者协会成立时起，我就是它的成员。但是我对记者和办报人的看法非常不好。特别是，当开始在《真理报》工作时，我明白了，这些卑劣的人是大多数。我不知道，在记者中有那么多的卑劣之人，他们准备说任何谎话，能够歪曲一切。我的确不知道。因此，对于您的问题，我作了回答，而在那里，在《真理报》，周围是克格勃的工作人员，我沉默不语。我可以讲很多东西，但他们会往我身上泼脏水。他们是些报复心很重的人。我不怕他们，但是牵涉到某种污浊的事情，总是件不愉快的事。

记者：现在，这样一个时期到来了，可以说，社会主义大厦在你们的国家如果不说已经垮塌，那也是正在垮塌之中。但是，大概事情并不在于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很显然，大厦本身就存在某些缺陷？

弗罗洛夫：是的，当然了。戈尔巴乔夫搞的党的文件，也是我和他一起搞的文件，从纪念十月革命 70 周年的报告开始，其中就有相关内容。在党纲草案中也写了。问题不在社会主义原则本身，而在这些年这些原则在实践中是怎样被变为现实的。

记者：换句话说，一切不幸都在于体现在生活中的社会主义原则并不完全正确？

弗罗洛夫：当然了，在对这些原则的理解中也有不正确的地方。因此它们应该不断改变、发展。社会主义原则，甚至是列宁的理解，斯大林就更不用说了，与我们在戈尔巴乔夫时期的理解也有非常重大的不同。不同于后来被我们称作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对社会主义的理解。这是不同的东西。因此对社会主义各项原则的理解也发生了改变，朝着社会主义是人道的民主的社会的方向改变。在斯大林时代是兵营式的共产主义。这就是我想要让您

知道的全部内容，我说了自己的活动，戈尔巴乔夫之前、戈尔巴乔夫时期和现在的活动，我的活动可以归结为致力于摧垮教条主义、公式主义，使社会主义思想具有创造性，使马克思主义成为创造性的、不断发展着的学说。不能像过去那样教条主义地、按照某种公式设想社会主义。我们的（也包括我的）全部工作都在于此。关于新社会主义的也即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这些思想，它们的最后的、集中的体现，在新党纲草案中得到表述。这是对社会主义的观点、对马克思主义的观点的表述。

当然，我一开始所说的，斯大林时期的情况，他的镇压行为，我把它们称作社会主义的专制官僚主义变形。所有这些都应该被抛弃，我们应该继续往前走，走向人道的和民主的社会主义。但最主要的是社会主义的变形。改革的任务，就是改革社会主义。也就是说，全部改革都是在社会主义社会的框架内进行的。戈尔巴乔夫是这样想的，我也是这样想的。我现在还这样理解改革。

这很重要。我已经说过，社会主义，现实的社会主义，我们没有。对社会主义原则 和戈尔巴乔夫本人，开始往改革中纳入那种 8 月以后的东西。8 月以后发生的事不是社会主义的改革，已经是从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转变。这是不同的东西。在我看来这不是改革。在这个意义上我是比罗马教皇更大的天主教徒。现在的共产党人说，戈尔巴乔夫从一开始就想摧毁社会主义，用资本主义取代它。这是不正确的。他那时没有这样想，我就更不用说了。我到现在也不这样想。

不久前我在沙赫纳扎罗夫那里读到，当他在戈尔巴乔夫那里工作的时候，他认为应该走得再远一些，摧毁一切，等等。他们影响了戈尔巴乔夫。结果就发生了他所说的事。

记者：戈尔巴乔夫基本上成了另外一个人。在各种情况下，他的观点变了。在你看来，什么是基本原因，是别人对他的强有力的影响，还是他的性格的弱点？为什么一个人在如此成熟的年龄改变观点？

弗罗洛夫：因为他是政治家。在学者那里，学术研究的目的是什么？找到真理。在政治家那里完全不是这样。政治家的主要目的是找到最佳方案，也就是在既有条件下最可接受的，最合目的的方案。这不是真理。他抛弃那

些现在对他有妨碍的观点。这使得政治与道德分离开来。政治是肮脏的事情，是不很干净的人的职业。为了从事政治，必须忘记良心。可能我是个道学先生。但非常多的人，几乎是所有的人，都认为政治和道德是互不相容的。政治与追求真理不能并存。

而我们在这种情况下寻找社会主义的真理。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想要把自己理解的真正的社会主义贯彻到政治当中。刚一遇到挫折，戈尔巴乔夫，作为政治家，便说这对他不适合。首先是雅科夫列夫说，这对我不适合。在这种情况下，与此不同的观点是最好的。我们的所有观念都靠边站了。

但是，我们的观念未能成为现实，而且发生了八月暴乱，并不意味着我和戈尔巴乔夫坚持的立场是不正确的。我，我们，目标是进化、改善、纯洁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可以被以这样的形式改变，即甚至允许有比现在更多的市场关系。但只是不能发生爆炸。就像中国所做的那样。在中国，实际上市场关系得到广泛发展，可在理论上，中国人一直在谈论社会主义。这就是我想做的。请不要忘记，我说过话语是一回事，实践是另一回事。用改良的办法，一步、一步，人民能好好过日子。甚至可能越来越好。可是一切都在1991年8月中断了。这已经是向新的关系的转变了。

可能在日本人们会对此做出正面评价。但是俄罗斯不是日本。在俄罗斯，一切都被打碎了，一切都被颠倒过来了。得到的不是建筑物的更新改建，而是它的垮塌。我反对的就是这，也正因为这一点，我不赞成戈尔巴乔夫和民主派。因为在那些时候我是这样对待民主派的：“好吧，让他们工作，让他们批评并提出自己的新观点，奉行多元主义。”可是民主派掌了权，本来应该实行多元化，可他们却想完全不要它。戈尔巴乔夫不反对。雅科夫列夫赞同这样做。所有的问题都在这里。

对我来讲，改革是社会主义的改革。戈尔巴乔夫也是这样理解的。他说，在任何情况下改革都不能被理解为拒绝社会主义的思想和原则。可是后来他自己把一切都推翻了。在政治语言中，这被称作“背叛”。

改革的敌人是保守派，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者。他们认为正确的是改革之前的社会主义，斯大林时代、勃列日涅夫时代的社会主义，戈尔巴乔夫

开始的改革，不是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反对改革。对抗改革。现在党垮台了，叶利钦禁止共产党活动，作为回到过去的步骤，一些共产党员重建了党。今天共产党的领导人，基本上是一些被改革推到次要地位的人。他们说：“对，现在看出来了，戈尔巴乔夫从一开始就不是在说社会主义改革，而是用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他们把这叫作“戈尔巴乔夫主义”。他们批判他，说改革没有社会主义性质，等等。

.....

我应该在一开始就声明，我不想谈论戈尔巴乔夫。我后悔没有守住底线，就戈尔巴乔夫说了那么长时间。我不想谈这个问题。我不想再谈这个问题。没办法，说的话都录下来了。我不知不觉地说到关于戈尔巴乔夫的话题上了。

我恳求不要再谈这个话题了。这是我的请求。我很后悔，不知怎么搞的，不知不觉就说到这个话题了。

就算我不对，但是我不想说。我已经说得太多了。

记者：您到《真理报》以后，使报纸的情况变好了吗？

弗罗洛夫：是的。我曾经有个想法：像《真理报》这样的报纸，不需要和电视竞争。报纸应该改变。它应该刊登读者将要思考的东西。应该不只是作为记者工作，而是作为专家工作。

此外我增加了争论性栏目。起初报纸向好的方向发生明显改变。后来政治局势变了。我开始不感兴趣。他们开始想：“嗯？我们这里有个哲学家……”。我的原则是这样的，我想建立自由的《真理报》股份有限公司，除了《真理报》还有其他报纸、图书出版社，甚至这个股份有限公司里还有电视，电视独立于党，但表达党的关切，等等。为什么我产生了与《朝日新闻》类似的那种“高度协作”的想法？因为《朝日新闻》是我的理想。我想把《真理报》办成《朝日新闻》那样。

第一，业务广泛的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公司和党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很自然，它有自己的立场，表达自己的观点。起初戈尔巴乔夫对此做出很好的反应，帮助我。后来局势发生变化。后来如何，这是一个很长的故事。

我是在戈尔巴乔夫几次请求后到《真理报》的。他自己一度拿不定主意，值得请弗罗洛夫吗？他做了两次决定。我举办了《真理报》联欢节。我是第

一个组织这种活动的。领导班子，政治局决定支持《真理报》，支持我。

但是《真理报》的威信下降了，因为党的威信下降了。为了支持我，戈尔巴乔夫示威性地来到《真理报》，介绍我。我们想提高报纸的威信。有这样的设想：让它发生变化，吸引社会的注意力。和党的情况一样，像我已经说过的，我们想要更新党，同样也试图更新《真理报》。

《真理报》有很多好记者，但是记者的基本队伍有比党中央还要多的正统派。一向如此。我和他们发生了冲突。我需要扭转他们对改革和对戈尔巴乔夫本人的负面态度（我从来不知道这一点，只是和他们发生了冲突）。我甚至没有料想到这一点。因此戈尔巴乔夫支持我，强调我们的联系（戈尔巴乔夫后来让我当了苏共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以巩固我的威信），但这是在给我帮倒忙，因为在报社大部分人眼里，我站在戈尔巴乔夫一边，支持改革，不是我的优点，而是我的缺点。

这种情况整个披上了伪装，浇上了各种调味汁。但是下面的情况证明我的看法是对的：戈尔巴乔夫刚刚来过报社，他还在总统位置上的时候，《真理报》就向他扑过去。“改革”一词只是在括号中使用。对戈尔巴乔夫的发疯了似的批判，现在多多少少平和了些了，当时是立即……。这说明我的看法是对的。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现在。

记者：具有人的面孔的或者新型的社会主义，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这对你意味着什么？

弗罗洛夫：这是一个确立了人的优先地位的社会。人是万物的尺度，如普罗泰戈拉所说。这意味着在经济领域、社会领域、文化和科学领域，以及其他领域，人都处于优先地位。一切都要用人的需要和能力来衡量。这是最重要的。

不能使用任何破坏个人权利、人的自由等等的手段。如果经济的或社会的生活导致在社会中造成对人的损害，那么这就是不正确的。任何时候都需要考虑：这是不是会给人造成损害，一切形式的损害，包括经济等方面的损害。人特有的价值，人的价值，它们应该是主要的起决定作用的标准。

这符合陀思妥耶夫斯基确立的人道主义原则。在我们那里（包括在我那里）有这样一种叙述新的、人道主义的和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方法：首先通过

与斯大林时期的情况作对比，给出它的定义。我们从对斯大林时期的否定性评价出发。这是与斯大林时期的社会相对立的一切东西，在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中，扑灭个性、镇压民主，那里存在着专制主义—官僚主义的关系。可是好像相反，一切与此对立的東西这里都曾存在，还有一定的继承性。

我甚至不把这叫作社会主义，而是叫作“现实人道主义的社会”。这意味着什么？民主的社会主义？这很清楚：法制、选举、分权。一切用来标志民主的东西。这是一个有混合经济、多结构经济的社会，在那里既允许公有制，也允许私有制。但是公有制具有优先地位。

除此而外，这是有机地融入世界大家庭的社会。对它而言，全球性问题、全人类问题优先。

对于我们的国家，在最近几年和几十年，不可能有这样的前景。要是以这样的标准认识一个社会，不管是不是把它叫作社会主义，我认为，很早以前社会主义就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产生了（例如瑞典等国），但在俄罗斯。我把这看作一个全球性的过程，看作将要被建立的东西。存在建立统一的世界社会、人道的和民主的社会的趋向。俄罗斯的社会主义在这里可以发挥自己的作用，可是现在社会主义一下子就被扔到一边去了，当然，在这个过程中，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起的作用会大得多。

实际上，依靠平均分配的原则，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都能走向这个统一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可是现在，这个目标一下子就被抛弃了。而俄罗斯失去这个目标后，将会作为落后国家跟在其他发达国家后面往前走。

这个术语，“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人道民主的社会”，在我国现在已经不使用了。为什么？因为俄罗斯的民主派不使用它，而这又是因为共产党使用过它，在共产党的第 28 次代表大会上，在党的纲领性目标中用过，因此民主派不用。

那些今天重新建党的共产党人，在自己的纲领性声明中不用这个术语，因为对他们来说，它与改革联系在一起。他们认为这个术语是从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立场的退却，是社会民主党倾向。他们把它和他们所谴责的改革联系在一起。他们把这叫作“戈尔巴乔夫主义”，虽然戈尔巴乔夫本人也不再使用它，因为他拒绝这些原则。

这个术语为党作过贡献，进入了政治。现在它只是作为理论、思想原则留了下来。它能不能在某个时候再次被使用，我不知道。但是问题不在术语，事情的实质仍将存在，会在以后起作用，只是再次接受它的将不是共产党。

这不好。责任在戈尔巴乔夫。那些曾经和戈尔巴乔夫联系在一起的人（例如我，不仅是我），由于戈尔巴乔夫的那种行为，已经不再把自己和拒绝这个术语及这些观念的共产党联系在一起了。在这个意义上，党在思想方面在走回头路。

对我和许多其他人来说，这个术语在思想中保留下来了。但是您也看到了，我不是在政治家的办公室接待您。我只是研究这个术语，不拒绝它。因此在今天，我只是理论家，只是哲学家。这和过去一样，虽然过去我和政治的联系比今天多。

这些思想，关于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必然性的思想，对我国社会来说，显得有些超前了。也正因为如此，它们没有被广大民众的意识所接受。甚至在党内也没有被完全接受，因为社会和党内的意识没有成熟到接受这些思想的程度。社会更多地是粗俗地、粗劣地接受思想，社会意识比这些经过精心考虑的半哲学思想要粗俗、粗劣，这些思想必将在某个时候变成现实。但是是在什么时候？可能要经过几十年，甚至可能是经过几百年。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在沿着这个方向发展，它们走得比俄罗斯快。因为这和经济的、物质的丰裕相关，发达国家的民主制度在发展，文化开始急剧发展。

俄罗斯的情况相反，在衰落。我们可能再次回到宗教大法官。但是，从另一个方面说，谁知道呢？我不认为我可以活到那些鼓舞我的思想再次为人们所需要，在政治家那里出现对这些思想的需要的时候。安德罗波夫、契尔年科，然后是戈尔巴乔夫……，突然间，出乎预料地出现了对它们的需要。现在我更加相信，我不会活到我所说过的那些思想再次被人们需要的时候。

我已经完全是个老人了。突然间我将看到出现了某个新戈尔巴乔夫，他也需要这些思想，我的思想以某种形式有了用处？要知道，思想是不会被消灭的。它们能通过某种变形了的样式再次出现。没有必要引证什么人的话，包括我自己的话。但是思想可以自我重生。甚至不以理论的形式，而是以半抒情作品的形式重生。

记者：你说过，党纲中保留了这样的话：信教的人和不信教的人都可以入党。你大体上持反对意见，随后提出了自己的理由。可是你在别墅，在郊外准备党纲。你和戈尔巴乔夫就这个问题发生过什么争论吗？

弗罗洛夫：不，不。我没有和他谈过这个问题。后来有其他一些人非常强有力地干预这件事，戈尔巴乔夫同意了。戈尔巴乔夫究竟怎么了，这件事是又一个证明。他经受了对自己的非常强有力的影响，结果是放弃了许多自己的观念，其中包括在这个问题上的观念。我想他没有充分考虑。以前他任何时候都不会允许这种主张。

我没有和他就这件事进行讨论的可能性。这个时候我在住医院。有时我在医院里给戈尔巴乔夫打电话。我们决定了：反正都一样，在中央全会上，或者在代表大会上，经过讨论，如果不是后来发生政变的话，那些话会被删除，因为这将使共产党完全变成另外的党。某些人希望的就是共产党不再是共产党。但是共产党员们会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留下来，他们不会把这些话写入党纲的。我相信这一点。因此我没有进行争论。

我想，戈尔巴乔夫对这些事不屑一顾。他想的已经完全是另外的事情了。他已经把这个以政党为名的组织放进档案里了，他已经是另外一种心情了，因为他知道，要是共产党不发生变化，他无论如何都不会被选为党的总书记了。这一切他知道得很清楚。他只想当总统。在共产党内可能是另外一个什么人当总书记。谁当就谁当吧，戈尔巴乔夫不屑一顾。这是一个原子反应堆。发生了爆炸，他也成了碎片，不知所去了。当然了，我没有预见到戈尔巴乔夫会这样做事。

【Abstract】 The fate of Russia depends on Russian society and Russian culture. The dilemma of freedom and material abundance runs through Russia's entire history. In a sense, Gorbachev's reform has brought freedom but took Russians' bread. Consequently, Russia did not need freedom brought by reform. We can't understand what was or is happening in Russia without taking this dilemma into consideration. The phrase of "humane and democratic socialism" is what Frolov came up with and Gorbachev agreed. The opponents of reform are

dogmatists, who saw Gorbachev astray from socialism. Gorbachev is a very fickle person and his biggest drawback is cowardice, tolerant of power loss. Gorbachev focused on his presidency and left the party to others, losing control of the party's development. The party was just like an atomic reactor. It continued to work, while Yakovlev, Shevardnadze, Gorbachev, and others serving the reactor ran away. No one adjusted or controlled the reactor, which led to its explosion.

【Key Words】 Disintegration of the Soviet Union, Gorbachev's Reform, Lessons from the failures of Reform

【Аннотация】 Судьба России зависит от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общества и российской культуры. Дилемма свободы и материального изобилия пронизывает всю историю России. В некотором смысле, горбачёвская перестройка принесла свободу, но отняла у россиян хлеб, и России уже стала не нужна принесённая реформами свобода. Оставив данные дилеммы в стороне, невозможно понять произошедшего в России. «Гуманный 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ий социализм» — это придуманная Фроловым фраза. Он предложил, Горбачёв согласился. Противники реформы — догматики, они полагают, что Горбачёв отошёл от социализма. Горбачёв очень непостоянная личность, самым большим его недостатком является слабость, толерантность к потере власти. Горбачёв сконцентрировал свои усилия на выполнении президентских обязанностей, партию оставил другим, развитие партии лишилось контроля. Партия, как ядерный реактор, он работал, а Яковлев, Шеварднадзе, Горбачёв и т.д., служащие реактору люди, убежали. Без тех, кто осуществлял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и контроль, реактор взорвался.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Развал СССР, горбачёвская перестройка, Урок поражения перестройки

(责任编辑 陈大维)

苏联外交

赫鲁晓夫时期苏联与古巴关系的演变及其影响因素*

刘国菊**

【内容提要】赫鲁晓夫时期的苏古关系是冷战时期最引人注目的国家关系之一。厘清该时期苏古关系的发展历程,总结出双方关系运行和演变的规律及其影响因素,不仅有助于深刻理解古巴革命胜利后为何舍弃美国而选择苏联,以及苏联采取哪些措施赢得了古巴的追随等问题,而且对认识和把握当前错综复杂的国际关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通过对赫鲁晓夫时期苏古关系的演变过程及其影响因素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处理好苏古关系中涉及对方核心利益的问题,是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内在动力;美国因素是推动苏古关系发展的重要外部原因。

【关键词】苏古关系 勒库布尔号事件 古巴导弹危机

【中图分类号】D851.2; K512.5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6)05-0082(24)

二战以后,美国和苏联成为超级大国。为争夺霸权,双方在经济、军事等领域展开了较量。但是,由于核武器的出现、主权规范的深化等原因,美苏之间通过武力征服对方均难以实现,两国之间发生大规模战争和相互兼并领土的可能性也极小。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美苏之间权力竞争的方式转变为通过拉拢各自的盟友来建立势力范围,以换取盟友在政治和安全问题上对

*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意见,文中疏漏之处由笔者负责。

** 刘国菊,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博士后。

自己的支持和追随。1959年古巴革命恰逢美苏在第三世界展开激烈争夺之际。古巴为何疏远美国而选择苏联，苏联采取哪些措施赢得古巴的追随等问题，值得深思。

赫鲁晓夫时期的苏古关系是冷战时期引人注目的国家关系之一。对于该时期苏古关系的发展状况，学者们已经有过不少探讨，但受到民族立场的影响，其观点也存有分歧。苏联历史研究者多以积极、肯定的态度评价苏联与古巴之间的合作^①。西方学者的评价大多持否定态度，认为古巴是苏联的“代理人”、“卫星国”、“傀儡”^②。另外，还有学者认为古巴是苏联的盟友^③，苏联希望通过古巴这座桥头堡巩固其在加勒比海的军事存在^④，古巴严重依赖苏联的政治、经济、军事援助^⑤，等等。本文试图结合新发现的材料，重新梳理赫鲁晓夫时期苏古关系的发展历程，考察推动苏古关系发展的根本动力，审视古巴在苏古关系演变中的作用。

① Бекаревич А.Д. Куба: Внешне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М., 1970; Бекаревич А.Д., Кухарев Н.М.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и Куба: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М., 1973; Великий Октябрь и кубинская революция. /Авт. кол. М., 1977; Гавриков Ю.П., Кондратов П.Т., Гриневиц Э.А., Гвоздарев Б.И. Куба в мировой политике. М., 1984; Дарусенков О., Горбачев Б., Ткаченко В. Куба-остров созидания. М., 1975; Ермолаев В.И. Героическая эпопея народа. М., 1968; Зорина А.М. Рабочее движение на Кубе. М., 1975; Российско-кубинские связи XVIII-XX вв. М., 1975 и др.

② Alexander L. George, David K. Hall, William E. Simos, *The Limits of Coercive Diplomacy: Laos, Cuba, Vietnam*, N.Y., 1971; *Cuba in Africa*, Pittsburg, 1982; D. James, *Cuba el primer satelite soviético en America*, Mexico, 1962; R.S. Litwak, S.N. Mc Far-lane, *Soviet Activism in the Third World*, London, 1987, No.1, Vol.29; Almeda M. Monreal, *Cuba, el comunismo y el caos*, Mexico, 1971; *Politique aujourd'hui*, Paris, 1971, No.1; *The Struggle for the Third World*, Wash., 1986; Quiroga A, *La revolucion cubana*, Barcelona, 1976.

③ R.S. Schroeder, *Cuba after 15 Years*, Wash., 1973, Vol.II; A.R.M. Ritter,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Revolutionary Cuba*, N.Y., 1974.

④ R. Beggs,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London, 1971; K. Devlin, "The Castroist Challenge to Communism", in *The Soviet Union and Latin America*, N.Y., 1970; *Freedom*, London, 1971; L. Goure, "Cuba-s Military Dependence on the URSS", in *Soviet Seapower in the Caribbean: Political and Strategic Implications*, N.Y., 1972; L. Goure, M. Rothenberg, *Soviet Penetration of Latin America*, Miami, 1975; H. Thomas, *Cuba or the Pursuit of Suchlicki J. Cuba from Columbus to Castro*, N.Y., 1974.

⑤ T.S. Cheston, B. Loeffke, *Aspects of Soviet Policy toward Latin America*, N.Y., 1974.

一、美古关系的恶化与苏古合作

20 世纪上半叶，古巴与美国的关系几乎成了古巴对外关系中唯一的中心。1903 年，美国通过《普拉特修正案》获得干预古巴的权利及关塔那摩的领土。1906 年美国再次占领古巴，其后事实上一直统治着这个国家。20 世纪 30-40 年代以后，美国垄断资本几乎控制了古巴的经济命脉。美国在古巴的全部投资约有 12 亿美元，这些资本操纵着糖业、炼油业、采矿业、电力、金融和铁路等经济要害部门。^①1952 年，美国扶植的巴蒂斯塔发动政变夺取了古巴最高权力。上台后他立即解散议会，废除 1940 年以来具有进步意义的宪法，制定了“宪法条例”和反劳工法，禁止政党活动、群众集会、罢工，并与美国签订《军事互助条约》。^②同时，巴蒂斯塔表示绝不恢复昔日与苏联的联系，并宣布在古巴的共产党为非法组织。这使美国认定巴蒂斯塔不仅“具有保证稳定与秩序的能力”，还能够“奉行一种强烈的反共产主义政策”。^③巴蒂斯塔的反动政策使美国垄断资本不仅掌握了古巴的经济命脉，而且对古巴的政治、军事、外交随心所欲地加以控制，以至于有的美国学者把古巴岛称为“美国的第 51 州”^④。美国对古巴的控制和压榨也使古巴国内的民族矛盾与阶级矛盾日益激化。

（一）美古关系的恶化

1959 年 1 月，卡斯特罗领导的起义军推翻了巴蒂斯塔的独裁政权。古巴革命的胜利是通过自身艰苦的武装斗争取得的。革命者先在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将反独裁的斗争与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结合起来，因而得到了农民的拥护。革命力量壮大以后再向城市发展，最后进军首都哈瓦那夺取全国政权。为推动革命的深入发展，通过土地改革废除大庄园制经济并没收外国占

① José Luis Rodríguez Garcíá, *Desarrollo económico de cuba (1959-1988)*, Editorial nuestro tiempo, S.A, p.20.

② Louis A. Perez, *Cub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ies of Singular Intimary*, Athens an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Georgia Press, 1997, p.238.

③ Lloyd J.Mecham. *A Survey of United States-Lat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1970, p.306.

④ Alex R. Hybell, *How Leaders Reason: US Intervention in the Caribbean Basin and Latin America*, Oxford, UK; Cambridge, Mass., USA: B.Blackwell, 1990, p.77.

有的古巴土地，分给革命中主要依靠的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并解决人民迫切要求解决的失业、教育、住房、医疗等问题，这成为摆在卡斯特罗面前的首要任务。但是，土地改革等政策一旦实施，就意味着美国丧失在古巴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出于策略的考虑，在美国政府未对古巴革命政权表明立场前，卡斯特罗宣称，“古巴革命既不是资本主义的，也不是共产主义的”，而是“橄榄绿色的人道主义革命”，是“穷人所有、穷人所治、穷人所享”的革命。该时期卡斯特罗的政治立场尚未明确，他指出，“当时就提出信奉社会主义纲领，是无法取得政权的。那时如果宣布激进纲领，会刺激全国处于分裂状态的反动力量联合起来反对革命，还会促使巴蒂斯塔、统治阶级和美帝国主义者之间结成巩固的联合阵线。他们最后会招来美国军队占领全国，这将造成复杂的局势。我们当时能动员的力量在毫无外援的情况下，不可能战胜它。”^①卡斯特罗对待美国的态度是比较理智的，当时古巴在面临外部威胁或挑战时仅有两种选择，要么追随强者，要么采取制衡行为。追随强者是指与引发危险者结盟，制衡是指与其他国家结盟以反对具有优势的威胁。^②

在复杂的国际背景下，古巴首先进行了追随强者的试探。1959年4月，卡斯特罗亲自率团访美。但是，由于古巴奉行独立自主的经济政策影响到美国在古巴的经济利益，艾森豪威尔拒绝会见卡斯特罗。美国对古巴的冷漠态度没有影响卡斯特罗在国内进行土地改革的决心。5月17日，古巴颁布《第一部土地改革法》，要求废除大庄园制度。每一个自然人或法人可拥有土地的最高限额为30卡瓦耶里亚（1卡瓦耶里亚=13.43万平方米），分配之外的土地为国家所有。自法律颁布之日起，禁止订立土地租借和任何其他按产品比例计算缴纳庄园租金的合同。压榨甘蔗的合同不在此例。自该法颁布一年后开始，任何不具备法律规定条件的股份公司不得经营庄园。法律颁布后，共征收本国和美国大庄园主的土地约16.2万卡（合217万多公顷）。土地

①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Кубы: Сборник официальных документов КП и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Куба и материалы из статей и выступлений кубинских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М., 1980. С.415.

② [美]斯蒂芬·沃尔特著：《联盟的起源》，周丕启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16页。

改革法的颁布使美国垄断资本失去了在古巴生存的土壤，促使古美关系进一步恶化。1959年6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在讨论关于“古巴的问题”时指出，卡斯特罗必须垮台。美国政府未公开的目标是：“以支持古巴反对派发展的方式，带来……一个对美国有利的新政府”。^①古美关系恶化得如此迅速，其原因何在呢？

肯尼迪在1960年初出版的《和平战略》一书中问道，如果美国政府不是“那样长久、那样不分青红皂白地”支持巴蒂斯塔，而是在卡斯特罗访美时给予更热情的接待，卡斯特罗会不会采取一条“更通情达理的路线”呢？笔者认为，该时期古美关系的发展存在三个难以逾越的障碍：

一是美国与古巴互不信任。卡斯特罗夺取古巴政权的手段与巴蒂斯塔不同。1959年革命推翻了美国政府扶植的巴蒂斯塔政权，古巴革命政权代表古巴人民的利益，这就意味着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政府与美在古巴的利益集团阶级属性不同，两者之间存在着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当古巴政府审判许多曾在巴蒂斯塔政府和军队中供职的人员时，美国新闻媒体和美国国会里批评声音甚多，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古巴政府其他领导人对此十分恼火。^②

二是土地改革和没收外国在古巴资产的举措破坏了古美合作的基础。1959年，美国在古巴制糖业、采矿业、公共事业、银行和制造业的投资超过其在任何一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投资额（委内瑞拉除外）。^③掌握古巴经济命脉是美国左右古巴政局的重要手段。古巴独立后，不仅没收了外国控股的公司，而且不允许外国股份公司经营或租借甘蔗园。这些政策的实行使美国的股份公司难以从内部影响古巴的经济，也使美国失去了控制古巴的有效手段。

三是独立自主的发展空间是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政府最迫切需要的。美国租借关塔那摩基地犹如插入古巴的楔子，卡斯特罗政府一直反对该军事基地的存在，并拒绝接受美方租金，要求美国军队撤出关塔那摩。

① James G. Blight, Bruce J. Allyn, David A. Welch, *Cuba on the Brink*, Rowman & Littlefield Publishers, 2002, p.15.

② [英]莱斯利·贝瑟尔主编：《剑桥拉丁美洲史》（第七卷），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译，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1996年，第482页。

③ 同上，第527页。

由于美国与古巴之间存在上述难以逾越的障碍，两国关系难以正常化。古美关系恶化后，古巴最关心的是：在国际上如何突破美国的封锁和遏制，以保存新生的革命政权；在国内如何获得古巴改革和发展所需的援助。古巴寻找的新合作伙伴，必须能够为它提供安全保障和经济支援。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自然在古巴的考虑范围之内，古美合作基础的破坏为苏古关系发展提供了机遇。

（二）苏古合作

在赫鲁晓夫上台以前，苏联与古巴之间的合作基础是薄弱的。两国最早的合作可以追溯到 1925 年，当时在共产国际的倡议下古巴共产党成立，苏联共产党与古巴共产党建立了联系。1942 年 10 月，为推进世界反法西斯运动，苏古建立了外交关系。1943 年初，苏联任命驻华盛顿大使马克西姆·李维诺夫兼任驻古大使。同年，斯大林邀请古巴外交部部长奥列里·孔切索访问莫斯科。冷战开始后，古巴总统劳·圣马丁和普里奥·索加拉斯先后投向美国反共势力的阵营，苏古关系便冷淡下来。

1953 年 7 月 26 日，卡斯特罗因攻打蒙卡达兵营失败而被捕。当时刚好是斯大林逝世后不久，苏联的内政外交尚未发生根本变化。苏联对民族解放运动并无很大的兴趣，因为在斯大林看来，民族运动的领导者通常是民族资产阶级，他们很容易同帝国主义妥协，出卖民族利益，成为帝国主义的附庸。^①所以，卡斯特罗对蒙卡达的攻击以及随后的游击战争，并没有引起苏联高层的注意。“当卡斯特罗领导的革命取得胜利，带领军队进入哈瓦那的时候，苏联对其政权会走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全然不知”。^②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格·马·普希金甚至向赫鲁晓夫报告说，“卡斯特罗是大资产阶级的代表，而且是中央情报局的走狗，同巴蒂斯塔没有什么两样。”^③不过，古巴革命胜利

① 张盛发：“试析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核导弹的动机与决策——写在古巴导弹危机爆发 50 周年之际”，《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2 年第 6 期，第 60 页。

② Родригес И.И. Партий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работа по укреплению единоначалия в Революционных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ах Республики Куба. 1959-1981 гг.: Дис. канд. ист. наук. М., 1982. С.191.

③ [俄]谢·赫鲁晓夫著：《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郭家申、述弢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 年，第 405 页。

所引起的反响是苏联不能忽视的。赫鲁晓夫积极支持国外革命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在 1959 年 1 月率先承认古巴共和国革命政府。6 月，苏联与古巴有了第一次官方合作。在古巴土地改革法的细节公布之后，美国开始秘密地策划推翻卡斯特罗政府。切·格瓦拉被派往国外考察以获取支持。在开罗，格瓦拉同苏联大使馆取得了联系。7 月，与苏联达成初步的协议：苏联购买古巴 50 万吨糖。^①该协议本身并不值得特别关注，在巴蒂斯塔时期苏联也购买过这个数量的糖，但这却表明，古巴与苏联之间存在着继续合作的可能。苏古购糖协议的签订，标志着两国关系迈出了新的一步。

格瓦拉的求援引起苏联高层的注意，克格勃决定派“塔斯社记者”亚历山大·阿列克谢耶夫去哈瓦那。该时期卡斯特罗本人暂时还未公开自己的观点，但是他的弟弟劳尔·卡斯特罗却公然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赫鲁晓夫非常高兴，不过他还无法完全信任卡斯特罗，又决定派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米高扬赴古巴考察情况。”^②

米高扬对古巴的考察推动了苏古关系的发展。1960 年 2 月，米高扬赴哈瓦那主持“苏联科学、技术与文化成就”展览会的开幕仪式，前后参观展览会的古巴人达到 80 万（占古巴当时总人口的 1/8）。似乎在短短 20 天时间里，古巴人民对苏联的了解超过了以往 40 年^③。2 月 13 日，米高扬同卡斯特罗签订了《苏联与古巴贸易支付与提供信贷协定》。苏联允诺在此后 5 年内购买古巴蔗糖 580 万吨；向古巴提供石油；提供 1 亿美元的低息贷款，帮助古巴进行工业改造和住房建设。苏古贸易结算中 20% 使用美元，80% 使用货物（主要是石油、机械、小麦、新闻纸和化学制品）。^④《苏联与古巴贸易支付与提供信贷协定》的签订，奠定了苏古经贸关系发展的基础。米高扬回国后向赫鲁晓夫汇报情况时表示，“应该帮助古巴，但同时也应在思想上保持高度警惕。一旦美国猜到卡斯特罗正在往哪里倾斜，这一尚未巩固的新制度向哪里靠拢，立刻就会把它扼杀掉。”米高扬的汇报表明，苏联已经

① Слезкин Л.Ю. История Кубинской республики. М., 1966. С.468.

② [俄]谢·赫鲁晓夫著：《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第 406 页。

③ Роландо С.И. Развитие и становле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бюджета Республики Куба: Дис. канд.экон. наук. Л., 1980. С.132.

④ Фокеева Г.В. История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и внешней политики СССР. М. Межд. отн., 1987. С.20.

把卡斯特罗当成潜在的朋友了。赫鲁晓夫表示，“我们作为国际主义者，不能不帮助古巴，不能听任革命被扼杀。”^①同时，古巴也越来越重视国内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的传播。1960年3月3日，在古巴人民社会党全国委员会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关于国家局势的决议》和《提高革命觉悟及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水平的决议》。

表1 苏联与古巴的糖贸易（1960-1964年）

年份	古巴产糖量(百万吨)	向苏联的出口量(百万吨)	苏联购糖量在古巴糖产量中所占的份额(百分比)	所支付的价格(每磅以美分计)	苏联的进口总值(百万卢布)	苏联向其他国家出口糖的数量(百万吨)	苏联的出口值(百万卢布)
1960	5.862	1.467	25.0	3.21	93.4	0.243	22.8
1961	6.767	3.345	49.4	4.00	270.4	0.414	33.2
1962	4.315	2.233	46.4	4.13	183.5	0.792	56.4
1963	3.821	0.996	26.1	6.22	123.2	0.802	94.1
1964	4.589	1.859	40.5	6.00	222.6	0.348	50.2

资料来源：Внешняя торговля СССР 1918-1966 г. (Статистический сборник). Москв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1967.

在这里有必要探讨一下，对古巴的援助是否成为影响美古关系和苏古关系的重要因素。1959年4月，卡斯特罗率团访美。关于卡斯特罗访问美国的目的，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见解：一是为获取古巴土地改革所缺的资金；二是为获得美国舆论界对古巴革命的支持。关于第一种解释，笔者在美国解密档案中并未找到相关材料，即古巴需要多少资金，在何时、何地表达古巴的资金需求。关于第二种解释，可见《卡斯特罗答美国记者洛克伍德问》中的解释，“为了要做出努力使美国舆论获得较好的情报，以正确对待我们的革命”。^②由此可见，古巴革命后，并未把向美国请求经济援助作为最重要的外交目标。所以，当美国拒绝援助古巴时，这也没有影响古巴革命的继续发展。同时，该时期苏联给予古巴的实际援助也仅占很少的份额，以苏古之间的主要经济合作项目“糖贸易”为例，1960年古巴产糖586.2万吨，向苏联的出口量为146万吨，苏联的进口量在古巴糖产量中所占的份额仅为

① 徐隆斌著：《赫鲁晓夫执政史》，山东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340页。

② 参见齐世荣主编：《当代世界史资料选辑》（第三分册），北京：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第555页。

25%。因此，有学者认为该时期提供援助是影响苏古关系发展的主要原因或施加影响的有力工具，其观点并不准确。实际上，只有苏联与古巴认为这个做法符合各自的国家利益时，才提供和接受军事或经济援助。

二、美国企图颠覆古巴政权与苏联对古巴的支持

在国际形势的影响下，古苏关系的发展使美国更加敌视古巴，因而对古巴实行经济封锁、外交孤立和军事包围的政策。反过来，苏联赢得古巴追随的政策逐步完善。经济援助、外交支持与武器供应相结合，这些政策使古巴将苏联提供的安全保障视为革命避免遭受美国扼杀的唯一途径，引导古巴进一步转向社会主义阵营。

（一）“勒库布尔号事件”促使苏联与古巴恢复外交关系

1960年3月4日，一艘悬挂法国国旗的“勒库布尔号”轮船给古巴革命政府运送65吨武器，在接近哈瓦那港时发生爆炸，不仅港口建筑物遭到严重破坏，而且在爆炸中有近300人伤亡。次日，古巴逮捕1名与“勒库布尔号”惨案有关的美国人——纳德·查普曼。美国国务院官员弗朗西斯·塔利随即发表声明，拒不承认美国与“勒库布尔号”轮船爆炸事件有关联，并且再次威胁古巴，扬言要“立即通过外交途径向古巴表示美国政府的强烈抗议”。^①卡斯特罗在祭奠爆炸事件死难者的葬礼上，揭露美国官员阻止古巴向他国购买武器的交易，并且指出，“应该在美国政府的官员中寻找进行这次破坏活动的祸首”。^②

“勒库布尔号事件”发生以后，古巴意识到革命政权随时面临威胁。这使古巴反对美国的意志更加坚定，卡斯特罗放弃了中立态度，对苏联“一边倒”。3月5日，卡斯特罗与阿列克谢耶夫共进午餐时问道，“如果美国进行封锁或干涉，古巴能否指望得到苏联的援助？”这是古巴领导人第一次公

① Российско-кубинские и советско-кубинские связи XVIII-XX вв. в 2-х частях. Часть I. М., 1975. С.351; Часть II. М., 1980. С.287.

② *Granma*, El 6 de marzo de 1960.

开要求苏联提供直接的军事援助。^①3月6日，古巴驻联合国代表特雷萨·卡苏索表示，“目前，我们不能孤立于别人而生活，因为贫困与落后是大多数美洲国家无法回避的现实问题。”^②特雷萨·卡苏索暗示古巴在两极格局的背景下将选择倒向一方。

正当古巴有意向苏联靠拢时，苏联向古巴抛出了橄榄枝，积极向古巴提供外交支持并供应军用物资。3月8日，苏联外交部部长葛罗米柯代表苏联政府和人民就“勒库布尔号事件”向古巴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同情。3月13日，苏联《消息报》就古巴“勒库布尔号”轮船爆炸事件发表评论指出，“在古巴革命刚刚胜利的时候，美国就企图对古巴进行武装干涉。为了反对美国的这种军事威胁，古巴人民不得不武装起来。”^③接着，苏联第一次向古巴提供军用物资。3月18日，苏联政府把它在哈瓦那举行的苏联科学展览会上展出的一架米-4直升机及其零部件，以及一批医疗器材赠送给古巴政府。

为了加深与苏联的合作，古巴采取的举措让苏联颇为满意。1960年4月7日，古巴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努涅斯·希门尼斯宣布，古巴计划在甘蔗大庄园中建立1000个甘蔗合作社，这些合作社生产的甘蔗占全国甘蔗产量的一半。国家银行贷给全国土地改革委员会3420万比索，用来建立甘蔗合作社和发展合作社的生产。^④4月24日，古巴《今日报》出专刊纪念列宁诞辰90周年，古巴今日报社长卡洛斯·罗德里格斯在《列宁和殖民世界》一文中指出，“没有一个人能像列宁那样最正确地运用科学来研究殖民问题，列宁积极参加和组织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摆脱帝国主义制度的斗争”。^⑤

苏联与古巴的合作基础逐步构建，加上国际局势的推动，两国于1960年5月8日发表了《关于恢复外交关系的联合公报》。苏古外交关系的恢复

① Разумович Н.Н.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преобразования революционной Кубы.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я. Москва, 1964. С.16.

② *Granma*, El 8 de marzo de 1960.

③ *Известия*. 13 Марта 1960 года.

④ L.Gould Lewis, *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John F. Kennedy Presidency*, Vol.6. Washington, DC, 2005, pp.9-51.

⑤ *Periódico Hoy*, El 24 de abril de 1960.

是古巴共和国外交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古巴《今日报》发表社论指出，古巴和苏联建立外交关系，从苏联方面看，是一个友好的决定；从古巴方面看，革命政府的行动首先意味着收回民族主权。社论强调，古巴并不是孤立的。7月9日，赫鲁晓夫宣布，苏联准备用导弹来“象征性”地捍卫古巴。苏联保证“用它所掌握的一切手段来防止美国对古巴的武装干涉”，而且苏古将签订第一个正式的军事协定。^①“勒库布尔号事件”后，苏古外交、军事关系日益加强，古巴彻底转向了社会主义阵营。

（二）苏古关系全面发展与苏联对古巴的援助

该时期古巴面临的经济发展问题仍十分严峻，国内产业发展被糖业所困，古巴自主建立工业体系的基础十分薄弱，不仅存在资金匮乏和技术落后的问题，而且需寻找大量的贸易合作伙伴。古美关系恶化后，1960年7月3日，美国国会通过了一项新的蔗糖修正法案，该法案授权美国总统可以削减古巴糖的进口限额。7月6日，美国正式宣布对古巴进行经济制裁。

面对改革与发展中的重重困境，古巴向苏联寻求援助和支持。随后，苏联答应购买美国削减的古巴食糖出口额。7月9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赫鲁晓夫发表声明称，“一旦外国武装干涉古巴，苏联将给予古巴人民坚决的支持”。^②7月11日，政府贸易代表团团长努涅斯·希门尼斯宣布，古巴向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购买了可以装配30家工厂的工业设备。苏联的援助为古巴经济改革提供了坚强后盾，古巴土地改革继续深入，并逐步走上了工业国有化的道路。

在此情况下，美国仍不放弃对古巴的干涉政策。8月，当古巴开始大规模工业国有化运动以后，美国出面召开美洲国家组织外交部部长会议，通过《圣约瑟宣言》，宣称美洲国家必须防范古巴革命的影响，并以6亿美元的贷款拉拢美洲国家孤立古巴。^③美国随即宣布对古巴实行全面禁运。9月2日，卡斯特罗发表演说，对美国进行了有力回击，同时废除了1952年的古

① *Revolución*, El 21 de julio de 1960.

② Richard Gott, *Cuba: a new history*, Yale University Press, New edition, 2005, p.2.

③ [美]利昂·古雷、莫利斯·罗森堡：《苏联对拉丁美洲的渗透》，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年，第61页。

美军事协定。美国宣布对古巴实行全部贸易禁运后，苏联与古巴签订《1962年贸易议定书》，同意向古巴提供贷款、援助粮食。^①

1960年9月19日，赫鲁晓夫率领苏联代表团赴纽约出席联合国大会，当时他正被柏林危机所困扰。战后西方国家对德国问题的一贯立场是以“自由选举”来“重新”统一德国，但这一立场未被苏联接受。赫鲁晓夫于1958年底提出，要把西柏林变成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限定美、英、法三国在6个月内从西柏林撤军。由于美国毫不退让，不久赫鲁晓夫让步，但U-2飞机事件使赫鲁晓夫推迟参加5月举行的四国首脑会议。苏美关系的这种演变使赫鲁晓夫对古巴问题更加关切。赫鲁晓夫特意安排与卡斯特罗在哈莱姆的旅馆见面，双方都很清楚会面地点的象征意义。赫鲁晓夫指出，“通过前往一个黑人社区的黑人旅馆，我们向美国对黑人和古巴的歧视政策做出了双重的示威。”^②

联合国之行以后，赫鲁晓夫对古巴的态度发生了根本转变。他认为，“古巴不仅是一个要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更是一个近距离给美国制造麻烦的盟友。古巴就是敢于对抗力量强大的歌利亚的大卫。必须竭尽全力挽救古巴的革命，这是我国的国际主义义务，是赫鲁晓夫本人的责任。围绕古巴所发生的事件将在最近很多年内决定着世界革命的发展。”^③1960年11月，在莫斯科举行的81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表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即“莫斯科声明”），再次强调古巴革命的重要性。声明指出，“古巴革命的胜利有力地激励了拉丁美洲人民为争取完全的民族独立而进行的斗争”，并在这个地区开辟了“一条对帝国主义进行积极斗争的阵线”^④。但是，对于古巴的军事援助不能操之过急，苏古都担心这样会过分刺激美国。

赫鲁晓夫与卡斯特罗的会见使肯尼迪对古巴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肯尼

① José Luis Rodríguez García, *Desarrollo económico de Cuba (1959-1988)*, Editorial nuestro tiempo, S.A, p.20.

② Edward Boorstein, *The Economic Transformation of Cuba, a First-Hand Account*, Monthly Review Press, New York, 1968, p.27.

③ W.Ray Duncan, *The Soviet and Cuba interests and Influence*, New York: Praeger, 1985, p.144.

④ Визит Генерального секретаря ЦК КПСС, Председателя Президиума Верховного Совета СССР М.С. Горбачева в Республику Куба. 2-5 апреля 1989г. М., 1989. С.32.

迪在 1960 年 10 月发表于辛辛那提的演说中认为，卡斯特罗已经“背叛了古巴革命的理想”，并把古巴变成了“一个敌对的、好战的共产主义国家”。他说，“就目前而言，古巴是丢失了，没有任何一种神奇的办法能够使它回来。”^①在古美关系急剧恶化的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已开始危地马拉山区训练 1 万多名古巴流亡分子，以便在可能的情况下用来进攻卡斯特罗。

（三）猪湾入侵与苏联对古巴的支持

1960 年底，危地马拉许多报纸透露了古巴流亡分子训练营的消息。紧接着，美国的《西班牙美洲报道》、《民族》、《时代》等刊物也一再或明或暗地点破了天机。1961 年 3 月，美国报纸竞相报道在迈阿密的大规模军事调动，《纽约时报》已预测最近将发生一次对古巴的入侵。不久，美国新闻界正式报道中央情报局在危地马拉训练流亡分子的消息。

为帮助古巴瓦解美国的军事颠覆政策，苏联给予古巴大批军事援助。苏联供应轻武器、坦克、火炮，却没有提供飞机。赫鲁晓夫指出，“这主要和距离有关，古巴是个孤立的岛屿。一旦卡斯特罗遭到失败，苏联士兵就只有当俘虏了。这样冲突就闹大了。”^②尽管当时得到的苏联军事援助并不多，格瓦拉仍高兴地说，古巴得到了“历史上最伟大的军事强国的保护……。”^③

4 月 17 日，1400 名古巴流亡分子在 6 架没有任何标志的 B-26 老式轰炸机的掩护下，乘着 2 艘登陆艇和 5 艘商船，在古巴拉斯维利亚省的猪湾登陆。得到流亡者入侵古巴的确切消息后，苏联从外交层面给予古巴重要的支持。赫鲁晓夫致信肯尼迪：“几天前，您声明说美国无意参与针对古巴的军事行动，这给人一种印象，说明美国的领导层深知入侵古巴对于全世界和美国本身会有怎样的后果。现在，当侵犯古巴已成事实时，我们怎样来理解美国实际上的所作所为呢？至于苏联政府，请不要对我们的立场产生任何误解：在反击武装入侵古巴方面，我们将对古巴人民及其政府提供一切必要的援助”。

① 杨光斌、赵少钦著：《大国早殒——肯尼迪》，北京：学苑出版社，1996 年，第 157 页。

② [俄]谢·赫鲁晓夫著：《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第 406 页。

③ 杨光斌、赵少钦著：《大国早殒——肯尼迪》，第 156 页。

①当晚，2 万名由苏制坦克和大炮武装的古巴政府军将海滩包围，流亡者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进攻失败。

古巴政府对苏联给予的外交支持做出积极回应。4 月 18 日，古巴驻苏联大使乔蒙·梅迪亚维利亚指出，“苏联是我们的朋友，在古巴遭到海上封锁时，苏联首先向古巴伸出了援助之手，同时还第一个用苏式设备帮助我们装备工厂。”^②他对苏联《共青团真理报》记者说，“我今天感到特别兴奋，苏联人民是多么真诚地支持革命的古巴人民。帝国主义者不能使古巴屈服，因为在社会主义革命旗帜下站起来的人民是战无不胜的。”^③这是古巴政府官员第一次向外界宣布古巴革命具有社会主义性质。

猪湾入侵事件让古巴认识到，如果要在古巴进行一场激进的革命，必须与美国决裂，而在美国的进攻面前捍卫一场激进的革命，就需要得到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支持。随后，古巴在苏联的支持和指导下推行内政改革，古巴政府加强了组织建设、军队建设，进一步深化了经济改革。将七二六运动、人民社会党和三一三革命指导委员会合并，建立统一的革命组织，并公开任命一些共产党员担任政府职务。5 月 1 日，卡斯特罗正式宣布古巴是社会主义国家。

12 月 1 日，卡斯特罗在“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统一党”的电视演说中谈了自己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他说，“社会主义虽然拥有自己的全部权力，然而不能滥用这个权力，它是严肃的、自觉的，它为克服一切缺点而斗争，为消灭极端主义、宗派主义、专横行为和不合理现象而斗争。……争取使人们过较好的生活，使人民获得更为幸福的生活，使人民过更为自由的生活，用这种生活来代替由一个阶级进行压迫、一个阶级对劳动人民进行剥削的制度，争取实现工人的民主，这在马克思主义的词汇里就称为‘无产阶级专政’”。^④尽管卡斯特罗在夺取政权之初宣布古巴革命既不是资本主义性质，也不是社会主义性质，但卡斯特罗所要达到的革命目标与社会主义最终目标越来越接近。两个国家的内部意识形态越相似，它们越有可能发展成为盟友。

① [俄]谢·赫鲁晓夫著：《导弹与危机——儿子眼中的赫鲁晓夫》，第 407 页。

② *Granma*, El 18 de abril de 1961.

③ 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18 апреля 1961 года.

④ 《卡斯特罗言论集》（第二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63 年，第 266 页。

当古巴感到自身安全能够得到保障时，意识形态才成为影响它选择盟友的重要因素，而在两极格局中意识形态对盟友选择的影响往往被夸大。事实上，古巴是在选定盟友后才表明自己的意识形态立场。

同时，卡斯特罗还提出，“反对帝国主义的，和社会主义的革命应该是一个、一个唯一的革命，因为革命只有一个。”^①卡斯特罗的演说把反对帝国主义纳入自己对社会主义认识之中，既是对古巴与美国关系恶化的理解，也表明苏联与古巴在反美斗争方面存在一致利益。

三、苏古关系发展的高峰与导弹危机对苏古关系的影响

导弹危机是赫鲁晓夫时期苏古关系的一个重要分水岭。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标志着两国关系发展到高峰。而导弹危机后苏古双方产生的分歧和矛盾则使两国关系急速倒退。探究苏古关系急剧恶化以及破而不裂的原因，是该时段研究的重点问题。

（一）苏古关系发展的高峰——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

猪湾入侵后，美国并没有放弃对古巴的干涉。1962年1月25日，美国国务卿腊斯克在美洲国家外长会议上正式提出干涉古巴的美国计划。腊斯克在发言中要求与会各国朝着四个主要方面采取行动：第一，宣布古巴政府“同泛美体系的宗旨和原则不相容”；第二，把古巴完全排除在美洲国家组织及其各机构之外；第三，停止拉丁美洲国家同古巴之间的贸易往来，特别是军火贸易；第四，制定出干涉古巴的计划。

不久，肯尼迪政府又制定一项被称为“猫鼬行动”的计划，企图在古巴制造动乱，继而推翻卡斯特罗政权，并策划对卡斯特罗的暗杀。美国与古巴近在咫尺，而苏联和古巴却相隔万里，虽然苏联可以向古巴源源不断地运送武器，但是难以抵御美国一次真正的大规模入侵。

关于苏联在古巴部署进攻性导弹的动机，学者之间有不同看法。苏联（俄罗斯）的多数学者认为，苏联这样做的主要目的在于保护古巴，防御美国入

① 《卡斯特罗言论集》（第二册），第266-275页。

侵。另一种较为普遍的解释是，苏联想以在古巴部署导弹为杠杆向美国施加压力，迫使美国撤出柏林。事实上，除上述目的外，苏联的真实意图是达到所谓的“战略均势”，希望以此解决苏联的核劣势问题，实现苏联与美国平起平坐、共同主宰国际事务的夙愿。20世纪50年代后期，艾森豪威尔政府曾大规模扩充核武器，使美国在苏美核竞赛中始终处于领先地位。肯尼迪上台后，从1961年3月发表第一篇国防咨文开始，就大力发展由潜艇发射的北极星导弹和从地下发射的民兵式导弹，并改进了美国的常规力量，以确保美国威慑力量的不可摧毁性。^①当时，苏联仅有44枚洲际导弹和155架战略轰炸机，而美国同类武器分别有156枚和1300架，实力远胜于苏联。另外，美国在土耳其、意大利和西德均部署有针对苏联的导弹，苏联境内所有的重要工业城市都处于美国核弹和战略轰炸机的直接威胁之下，苏联等于是处于美国的“包围圈”中。因此，在赫鲁晓夫看来，如果苏联把中程导弹安放在古巴，便可以避开美国的预警系统而具有直接打击美国本土的能力。他认为，此举既可以改善苏联的战略地位，也可以造成不利于美国的政治影响。在必要的时候，这些导弹又可以作为筹码，迫使美国在其他问题上让步。

对于导弹部署问题，古巴是比较矛盾的。这不仅因为导弹的隐秘性，更是因为部署导弹将会使这个国家成为“苏联的一座军事基地”。然而，从另一角度看，当时对于古巴来说国家安全更为重要。在冷战时期，古巴刚刚独立，保卫新生政权是古巴的首要任务，有安全的生存环境才能有发展。卡斯特罗说：“我们正在讨论应该采取什么措施。苏联询问古巴的意见，然后我明确地告诉他们——必须要让美国清楚，一次对古巴的入侵意味着一场同苏联的战争。”^②1962年7月2日，古巴国防部长劳尔·卡斯特罗应苏联国防部邀请到访莫斯科，双方在莫斯科草拟了在古巴部署导弹的秘密协定，包括核设施的内容。条款中有一条规定，苏联军方保有对核弹头的唯一控制权。^③苏联在古巴部署导弹，标志着苏古关系发展达到了高峰，苏联向古巴提供

① Public Statements by the Secretaries of Defense, Part 3 “Kennedy and Johnson Administrations, 1961-1969”, <http://www.gwu.edu/nsarchiiv>

② Ивановский З.В. Лагинская Америка и Карибы. М., 2000. С.191.

③ 杨存堂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9卷），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516页。

了其最需要的东西，在尊重古巴独立的基础上给予其安全保障。

（二）导弹危机的爆发与苏古关系急速倒退

秘密协定签署后，苏联开始实施代号为“阿纳德尔”的计划。9月6日，苏联大使多勃雷宁通过肯尼迪的特别行政助理索伦森将一封赫鲁晓夫的私人信件转到肯尼迪的手中。信中谈道：“在美国国会选举以前，我们将不采取任何可能使国际形势复杂化或加剧我们两国之间紧张关系的步骤……只要对方不采取任何会改变现状的行动，这包括对德和约与西柏林问题。……如果情况需要，那也只是在11月的下半月才有可能。苏联不希望卷入美国国内的政治事务中去。”^①随后，多勃雷宁大使又反复强调了苏联对待古巴的态度。他说，苏联在古巴没有做任何新的或特别的事情，所有这些措施肯定是防御性的，并不构成对美国安全的任何威胁。^②与此同时，苏联在古巴部署了42枚中近程和中远程弹道导弹。

10月22日，美国获得了苏联在古巴建立导弹基地和轰炸机基地的确凿证据。肯尼迪要求苏联从古巴撤走“进攻性导弹”，并强行对古巴这个岛国实行海军“封锁”，以阻止苏联运送武器去古巴。肯尼迪还要求苏联撤走战略轰炸机，并承担今后不在古巴部署苏联战略武器的义务。为解决加勒比海危机问题进行的纽约谈判于1962年10月29日开始，一直持续到1963年1月7日。美国拒绝进行苏、美、古三方谈判的建议，苏古双方的代表一直保持着经常性的接触，以协调自己和古方的所有行动。

11月24日，美方提出了自己的声明草案。草案中虽有承诺不入侵古巴义务的条款，但这仅仅是表面文章，其中却一系列令人无法接受的条款和附加条件，尤其是美方承诺不入侵古巴的义务是相对的。根据该条款，美方所承诺履行的不入侵古巴的义务，只有当古巴不采取危及西半球和平与安全的行动时才有效（随后美国建议使用“条件是古巴不对西半球任何国家实施侵略行为”这一措辞）。^③

① [俄]阿纳托利·多勃雷宁著：《信赖——多勃雷宁回忆录》，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年，第79-82页。

② 同上。

③ 杨存堂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29卷），第508页。

在谈判过程中，苏联为古巴的利益做了积极的努力。赫鲁晓夫试图达到其对外宣传所要达到的目标，即保卫古巴的安全。同时，苏联夸大谈判的结果，宣称“纽约谈判的结果使苏联、古巴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在国际舞台上的地位空前巩固。这种地位是通过我们坚持不懈的斗争取得的，而这场斗争则在用和平手段保障古巴革命的安全上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苏联政府在防止世界热核战争和用妥协的方法和平解决加勒比海危机上所表现出的勇于创新的精神，赢得了各国人民的赞赏”。^①但是，苏联在没有与古巴商量的情况下就做出了让步，撤走了在古巴的全部战略部队，菲德尔·卡斯特罗对此颇为愤怒。

导弹危机后，古巴领导人希望能与苏联签署军事同盟条约，以保障古巴的安全。一方面，古巴的社会主义改造日益深入，同反革命进行着大规模的斗争，人民和政府处于战备状态，随时准备反击帝国主义的侵略图谋。^②另一方面，卡斯特罗和多尔蒂科斯都强调说，没有这样一个条约，美国人似乎认为古巴是孤立的，从而助长其冒险尝试，一笔勾销不入侵古巴的义务，对古巴发起军事进攻。古巴领导人向苏联提出订立军事条约时宣称，在拉丁美洲国家通过武装斗争消灭资本主义制度的全部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他们把协助拉丁美洲人民作为自己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

迫于国际形势的压力，苏方拒绝了古巴的请求，两国关系的进一步发展面临多重考验。苏联军事专家库兹涅佐夫提出的理由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古巴领导人执行的是另一条路线，即不是去增强古巴人民对苏联在加勒比海危机期间为拯救古巴及对古巴的全面经济援助和其他援助所表达的感激之情。“无论是菲德尔·卡斯特罗还是其他古巴领导同志，最近在发言中不再提起苏联对古巴的援助，倘若提到这种援助，也是强调这种援助来自社会主义阵营，或者把这种援助说成是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提供的。”^③二是古巴领导人认为，苏联政府在加勒比海危机时采取的行动不完全正确。1963年1月7日卡斯特罗在写给联合国秘书长吴丹的最后信函里说，古巴

① 杨存堂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29卷），第511页。

② 同上，第513页。

③ 同上。

方面认为，谈判并未取得加强古巴安全的结果。^①三是苏联认为自己派往古巴的专家未得到重用。“我们的专家不总是能被充分地加以使用。在许多情况下，古巴同志对我们的专家存有戒心，好像害怕苏联顾问管多了。我们认为，季托夫同志领导的苏联总顾问小组的处境尤其应该值得注意。”^②

导弹危机成为苏古关系史上分歧与矛盾最严重的一次事件，但苏联和古巴并没有断交。笔者认为，主要有四方面原因：一是美国履行了不入侵古巴的承诺。肯尼迪总统在1963年1月9日与苏方交谈时重申，美国承认并打算履行不入侵古巴的义务。肯尼迪在此次交谈中还表示，美国政府不允许古巴侨民在美国领土上进行入侵古巴的准备工作，决定解散1962年12月从古巴返回的曾参与1961年武装干涉人员的队伍。^③二是如果古巴始终坚持社会主义道路，那么古巴与苏联有着共同的革命理想。1963年10月4日，古巴颁布《第二次土地改革法》。法律规定：不允许资产阶级庄园或占有人掌握庄园来损害劳动人民的利益，阻碍供应居民的粮食生产，并且用产品进行投机或把他们剥削他人劳动所得的高额收入用于反社会和反革命的目的。农村资产阶级的存在是同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不相容的。必须消灭美国所依靠的与工农为敌的农村资产阶级。从古巴第二部土地改革法中可以看出，古巴不仅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而且在法律文本中融入了对古巴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指出了美国庄园主是古巴的真正敌人。古巴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并反对美国，与苏联存在共同的国家利益。三是在美苏两极格局的背景下古巴选择投向苏联，与当时的国际背景和苏联国内环境密切相关。赫鲁晓夫时期苏美的力量消长发生变化，可供苏联利用的机会、苏联利用这些机会的能力、以及美国对这个地区的控制均发生了变化。古巴对于苏联越来越重要是不言而喻的，它是苏联唯一能对美国近距离地制造麻烦的盟友。^④古巴加入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并成为正式成员，这就是在美国所控制的拉丁美洲

① 杨存堂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29卷），第513页。

② 同上，第514页。

③ 同上，第510页。

④ [古]菲德尔·卡斯特罗、[法]伊格纳西奥·拉莫内：《卡斯特罗访谈记：我的一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第286-289页。

打开了一个大缺口。苏联保住古巴政权，可以证明第三世界国家走亲苏路线的正确性，并进一步推动苏联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因此，当有能力和机会与古巴合作时，苏联是不会放弃的。四是苏古关系的发展深受美国因素的影响。古巴是夹在苏美之间的加勒比海小国，然而，古巴远不是两个超级大国、两个世界争夺的唯一焦点。美苏两国都试图使摆脱了殖民统治的国家接受自己的价值观，加入东方集团或西方集团。古美关系恶化后，只有采取倒向苏联的对外政策才能保住古巴新生的革命政权。

（三）苏古外交政策的调整及影响

导弹危机过后的苏古关系已发生变化，赫鲁晓夫试图缓和同古巴的关系。1962年11月16日，米高扬赴古巴商讨苏联对古巴经济技术援助的具体问题。1962年12月20日，苏古发表《1963年贸易谈判的第一阶段公报》，双方就1963年扩大两国贸易达成了协议。1963年2月6日，苏古两国政府代表在莫斯科签订了《1963年苏古换货议定书》和《苏联向古巴提供贷款的协定》。4月28日，应苏联方面邀请，卡斯特罗在莫斯科机场受到了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的迎接。卡斯特罗的来访对苏联有着重要的意义，在苏联处境艰难的情况下，赫鲁晓夫需要向其他国家的党和人民证明，他对古巴这个苏联阵营新成员的支持是正确的。4月底，苏联将古巴列入“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宣布完全承认卡斯特罗的社会主义。^①

此时，古巴政府对于苏联会在多大程度上帮助古巴尚捉摸不透。为了使古巴革命政权得以生存，古巴制定了维护自己利益的全球外交政策：一是建立一支精于外交、国际、经济、情报和军事庞大外交队伍。古巴领导人希望利用外交政策来取得古巴进行社会经济改造所需要的资源；古巴与苏联的关系仍是古巴发展对外关系的最优先方向；古巴力图与全世界尽可能多的政府保持良好的关系。古巴的这项政策就是为了冲破美国政府想把封锁强加于古巴的企图。为此目的，古巴愿意同非共产主义国家建立经济关系。二是扩大古巴在国际左派运动中的影响。古巴领导人认为，他们领导了一场真正的夺取政权的革命，马列主义在古巴已经得到确立，不像大部分东欧国家那样是

^① Правда. 29 апреля 1963 год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占领那些国家的副产品。而且，这场土生土长的加勒比革命，并不是老牌的共产党领导的。^①古巴革命者认为，他们对于第三世界的革命应当如何进行，以及如何向马列主义演变等问题拿捏得很准确。^②三是有力地支持许多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的革命运动。古巴“格瓦拉主义者”认为，要保证卡斯特罗政权的存在，决不能仅依靠苏联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只有在整个拉丁美洲大陆进行革命才能达到保卫该政权的目的。^③古巴将物资援助给予大部分中美洲国家和安第斯国家的革命者，在非洲与葡萄牙做斗争的人，以及刚果（布拉柴维尔）、阿尔及利亚和北越的友好革命政府。古巴试图借助其作为社会经济和政治发展的楷模形象扩大古巴革命的声望，在第三世界建立古巴的利益范围，摆脱被孤立的局势，削弱苏古关系冷淡对古巴造成的不利影响。

古巴的全球外交政策也给苏古关系带来冲击。苏联对古巴支持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做法没有提供任何支持。该时期苏联如果公开支持古巴的独立外交政策，将恶化导弹危机后缓和的苏美关系，使苏联在与美国的尖锐对抗中消耗自己的力量。苏联担心对古巴提供大量经济 and 军事援助后，古巴对苏联仍持若即若离的态度。一旦古巴在第三世界的力量日益增长，不再需要苏联提供安全保障，那么苏联将失去控制古巴的手段，其外交战略利益势必大大受损。另外，在拉丁美洲革命力量弱小且革命条件尚不成熟时，发展革命运动将迫使非共产党力量起来反对革命、反对苏联，特别是拉丁美洲国家资产阶级政府将会更倾向于寻求美国的政治保护，这不利于苏联与许多拉美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和发展经贸关系。由于美国的激烈反对和苏联的漠然视之，卡斯特罗和切·格瓦拉在对外输出革命时遇到严重困难，古巴轰轰烈烈的输出革命运动最终以失败告终。

①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著：《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30-35页。

② 同上，第261-274页。

③ *Granma*, El 3 de enero de 1963.

四、结语

赫鲁晓夫时期苏古关系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重要阶段：古美合作基础的破坏为苏古关系的发展提供机遇、美国企图颠覆古巴政权与苏联对古巴的支持、苏古关系发展的高峰与导弹危机对苏古关系的影响。该时期苏古关系的演变是内外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苏联与古巴的国内环境是推动苏古关系发展的内因，决定着苏古关系演变的基本趋向。美国因素是推动苏古关系发展的外部动力，对苏古关系的发展起着加速的作用。笔者认为，影响该时期苏古关系演化的因素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推动苏古关系发展的内部因素。从苏联方面看，赫鲁晓夫时期苏联已修复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给苏联带来的创伤，要对离它如此遥远的拉丁美洲地区采取一种积极战略，当时苏联是有能力支持的，况且 1959 年的古巴革命为苏联提供了可利用的机会。拉丁美洲虽处于美国牢固控制之下，苏联向拉丁美洲的渗透已打开一个缺口。如果苏联能够与古巴发展关系，不仅有利于维持全球局势的均衡，而且有利于推动苏联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证明第三世界国家走亲苏路线是正确的。不过，苏联最关心的是：古巴革命的领导人卡斯特罗是否能够转变成真正的共产党人和马克思主义者，革命后的古巴能否走上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政府在获得苏联信任的过程中，苏联给了古巴所需要安全保障，给了古巴革命和改革所需要的大国认同。从古巴方面看，为推进 1959 年古巴革命的深入发展，卡斯特罗废除了美国资本在古巴赖以生存的大庄园制，没收美国资本家在古巴投资的企业，使美国失去了从内部控制古巴最有效的经济手段。古美合作基础的破坏为苏古关系的发展提供了机遇。赫鲁晓夫时期，古巴最关心的是：如何突破美国的封锁和遏制以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如何获得古巴改革和发展所需的援助。而苏联不仅为古巴提供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支持，在苏古关系的高峰时期，苏联为保住古巴政权甚至在古巴部署导弹，来构建苏古关系合作的基础。因此，处理好苏古关系中涉及对方核心利益的问题，是推动赫鲁晓夫时期苏古关系发展的内在动力。

第二，推动苏古关系发展的外部因素。二战以后，美苏争夺世界主导权

的方式发生变化，两国主要是通过赢得小国追随的方式分别建立自己的势力范围。追随的国家越多，在政治和安全问题上所获得的支持也就越多。革命后的古巴是苏美争夺的新对象。而 1959 年古巴革命的深入发展颠覆了古美合作的基础，使美国失去了从内部控制古巴的手段，美国争夺古巴的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该时期美国对古巴进行的经济封锁、外交孤立和军事包围等政策主要是从外部入手，但美国的这些外部打击政策恰恰在客观上对苏古关系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古巴为获得土地改革的资金向距离遥远的苏联求援，苏古签订了两国之间第一个重要的双边经济协定，并促进两国其他方面关系的发展。苏古关系的发展促使美国对古巴的遏制政策愈加严厉，“勒库布尔号事件”和猪湾入侵不仅让古巴反美意志更加坚定，而且也使卡斯特罗停止了在“美苏之间的摇摆”。但是，猪湾入侵以后美国仍不放弃对古巴的干涉。在古巴向苏联寻求更多军事援助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在古巴部署导弹，将苏古合作关系推向高峰。从赫鲁晓夫时期苏古关系的演变过程来看，两国关系亲近或疏远，其背后或多或少均有美国的影响，美国因素是推动苏古关系发展的重要外部原因。

【Abstract】 The Soviet-Cuba Relations during the Khrushchev period was one of the most remarkable relations in the Cold War. Clarifying the evolution of Soviet-Cuba relationship during this period and summarizing the law and its influential factors not only contributes to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the reason why Cuba chose the Soviet Union instead of the U.S. after the victory of Cuban revolution and what measures the Soviet Union took to win Cuba as follower. Besides, it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to understand and grasp current complicate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s well. By analyzing the evolution and its influential factors during the Khrushchev period, this article draws such conclusion: dealing well with each other's core interests within Soviet-Cuba relations is an intrinsic impetus to promote their relations; the factor of the U.S. is an important external cause in promoting the development of their bilateral

relations.

【Key Words】 Soviet-Cuba Relations, la Coubre Explosion,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

【Аннотация】 Советско-куби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хрущёвского периода являлись одними из самых ярки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во времена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 Анализ развития отношений между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и Кубой в данный период подытоживает закон и факторы эволюции развития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что не только способствуют глубокому пониманию того, почему после победы кубин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выбор пал не на Соединённые Штаты, а на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а также пониманию мер, принятых Советским Союзом для завоевания доверия Кубы, но и имеет важное практическое значение для понимания нынешних сложных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Проведя анализ эволюции и влияющих на неё факторов советско-куби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периода Хрущёва, можно сделать следующий вывод: разрешение затрагивающих ключевые интересы обеих стран вопросов советско-кубин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является внутренней мотивацией развития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а Соединенные Штаты Америки — внешним фактором развития данных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оветско-кубинские отношения, взрыв теплохода «Ля Кувр», кубинский ракетный кризис

(责任编辑 肖辉忠)

浅析苏联在 1961 年果阿事件中的角色*

刘名望**

【内容提要】印度独立后，在其本土仍残存着法国、葡萄牙的殖民地。为此，尼赫鲁政府积极与法、葡协商，试图和平收复两地。法国对此欣然接受，但葡萄牙却拒不合作，如此激起了印度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并最终促使尼赫鲁于 1961 年用武力收复了果阿，史称“果阿事件”。在该事件中，苏联扮演了积极角色。无论是在收复果阿之前还是之后，苏联都对印度的想法或行动予以坚定的支持，这与美英等西方国家在此事件中的态度形成了明显的反差，极大地捍卫了印度的国家利益与尊严，为随后印苏关系的快速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关键词】果阿事件 苏联角色 印度

【中图分类号】D851.2; K512.5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1009-721X(2016)05-0106(19)

随着冷战进程的延伸，东西方集团的关系也在不断紧张。倡导不结盟的尼赫鲁在美苏两大阵营间不断博弈，以换取更多的政治资本来实现其本国利益的最大化，这直接导致它与美苏间的关系发生逆转，逐渐由独立后最初几年的亲美质变为亲苏，其中最为典型的莫过于印度在 1950 年朝鲜战争中立场的转变和在 1956 年埃及苏伊士运河危机与匈牙利事件中迥异的态

* 本文系贵州省 2016 年度社科规划课题“冷战时期的印苏关系研究（1947-1991）”（项目批准号：16GZYB35）、2015 年度贵州遵义师范学院博士基金立项项目“尼赫鲁时期的印苏关系研究（1947-1964）”（项目批准号：遵师 BS[2015]18 号）的阶段性成果。

** 刘名望，遵义师范学院博士。

度^①。尼赫鲁在东西方阵营间的摇摆，为印度博取了巨大的政治、经济与军事等多方面利益，尤其是在涉及国家领土主权方面，印度更是获取了苏联难能可贵的鼎力支持。由此不难判断，这一时期印度对苏联的政策可以说是完全成功的。但与此相背离的是学界，尤其是国内学界，对这一时期的印苏关系研究远远滞后于同期的中苏、中美、美苏等大国关系的研究。因此，很有必要加大对这段历史的研究力度与深度，为更深入地研究冷战时期的印苏关系奠定基础，也为我国在新形势下更好地构建新型大国关系与周边关系提供一些案例参考。

1961 年果阿事件的爆发，除了受印度偏激的民族主义思想直接驱使以外，苏联因素也在其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当时，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国家对果阿问题采取的是一边倒偏袒葡萄牙的策略，这在一定程度上使得印度在如何收复果阿这一问题上有所疑虑。因此，苏联在该问题上的立场在很大程度上大大提升了印度收复果阿的信心与决心，同时也在印度能否成功收复果阿和巩固成果的问题上发挥了积极作用。所以说，苏联在印度 1961 年收复果阿这一事件中扮演了相当重要的积极角色。这一观点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比如阿瑟·斯坦因（Arthur Stein）、班纳吉（Banerjee Nath Brojendra）、陶亮和李华等^②都在自己的论著中肯定了苏联在印度解放果阿的过程中扮演了积极角色，但均未对此展开深入研究。除此以外，苏联在该事件中的立场对随后印苏关系的发展、印度这一时期的对外政策，甚至南亚地区冷战格局的演变等都产生了重要影响，是尼赫鲁时期印苏友好关

① 在朝鲜战争初期印度支持美国，但随着战争的延续，印度继而转变为亲苏中，对此西方媒体称尼赫鲁是一个“出尔反尔”、“糊涂的”人等等，具体参见刘名望：“印苏在 1956 年苏伊士运河危机中的政策及战略考量”，《郑州轻工业学院学报》（社科版），2015 年第 4 期。在苏伊士运河事件中，尼赫鲁政府对英、法、以的侵略行径予以了强烈谴责，但对苏军在匈牙利的军事镇压行动，则以不明真相为由，为苏联在各种场合做伪辩关于印度在此二事件中的态度，具体参见刘名望：“印度在 1956 年匈牙利事件中的政策探究”，《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科版），2016 年第 2 期。

② 具体参见 Arthur Stein, *India and the Soviet Union: the Nehru er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pp.136-138; Banerjee Brojendra Nath, *India's Political Unity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 New Delhi: Paribus Publishers and Distributors, 1985, pp.156-158; 陶亮、李敏：“尼赫鲁对果阿问题的处理与 1962 年中印边界冲突”，《南亚研究》，2014 年第 2 期；李华：“苏联声援印度收复果阿及其动因：以 1955 年苏联领导人访印演讲为视角”，《潍坊学院学报》，2014 年第 1 期。

系的集中体现之一，很值得学界进行深入的研究。所以，本文将在借鉴最新相关研究成果与资料的基础上，深度剖析 1961 年果阿事件的来龙去脉和苏联在 1961 年果阿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最大限度地还原历史原貌，以期与前期的相关研究成果形成互补，起到一种由点到面地认识冷战时期印苏关系的作用。不当之处还请同行专家们批评指正。

一、果阿事件的由来

随着航海技术不断提升与新航线的开辟，亚非拉逐步成为西欧国家的竞技场，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印度也未能幸免于难。自 1498 年葡萄牙航海家达·伽马绕过非洲南端，到达印度马拉巴尔海岸的港口卡利库特^①以后，印度就逐步沦为葡萄牙人、英国人、荷兰人和法国人利益竞相角逐的竞技场。最终，英国人在 1858 年完全胜出，由此拉开了英国人在这片古老土地上近 200 年残暴统治的序幕。印度人民经过长期艰苦不懈的斗争，终于使得英帝国在 1947 年 6 月做出和平过渡交出统治权力的决定，但当时在印度本土仍存有法国人和葡萄牙人的殖民地。如何将这国家所霸占的领土收回，就成了独立后印度政府的头等大事之一。

印度独立后，便积极与法国人商讨归还印殖民地问题。法国人对此起初并不乐意，但法国人在印度支那的有心无力和印度人的积极沟通下，1954 年 10 月，法国人向印度和平转让了法在印的殖民地本地治里（Pondicherry），并于 1956 年签署了转让协定。尼赫鲁不无骄傲地说：“这就是我所说的真正的解决，并且如果你用正确的方法，它们也许有时冗长乏味还很慢，但最终为了完整地解决一个问题，这条路是最快的。”^②

然而，收回葡萄牙人占有的殖民地—果阿邦，就没有那么容易了。果阿位于印度南部西海岸，包括果阿（1510 年）、达曼（1558 年）和第乌（1531 年）三个部分，面积合计为 1500 平方公里，到 1954 年大约有 63.8 万人。^③

① 林承节：“殖民统治时期的印度史”，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 年，第 38 页。

② Kumar Akhilesh, *Feder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The Indian Context*, Pondicherry: Pondicherry University, 2004, p.38.

③ Kumar Akhilesh, *Feder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The Indian Context*, p.39.

由于它独特的地缘和资源优势，印度人对它的未来早有预想。

（一）独立前后甘地、尼赫鲁等对果阿的态度

甘地早在印度组建临时政府之前，就在其自办的《民族旗帜》(*Harijan*) 周刊上(1946年6月30日)说：“在自由的印度，果阿不允许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和一个有违这个自由国家的法律而存在。……我将冒险建议果阿的葡萄牙政府承认时代的趋势……而不是通过与英国人签订协议来行使职能。”^①独立后，甘地也多次强调果阿是印度的一部分，“果阿不属于英属印度，但它是在整体地理印度之内的，并且在葡萄牙人与果阿印度人之间几乎是没有任何共同的地方……将葡萄牙说成是果阿印度人的母国是荒谬的。”^②

印度革命先锋国大党则在1946年8月的工作委员会上宣布：“果阿一直且必须不可避免地成为印度的一个部分，它必须分享印度人民的自由。它在自由印度的地位和身份仅能与果阿人民咨询决定，而不由任何外界政府决定。”^③随后，国大党又在1948年斋蒲尔(Jaipur)的年会上对此再次重申：“随着独立印度的建立，任何在印度的外国殖民地的继续存在将是异常的，有违印度统一和自由的概念。”^④

具有强烈民族主义和反帝反殖精神的尼赫鲁，更是多次公开表示要将果阿并入印度版图。他于1950年12月6日在议会发表的题为《战争与和平》的讲话中就说：“我们实际上不能理解与容忍在印度还有任何外国的据点这一概念。”^⑤1951年3月28日，尼赫鲁又在议会强调，“让我来对我们对在印度的外国殖民地的政策澄清一下，印度不能容忍任何外国强权在这个国家有任何据点。我们急切地想给这些地区的人民一个过他们自己生活的

① “The Importance of Self-Knowledge”, *MANAS Journal*, 1962, Vol. XV, No. 23, p. 12.

② Kumar Akhilesh, *Feder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The Indian Context*, p. 41.

③ Rajkumar Nagoji Vasudev, *The Background of India's Foreign Policy*, New Delhi: Indian National Congress, 1952, p. 92.

④ Ibid.

⑤ Jawaharlal Nehru, *Jawaharlal Nehru's Speeches, Vol. 2 (1949-1953)*, New Delhi: Publications Division,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Broadcasting, Government of India, 1954, p. 248.

机会和选择他们自己未来的权利。”^①而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两种方式——要么是战争，要么通过外交方式实现这个想法。在追求我们的想法时，我们排除使用战争，除非我们被迫用此作为一种解决手段。”^②这是尼赫鲁首次提到要用武力解决争端的言论。可见尼赫鲁对非暴力还是有所保留的，这就不难理解随后的中印边境冲突和解放果阿的行动。

由此可见，印度对果阿的态度相当明确，但如何收复无疑是个难题。

（二）尼赫鲁对武力收复果阿的克制

独立后，尼赫鲁认为，一旦英国从印度退出，葡法将不可避免地把它在印度的殖民地和乎过渡到印度手中。为了使用外交方式尽早解决果阿问题，1949年，印度在里斯本建立了一个旨在通过协商解决果阿问题的公使馆，并于1950年2月17日向葡萄牙外交部提交了第一个关于公开协商解决此问题的备忘录。但得到的回应是，葡萄牙于1951年6月修改宪法，单方面将果阿改为了葡萄牙的一个海外省。印度政府对这种人为改变果阿身份的做法予以强烈谴责。^③而这种做法也引起了印度政府的警觉。是年10月1日，尼赫鲁就法国和葡萄牙在印度的殖民地问题在议会发表讲话强调：“这些领土应该成为印度的一部分是很有必要的，在这些地区的持续殖民统治是不合潮流的，且一定会导致不断的摩擦。当印度是一个主权国家时，没有理由允许这些外国飞地继续存在”^④

1953年1月，印驻葡公使馆又向葡萄牙外交部提交了另一份备忘录，指出：“人为的政治障碍是由一个历史的插曲造成的，……历史不再阻止（印度人民）国家统一的强烈愿望。”^⑤但葡萄牙政府置若罔闻，并于同年6月11日关闭了印度在里斯本的公使馆。葡萄牙政府这种不友好而且时常是令人厌恶的态度，使得这种谈判在1953年终止。设法谋求和平移交葡萄牙在印

① Jawaharlal Nehru, *Jawaharlal Nehru's Speeches, Vol.2 (1949-1953)*, p.248.

② Ibid, p.286.

③ Rahman Habibur, "India's liberation of Goa and the Anglo-American stand", *Journal of South Asian Studies*, 1996, Vol.9, No.1, p.38.

④ Chandernagore Sailendra Nath Sen, *From Bondage to Freedom 1900-1955*, Calcutta: Primus Books, 2012, p.299.

⑤ Kumar Akhilesh, *Federalism and Foreign Policy: The Indian Context*, pp.44-45.

度大陆上殖民地的企图与希望就此成为泡影。^①如此，果阿的民族主义者和印度政府开始了一系列解放果阿的措施。

1954年7月，果阿的民族主义者解放了达德拉和纳格尔（Dadra, Nagar）；8月成立了果阿政府委员会。受达德拉和纳格尔胜利的鼓舞，更多的印度人和果阿人加入到和平解放果阿的运动中来。1955年8月初，果阿爆发了大规模的非暴力独立运动。葡萄牙军队对游行示威者进行射击和逮捕，导致几十名印度人被打死，^②数千人遭逮捕。印度全国各地掀起了罢工和抗议示威。尼赫鲁为防止事态升级，下令禁止了非果阿人的游行示威。而许多国会议员则变得更为激进，时不时对尼赫鲁等人的政策发出抨击，认为政府太过软弱，应该采取军事手段来收复果阿。但尼赫鲁此时还是显得相当冷静，他向那些焦躁不安的议员们发表讲话说：“我们对果阿的基本政策是什么呢？第一，它必须是和平的方式。这是相当重要的，……我们完全拒绝使用非和平的手段。……如果印度人可以采用武力解决这个问题，那它就不能否决其他国家也有如此的权利，这是一个原则问题。”他还援引新中国对澳门问题的态度来说服那些议员：“中国政府并没有因为澳门仍是葡萄牙的殖民地而变得焦躁不安。……它们的军事实力并不弱，如果它们选择武力解决，那只是小菜一碟。……因此，我们应该运用我们的智慧与力量来解决这个问题。”^③尽管如此，这番话也未能压制议员们和尼赫鲁内心的狂躁。不久后，印度政府对外宣布，不允许葡萄牙人经过印度领土、对果阿进行贸易禁运和停开果阿与印度间的火车，并从1955年8月8日起关闭葡萄牙在印度的公使馆。这样，两国在1955年8月就断绝了外交关系。这意味着印度寻求外交途径解决果阿问题的阀门已然关闭。正如基辛格博士所指出的，当外交途径解决不了问题时，那就只剩下军事手段了，而这只是时间问题。

①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印度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函：文件 S/5020（原件：英文）（联合国官方文件）

② 陶亮：《理想主义与地区权力政治：冷战时期印度对外政策》，云南大学博士论文，2012年，第165页。

③ Jawaharlal Nehru, *Jawaharlal Nehru's Speeches, Vol.3(1953-1957)*, New Delhi: Publications Division, Ministry of Information and Broadcasting, Government of India, 1958, pp.385-391.

1956年5月30日，葡萄牙总理萨拉查（Antonio de Oliveira Salazar）在里斯本宣称，葡萄牙政府决心维护它在印度的殖民地果阿的主权，“（果阿）是完全值得为之作任何牺牲的，这不仅是因为它是葡萄牙的一部分，更因为它代表着西方文明的扩张史。”^①面对葡萄牙人对果阿问题的强硬态度，尼赫鲁在1956年6月4日的孟买果阿人的集会上强调，“果阿人民的利益与印度的利益是相似或完全一致的。”^②随后，他又在人民院发表演讲强调：“果阿与印度联邦组成了一个国家。……印度的自由运动不限于这个国家的某一部分，它的目标是将整个国家从任何一种形式的外来统治中解救出来。……因此，政府和这个国家的人民完全同情果阿人民脱离外来统治和与它的祖国重新统一的渴望。”^③

尽管如此，尼赫鲁等人还是认为，用和平方式解决果阿问题比较好，并积极向英国和美国求援，希望两国对葡施压以顺利解决问题。但两国均表示，这是印度政府和葡萄牙政府之间的事情，并不想多事。

在此情形下，尼赫鲁解决果阿问题的指针开始逐步向动用武力上倾斜。

（三）尼赫鲁武力解放果阿思想的爆发

1959年，尼赫鲁受中印边境问题上理想主义的破灭^④、苏联在中印边境问题上的态度^⑤和大选在即的影响，对果阿问题的态度逐渐强硬起来。

1961年3月，尼赫鲁在新德里召开的果阿国民代表大会上，发表了葡萄牙在果阿的殖民统治进行谴责和要果阿人行动起来解放他们故乡的讲话。8月，印度议会通过一项法案，批准达德拉和纳格尔并入印度联邦。葡

① Jawaharlal Nehru, *Selected Works of Jawaharlal Nehru second series Volume 33*,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pp.406-407.

② Ibid, p.413.

③ Jawaharlal Nehru, *Jawaharlal Nehru's Speeches, Vol.3(1953-1957)*, p.372.

④ 1959年3月22日，尼赫鲁给周恩来写信，提出了不仅要求将已被其非法占领的东段边境“麦克马洪线”以南9万平方公里和中段边境2000平方公里的中国领土划入印度，还要把西段边境一直在我国政府有效管辖下的阿克赛钦等地区33000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也划归印度，遭到中国政府的断然拒绝。

⑤ 既然印度能在中印边界问题上得到苏联的支持，在果阿问题上得到苏联的鼎力支持也就绝不是问题。

萄牙政府对此予以强烈谴责，并通过巴西驻新德里大使馆照会印度政府：“这项法案有违葡萄牙的主权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并与1960年4月国际法庭的判决相违背（根据该项判决，葡萄牙在印度的两块殖民地是葡萄牙的‘合法领土’）。”^①尼赫鲁对此予以了拒绝，并强调他不能保证印度政府不会用武力解决果阿问题。不久，尼赫鲁召见驻孟买的查德赫里将军（Chowdhury），询问如果武力解放果阿是否存在困难，这位将军自信满满地答道：“一切顺利的话，只需要24小时，反之，最多48小时。”^②尼赫鲁不由得感到胜券在握，遂命查德赫里将军去找国防部长克里希纳·梅农（Krishna Menon）商讨此事。

1961年11月17日，驻安吉边岛（Anjidiv）的葡萄牙军队向一艘印度客船开火，并导致一人死亡。印度政府通过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使馆向葡萄牙政府抗议这种无由侵略与肆意杀害从事正常职业的印度平民的行为。同时，印度政府还向联合国安理会控诉：这艘船是在多少年来固定的航线上航行。印度客船萨巴尔马蒂号（Sabarmati）没有得到警告就受袭击，^③这显然有违联合国宪章精神。

随后，印葡分别开始加强戒备。葡萄牙从本国空运了2000名士兵到果阿，而印度则从海陆空对果阿地区进行包围，大战一触即发。同时，两国均致函安理会主席指责对方。对此，英国人表态认为，这是印葡两国的事情，它无权干涉。而美国人则通过印驻美大使B.K·尼赫鲁向印度政府传话：“如果印度确实越过了葡萄牙在果阿的管辖地和果阿问题提交到安理会的话，美国将被迫采取反印立场。”^④但印度政府毫不妥协。

12月7日，尼赫鲁在议会发表讲话说：“正如议会所知道的，我们极不愿意使用武力来解决问题，……但我必须说，我们对葡萄牙的态度已经忍到极致了，要克制我们的情绪和随之而来的行动，对我们一直就有很大的困难。……因此，我们认为我们应做好应对各种可能的发展和结果的准

① Rahman Habibur, “India’s liberation of Goa and the Anglo-American stand”, p.40.

② Banerjee Paula, “John F.Kennedy and Goan Crisis”, *International Studies*, 1996, Vol.3, p.328.

③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二日印度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函：文件 S/5020（原件：英文）（联合国官方文件）

④ Rahman Habibur, “India’s liberation of Goa and the Anglo-American stand”, pp.42-43.

备，并且我们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来达到这个目的。到底会发生什么具体情况，目前我还不能说，因为这取决于环境和事情的发展，……但当前这种状况是不能容忍的。”^①

在此情形之下，12月10日，联合国秘书长吴丹（U.Thant）向尼赫鲁写信，呼吁避免使用武力，并说印葡的分歧可以在联合国的框架下解决。但印度政府对此毫不理会，并表示，“就目前形势而言，葡萄牙人是否留在印度并无协商可能”。第二天（12月11日），尼赫鲁在议会向葡萄牙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我们的耐心已经耗尽，我们仍然希望葡萄牙人自己或接受他们朋友的建议……放弃他们目前正在做的事，并接受从果阿撤退的事实。”同时，印度人用飞机散发了关于解放果阿的宣传册。宣传册说，“现在与你们在一起的防御军队是为了保护你们，捍卫长时期从祖国分离出来的领土的荣誉与安全是他们的责任，而这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你们自己的努力来实现的，”^②以此来激发果阿人的反葡情绪和给予印度军队相应的配合。

12月17日，印度政府通过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和巴西大使馆向葡萄牙政府发出照会：“印度人民决心保证它们的独立的（领土）完整和（铲除在）它们领土上的殖民统治，要求葡萄牙立即从印度的殖民地撤出。”同时，印度陆、海、空方面的军事准备已达到高潮。对此，美国通过美驻印大使加尔布雷思（John Kenneth Galbraith）向印度政府施加压力，要求印度避免使用武力解决果阿问题，并警告：“如果这样做，将损害印度的国际地位。”^③尼赫鲁受前不久中印边境冲突的影响和大选在即的考虑，这次决定一意孤行，军事手段解决果阿问题是无可挽回的，除非葡萄牙自行放弃，“如果印度不采取行动，果阿将变成一个外国军事堡垒。”^④

12月18日零点，尼赫鲁下令实施“维贾伊行动”（Operation Vijay），果阿危机由此爆发。印度军队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几乎没有遇到任何

① “Portuguese must leave india”, *Ellensburg Daily Record*, Dec 7, 1961, p.1.

② “Indian force invade Goa”, *The Times*, 2000.

③ “印度政府照会葡政府要求撤出果阿 美大使就果阿问题又同尼赫鲁会谈”，《参考资料》，1961年第4745期（下午版），第6页。

④ Banerjee Brojendra Nath, *India's Political Unity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 New Delhi: Paribus Publishers and Distributors, 1985, p.158.

抵抗的情况下，一举解放了达曼、第乌和果阿，而这一过程仅用了 36 个小时，^①这就是当时著名的果阿事件。

二、苏联与美英等国家在果阿事件爆发前的态度与立场

果阿事件爆发前，苏联对此的态度，集中体现在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 1955 年 11 月对印度进行为期 18 天访问期间的讲话中。

在访问期间，为了提升苏联在印度的影响和诱使印度的外交指针向苏联偏摆，两人不断抛出诱饵，“你们想建设工厂吗？……或许你们经验不足吧？那么，找我们，……你们想建设电站吗？要是你们在这方面没有经验，要是你们需要技术上的帮助，那么，找我们”^②，“克什米尔是印度的一个邦”^③。同时，两人自然也不会遗漏针对日益紧张的果阿问题发表鸿篇大论，以拉拢印度。

果不其然，11 月 28 日，布尔加宁就在马德拉斯的讲话中强调：“欧洲的某些国家到现在还不能懂得，时代变了，旧殖民制度一去不复返了。向来是印度的领土之上一直到现在还保存着葡萄牙的殖民地果阿是毫无道理的。这是文明人民的耻辱。（掌声）苏联人民过去一直是，并且将永远是同情为反对殖民主义和它的残余而斗争的人们的（暴风雨般的掌声）。”仅两天后，赫鲁晓夫又在加尔各答的讲话中强调果阿将属于印度。他说：“今天，还有一些国家，象虱子一样叮在健康人身上。这里我所指的是葡萄牙，它不愿意退出果阿，不让这块当属于印度的领土从它的统治下解放出

① 关于解放的详细过程可以参阅，“36 小时武装压境收复‘南亚香港’”，<http://www.chinanews.com/mil/2013/09-26/5326835.shtml>。印度政府在 29 日对外发布公告称，在这次行动中，印度死了 22 名军人，包括 2 名军官和 1 名下级军官及 19 人其它军人，伤 53 人；葡则有 1 名军官死亡和 16 名其它军人死亡，伤 38 人。“印外交部宣布收复果阿作战中双方伤亡数字”，《参考资料》，1962 年 1 月 2 日第 4774 期，下午版第 9 页。

② 人民出版社编辑：《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关于访问印度、缅甸和阿富汗期间的讲话 1955 年 11 月-12 月》，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 年，第 44 页。

③ 人民出版社编辑：《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关于访问印度、缅甸和阿富汗期间的讲话 1955 年 11 月-12 月》，第 111-113 页。

来。（掌声）但是，这不过是迟早的事，果阿必将从外国统治下解放出来，成为印度共和国的一部分（暴风雨般的掌声）。”^①

就在两人的讲话迎来印度人阵阵“印地，露西——巴依，巴依”（印地语：印俄人民是兄弟）欢呼的同时，葡萄牙人坐不住了，赶紧向美国人求援。12月2日，葡萄牙外交部部长库纳（Kuhna）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Dulles）就果阿问题发表了联合公报。在公报中，美国政府表示将坚决支持葡萄牙政府保持它对印度领土果阿的统治的要求。为此，甚至可以利用北约的军事机构。^②4天后（12月6日），杜勒斯又在记者招待会上直言，“根据葡萄牙的法律，果阿是葡萄牙的一个省，印度对此也是不会怀疑的。”^③丘吉尔对此大加赞扬，“杜勒斯，做得很对，很对”。^④

杜勒斯此举显然有违印度民意，洛克菲勒在给艾森豪威尔的秘密信中披露：“美国国务卿在果阿问题上维护葡萄牙人的立场所导致的后果，就是使得美国在印度的威信剧烈下降，特别是在杜勒斯发表了葡萄牙应当保有果阿的言论以后。”^⑤

这种藐视苏联威信、无视印度主权的言语，在激怒印度人的同时，苏联人焉能示弱。12月13日，赫鲁晓夫在接见印度国会议员时，称葡萄牙就是个窃贼。他说：“我感到惊奇的是，我们的反对殖民主义特别是反对葡萄

① 人民出版社编辑：《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关于访问印度、缅甸和阿富汗期间的讲话1955年11月-12月》，第88、103页。

② [苏]茹科夫等著：《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在印度、缅甸和阿富汗 通讯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82页。

③ [美]杜勒斯著：《杜勒斯言论选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第212页。

④ [美]塞勒斯·利奥·苏兹贝格著：《七大洲风云四十年——回忆录萃编(上册)》，蒋敬等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349页。塞勒斯·利奥·苏兹贝格是当代美国著名的政治专栏作家，1933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他在世界各国进行新闻采访活动，足迹遍及七大洲，撰写了大量的通讯报道和评论文章。他在1956年7月10日在丘吉尔的私人别墅——恰特韦尔对丘吉尔长达5小时的访问中提到了尼赫鲁，丘吉尔回答说：“尼赫鲁从来没有为我们干过一件有利的事。”并相信，要再发生战争，尼赫鲁决不会帮英国的忙，而甚至可能会通过俄国和中国的压力被引诱加入共产党集团反对西方。

⑤ 石油工业出版社编：《中东石油资源》，北京：石油工业出版社，1958年，第68页。杜勒斯的行为无疑引起了无数印度人的愤怒，以致其在1956年1月要对印度访问时，印度各大媒体均表示拒绝杜勒斯访印。

牙在果阿和在印度领土上的其他葡萄牙属地继续进行殖民统治的言论，竟然引起某些美国政界人士出面来为葡萄牙殖民主义者辩护，理由是这些属地在他们手中已经有四百年了。不论过去多少年，贼赃仍然是贼赃，它必须归还原主。贼赃应该归还，而且还要加上利息。当然，如果有良心的话。（暴风雨般的掌声）”次日（12月14日），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在新德里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强调：“人人都知道果阿是印度领土的一部分。……不管殖民者是否喜欢，……将不得不从不是他们自己的领土的土地上滚出去。”^①这番话，自然受到尼赫鲁等人的赞赏：“这是苏联领导人在经过深思熟虑后才讲的。”^②

毫无疑问，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在果阿问题上对印度坚定支持的态度，极大地提升了印度收复果阿的信心与决心，并强烈刺激了尼赫鲁武力收复果阿的神经中枢。

三、果阿事件爆发后，苏联与美英等西方国家的态度与立场

尼赫鲁武力解放果阿的举动无疑让世人大吃一惊，世界各国对此褒贬不一。西方各国从与葡的天然关系和阵营稳定等因素考虑，纷纷发表对印度政府此举表示“遗憾、震惊、沮丧”的言论。

英联邦关系大臣邓肯·桑迪斯（Duncan Sandys）当天（12月18日）在下议院说：“尽管英国一直理解印度人民将果阿、达曼和第乌并入印度联邦的自然渴望，……（但他）必须明确说明英国政府对印度政府为达政治目的而使用武力的决定深表遗憾”。英国反对党领袖休·盖茨克尔（Hugh Gaitskell）也对印度在解决它与葡萄牙的争端中求助于武力的方式深表遗憾；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在当天就强烈敦促这个问题应该立即提交到联合国，“我们对这些不同的呼吁竟然未起任何作用深表遗憾”。法国则表示震惊和遗憾。巴基斯坦称此为“赤裸裸的军事主义……世界现在已经知道印度

① 人民出版社编辑：《布尔加宁、赫鲁晓夫关于访问印度、缅甸和阿富汗期间的讲话1955年11月-12月》，第128-129、136页。

② Arthur Stein, *India and the Soviet Union: the Nehru er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9, p.76.

有双重标准”。^①巴西也在12月18日向安理会表示：“巴西政府对印度联邦以武装侵略葡萄牙的领土果阿、达曼和迪乌深感不安。巴西政府认为这种行动绝对违反了联合国宪章中禁止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的各项原则。巴西政府只能表示惊讶，看到像印度联邦这样一个（崇尚与倡导非暴力的）国家竟有这种行为。”^②尼赫鲁也由此被美国舆论界认为是“伪君子”，“妓院的说谎者”和强权主义者。^③

在此情形之下，苏联对此给予了难能可贵的坚定支持，这其中尤以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的声援和苏联在联合国对印度的支持为最，极大地捍卫了印度的基本国家利益与尊严。

（一）勃列日涅夫、赫鲁晓夫对尼赫鲁的声援

在果阿事件爆发的当天（12月18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勃列日涅夫“恰巧”在印度访问（为获得苏联对解决果阿问题的支持，印度事先就已经将自己的决定告知了苏联决策层^④）。他无论走到哪里均表示，印度在果阿的行动是正义的、合法的，并声称苏联将给予印度必要的援助。在孟买，他说：“（苏联）热烈支持印度解放和统一葡萄牙飞地果阿、达曼和第乌的行动，……支持废除殖民主义的一切形式和表现。”^⑤在加尔各答（12月21日），他说，“在消灭果阿、达曼和第乌的外国殖民统治的残余

① “International Reactions to Indian Attack on Goa. - Soviet Veto of Western Cease-fire Resolution in security Council”, *Keesing's Record of World Events* (formerly Keesing's Contemporary Archives), 1962, Vol.8, India, Portugal, Indian, Portuguese Territories, India, Portuguese, pp.18659-1, 2, 3. Keesing's record of world events. 金氏记录从一九三一年开始出版至今，收录了全球一百多个国家的报章杂志新闻编辑而成，记载了全世界重要的政治、社会和经济事件。

② *The Delegation of Brazil to The Sixteenth Session of the General Assembly Addressed to the President of the Security Council*, 8/5034.18 December 1961, Letter Dated 18 December 1961 From The Chairma: English (Original): French（联合国官方文件）

③ 陶亮：《理想主义与地区权力政治：冷战时期印度对外政策》，第174页。

④ *Note on a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GDR's Moscow Embassy and the Soviet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German), South Asia Dept. 1962 10 Jan 1962, PA AA, MfAA, A 765, Bl. 92-94, Political Archives of the German Foreign Office, 源文件为德语，笔者依据该文献的英文摘要翻译而得。

⑤ “勃列日涅夫昨到孟买”，《参考资料》，1961年第4745期（下午版），第6-7页。

的正义事业中，苏联人民完全站在印度一边。”^①因此，若印度因解放果阿而发生危机，是能够得到苏联的友好援助的。

而赫鲁晓夫则三度致电尼赫鲁表示祝贺。在事发当天，他给尼赫鲁发去贺电，表示印度政府采取的铲除殖民主义在印度据点的行动是完全合法且正义的，苏联人民完全一致地同意这些行为。^②两天后（20日），赫鲁晓夫又在给尼赫鲁的贺电中说：“印度政府消灭在它领土上的殖民主义堡垒的果断行动是完全合法和有理由的。……苏联人民一致支持这些行动并祝贺友好的印度在巩固它的独立方面取得成功。”^③当尼赫鲁在面对西方世界对此的严重不满显得有点手足无措时，^④赫鲁晓夫则在22日（即事件爆发后的第4天）再次给尼赫鲁发贺电，为尼赫鲁鼓劲：“印度政府铲除其领土上的殖民主义遗留的行动是绝对合法和正义的，……苏联人民一致支持这些行为并祝愿成功属于友好的印度。……葡萄牙应该退出印度的要求不是一个国际冲突，也并没有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威胁。”^⑤“印度政府所采取的举措对人类瓦解殖民体制的崇高斗争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⑥事后一年，赫鲁晓夫还在1962年12月12日的最高苏维埃讲话中一再强调印度解放果阿、达曼和第乌的正确性。他说：“印度解放了果阿、第乌和达曼。这是印度国土上的殖民主义残余。……印度，它的政府表现了忍耐精神，对这种情况容忍了若干年，然后就动手赶走了殖民主义者。他们做得对吗？当然是对的！”^⑦

① “勃列日涅夫到加尔各答”，《参考资料》，1961年第4751期（下午版），第10页。

② “International Reactions to Indian Attack on Goa. - Soviet Veto of Western Cease-fire Resolution in security Council”, *Keesing's Record of World Events*, pp.18659-4.

③ “赫鲁晓夫致电尼赫鲁祝贺印度收复果阿”，《参考资料》，1961年第4752期（上午版），第18-19页。

④ 当西方对印度在果阿的行动大加指责时，印度方面显得有点手足无措。因为当时印度政府并没有准备相关控诉葡萄牙霸占印度果阿的控诉书，仅有克里希那·梅农的关于葡萄牙军队朝奉命进入果阿的印度军队开火的声明。Rear Admiral Satyindra Singh, *Blueprint to Bluewater: The Indian Navy 1951-65*, New Delhi: Lancer International, 1992, p.421.

⑤ Banerjee Brojendra Nath, *India's Political Unity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 pp.153-154.

⑥ Singh Rear Admiral Satyindra, *Blueprint to Bluewater: The Indian Navy 1951-65*, p.421.

⑦ “赫鲁晓夫在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上的报告（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人民日报》，1963年2月2日。

苏联除了通过勃列日涅夫和赫鲁晓夫对印度解放果阿的行动予以积极声援以外，还在联合国积极为印度据理抗争，动用宝贵的否决权，对印度巩固该成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苏联在联合国对印度的支持

战斗打响后不久，葡萄牙就积极寻求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联合国安理会的支持。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特别会议上，葡萄牙政府强烈呼吁北大西洋公约成员支持其在安理会所提交的议案，结果，除爱尔兰外，均表示支持葡的要求。在联合国，葡萄牙“控诉”印度对果阿的行动是“一个有预谋的行动，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容忍的。它公然侵犯葡萄牙的主权，违反了联合国的宪章”。葡萄牙要求联合国“立刻召开安全理事会，制止印度联邦这种应予谴责的侵略行为，下令立刻停火，要印度立刻从葡萄牙的领土果阿、达曼和迪乌撤返所有侵略军队。”^①

葡萄牙的“控诉”很快就得到了美国的共鸣。美驻联合国代表史蒂文森（Adlai Ewing Stevenson）在安理会会议上发言说，支持“（印度的）这个行为对我们来说十分痛苦。……我们诚挚地强烈要求印度从它们所侵占的领土上撤出，我们诚挚地呼吁停火，我们诚挚地强烈要求印葡通过谈判解决这个问题，我们要求必须马上立即停火，我们坚持认为入侵部队必须马上撤出。……宪章禁止使用武力。这里没有对世界一些地方用一部法律，对世界的其他地方又用另一部法律。宪章是全世界的法律，安理会必须支持它”^②随后，在美国的倡导下，一个由美英法等五国起草的谴责印度使用武力、呼吁停火和撤军的议案提交到安理会。该议案主要包括四个方面：1、立即停战；2、印度军队立即撤回到12月17日以前所在的位置；3、强烈要求印葡根据联合国宪章的准则制定出一个永久解决分歧的方案；4、联合国

① “一九六一年十二月十八日印度代表致安全理事会主席函：文件 S/5030”（原件：英文），（联合国官方文件）。

② “International Reactions to Indian Attack on Goa. - Soviet Veto of Western Cease-fire Resolution in security Council”, *Keesin's Record of World Events*, 1962, Vol. 8, India, Portugal, Indian, Portuguese Territories, pp.18659-7.

秘书长对此进行适当的援助。^①显然，这个议案并不是从尊重印度国家主权与尊严考虑的一个议案，最终由于苏联的否决票，没有获得通过。对此，苏联驻联合国代表佐林（Valentin Zorin）声色俱厉地说：“果阿问题完全是印度的内部事务，不应拿到安理会来讨论。但是，如果确实有必要，讨论的主题就应该是葡萄牙违背自己所作出的给予殖民地国家和人民独立的承诺的问题。葡萄牙并没有履行也不打算履行这个宣言（在第 15 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了反殖民主义决议，葡萄牙是联合国会员国之一，就应该遵守此决议）。因此，它对世界不同地方的和平与安全造成了威胁……当葡萄牙在安哥拉射杀成千上万人时，英美既没有谴责葡萄牙，也没有要求葡萄牙停火和撤军。而当提到印度解放其被殖民的人民和领土时，就指责印度违背了联合国宪章。（这是多么的可耻！）…苏联将与印度和果阿人民在他们解放葡萄牙殖民地的斗争中团结一致。”^②

随后，在苏联的倡导下，一个由利比亚、锡兰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三国起草的旨在维护印度主权完整独立的提案提交到了安理会。它主要包括三个方面：首先，在印度的葡萄牙所宣称的“飞地”对世界和平与安全构成了威胁并阻碍了印度共和国的统一；其次，要求安理会拒绝葡萄牙对印度“侵略”的控诉；最后，要求葡萄牙停止敌意行动，并在废除它在印度的殖民地方面与印度合作。但由于英美法土等西方七国的反对，^③该提案未能通过。

苏联在安理会的举动使得葡萄牙总理萨拉查恼羞成怒，竟以退出联合国相要挟。他于 1962 年 1 月 3 日在国会宣称：“由于苏联的否决，安理会未能阻止对一个小国家赤裸裸侵略的情况表明，联合国的有效权力已经传到了共产主义和亚非国家的手中；印度代表坚持不撤军的声明对联合国构成了挑战，宪章不再是宪章，安理会不再是安理会，现在最好考虑解散联合国。

① *France, Turkey,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and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oint draft resolution:S/5033, 18 December 1961, Original: English. (联合国官方文件)

② “International Reactions to Indian Attack on Goa. -Soviet Veto of Western Cease-fire Resolution in security Council”, *Keesing's Record of World Events*, Vol.8, pp.18623-7.

③ *France, Turkey,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and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joint draft resolution:S/5033, 18 December 1961.

尽管他不确定葡萄牙是否会第一个退出联合国的国家，但一定是第一批中的一个。同时，葡萄牙将拒绝在一些与葡萄牙直接利益无关的事情上与联合国进行任何合作。”^①

可见，正是由于苏联人对印度解放果阿行动的大力支持，才使得印度保住了解放果阿的成果，极大地维护了印度的根本国家利益。对此，印度学者奈斯指出：“在由像美英等西方殖民者们把持的安理会，如果没有苏联对印度的坚定支持，很难想象印度的主权、统一与安全将会发生什么。如果苏联没有否决英美在安理会的提案，果阿将成为另一个对印度政治统一和主权的威胁，苏联在安理会的行动避免了有可能演变成一场灾难性国际冲突的危机。”^②

应该说，尼赫鲁此举对印度的统一大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这种方式也无疑昭示了其心中的地区霸权和大国政治思想。而苏联对此的积极支持，更使得这些思想在印度国内和政界不断膨胀，为随后的中印边境冲突和印巴间的两次战争的爆发埋下了巨大祸根。同时，苏联也欢迎印度采取激进态度维护自己的利益。因为这样不但可以削弱印度与西方各国的关系且使之尖锐化，而且也可以达到印度对苏联的依赖性不断增加最终使其慢慢并入苏联外交轨道的战略目的。而苏联在此问题上的积极肯定态度，一方面充当了印度维权代言人的角色，证明了印苏友谊的可靠、稳定；另一方面为苏联“联印遏中”战略的实施在无形中添了一把火。正如美学者比亚勒（Seweryn Bialer）在其《苏联的稳定和变迁》一书中所说的：“苏联的立场事实上是从属于它自己的发展的要求，同资本主义的立场没有多大差别。”^③

① “International Reactions to Indian Attack on Goa. - Soviet Veto of Western Cease-fire Resolution in security Council”, pp.18659-9.

② Banerjee Brojendra Nath, *India's Political Unity and Soviet Foreign Policy*, p.156.

③ [美]塞维林·比亚勒著：《苏联的稳定和变迁》，普尔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第271页。

结 语

1961 年果阿事件的爆发，不仅是尼赫鲁对非暴力思想有所保留的体现，更是其在南亚地区推行地区强权政治的佐证之一。它对印度的对外政策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不仅加速了印度向苏联靠拢的步伐，更是助长了印度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气焰。如此，大大加速了 1962 年中印边境冲突的到来。

【Abstract】 After India's independence, there were still French and Portugal residual colonies on its own territory. To this end, the Nehru government actively consulted with France and Portugal, trying to recover the two territories peacefully. France is pleased to accept this request, while Portugal refused to cooperate, which aroused strong nationalist sentiment in India, and eventually leading Nehru to recover the territory of Goa by force in 1961. In this event, the Soviet Union played a positive role. Whether before or after regaining Goa, the Soviet Union always firmly supported Indian thoughts and actions, which was in complete contrast against Western countries including the U.S. and Britain. This greatly defended India's national interests and dignity, laying a certain foundation for the subsequent rapid development of India-Soviet relations.

【Key Words】 Goa Event, Soviet role, India

【 Аннотация 】 После обретения Индией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на её территории по-прежнему находились остатки колоний Франции и Португалии. В связи с этим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Неру активно проводило консультации с Францией и Португалией, пытаясь мирным путём вернуть две территории. Франция с радостью согласилась, однако Португалия отказалась сотрудничать, что вызвало сильные националистические настроения в Индии, и в конечном итоге привело к тому, что Неру в 1961 г. вооружённым путём аннексировал Гоа, что и стало называться событиями в

Гоа. В этих событиях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сыграл активную роль. Будь-то перед аннексией Гоа, или после этого, Советский Союз выражал твёрдую поддержку Индии в её идеях и действиях, что коренным образом отличалось от позиций США и Великобритании, а также других западных стран, данная позиция СССР защищал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интересы и достоинство Индии, заложив тем самым определённый фундамент для последующего быстрого развития индийско-советских отношений.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События в Гоа, роль СССР, Индия

(责任编辑 阎德学)

俄罗斯经济**俄罗斯本国收入的资本化与经济增长**

陈宇*

【内容提要】金融体系将闲置资金转化为投资，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从而拉动经济增长，这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关键。俄罗斯从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其本质与初衷就是希望市场能够替代政府进行资源配置（特别是金融资源配置），从而达到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目的。转型以来，虽然固定资产投资（资本形成）拉动了工业，尤其是能源相关行业的增长，从而带动了整体经济的增长，但是，外资是这一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来源。这是因为转型过程中俄罗斯法律与制度的不完善及其执行不力，所以在借款人与贷款人的博弈中存在着一个纳什均衡，而贷款人的最优策略为提供短期贷款。换言之，保护债权人的法律及执行欠缺，导致俄罗斯的金融功能不足，未能将本国收入转化为长期投资，即，未能转化为企业所需的用于生产经营的固定资产投资，从而不断累积固定资本，导致固定资产投资或长期投资过多依赖于外资，因此造成了今天俄罗斯的经济困境。

【关键词】俄罗斯金融 俄罗斯转型 俄罗斯投资 俄罗斯经济增长

【中图分类号】 D851.2; F151.21 **【文章标识】**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16)05-0125(25)

* 陈宇，辽宁石油化工大学经济管理学院讲师，辽宁大学世界经济专业博士。

一、引言

金融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一个关键因素。现代经济的增长，从表面上看是由最终需求决定的，但其实质，是一个由金融体系决定的资源组织过程。金融体系扮演着将闲置资金转化为投资所需融资的关键角色。运行良好的金融体系能够使货币资金的筹集、融通和使用充分而有效，能够更加准确、真实地反映价值，因此金融体系能够以此提高经济以及商业体系的整体效率。经济增长在多大程度上依赖金融体系，将体现出金融体系对经济增长起到多大的贡献作用。

就俄罗斯而言，自 1992 年经济转轨至今，其所经历的就是一个现代金融体系与市场经济的确立以及不断完善的过程（经济领域）。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企业的私有化与经营的自由化，使金融机构与市场逐渐取代了政府成为配置资源的主体。在完全没有政府干预的条件下，金融机构与市场必将本着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原则进行金融资源配置，因此在理论上会选择投资回报率高、投资风险小的企业（行业）进行投资，而不会选择低回报、高风险的企业（行业）进行投资。另一方面，激进式的金融转型也使银行、证券本身成为一种产业，参与到整个经济活动当中，同其他产业竞争资源。不过，大量理论与实证研究表明，经济的快速增长是由实体经济领域的固定资产投资所不断形成的固定资本的逐渐积累而持续推动的；^①而企业为生产经营活动所进行的固定资产投资所需要的，是金融体系所提供的长期贷款。对于银行而言，则为长期投资，因为短期投资（或短期贷款，主要满足企业的流动性需求）的作用有限。因此银行应该更多长期投资于非金融企业进行固定资本积累，对金融领域的过多投资会对实体经济的投资产生“挤出”效应。^②

本文从俄罗斯金融体系、主要是银行体系如何配置固定资产投资（或长期投资），从而对产业以及整体经济增长产生何种影响的角度，进行分析。第二部分阐述固定资产投资主要进入到能源相关产业，从而使能源相关产业

① De long, J.B. and Summers, L.H., “Equipment investment and economic growth”,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991, Vol.106, No.2, pp.445-502.

② James Tobin, “Money and Economic Growth”, *Econometrica*, 1965, Vol.33, No.4, pp.671-684.

获得更大程度的增长，继而拉动了整体经济的增长；第三部分阐述外资是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来源，而政治与经济等多种原因导致这种对外资的严重依赖，不能维持长期投资的稳定增长；第四部分分析俄罗斯法律制度的不完善以及其执行的缺陷，这导致了银行更愿意为企业提供更短期投资，从而使企业缺乏长期投资来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即银行未能将本国收入转化为固定资本，因此使固定资产投资或长期投资过度依赖外资；第五部分为结论与启示。

二、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流向

（一）固定资产投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转轨之后俄罗斯经济的增长与否

自 1992 年经济转轨以来，在最初的五年中，俄罗斯经济处于严重的危机状态，不但生产全面下降与衰退，而且整个社会也陷入了全面危机之中。特别是，这一危机带来了一系列连锁反应。为控制高通货膨胀，政府采取紧缩的财政与货币政策，这使得企业投资资金严重不足，1994 年的生产性投资只及 1991 年的 39%。虽然从 1997 年开始，经济下滑的趋势以及通货膨胀得到控制，而且金融工业集团、一些中小企业以及合资企业为经济增长做出一些贡献，整体经济的相对稳定使投资领域表现出了稍许的积极进展，但是 1998 年的金融危机又使这一转机戛然而止。再融资利率、抵押贷款利率的增长，强制性储备的规范，使信贷和金融市场再一次恶化。俄罗斯投资评级的降低，风险的增长，急剧恶化的投资环境，导致大量本地以及外地的资金外流，再加上卢布的贬值，使投资活动再一次陷入衰退之中。与 1997 年相比，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利润在 1998 年减少了 1.7 个百分点，这使得固定资产投资比 1996 年减少了 1 个百分点，其值为 15.3%。最终，固定资产投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在年底达到了 15.0%。^①由此可见，在 1992 年至 1998 年之间，俄罗斯经济中并没有形成良好的、刺激性的投资机制。制度的缺陷、欠佳的投资环境等诸多原因，使俄罗斯在 1992 年至 1998 年

^① *Russian Economy in 1997: Trends and Outlooks*, Gaidar Institute for Economic Policy, Gaidar Institute, 1998.

期间投资一直处于下滑状态。1992年，全国投资比1991年下降了39.2%，1993年比1992年下降了46.6%，1994年比1993年下降了60.6%。1995年的投资额仅为1990年的25%，1996年比1995年下降了18%，1997年比1996年下降了5%。而在1990年至1996年期间，用于固定资产投资的长期投资（长期贷款）则减少了70%。^①

金融工业集团在1996年至1998年期间迅速形成。数据显示，1997年正式的金工业集团达到72个，最大型的、事实上的金融工业集团达到30—50个。而且与此同时，在1994年至1999年期间，金融工业集团的资本投资逆势增长，1995年最大的十五家金融工业集团的投资比上年增长了150%，1996年15个金融工业集团基本建设投资比上年增长了250%，1997年最大的15家金融工业集团的投资比上年增长了150%。^②1998年金融工业集团的投资比上年增长了6%。^③但是即便如此，金融工业集团投资的增长，仍然不能弥补在此期间总体投资的下滑。

从1999年开始，俄罗斯国内经济开始趋于稳定，国内需求的快速增长以及高水平的流动性，为投资活动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环境。此时俄罗斯经济中的重要特点之一就是投资需求快速增长，这使得固定资产投资在此期间虽然存在较大波动，但是总体上明显高于上一个时期。2000年固定资产投资为17.4%，此后便一直维持在10%以上的水平，在2007年更是达到了21.1%。虽然在2008年后又开始回落，但2008年当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仍为9.8%。^④另外一个特点是，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往往比国内生产总值（GDP）以及国内主要经济部门产出的增长速度更快。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率超过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率，这一趋势从2002年便开始出现。2004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长率约为11%，2005年约为10.5%，一直高于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① *Russian Economy in 1998: Trends and Outlooks*, Gaidar Institute for Economic Policy, Gaidar Institute, 1999.

② 程锐：“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的发展及与中国企业集团的比较”，《世界经济情况》1998年第14期。

③ 陈柳钦：“俄罗斯金融工业集团及其对俄罗斯经济的正负影响分析”，《云南财经大学学报》，2006年第224期，第13—17页。

④ *Russian Economy in 2007: Trends and Outlooks*, Gaidar Institute for Economic Policy, Gaidar Institute, 2008.

(GDP) 的增长速度。而且这一趋势在整个俄罗斯经济快速增长的十年中，一直得以保持。除了企业（产业）投资之外，对于在贸易条件没有改善的情况下需要维持高增长率的额度而言，固定资本形成总额似乎相对较低。因此，为了缓解快速增长的工资水平和激增的进口等对经济增长的负面影响，在这一时期，俄罗斯政府已经开始通过增加公共投资，特别是在基础设施方面，来放松对经济增长的一些约束。

由此可见，在 1999 年至 2008 年期间，固定资产投资总量虽然在不同年份存在波动，但是相较于上一时期，固定资产投资总量明显处于增加状态，而且整体上超过了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特别是在 2001 年至 2006 年，固定资产投资分别为 8.7%、2.6%、12.5%、10.9%、10.5% 和 12.6%。^① 但是与所有转型国家相同，资金短缺仍然是俄罗斯经济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据预测，从 2002 年开始的 20 年至 25 年，至少需要 2.5 万亿美元的投资，才能保证俄罗斯经济的稳定增长，即每年需要 1000 亿美元的投资才能满足经济增长的需求。而 2002 年俄罗斯的固定资产投资仅为 1.7624 万亿卢布（按当年平均汇率 1 美元兑换 31.78 卢布计算，约合 555 亿美元），2003 年为 2.1862 万亿卢布（约合 742 亿美元），2004 年为 2.7298 万亿卢布（约合 948 亿美元），没有一年达到 1000 亿美元^②，投资不足由此可见一斑。

受到 2008 年金融危机的影响，投资、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严重受损。2009 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实际量减少了 15.7%。^③ 不过在 2010 年和 2011 年很快恢复为增长状态。到 2012 年，固定资产投资超过了 2008 年的水平。^④ 但是从 2012 年下半年开始，投资又出现减少的趋势。到 2013 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的趋势愈加明显，到 2013 年底，固定资产投资为上年同期值的

① *Russian Economy in 2008:Trends and Outlooks*, Gaidar Institute for Economic Policy, Gaidar Institute, 2009.

② 高晓慧：“俄罗斯经济增长中的结构问题”，《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5 年第 4 期，第 41-46 页。

③ *Russian Economy in 2011:Trends and Outlooks*, Gaidar Institute for Economic Policy, Gaidar Institute, 2012.

④ *Russian Economy in 2012:Trends and Outlooks*, Gaidar Institute for Economic Policy, Gaidar Institute, 2013.

99.8%。^①2014年，固定资产投资下降为上年同期值的97.3%。^②2015年7月，固定资产投资下降为上年同期值的91.5%。^③俄罗斯统计局（Rosstat）的近期数据显示，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同比下降8.4%，下降幅度比上年扩大了6.9%。总体而言，从2009年至2015年，固定资产投资整体呈下滑趋势，截至2014年底，固定资产投资与1999年相比仅增加了2.89倍。^④

（二）进入到能源相关产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与减少决定了该产业的增长与衰退

1992年至1998年，不同产业的投资的调整，使得产业结构逐渐发生变化。从1992年开始，商品生产领域的资本投资每年都在稳定下降，直到1995年开始才显示出增长趋势，而在服务领域的资本投资却在增长。工业领域的投资从1990年的35.9%下降到1995年的33.6%。1995年，工业投资支出占投资总额支出的比例为3/5，在工业投资领域，燃料和电力等行业的投资支出则占据相对较大份额，这些行业的投资支出占国民经济资本投资支出的比例为1/5。而在1990年，工业投资支出占投资总额支出的比例为39%，燃料和电力等行业的投资支出占国民经济资本投资支出的比例为14%。与此同时，对农村经济的投资支出急剧下降：1995年，资本投资总额中的2.7%直接投向农村经济，而在1990年这一数字为15.8%。交通和通信等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在1991年至1992年经历衰退之后开始恢复增长，1995年这些领域的投资支出比例为14.5%。住房建设投资支出也在持续增长，在1995年，约有64.8万亿卢布用于住房建设投资，占实体经济部门投资总额的26%。虽然与1994年相比，住房建设速度下降了4%，但是私营部门中建设投资则增长了40%。^⑤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1998年的生产投资水平相对于1997年而言下降了10.5%。生产建设项目投资的绝对值减少了大约130亿卢布，

① *Russian Economy in 2013:Trends and Outlooks*, Gaidar Institute for Economic Policy, Gaidar Institute, 2014.

② http://www.gks.ru/bgd/regl/b15_06/IssWWW.exe/Stg/d06/14-01.doc

③ <http://www.iep.ru/files/RePEc/gai/recdev/583Izryadnova.pdf>

④ *Russian Economy in 2014:Trends and Outlooks*, Gaidar Institute for Economic Policy, Gaidar Institute, 2015.

⑤ *Russian Economy in 1995:Trends and Outlooks*, Gaidar Institute for Economic Policy, Gaidar Institute, 1996.

为 2501 亿卢布。同时，建筑安装工程的价格增长了 9.7%，机械设备的价格增长了 20.7%。伴随着生产项目投资水平的下降，非生产项目投资水平则出现了增长。1997 年的非生产项目投资支出比例为 35.5%，而 1998 年这一投资支出比例上升至 37.8%，其投资额为 1523 亿卢布。^①固定资产投资结构调整具体如表 1 所示。

表 1 俄罗斯固定资产（资本）投资结构：1992-1998 年

	1992	1993	1994	1995	1996	1997	1998
固定资本投资总额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工业	40.9	36.3	30.3	34.4	34.8	36.4	39.9
农村经济	10.8	7.3	4.7	3.5	2.9	2.5	3.4
建筑	2.7	2.4	3.3	2.5	2.5	4.0	3.3
交通与通信	8.8	11.0	12.8	14.6	15.8	18.0	18.1
贸易	1.3	1.1	1.8	2.0	2.2	2.2	2.0
住宅建设	21.7	23.1	23.7	22.8	20.7	18.5	16.2

数据来自 *Russian Economy in 1995-1998: Trends and Outlooks*, Gaidar Institute for Economic Policy, Gaidar Institute 1996-1999. 由作者整理。

虽然对某些产业的投资有所增加，但是对更多产业而言，投资明显减少，特别是在生产领域。因此，总体来看，在投资量减少的情况下，必然有大量投资从生产领域转向非生产领域，也有大量固定资产投资转向流动性资产投资。这在事实上导致了包含第一、第二产业的萎缩，以及第三产业没有明显的增长。即，没有任何生产性部门、企业（产业）明显增加投资（某些金融工业集团除外）。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融资产在金融领域和工业行业中分配不均，十几家大型银行拥有相对富余的资金，并将大量资金投入资本市场。例如，由于外债市场当时盈利率很高，因此，银行将大部分资金都进行了外债投机活动。而急需资本投资的工业企业则资金匮乏，甚至连流动资金都成问题，这正是在此期间俄罗斯经济衰退的原因所在。

1999 年至 2008 年是几乎所有产业的投资活动都处于比较活跃的时期。其中在 2000 年至 2007 年，交通、通信和贸易的投资份额增长了 3%，为国

^① *Russian Economy in 1998: Trends and Outlooks*, Gaidar Institute for Economic Policy, Gaidar Institute, 1999.

定资产投资总额的 25.3%。交通领域的投资增加了近一倍，在 2007 年达到 20.2%。1992 年，通信投资在国民经济投资总额中所占比重不到 0.6%，而在 2007 年则达到 5.3%。^①虽然贸易和交通领域固定资产投资在投资结构中均占有较大比重，但是这一时期更为主要以及明显的是，俄罗斯固定资产投资主要集中在工业领域。而在工业领域方面，投资的最大份额主要为燃料和能源的综合体，即石油和天然气行业。同时原材料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份额也占较大比重，这些行业的很多企业都以金融工业集团的形式存在。这一时期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的调整具体如表 2 所示。

表 2 俄罗斯固定资产投资结构：2000-2007 年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6*	2007*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100
农林业	3.0	4.0	4.6	4.1	4.1	3.9	4.9	4.0	4.3
工业	40.4	40.4	38.6	38.2	38.7	37.1	37.2	40.7	41.7
矿业开采	18.1	19.0	16.9	16.0	15.4	13.9	15.3	17.0	17.3
加工业	16.3	15.9	15.9	15.6	16.4	16.4	15.8	16.1	15.7
电力、燃气与水	6.0	5.5	5.8	6.6	6.9	6.8	6.1	7.6	8.7
建筑	6.4	5.2	5.4	4.9	3.5	3.6	3.5	3.6	2.4
交通	18.5	19.2	15.1	17.5	17.3	19.1	18.8	20.2	20.2
通信	2.7	3.0	3.4	4.8	5.4	5.4	4.7	5.3	5.1
金融活动	0.8	0.8	1.0	1.2	1.4	1.4	1.2	1.1	1.4
房地产租赁	15.2	14.7	18.1	17.7	17.3	16.8	16.4	12.0	12.0
教育	1.5	1.5	2.0	1.6	1.7	1.6	1.6	2.2	2.3
政府、社会安全	1.3	1.5	1.5	1.4	1.8	1.9	2.2	2.1	2.0
医疗保健	2.6	2.4	2.0	2.0	2.5	2.6	2.7	2.7	2.6
公共事业	3.9	3.5	3.8	2.6	2.4	2.5	2.9	2.8	2.7

数据来自 *Russian Economy in 2000-2007:Trends and Outlooks*, Gaidar Institute for Economic Policy, Gaidar Institute 2001-2008. 由作者整理。

*表示不包括小型企业和非正规企业的数据

虽然各种行业的投资都获得了实质性的增长，但是能源、原材料相关的行业凭借着相对更高的投资回报率获得了更多的投资，特别是固定资产投

^① *Russian Economy in 2007:Trends and Outlooks*, Gaidar Institute for Economic Policy, Gaidar Institute, 2008.

资，从而累积了大量固定资本，取得了更快、更大的增长。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产业结构对经济增长存在影响，实证结果表明，在细分行业当中，能源行业对国内生产总值（GDP）的贡献高于其他行业。^①由此可见，能源行业的增长对这一时期国民生产总值（GDP）的增长起着主导作用。

表 3 俄罗斯固定资产投资结构：2012-2015 年

	2012	2013	2014	2015
固定资产投资总额	100	100	100	100
农林业	3.4	3.4	3.4	3.7
渔业	0.1	0.1	0.1	0.1
工业	51.1	51.3	52.6	51.6
其中，矿业开采	22.3	22.7	23.4	23.4
加工业	17.8	18.2	19.2	19.9
电力、燃气与水	11.0	10.4	10.0	8.3
建筑	2.3	2.1	2.1	1.6
批发与零售贸易	1.9	2.8	2.8	2.7
酒店业	0.3	0.8	1.0	0.4
交通与通信	25.3	21.2	20.2	20.2
铁路运输	4.2	4.1	2.9	3.0
管道运输	10.0	6.7	7.3	6.7
通讯	3.4	3.4	3.3	3.3
金融	1.6	2.1	1.4	1.4
房地产	6.9	8.7	10.4	9.8
政府管理	1.4	1.4	1.0	1.1
教育	1.5	1.4	1.4	1.6
医疗与社会服务	1.7	1.7	1.1	1.1

数据来自 *Russian Economy in 2012-2015:Trends and Outlooks*, Gaidar Institute for Economic Policy, Gaidar Institute 2013-2016. 由作者整理。

2015 年为 1-7 月份数据

2009 年俄罗斯经济触底后，从 2010 年至 2012 年，总投资的恢复增长使各个产业的投资都有所增长，而固定资产投资仍然主要集中在工业领域，特别是能源相关产业。短暂恢复增长之后，从 2013 年至 2015 年，各个行业的固定资产（资本）投资开始萎缩。大中型企业部门固定资本投资下降了

^① 郭晓琼：“俄罗斯产业结构与经济增长的互动关系研究”，《俄罗斯研究》，2011 年第 3 期，第 119-134 页。

5.6%。除此之外，在制造业，2013年固定资产投资保持在4.2%，低于危机前的水平；炼油，化工行业和生产车辆占制造业投资需求的一半左右。同样在2013年，进口机械、设备与车辆在机械、设备和车辆投资总额的相对比例为16.1%。^①而在2014至2015年，工业、特别是能源相关行业（包括能源开采）占固定资本投资高比重的趋势仍然没有发生改变。另外，相对于固定资产投资的变动趋势，近年来进口投资的增长仍然继续，这说明用于国内生产的资本产品的投资仍然没有能够得到充分满足。这一时期固定资产投资结构的调整具体如表3所示。

能源相关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在恢复增长后，受到石油价格持续下跌的影响，固定资产投资逐渐减少，而欧美对俄罗斯的经济制裁则使固定资产投资的减少更加严重。受到这一因素影响，能源相关行业在短暂恢复增长之后，增长速度逐渐趋缓直至萎缩。

以上分析表明，俄罗斯经济转轨以来，固定资产投资所带来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量及其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GDP）及其增长率明显正相关。这一点，通过比对比图1、图2与图3、图4可以看得非常清楚。可见，固定资产投资是影响俄罗斯实体经济增长（衰退）的首要因素。更为重要的是，固定资产投资首先与产业相连接，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与减少首先带来了能源相关行业的增长与衰退，然后能源相关行业的增长与衰退则决定了整体经济的走势。

^① *Russian Economy in 2013: Trends and Outlooks*, Gaidar Institute for Economic Policy, Gaidar Institute 201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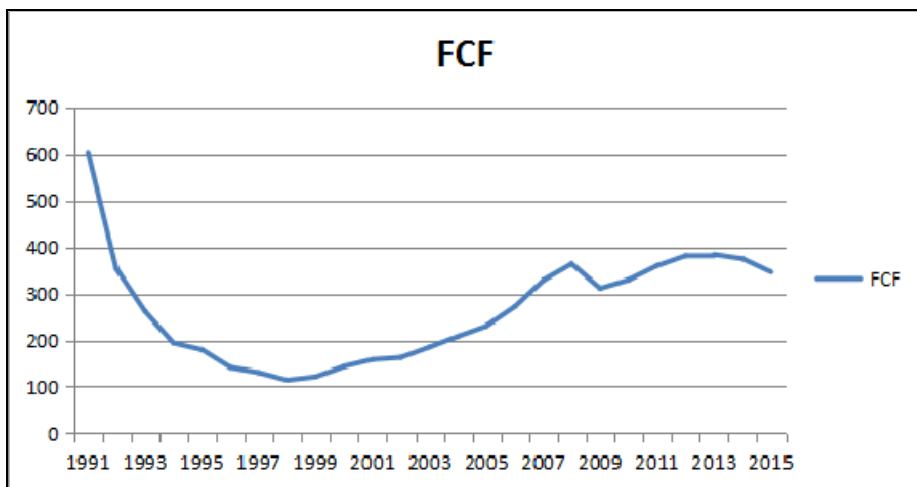


图 1 固定资本形成 (FCF) 总量指标的变化趋势 (1991-2015 年)

注：作者计算，FCF 为总量指标，以 2010 年不变价格美元衡量，单位为十亿，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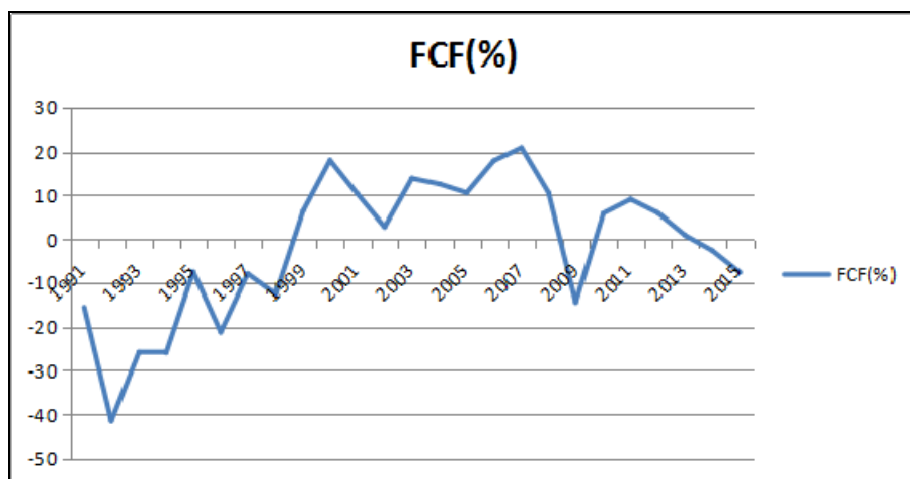


图 2 固定资本形成 (FCF) 增长率的变化趋势 (1991-2015 年)

注：作者计算，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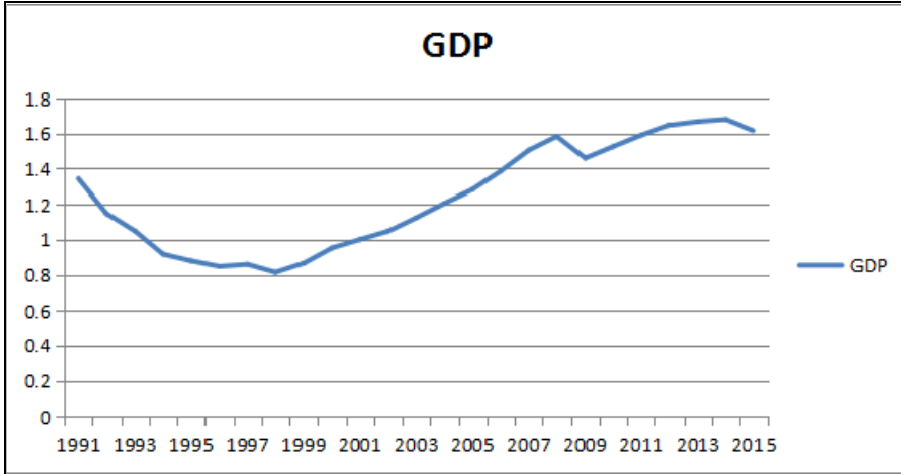


图3 GDP总量指标的变化趋势（1991-2015年）

注：作者计算，GDP为总量指标，以2010年不变价格美元衡量，单位为万亿，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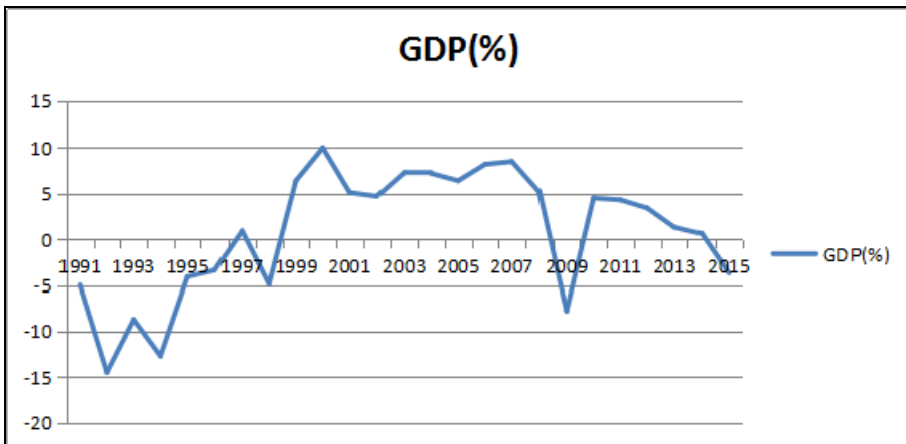


图4 GDP增长率的变化趋势（1991-2015年）

注：作者计算，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三、固定资产投资对外资的依赖

从表面上看，俄罗斯企业的融资结构并不单一，其融资主要来源于五个方面：第一，企业的自有资金。这一资金来源从经济转轨初期存在至今，虽然其在投资总额中所占比例总体呈下降趋势，但是这一融资方式一直都是固定资产（资本）投资的重要方式之一。第二，预算资金。主要包括联邦预算资金、联邦主体及地方预算资金等，其总额一直都占固定资产投资的很大比例。第三，银行贷款。特别是 2000 年以来，俄罗斯银行贷款迅速扩张，而银行资金流向最多的是企业，俄罗斯银行对企业贷款在银行业总贷款中所占的比重一直呈稳步增长趋势。第四，预算外资金。长期以来，预算外资金同样是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所需资金的主要来源之一。第五，国外资金。从 1992 年至今，国外资金一直为企业固定资产（资本）投资提供融资。截至 2007 年底，在累积外资总额中占比重最大的是有偿投资（国际金融机构贷款、商业贷款等），占 50.2%；外商直接投资（FDI）占比 46.7%；有价证券投资占比 3.1%。^①此外，还有一些大型企业从国际资本市场直接融资。国外资金主要集中在能源、冶金、机器制造、有色金属等领域，这让国外资金获取了大量的自然资源。

表面上看，外资只是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所需资金的一部分，但事实上，转轨至今，外资、特别是来自欧美的外资，是决定能源相关行业增长与否以及整体经济走势的固定资产投资的主要融资来源。

（一）银行贷款和预算资金等国内资金在转轨初期都不能为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提供所需资金

从 1992 年至 1998 年，俄罗斯国内的很多资金持有者为规避本国存在的各种风险，纷纷选择持有各种外国资产，包括金融资产，这就造成大量的资本外流。俄罗斯央行相关资料显示，在这一时期，从俄罗斯流出的资本总额大概为 500 亿至 800 亿美元，也有机构估计这一数字应该为 1500 亿至 3000

^① 郑雪平：“试析国际资本对俄罗斯投资的国家风险”，《西伯利亚研究》，2008 年第 6 期，第 37-41 页。

亿美元。这些外流资本大部分用于非生产性目的：或投向不动产，或存入外国银行，这意味着，国内资金不可能成为产业投资所需的主要融资来源。同时，政府因为财政赤字也没有办法给很多国有企业及公共产品进行投资，而为弥补政府的财政赤字，也带来其他消极影响。一方面，政府希望通过增加税收收入弥补财政赤字，而税收增加则加重了企业的负担，税赋合计达利润的70%以上^①，使得企业无力进行积累，增加生产投资。另一方面，政府为弥补财政赤字而发行国债，这使得银行等金融机构沦为政府开支所需资金的重要来源，这无疑对企业从银行等金融机构贷款产生“挤出”效应。加上通货膨胀导致储蓄实际利率为负，这在很大程度上减少了居民储蓄，因而减少了银行可贷资金的来源。在这些因素的共同作用下，企业的再生产投资严重缺乏。

在这一期间，投资获得良好表现的金融工业集团的融资也并非来自商业银行。一些学者认为，金融工业集团由于拥有大型的、专业化的商业银行或金融机构，在政府规定的范围内，它可以发行在国内外市场均可流通的期票和债券，再加上收入不纳税，有利于吸纳国内外的社会资金和加速资金的流转。这些都使金融工业集团与整体经济或是独立企业相比，投资规模会更大。但是事实上这种规模是有限的。这是因为，由于工业企业中严重的内部人控制问题，大银行在无法控制企业的情况下不会贸然向企业投资。^②表4体现了金融工业集团中的银行对企业的贷款比重，可以看出，即便是一些大银行，对集团内部企业的贷款额也不是很高。在这种约束条件下，从1995年开始，一些大型金融工业集团开始进入国际资本市场融资。例如，“威姆贝尔”和“太阳啤酒”（SUNBrewing）通过首次公开募股（IPO）筹集1.5亿美元。随后在1997年至1998年之间，一些大型银行、能源公司和电力公司等多次发行欧洲债券，筹集了投资所需的大量资金。

① *Russian Economy in 1995: Trends and Outlooks*, Gaidar Institute for Economic Policy, Gaidar Institute, 1996.

② 钱颖一：“企业的治理结构改革和融资结构改革”，《经济研究》，1995年第1期，第20-29页。俄罗斯在转轨过程中，因为实施了私有化方案，因此内部人获得了企业大量的控制权，而这些内部人大部分都是经理人员。经济学家认为，缺乏外部人士参与的公司治理一般不利于企业健康运转，因为内部人会过多考虑自身利益，而忽略所有者利益，因此内部人控制会出现经营扭曲现象，比如很难替代绩效差的经理人员等。

表 4 金融工业集团中的银行对企业的贷款比重（1999 年 3 月 1 日）^①

银行名称	金融工业集团名称	银行贷款占总资产比例 (%)	对金融工业集团内部企业贷款占银行资产比例 (%)
汽车银行	下城汽车、斯夫亚托罗柯尔	0.596	0.416
奥涅克希姆银行	欧巴罗尼杰勒尼系统	0.385	0.193
石化银行	罗莎克罗保莫	0.19	0.15
下城银行家	下城汽车	0.272	0.17
普里欧对外贸易银行	罗莎·普利姆	0.186	0.128
无线电工业银行	西伯利亚、弗拖尔梅特投资	0.189	0.132
俄罗斯信贷	鲁斯化学、斯夫亚托罗柯尔	0.255	0.048
斯贝尔德勒索兹银行	格拉夫斯列德乌拉尔工厂	0.3	0.22
阿尔法银行	保勒兹斯克亚公司	0.191	0.134
阿尔谢纳尔	专业运输汽车制造	0.078	0
信托投资银行	俄罗斯纺织财团	0.129	0.032
多宁贝斯特银行	多宁贝斯特	0.2247	0.203
黄金-铂工业银行	乌拉尔贵重物资	0.372	0.158
进出口贷款银行	耶勒别鲁斯	0.417	0.006
库兹堡斯工业银行	库兹堡斯	0.365	0.28
兰塔银行	—	0.118	0.047
马波银行	—	0.208	0.174
桥银行	—	0.181	0.167
梅塔尔	塔纳克	0.366	0.181
圣彼得堡银行	罗斯特罗	0.056	0.045
斯别思-阿克罗银行	尼瓦黑土	0.276	0.161
乌拉尔对外商业银行	阿拉米德杰赫	0.341	0.283
库尔斯克工业银行	索柯尔	0.383	0.312
银行系统的平均值	(1999 年 5 月)	0.38	0.26

（二）企业自有资金和预算资金在俄罗斯经济恢复增长时期为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提供所需的资金有限

从 2000 年至 2008 年，高额的税收和高额的储备大量减少了企业的自有资金，因此，自有资金没有成为企业长期投资的主要融资来源（但仍是重要来源。自有资金大部分是由留存利润构成，而利润的创造也是依靠外资）。同时，这一政策也决定了预算资金不可能成为国有企业长期投资的主要融资

^① Авдашева С. Б., Балюкевич В. П., Горбачев А. В., Дементьев В. Е., Паппэ Я. Ш. Анализ роли интегрируемых структур на российских товарных рынках. М.: ТЕИС, 2000. С.172.

来源。在这样的前提条件下，俄罗斯能源企业对外融资逐渐增加，对外资的依赖程度不断加大。从表面上看，这一时期，发展良好的大型能源企业主要通过两条渠道获得融资：第一，辛迪加贷款和欧洲债券借贷；第二，首次公开募股（IPO）。但是，由于这一时期俄罗斯银行业同样获得很多外资贷款，所以能源企业从银行业获取的贷款融资事实上也多是外资。俄罗斯银行业和非金融机构的外债主要来自欧洲市场，而且其增长速度在这一期间逐渐加快，特别是在 2006 年和 2007 年，以及在 2008 年金融危机爆发之前的几个月的时间（见表 5）。其中 2006 年增长了 868 亿美元，2007 年增长了 1513 亿美元，2008 年 1 至 10 月增长了 845 亿美元。截至 2009 年 1 月 1 日，俄罗斯银行业与非金融机构外债累积余额为 4471 亿美元，约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30%，而其中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和俄罗斯石油公司外债合计就占外债总额的 17%。^①

表 5 俄罗斯外债结构（单位：亿美元）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2006	2007	2008
外债总额	1614	1511	1521	1857	2145	2574	3106	4635	5405
国家外债	1303	1135	1043	1057	1056	823	447	464	427
企业外债	311	376	478	800	1089	1742	2659	4172	4978
占 GDP 比重	12.6	11.0	13.5	18.5	18.4	22.9	26.2	28.0	36.0
银行	93	136	142	249	325	1250	1012	1637	1982
非金融性企业	218	240	336	551	764	501	1607	2535	2996
外汇储备	279	366	477	769	1245	1882	3037	3845	4787

注：2008 年数据截至当年 10 月 1 日，外汇储备包括外汇、黄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储备头寸、特别提款权和其他外汇资产

资料来源：俄罗斯央行 2001-2009 年《银行统计通报》，<http://www.cbr.ru/publ/BBS/Bbs>

值得注意一点的是，在这一期间，虽然非金融企业短期外债增长 560%，长期外债增长 116%。看似影响长期投资的长期外债增长并不是很快，但是银行业的长期外债增长 350%，短期外债增长 200%。^②而银行业增长较快的长期外债恰恰是非金融企业进行长期投资的融资来源之一，并且企业长期投

① 王道：“俄罗斯债务问题及中国对俄资本战略”，《俄罗斯研究》，2010 年第 2 期，第 12-26 页。

② 俄罗斯央行 2001-2009 年《银行统计通报》，<http://www.cbr.ru/publ/BBS/Bbs>

资大部分都是固定资产投资，由此可见外资对于非金融企业、特别是能源相关行业固定资产投资的重要作用。

（三）外资的流入与流出（包括本国资金的流出）决定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与减少

俄罗斯银行业与非金融企业对于外债依赖的逐渐增加，终于在 2008 年给俄罗斯带来沉重打击。开始于俄罗斯与格鲁吉亚的冲突而导致的国外资本逃离，导致了一系列负面影响。首先，在交易股票中占据 70% 比例的外资的撤离，使证券市场遭遇大幅度下跌。其次，证券市场的大幅度萎缩使银行业资本外逃，2008 年 8 至 9 月资本外逃 330 亿美元，10 月资本外逃 500 亿美元。^①最后，国外资本撤离及本国资本外逃，使卢布贬值及贬值预期加重，这反过来又加重了总资本的逃离，同时带来储户对存款的挤提。这些综合因素共同导致了 2009 年俄罗斯资本投资的严重不足。

虽然经历过 2008 年的金融危机，但俄罗斯企业仍然没有停止对外资的依赖。2010 年至 2012 年，私营部门的对外融资大幅度增长，其中 2011 年 1 月 1 日的的数据表明，银行业及非金融企业总债务为 4421 亿美元，占俄罗斯总外债的 90.5%。2012 年 1 月 1 日的的数据显示，银行业及非金融企业总债务为 5007 亿美元，占俄罗斯总外债的 91.9%。2013 年 1 月 1 日的的数据显示，银行业及非金融企业总债务为 5680 亿美元，占俄罗斯总外债的 89.9%。^②虽然俄罗斯外债总额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按国际标准衡量尚属合理，但投资总额中外债却占据较大比重。

这一时期俄罗斯对外融资的短暂增长，再一次给俄罗斯带来打击。2013 年，石油价格的逐渐走低使俄罗斯资本外流相比 2012 年增加了 14.8%，总额为 627 亿美元，而 2014 年资本外流总额为 1530 亿美元。俄罗斯中央银行的公告说，2015 年资本外流大幅度减少，但总额仍为 569 亿美元。资本外流虽然减少，但是工业固定资产投资萎缩加剧，这说明外资减少幅度逐步增

① 李新：“俄罗斯经济危机的特点及根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10 年第 2 期，第 18-24 页。

② *The central bank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Annual Report 2010-2012.*

加，并且外资占投资的比重很高，这直接造成了俄罗斯固定资产投资的严重不足。2013年底乌克兰危机爆发后，西方国家开始对俄罗斯进行金融制裁，制裁的主要领域即为俄罗斯银行业与能源行业。俄罗斯的六家银行——莫斯科银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银行、俄罗斯农业银行、俄罗斯储蓄银行、俄罗斯国家开发银行和俄罗斯外贸银行——被列入制裁名单，禁止美国公民为其提供长期融资。对于俄罗斯能源企业的制裁主要是限制或禁止这些企业的融资与项目合作活动，这些企业主要包括俄罗斯石油（Rosneft）、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Gazprom）以及卢克（Lukoil）等大型能源企业。尽管有关研究表明欧美在对俄金融制裁方面存在意见分歧，但是制裁的确导致了俄罗斯银行业与能源行业对外融资的大幅度下滑。截至2015年第三季度，俄罗斯央行数据显示，银行业对外债务总额为1386.03亿美元，较年初减少了19.2%，非银行机构对外债务总额为3399.54亿美元，较年初减少了9.4%。

由以上分析我们注意到，当投资回报率相对较低时，对外融资匮乏，俄罗斯银行业不能获得大量外资，从而为能源企业提供长期投资，能源企业本身也不能从国际资本市场获得融资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因而使得俄罗斯工业、特别是能源行业的固定资本投入不足。相反，当投资回报率相对较高时，对外融资充足，俄罗斯银行业则能够获得大量外资，从而为能源企业提供固定资产投资。能源企业本身也能够从国际资本市场获得融资来进行固定资产投资，因此出现能源行业固定资本投入相对充足，这非常明显地体现出引领长期投资增长的能源行业对于外资的长期依赖。更进一步，我们可以说俄罗斯转轨以来的长期经济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外资决定的。但是，我们同时也注意到，经济转轨历程表明，外资必然是不稳定的，受到经济、政治等方面诸多因素的干扰，这必然会对俄罗斯固定资产投资的稳定性造成影响。而即使对外融资能够得到保证，俄罗斯的固定资产投资仍然不足，这说明，这种对外资依赖的局面的形成必然另有原因。

四、俄罗斯金融功能不足

金融活动的本质是契约，而与契约紧密相连的是与契约相关的法律制度

与执行机制，因此实质上法律制度与执行机制对金融交易活动起着支配作用。与不支持债权人、股票持有者权利或不能有效执行契约的司法体系相比，对投资者权利进行保护以及确保契约能够履行的司法体系会刺激更多金融交易活动的发生，继而促进金融市场发展。^①同时，如果企业债权人的债权请求权和有担保债权的优先权得到充分保护，企业信息披露准确并及时，契约得到有效执行，则金融中介也会得到良好发展。^②总之，完善的相关法律制度以及良好的执行，能够改善金融功能。

一般认为，完善的法律制度能够使贷款人在遭遇借款人违约时具有更多的讨价还价能力，这可以提高贷款人的贷款意愿。而良好的执行可以使贷款人能够在面临违约时以更低的成本诉诸法律，从而使自己免于受到借款人机会主义的侵害，或者当借款人濒临破产时，贷款人诉诸法律使自己占据主动，从而降低自己的损失。^③具体而言，当信息完全对称时，贷款人可以通过扩大贷款息差对风险进行定价。当信息不完全对称时，扩大息差的风险定价方式会由于借款人的道德风险而丧失准确性。因此在现实社会中，贷款人往往通过控制贷款规模以及实施信贷配给来控制风险。而不十分完善的法律制度以及较高的执行成本，不能够保证贷款合同的有效履行，这必然会增加贷款风险，减少贷款收益，从而降低贷款人的贷款意愿以及贷款规模。与此同时，贷款人还通过贷款期限来控制风险。短期贷款需要贷款人经常重新评估贷款计划，这样客观上造成对借款人的不断监督，从而限制了借款人的道德风险以及策略性违约等行为。对于借款人而言，频繁的评估也会降低违约的意愿。在法律制度不十分完善，特别是其执行具有较高成本的情况下，当借款人违约时，如果贷款人不诉诸法律，则其必然蒙受很大的利益损失。而如果其诉诸法律，较高的执行成本，又必然会抵消掉一部分其本来应该获得的利益。

可见，短期贷款中的频繁评估虽然增加了成本，但是其有效地避免了借款人的违约，从而增加了自己的利益。因此，在这种情况下，相对于长期贷

① La Porta, Lopez-de-Silanes, ShleiferVishny, "Law and Financ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1998, Vol.106, No.6, pp.1113-1155.

② R. Levine, "Law, Finance,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1999, Vol.8, No.1-2, pp.8-35.

③ D.W. Diamond, "Presidential Address, Committing to Commit: Short-term Debt When Enforcement Is Costly", *Journal of Finance*, 2004, Vol.59, No.4, pp.1447-1480.

款而言，短期贷款是贷款人与借款人博弈过程中前者控制风险、增加收益的最优策略。对于这一理论，一些研究证明，相对于法律体系运作效率较低的国家，在法律体系运作良好的国家中，企业更容易获得外部融资，而且长期融资的比例更高，期限更长。^①

从历史的角度来看，从债务执行中的债权人保护到破产重整中债权人的保护，俄罗斯实施多元价值目标下的债权人利益保护制度。这种以公共利益优先的债权人保护制度，遭到了债务偿付危机的挑战，债权人对公共利益的让渡演变为对强势利益集团的利益让渡，这使得债权人的利益严重受损。1998年的金融危机使俄罗斯的很多商业银行损失惨重，众多商业银行濒临破产。为了挽救企业以及恢复经济增长，救助的重要法律措施之一就是建立破产重整制度。历经多年，直至2002年10月普京签署了俄罗斯的第三部破产法，破产重整制度才被完整地确定下来。破产重整制度包含两个层次，法庭外重整和法庭内重整。法庭外重整对债权人权利的保护，主要体现在政府对债权人的救助措施上。法庭内重整对债权人权利的保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是调查制度；第二是财务恢复中的担保制度；第三是仲裁管理制度。除此之外，俄罗斯还设置了债权人会议监督、仲裁管理人自律监督、俄罗斯联邦企业重整与破产管理局监督三个层次的监督制度。这些制度都在债权人权利的保护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从表面上来看，破产重整制度对债权人权利的保护做出了很好的设计，但在实践中，债权人权利的行使受到很多限制，俄罗斯的法律根源决定了债权人权利的行使是被动的。^②因此，在俄罗斯现行法律体系下，企业的债权人并未处于强势地位。

与此同时，可以非常清晰地注意到俄罗斯储蓄的变化情况。图5显示，从经济转轨之初的1992年到1998年，国内总储蓄（GDS）呈下降趋势；从1999年至2008年，总储蓄呈大幅上升趋势；经过2009年的短暂下跌之后又重新开始上升；从2013年至今，又呈下降趋势。虽然从俄罗斯转轨至今，国内总储蓄经过较大的三次波动，但整体上却呈显著增加的趋势。

① Asli Demirgüç-Kunt, V. Maskimovic, “Law, Finance, and Firm Growth”, *Journal of Finance*, 1998, Vol.53, No.6, pp.2107-2137.

② 禹芳：《俄罗斯破产重整中债权人利益保护法律制度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中国政法大学，2009年，第85-93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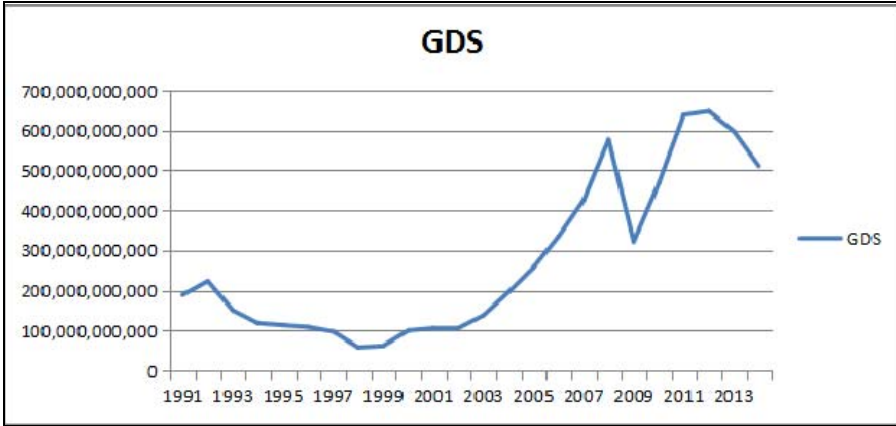


图5 GDS的变化趋势（1991-2014年）

注：作者计算，GDS为国内总储蓄，以现价美元衡量，单位为元，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而图6也显示，尽管国内总储蓄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比重（GDS/GDP）存在多次波动，但是整体上较为稳定，说明国内总储蓄随着国民生产总值的提高而增加。以上两点充分表明，国内总储蓄整体上呈上升趋势。但是在上述所分析的俄罗斯企业债权人权利没有得到充分保护的前提下，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自有资金一直是俄罗斯企业投资的重要来源（而前述分析表明自有资金也来源于外资）。特别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有数据表明，外资控制银行和国家控制银行显示出最高的长期贷款占资产的比重，分别为5.71%和4.76%。中小规模银行在长期贷款上的作用是可以忽略的，它们的长期贷款累积市场份额仅为1.53%。^①这不但表明了银行业整体贷款的规模较小，更表明了大多数银行比较倾向于短期贷款。但是企业进行固定资产投资真正所需要的却是长期投资，或者说企业进行生产经营活动的固定资产投资等同于长期投资。所以国内总储蓄的增加以及总投资的不足，特别是长期投资的有限，表明俄罗斯银行业的中介功能（金融功能）不足，未能将本国收入转化为投资，特别是长期投资，即固定资产投资，从而形成固

^① L.Chernykh, AK.Theodossiou, “Determinants of Bank Long-term Lending Behavior: Evidence from Russia”, *Multinational Finance Journal*, 2011, Vol.15, No.3/4, pp.193-216.

定资本积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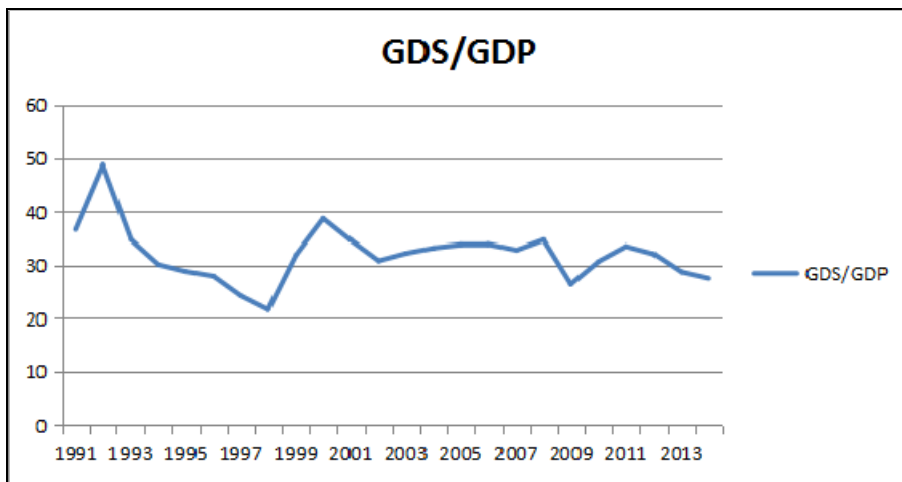


图6 GDS占GDP的变化趋势（1991-2014年）

注：作者计算，数据来自世界银行数据库

五、结论与启示

投资是拉动实体经济增长的首要因素。维持投资、特别是维持固定资产投资或长期投资的稳定，对一个经济体的经济稳定增长至关重要。俄罗斯经济转轨以来，长期投资所带来的固定资本形成总额及其增长率，与国内生产总值及其增长率显著正相关。具体而言：从1992年至1998年，转轨初期实体投资大幅度减少，从而导致包含第一、第二产业的萎缩，以及第三产业没有明显的增长，即没有任何部门、企业（产业）明显增加投资，从而拉动经济增长，这是俄罗斯经济衰退的一个直接原因。从1999年至2008年，由于能源与原材料产业（企业）的投资、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快速增长，使得与能源相关的行业获得大幅度增长，从而拉动了俄罗斯经济的快速增长。更为明显的是，2002年投资增长率下降，经济增长率也随之下降。2003年1至5月，固定资产投资率又明显上升，与上一年同期相比，其带动国内生产总值增长了

7%。而从2009年至2011年，能源行业的好转又带来了大量投资，从而拉动2008年危机之后经济的恢复增长。2012年至今，能源行业投资严重萎缩、特别是固定资产投资严重不足，导致了目前俄罗斯经济的增长趋于停滞。由此可见，整体经济走势是受到能源相关行业的增长与衰退的绝对影响的，而能源相关行业的增长与否，则是由投入这些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的增加与否所决定的。如果能源相关行业具有较高的投资回报率，则其能够获得较多的长期贷款进行固定资产投资，逐渐累积固定资本，从而获得增长，进而带动整体经济增长。相反，当能源相关行业投资回报率较低时，则会由于缺少长期贷款进行固定资产投资而萎缩，从而使整体经济增长下滑。

金融机构和市场的作用，就是为企业固定资产投资提供长期贷款，或者说，金融体系为企业提供长期投资。但是金融机构和市场需要满足一些条件才会对企业进行长期投资。虽然相关研究显示俄罗斯的金融规模逐渐扩大，金融体系的稳定性逐渐增强，但是与金融交易相关的法律制度不够完善，以及由此带来的在实践中没有对企业债权人权利的充分保护，则严重影响了金融功能的发挥。转轨以来，虽然储蓄总体呈增加趋势，而且银行对企业的贷款也逐渐呈增加趋势，但是银行将这些储蓄大多转化为短期投资，即为企业提供了流动性需求，而没有过多转化为长期投资。即，没能帮助企业进行更多的固定资产投资，从而无法满足企业的固定资本积累需求。这使得能源相关行业的长期投资，只能更多依赖于内部留存收益。但事实上，企业自身利润的获取也是源于对外资的依赖。所以，俄罗斯经济的增长与衰退主要是由外资所决定的。由于受到很多政治、经济因素干扰，外资的不稳定必然导致俄罗斯经济增长的不稳定，欧美的金融制裁对此体现得非常明显。

不可否认，在石油价格持续走低以及欧美金融制裁的背景下，俄罗斯经济必然仍要经历相当一段时间的困难时期。但是，这对于强化与发展俄罗斯金融功能以及改变产业结构而言，同样也是转机。首先，在不存在外资诱惑与侵占条件下，俄罗斯可以拓宽企业融资渠道，改善政府相应的财政政策，强化银行业的金融中介功能，以及金融市场的资源配置功能，向更多的企业提供贷款，特别是增加长期贷款的比重。其次，在国家发展战略层面上，为按照计划实现《2020年前俄罗斯联邦创新发展战略》所设定的目标，金融

体系需要为更多的中小企业、特别是为中小企业的创新活动提供更多的资金支持。尤其是要为其提供长期资金支持，使其获得持续增长，从而改变能源相关产业对长期投资的垄断，进而使俄罗斯各个产业获得较为均衡的发展，转变依靠能源的单一增长方式，改善产业结构，扭转目前经济增长不断萎缩的局面。

【Abstract】 The financial system turns idle funds into investment and that in fixed assets in particular, thus promoting economic growth, which is the key to market economy. Russia has been transforming from planned economy to market economy. Its nature and initial intent is to allocate resources, especially financial resources, by market rather than government so as to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resource allocation. Since its transition, although fixed asset investment (capital formation) has facilitated the growth of industries, particularly those energy-related industries, and thus boosted the overall economic growth, yet foreign funds is the main source of this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The reason is that during the transition Russia's laws and institutions are imperfect and badly implemented. As a result, there exists Nash equilibrium between borrowers and lenders, while the optimal strategy of lenders it to provide short-term loans. In other words, defects in Russian financial functions, caused by lack of laws in protecting lenders and its poor execution, haven't managed to turn its national income into long-term investment, that is,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for production. Consequently, Russian investment in fixed assets or its long-term investment depends too much on foreign funds, which leads to Russia's current economic difficulties.

【Key Words】 Russian Finance, Russian Transition, Russian Investment, Russian Economic Growth

【Аннотация】 Финансовая система превращает свободные средства в инвестиции, в частности, в инвестиции в основной капитал, и,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стимулирует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рост, что является ключом к

рыночной экономике. Сущность перехода России от план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к рыночной состоит в надежде на то, что рынок, а н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будет отвечать за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е ресурсов (особенно финансовых ресурсов), с целью повышения эффективности их распределения. Со времени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хотя инвестиции в основной капитал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капитала) и стимулируют развитие и рост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особенно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связанной с энергетикой, тем самым повышая общи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рост, однако основным источником инвестиций в основной капитал являются иностранные инвестиции. Э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из-за несовершен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правовой системы и её реализации в процессе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й, в игре между заёмщиком и кредитором наблюдается равновесие Нэша, и оптимальная стратегия кредитора заключается в предоставлении краткосрочных кредитов. Иными словами, проблемы в правовой охране и защите кредиторов привели к низким финансовым возможностям России, стране не удалось перевест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доход в долгосрочные инвестиции, не удалось перевести их в основной капитал, необходимый для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и эксплуатации предприятиями, что привело к постоянному накоплению основного капитала и чрезмерной зависимости от иностранного капитала в сфере инвестиций в основной капитал и долгосрочных инвестиций, и в результате это привело к сегодняшни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м трудностям в Росси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Финансы России, трансформации в России, российские инвестици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й рост в России

(责任编辑 张昕)

试论俄罗斯央地关系治理 的非常规工具选择——能源治理*

宋博**

【内容提要】俄罗斯治理央地关系的效果一直遭到质疑,作为世界上领土面积最大和联邦主体最多的国家,它没有像中国那样实现地方经济活力的释放和地方多样化发展的格局。俄罗斯形成了一种“国家能力维护型联邦主义”:在政治上承认宪法保障的地方分权事实,同时却寻求利用多样化的治理工具实现对地方的权力控制。因此,俄罗斯的央地关系长期受到地方独立倾向的挑战并威胁国家的稳定与发展,其主要原因是俄罗斯治理央地关系面临常规工具选择的困局:在联邦宪政体制背景下,中央政府只能依据宪法规定的权力清单来规制地方政府;苏共的全面解体导致地方行政资源更多地集中到地方精英手中;中央政府秉承的不干预为主的自由主义经济理念,坐视刚性的联邦财税制度和混乱的“联邦—地方”协议体系完全破坏其财税杠杆工具。为了突破以上困局,俄罗斯中央政府基于其地方当局依赖能源产业的现实,选择能源治理作为非常规的央地关系治理工具,从国家能源重点资产的控制权着手,配合限制地方油气出口能力的高税负和管道配额歧视政策,以国家油气公司为主要平台,实现了中央对地方的有效规制,并通过法律巩固利用能源工具治理央地关系的成果。

【关键词】俄罗斯中央与地方关系 俄罗斯能源治理 俄罗斯政府

【中图分类号】 D851.2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16)05-0150(29)

* 感谢匿名审稿人的宝贵意见,文章的不足由作者负责。

** 宋博,中国人民大学国家与发展战略研究院博士后。

治理央地关系，尤其是如何破解既要保持中央政府有效管制又要激发地方活力的“两难”格局，是俄罗斯和中国等发展中国家面对的重要国家治理难题。^①中国经济发展取得了瞩目的成就，其中最大的特点便是改革开放以后地方活力的增强。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一直坚持向地方放权为导向的央地制度改革，触发了地方发展经济的动力，直至今日在中国经济中地方政府的经济行动已经构成单独的影响要素。相反，同样试图进行地方分权的俄罗斯在地方层面却遭遇了腐败丛生、经济发展几近停滞的问题。^②近 20 年来，与中国相比，俄罗斯设立的国家级开发区数量并不少，且自 90 年代起就编制地区发展规划。从宪政体制来看，中国是单一制国家，实行社会主义民主集中制度，而俄罗斯从宪法层面保障地方充分自治，地方在立法方面的空间远大于中国。但从实践效果看，中国形成了诸如长三角和珠三角这样发达的地方经济区域，而俄罗斯的地方经济发展却并不显著。在这种分析框架下比较中俄两国的央地治理，似乎可以得出结论，即俄罗斯的央地治理可能遭遇失败。

实际上这种分析框架暗含了一个重要标准，即中国在国家发展中始终坚持把经济发展作为评估国家发展的最重要指标。这种央地关系分析框架主要以财政联邦主义为基础^③，在冷战结束后根据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经济飞速发展的情况而迅速得到系统阐释。中外学者一般利用该理论将中国的央地关系概括为“政治集权和经济分权”的市场维护型联邦主义模式。^④在这种模式下，地方政府划分为若干有效的经济行动单元充分参与到市场竞争中，而中央政府的政治集权（Centralization）则成为地方政府在经济领域展开竞争的

① 吴国光、郑永年：《论中央—地方关系：中国制度转型中的一个轴心问题》，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 1995 年版，第 3 页。

② “Federalism With and Without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China Versus Russia”, IMF Staff Papers, 2001, Vol.48, Special Issue

③ 华莱士·奥茨：《财政联邦主义》，陆符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2 年，中文版序。

④ Barry R. Weingast, “The Economic Role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Market-Preserving Federalism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Journal of Law, Economics and Organization*, 1995, Vol.11, Issue1, pp.1-31; Qian Yingyi, Barry R. Weingast, “Federalism as a Commitment to Preserving Market Incentiv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1997, Vol.11, No.4, pp.83-92.

最终制度保障。这种模式有效地解释了中国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但其暗含了前提假设：经济发展是国家发展的首要目标，这与中国改革开放初期所确立的国家发展目标完全一致。因此，中国的央地治理在以经济发展为主要评估指标的分析框架中很容易被视作成功的治理案例。

相反，俄罗斯处理央地关系是基于另外一种评估标准，它被设定为恢复和扩张国家能力（State Capacity）。这是因为苏联解体的冲击浪潮严重破坏了其原有的苏联式全能主义国家（Totalism）^①治理模式：俄罗斯从政治上由苏共主导的“政党型国家”^②，经济和社会文化生活方面分别由中央计划经济体制和党管意识形态负责的全面治理模式^③，迅速走向国家机制的熔化、国家制度保障方面的封建化^④、国家公共权力的私有化^⑤等三种国家功能弱化的趋势，俄罗斯面临成为孱弱或失败国家（Weak or failed states）的风险。俄罗斯需要进行国家重建，在国家重建理论中，国家能力体现了国家追求自身决策目标的限度^⑥，抑或政府掌控公民组织和地方社会的穿透能力。^⑦它与国家的基本架构或公民社会发育程度有关，是一个限定性的客观指标，很难通过政府的主观决策予以改善。^⑧但是俄罗斯社会内部以历史使命性构建的政治文化，却将俄罗斯的国家能力能否在某任政府中得以提升或保持视为重要的指标。这意味着，形式化的国家制度建设并不是俄罗斯国家重建的终

① 美国学者查尔斯·林德布洛姆对于全能主义国家治理模式进行了简练的概况，见查尔斯·林德布洛姆：《政治与市场——世界的政治经济制度》，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51页。

② 玛丽亚·乔纳蒂：《转型：透视匈牙利政党-国家体制》，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页。

③ 张慧君：《俄罗斯转型进程中的国家治理模式演进》，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09年，第98-104页。

④ Charles H. Fairbanks, Jr., “The Feudalization of the State”, *Journal of Democracy*, 1999, Vol.10, No.2, pp.47-53.

⑤ 有关俄罗斯的国家机构如何蜕变为俄罗斯私有化进程中既得利益者“势力范围”的论述可以见 Vadim Volkov, *Violent Entrepreneurs: The Use of Force in the Making of Russian Capitalism*, New York: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2, p.97.

⑥ Mann Michal,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Archives Européennes de Sociologie*, 1984, Vol.25, Issue 2.

⑦ Joshua B Forrest, “The Quest for State ‘Hardness’ in Africa”, *Comparative Politics*, July 1988, Vol.20, No.4.

⑧ Brian D. Taylor, *State Building in Putin’s Russia: Policing and Coercion after Communis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1, p.34.

极目标，扩张国家能力——政府对地域和社会的影响能力才是其国家重建的主要任务。因此，俄罗斯的央地治理的政策重心并非发展国家经济，而是维护和重新扩张其国家能力。具体到央地关系上，由于俄罗斯在苏联解体以后在历史上第一次实行了联邦制，这种从宪政基础上保护地方自治的央地关系，与俄罗斯习惯的集权型管理逻辑，发生了严重冲突，中央面对地方分权始终缺乏政治上的安全感。^①因此俄政府认为，在这种国家机制下治理这个领土面积广袤、境内民族众多的国家是孱弱无力的，有必要加强中央政府对地方的控制能力。在这种逻辑导向下，俄罗斯在央地治理过程中实际上构建了一个“国家能力维护型”的联邦主义模式。这种模式的核心是实施“政治分权和经济集权”，即中央政府在政治上承认宪法保障的地方分权事实，但同时却通过多样化的经济治理工具，重新寻求对地方权力的控制。

一、叶利钦时期的俄罗斯央地关系互动

这一时期的主要特点是中央政府的政治失能与地方权力的无序扩张。独立后的俄罗斯确立的是联邦主义路径：俄罗斯解散了高度集权的苏联共产党，在中央确立了议会民主体制，在地方确立了以地方直选为基础的自治体制。俄罗斯政治制度的设计者希望从列宁式的民族区域自治全面转型为以公民权利平等为核心的宪政体制，以全面解决苏联时期因中央管控严苛而导致地方发展动力的缺乏。可惜的是，西方意义上标准的联邦体制，在俄罗斯却形成了另一条发展路径，俄罗斯的央地关系非但没有缓解反而日趋紧张，成为俄罗斯政治体制的最大威胁。

俄罗斯独立伊始，社会精英的主流共识是全面否定苏联的政治经济制度，也包括苏联高度集权的、以行政命令为主的央地管理体制。独立后的俄罗斯很快确立了地方自治的原则，但是此后发生的**宪政危机**和**总统连任竞争**，却导致俄罗斯的地方自治原则被无限度地放大，央地关系处于失衡状态。

^① Quintin H. Beazer, “Political Centralization and Economic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Russia”, *The Journal of Politics*, 2015, Vol.77, No.1, pp.128-145.

（一）宪政危机

1991年“8·19事件”导致了苏联共产党的迅速崩溃，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顺利地夺取了国家领导权。此时俄罗斯的宪政建构尚处于进程中，“民主派”此前将精力主要用于与苏共争夺政权，并未妥善设计国家权力的顶层架构。因此在独立伊始，俄罗斯的主要国家权力机构的宪政存续依据，依然来源于苏联时代制定的法规制度。^①而为了确保己方政治力量在未来的新俄罗斯宪政制度中占据优势地位，“民主派”迅速发生分裂，形成了以叶利钦为核心、基于行政力量的“总统派”和以议会领导人哈斯布拉托夫等人核心、基于立法机构——人民代表大会的“议会派”。两派围绕制定新宪法展开了激烈的政治对抗。在这个过程中，地方当局的支持成为斗争双方亟须争取的重要砝码。为了得到地方领导人的支持，总统不得不同他们周旋，向他们讨好；而议会派也在采取同样的策略。^②

（二）总统连任竞争

1993年9月危机后，俄罗斯终于确立了以超级总统制为核心的宪政制度。俄国内的主要政治力量开始将重点转向争夺总统职位上，即1996年6月独立后的俄罗斯第一次依据新宪法和选举法进行的总统选举。而之前在1993年和1995年举行的俄罗斯杜马选举中，叶利钦政权不断遭受失败。以俄罗斯共产党为首的左派，迅速在议会层面压制了政府支持的右派。总统选情的悲观趋势，迫使叶利钦政府再度寻求地方实力派的支持。

本来，叶利钦政府在1993年夺取国家宪政主导权后，即开始着手收紧中央散失到地方上的权力，不仅取消了宪法中关于自治共和国主权的认可，还积极制定了以促进市政自治为核心的地方自治法典，削弱地方联邦主体的

① 其中总统的权力依据1987年制定的、在解体前夕补充修订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第121条的规定和1991年4月24日制定的《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选举法》以及《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总统法》，而立法机关——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的权力基于原苏联宪法、《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宪法》、以及1988年最高苏维埃制定的《苏联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的规定。

② 格·萨塔罗夫：《叶利钦时代》，高增训译，北京：东方出版社，2002年，第315页。

集权。^①在 1995 年底，叶利钦的内阁班底还起草了全面恢复地方领导人委任制的法案。^②但是，上述政策努力均因为 1996 年选战的白热化而出现严重倒退。因为杜马选举的惨败，叶利钦团队发现其严重缺乏基层政治动员能力，根本无法应对总统大选。因此，掌握大量政治和经济资源的地方当局，再次成为叶利钦政府的争取对象。虽然出台了多项限制地方政府权力的法律，但是中央政府却主动放弃了对地方政府的司法行动，使得这些法律几乎成为一纸空文。叶利钦也放弃了与一些地方领导人在职务任免权限方面的纠缠，改为与这些领导人达成私人性质的“默契”。即，地方政府表面上承认中央政府的任免权，而叶利钦则不空降任何官员到这些地方以打乱地方实权派的人事安排。叶利钦依靠寡头和地方实力派的支持，勉强夺取了 1996 年总统选举的胜利，但中央政府对地方当局的规制能力则更加倒退。

二、叶利钦时期暴露的央地治理难题——常规治理工具的匮乏

按照传统的国家治理理论，联邦政府治理央地关系主要依赖三类工具：立法及法律工具、行政管理工具，以及经济和财税工具。但是独立后的俄罗斯叶利钦政府，却严重缺乏这些治理央地关系的常规工具：

（一）立法及法律工具困局

在西方成熟的宪政国家，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立法和选举进行监督，是构建国家有效治理的重要工具。但是 1990 年开始的苏联政局动荡，导致俄罗斯境内很多较有实力的地方政府，趁机发表主权宣言或者自治宣言，并据此进行地方行政首长的选举。到 1993 年底，自发组织的行政首长选举，已经蔓延到俄罗斯的大部分自治共和国和一半以上的边疆区。^③由于当时的宪法中并未规定联邦主体行政首长的产生方式，地方当局对推动行政首长选举产生有很大的动力。叶利钦政府一直坚持遏制联邦主体自行选举行政首长的趋

① 1995 年的《关于地方自治组织一般原则法》

② 格·萨塔罗夫：《叶利钦时代》，第 482 页。

③ Cameron Ross, “Federalism and democratization in Russia”,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2000, Vol.33, pp.403-420.

势。他通过颁布法律（1994年的《俄罗斯地方行政长官条例》）、推动亲政府人员参选和直接委任或撤销地方行政长官职务等方式，努力保持大部分联邦主体领导人经由中央政府支持才得以上台的态势。然而到1996年，俄罗斯总统大选竞争趋于白热化，叶利钦亟须寻求地方实力派在其总统连任问题上给予支持。因此从1995年底开始，叶利钦政府对联邦主体的选举不再持一味打压的态度，而是允许亲政府的地区可以尽快举行选举。而独立意愿较强的地区在提出给予叶利钦支持的承诺后，便可以先与中央政府签署分权条约，在俄罗斯总统选举结束后可举行选举。为了表示支持地方实力派的诚意，叶利钦还否决了《关于选举的社会监督法》，以便掌握地方行政资源的领导人可以顺利连任。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中央政府对联邦主体只能好言相劝，听任地方当局自行决定。即便中央政府如此让步，鞑靼斯坦共和国、莫斯科市和圣彼得堡市，依然在中央政府不同意的情况下，自行举行了行政首长选举。

联邦主体的地方立法机构也在俄罗斯独立伊始就实现了各个级别的直接选举。由于传统的苏联苏维埃制度的影响，主导地方立法机构的领导人，通常也是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和积极分子。因此地方诉求得以通过中央立法机构进行伸张。1990年10月，新当选的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在成立仅仅五个月后，便提出了《俄罗斯联邦宪法草案》，其中明确规定，俄罗斯境内的自治共和国如同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一样，是具有退出联邦的自决权的“主权国家”。议会派也发挥立法优势，争取地方实力派的充分支持，强调会制定一个不挤压联邦主体的宪法修正案。^①而在1993年3月的第八次人民代表大会上，地方领导人的代表明确要求中央政府首先确认联邦主体已经享有的权利，否则便不会支持联邦政府的宪政改革方案。^②

由于俄罗斯独立之初便坚持联邦制的原则，俄罗斯的法律体系中更多体现着对中央政府权力的限制。俄罗斯宪法详尽地规定了中央与地方的分权结构，主要分为中央的专有权力、中央与地方共享的权力和地方自有的权力。

① 见哈斯布拉托夫 1993年2月在新西伯利亚对联邦主体立法和行政首脑的讲话：Хасбулатов в Новосибирске: Спикер раскритиковал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президента. <http://www.kommersant.ru/doc/39720>

② 格·萨塔罗夫：《叶利钦时代》，第326页。

其中，涉及央地关系治理的，主要是共享权力和地方自有权力。^①地方自有权力不仅在法律上有明确规定，而且因为俄罗斯独立之前地方的立法机构便普遍实现了直选，因此在立法层面也可以得到更好的保障。而共享权力的具体划分，在联邦层面缺乏法律保障，而且相当数量的共享权力在联邦政府与地方政府的权力划分谈判中作为“筹码”，主动授予地方来行使。

地方在抢占央地权力“模糊地带”的过程中，通过给予叶利钦政府政治支持和放弃主权声索的方式，迫使中央在权力划分协定中给予更多的实质让步，并将此类协定提升为联邦层面或者地区层面的宪法性法律予以保障。地方自行选举出的立法机构，也把设置维护本地区利益的宪法或基本法作为第一要务，甚至不惜挑战联邦宪法的限定。而俄罗斯的宪法法院又过于年轻弱小，在独立初期还卷入政治斗争中，很难作为治理央地关系的有效法律工具。

1993年10月以后，随着俄罗斯基本宪政制度得到确定，叶利钦政府初步形成了“宪法一条约”型联邦体制，但很快就发现其治理央地关系的工具困局。俄罗斯的央地关系经过多轮互动，最终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宪法一条约”型联邦体制。这种体制兼具形式复杂和权利义务非均衡的特点，构成了普京执政之初重构俄罗斯国家的工具选择困局。

从独立伊始到叶利钦总统连任前后，俄罗斯各派政治力量通过全国制宪和央地签署条约，框定了俄罗斯央地关系的主要结构。在俄罗斯独立前，苏联实行的是民族区域自治为形式、高度中央集权委托任命为实质的央地治理结构。虽然苏联的历部宪法都明确规定了加盟共和国的自治权力，并对联盟中央和加盟共和国进行详尽的权力划分，但是一党制背景下苏联中央却拥有单一制集权的绝对优势，无论是苏联的联邦制还是加盟共和国内部的民族区域自治均流于形式。20世纪80年代开始的苏联国内民族动荡，导致了苏联各个地区的自治和独立运动觉醒。以叶利钦为首的民主派为了能够在政局上赢得先机，趁机提出“主权检阅（Парад суверенитетов）”，推动在全苏范围内每个联盟主体都去争取自己的主权。为了应对风起云涌的主权诉求，缓和分离趋势，苏联政府提出以联盟中央与加盟共和国签署“邦联性条约”替

^① 范建中：《当代俄罗斯一政治发展进程与对外战略选择》，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年版，第112-115页。

换苏联宪法的方案，于1991年7月提出《主权国家联盟条约（草案）》，但随后的“8·19事件”中断了这一法案的批准进程。苏联解体并没有消除社会各界精英已经形成的共识，即，新独立的国家也需要在宪法之外，专门以条约形式来框定央地关系，以充分保障新独立国家内部的联邦主体的自治权力。因此，在1992年3月31日，俄罗斯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签署了《联邦条约》（Федеративный договор），作为一个重要的宪法性文件，它明确了新独立的俄罗斯内部中央和地方权力的划分。

但是，该条约的签署也预示着俄罗斯纷繁复杂的央地关系的开启。这个条约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体系，它由三个文件组成，分别是《联邦与自治共和国权力机关之间权限划分条约》、《联邦与边疆区、州、莫斯科市和圣彼得堡市权力机关之间权限划分条约》和《联邦与自治州、自治区权力机关之间权限划分条约》。^①分别对应俄联邦内部三类不同的联邦主体，并给予其不同的权限，同时又在整体上给予所有的联邦主体平等的地位。1993年经过宪政危机而重新修订的俄罗斯宪法，基本确认了上述原则，只是取消了自治共和国的“主权”定义。同时，新宪法也强调联邦条约是调整央地关系的主要依据。

地方强劲的分离动力，并未因为联邦条约的签署而得到削弱。这种普惠性的条约，无法满足地方愈发膨胀的分权诉求。1992年联邦条约的签字方不包括鞑靼斯坦共和国和车臣—印古什共和国，条约型的联邦体制在创立之初便遭遇严重的合法性挑战。因此俄政府在1993年版的新宪法中，为央地之间可以就权限划分进行谈判保留了相关条款。依据这一条宪法条款，俄中央政府又与地方联邦主体开始了新一轮“区别对待”型的央地条约谈判。

1994年2月，俄政府在单独的央地谈判中取得了标志性进展，分离趋势较强的鞑靼斯坦共和国与联邦政府达成了权限划分条约。联邦政府在协议中以较大的经济让步，换取了鞑靼斯坦当局在政治方面对中央政府的服从。鞑靼斯坦宣布放弃主权方面的诉求，而换取在经济方面享有比一般地区更多自主权的自由。例如，其可以创建自己的中央银行，还拥有独立的对外经济

^① 见俄罗斯联邦宪法网站关于联邦条约的介绍，<http://constitution.garant.ru/act/federative/170280/#100>

部门。自 1994 年起，联邦政府先后与近 40 个联邦主体签署了双边协定或分权协定，从形式上实现了以法律来规范央地关系。虽然绝大部分并未规定其具有宪法性地位，但是这些体现“区别对待”精神的协定，严重弱化了中央政府对地方的管制能力。整个叶利钦时代，中央政府不仅无法实现对地方的统一治理，而且整个央地关系也极为脆弱，沦为“手工操作系统^①”，只能依赖总统与地方领导人的私人情谊作为主要调节手段。

（二）行政管理工具困局

苏联时期，在地方层面实际上形成了权力高度集中于地方主体行政长官手中的块状管理机制。这种机制并未因为苏联的解体而遭到削弱，反而因为俄罗斯独立初期地方立法机构和行政长官选举全面实现自主普选而得到了加强。掌握地方行政资源的地方长官，很容易操纵和控制地方的主要政治进程，实现其政权合法性的自主肯定。联邦政府不仅无法影响整个过程，反而因为中央内部的争斗，需要争取地方自治当局的政治支持。中央不仅无法在行政业务上实现对地方的有效管理，其自身的行政政策还屡遭地方的掣肘与施压，如土地私有化等改革问题。

行政工具中的核心资源是行政干部资源。当年苏联拥有一套遍布各地完整的干部培训系统和交流机制。随着独立以后联邦制的确立，干部交流机制基本消失，取而代之的是地方实力精英与某一派全国性政治力量的结盟。^②跨区域政治组织的萎缩，堵住了俄罗斯通过组建全国性政党来推动行政治理的可能性。隶属于苏共的、全国统一的干部培训学校，在独立以后也被各个地方接管。虽然统一更换为“联邦总统直属经济与行政管理学院”的名称，但是实质上各自为政，只服务于独自培养地方后备精英的狭小目标。

在 1991 年苏联解体以前，地方首长一直由中央委任。中央通过苏联共产党、苏联政府的派出机构和受到委任的地方长官，进行事无巨细的行政管理制。然而，这种对地方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在苏联解体后荡然无存，取而代之的是新俄罗斯的联邦制度。在用联邦制构建国家的思想指导下，中央政

① 格·萨塔罗夫：《叶利钦时代》，第 483 页。

② Сельцер Д.Г. Прорабы и конструкции: локальные элиты и муниципальная власть в России // Современные политические процессы. 2014. №.13. С.86-96.

府大幅度放弃了对地方的行政管制，将这些权力转为央地共有的宪法权力。^①由于独立初期缺乏严谨的法律和制度保障，使得中央对地方的诸多行政管理沦为纸上空谈，地方联邦主体的行政资源聚合能力大幅增强。^②

此外，1989年10月，作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制定了《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代表选举法》，规定其具有议会上院地位的是民族院，由联邦主体选区当选的代表依据联邦主体地位的不同按比例组成。但是在总统派和议会派的争夺中，为了报答掌握实际行政资源的地方行政机关首脑的支持，叶利钦政府在1995年推动颁布《联邦委员会组成程序法》，调整具有议会上院地位的联邦委员会产生规则，联邦委员会不再经由选举产生，改由联邦主体行政机关首脑和选举产生的代表共同组成。^③这种制度设计，使得中央在对地方实行管制时，更易受到来自立法机关的限制。

（三）经济及财税工具困局

在苏联时期，高度统一的计划经济构成了央地经济联系的主要内容。苏联的国民经济，在地区间和央地间形成了部门齐全又相互依赖的完整体系。基于此，苏联可以实现联邦体制治理的形式和中央集权治理的实质的统一。但是，从1991年10月开始，叶利钦政府推出了激进改革方案，加速推动俄罗斯的经济结构向市场经济转轨。该方案在微观层面激进地推动全方位的私有化改革，以行政手段将苏联时期完整的经济协作体系，拆分成若干大型国有企业，继而改组为股份公司，并向公民配发私有化证券。过度迷信市场万能的激进经济改革，不仅没有实现任何预定的目标，反而把俄罗斯经济拖入泥潭。在私有化的浪潮中，由于源自苏联的行政管制和计划支持突然取消，中央政府失去了重要的财源——统一完整的国有企业综合体：在联邦层面，

① 范建中：《当代俄罗斯——政治发展进程与对外战略选择》，第112-113页

② Kathleen M. Dowley, "Striking the Federal Bargain in Russia: Comparative Regional Government Strategies",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udies*, 1998, Vol.31, No.4, pp.359-380.

③ 实际上即使是“选举”而来的联邦委员会代表，实质也是当地行政首脑酝酿分配的结果。见潘德礼、李静杰：《十年巨变——俄罗斯卷》，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第34页。

私有化进程迅速造就了以“内部人控制”为主的金融工业寡头集团^①；在地方层面，那些散布于各个地方联邦主体大型企业骨干生产单元，则在混乱中成为无主之地，迅速被地方联邦主体瓜分为其主要财源。

经济上独立的可能性给予地方联邦主体与中央博弈的更大底气。更糟糕的是，为了争取地方的支持，总统派和议会派在权力斗争中对地方攫取经济资源的行为争相鼓励，更加恶化了俄罗斯的央地经济联系。按照俄罗斯自由派经济学家原本设计的私有化方案，国家需要先将苏联时期属于中央部委直接管理的大型企业综合体，整合为全国性的股份制公司，再将国有控股公司旗下的资产按照产业优化原则予以股份制改造，并最终实现国家股权的逐步降低。^②但是在具体的执行法案审议过程中，议会派和在议会中的地方当局代理人，为在私有化进程中获取更多的地方利益，将上述私有化流程改为：先推动这些隶属中央的企业综合体整合为按地域联合原则建立的国家股份公司，并将此类公司的私有化股票优先向驻地居民和地方政府发售，使得相当数量的大型骨干企业被地方当局所控制。为了增加地方当局的经济实力，议会派还支持地方立法机关通过相关决议，以要求本地区内的私有化，必须考虑地方利益才能执行，或者干脆准许地方政府禁止本地的私有化项目，直接将其收归地方所有。而叶利钦政府为获取地方的支持，利用总统有权与地方联邦主体签署联邦条约的便利，在条约中规定，将原本属于联邦监管的产业由地方当局“托管”^③，或者要求实现私有化的驻地企业接受地方当局的监管，同样为地方联邦主体获取经济独立资源大开方便之门。

1998年开始的俄罗斯经济危机，成为扩大央地矛盾的严重威胁。金融危机的冲击，使得地方政府充分意识到建立自身独立完整的经济体系的重要性。因此在金融危机前后，更多的地方开始追逐实质的经济独立权利。这场经济危机，恰恰就是从暴露各联邦主体脆弱的财政体系开始的：为了解决俄罗斯独立以来的财政窘境，1995年9月以后，各联邦主体开始获准对外发

① 潘德礼、李静杰：《十年巨变——俄罗斯卷》，第148-152页

② 宋景义：《转轨时期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工业及其对外经济联系研究》，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8年，第65页。

③ A.B·沙罗诺夫：“俄罗斯地区燃料动力联合企业私有化的特点”，《国外社会科学》，1999年第6期。

行债券，联邦政府也以地方偿付为主的形式发行农业债券。债券销售有效地改善了各个地方政府的财务状况，增强了它们扩大自身债券销售的热情。但到俄罗斯金融危机全面爆发前的 1997 年，地方债券的发行已经完全处于失序的状态，债券发行额早已突破了地方可以偿还的限度。

1997 年，受到俄罗斯私有化进程和债券市场的鼓舞，大量外资在这一年集中进入俄罗斯。但是在这一年下半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促使当时在俄罗斯外资投入中占比较大的韩国资本加速抽离，导致卢布面临巨大的贬值压力。1998 年第一季度，俄罗斯因为政府更迭而导致的政治经济动荡，进一步削弱了联邦政府获取税收的能力，加剧了卢布贬值的压力。1998 年 8 月 17 日，无法承担金融动荡压力的俄政府宣布放开卢布贬值，并以“延期重组”的方式进行债务违约。中央政府解决自身的经济危机尚且如此困难，而对地方政府的债务问题则干脆采取了放任不管的态度。金融危机后，27 个自行发行债券的地区中有 25 个明确宣布债务违约，而联邦背书的农业债券在 70 个联邦主体中遭到违约。^①在金融动荡的过程中，地方和中央围绕债券发行、偿付和背书等方面的权力义务争执不断。双方既不限制自己的行动范围，也不愿意帮助对方，导致在财政这一最关键的央地关系上，相互之间完全缺乏信任，陷入僵局。

财税工具是包括中国在内很多发展中国家治理央地关系的重要工具，但是在叶利钦时代，财税工具却很难成为有效的国家治理工具，原因是俄罗斯的经济发展太差，而其联邦性的财税管理机制，是在一个以市场经济自由派年轻学者为领导、苏联式财税干部为基础的混合体制上，效率和清廉度都非常低下。俄罗斯实行以预算为核心的央地财税体制，名义上以分税制为主（即以不同的税种分属不同级别的政府征收），但是实际上由于主要的地方税种税基小、征缴困难等原因，联邦政府先后被迫将一些主要的联邦税种变为联邦与地方分享税种。无论联邦政府如何设置财税工具，地方政府均无法获得足够的财政保障，也无法通过财政杠杆对地方政府形成有效规制：

首先，联邦政府能够控制的收入太少，而且很难获得增长。1998 年俄

① 格·萨塔罗夫：《叶利钦时代》，第 479 页。

罗斯地方财政预算已经可以占到全国预算的 60%^①，中央控制的财政份额逐年减少。苏联时代，中央政府控制的预算收入占GDP的比重高达 45%。但是解体后随着大规模私有化和经济衰退，俄中央政府控制的预算收入仅为 25% 左右（1997 年）。联邦政府不仅收入减少，且其收入结构也由国有企业上缴利润变为以财税收入为主，使其短时间内很难通过政策调整获取收入上的增加。

其次，在构建联邦体制过程中，联邦中央和地方之间大量采取签署双边协议予以划分权力，虽然规避了强行推动统一性政策带来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反弹的风险，但是却使得联邦政府在财税政策调整上，面临更小的法律空间。大部分分权协议中的主要内容，均是央地之间的财税安排，而此类协议一般具有不可撤销的上位法法律效力，使得联邦税务部门很难依据税法及时做出调节。

最后，地方当局在面临严峻的财政压力背景下，倾向于争取独立的财政领导权。在独立伊始，地方政府的财政收入主要依赖三个来源：地方税、联邦税分成和联邦补贴。但是这一时期伴随着激进的经济转轨改革，为了尽快实现盖达尔政府设想的西方式样预算平衡体系，联邦政府强行将大量在苏联时期由中央保障资金承担的支出责任下放到地方（如社会保障），却不配给任何资金来源，严重加剧了地方的财政困难。独立初期，鞑靼斯坦、巴什基尔和雅库特等较大的自治共和国，为了应对地方财政挑战，借口无法履行中央的支出义务而拒绝上缴联邦税款。为了应对地方的抱怨，1993 年至 1997 年期间，俄罗斯政府还试图通过给予地方自行征税的权力，以弥补地方财政的困难。但是地方政府巧立名目一哄而上的征税趋势，严重冲击了俄罗斯的经济秩序，俄政府被迫取消地方自主收税的权力，改为联邦政府给予一定的补贴。俄政府的补贴缺乏普适性的原则和规范的流程，补贴多寡快慢全依赖中央和地方领导人之间的协商解决。这种不规范的财政调节，勉强依赖央地之间的政治交换和私下信任。但是在金融危机爆发的背景下，央地之间这种脆弱的默契关系迅速瓦解。为了保全己方级别债券的信用等级，联邦政府完

^① 弗拉基米尔·格尔曼：“中央-地区-地方自治：当代俄罗斯的中央再集权政策”，《俄罗斯研究》，2009 年第 4 期。

全摒弃了任何与地方债务有关的连带担保责任，造成地方财政的大规模破产。^①

央地之间脆弱的财政互动关系，使得地方无法给予中央政府财税政策充分的信任和支持。相反，一些较为谨慎的联邦主体从独立伊始，便开始着手增加地方收入，摆脱以联邦分税制为核心的财务规制。增收的主要扩展方向是寻求控制地方大型企业，尤其是资源类企业。苏联的解体导致国有大型骨干企业濒临瓦解，而俄独立初期政治经济的混乱局面，使得中央政府也担心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在尚无法解决宪政危机、构建专业稽查队伍的前提下，中央政府将很多骨干企业的核心资产交给驻地地方政府代为看管。此后，虽然地方政府不能藉此成为出资人、大规模攫取驻地企业，但是地方政府的监督角色，使得其在企业发展中扮演重要角色（例如行使否决权，或者作为最后的偿付方）。地方的财经实力也因此逐年扩大。由于分权协定中规定较大的联邦主体，特别是自治共和国，可以独自处置境内的自然资源，因此资源禀赋不同的联邦主体均采取较为一致的行动。即，利用自治共和国可以开展独立对外经济联系的权力，以境内的自然资源作为主要抵押物，寻求国外资本帮助其建立完全从属于地方的资源类企业。这些企业的发展壮大较好地解决了地方政府的财政困难，一些地方（如鞑靼斯坦）因此取得了较快的经济发展。这种依靠自身资源实现经济增长的事实，为俄罗斯境内地方当局寻求分离独立，提供了实践依据和可靠信心。

因此，立法及法律、行政管理和经济及财税等工具的相继失效，地方政府在央地财经关系互动中，藉由资源获取的分离主动权，促使俄罗斯中央政府着手寻求新的工具，来实现其调整联邦结构、重构俄罗斯国家的目标。

三、能源治理——普京时期央地治理的工具选择

1999年12月31日，普京接替宣布提前辞职的叶利钦，成为俄罗斯的新总统，俄罗斯的央地关系也走入了普京时代。普京时代开始尝试运用能源

^① Завгородняя Т.В, Метелев С.Е. Банковский кризис 1998 г. в РФ: уроки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Омск. Издатель ИП Погорелова, 2008. С.42.

治理，作为重构央地关系的重要工具。这是因为俄罗斯的地区经济结构出现明显的“能源化”特点，即能源产业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水平，明显高于其他地区，能源丰富的自治共和国经济水平全面高于其他的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区。^①俄罗斯地区间经济结构不平衡的形成，更多受到来自能源产业的影响，而俄罗斯的能源产业分布又极为不均衡。虽然整体上俄罗斯是一个世界能源资源大国，但是俄罗斯国内各地区的能源资源禀赋却差异极大，主要的能源资源集中在北高加索、伏尔加河中下游和西西伯利亚三个地区^②，而相当一部分地区却属于能源匮乏地区。苏联的解体加剧了这种地区间的不平衡。例如，原本统一的俄罗斯电力系统，在私有化浪潮中被分割成 72 个能源综合体，其中只有 15 个具有地区外的供应能力^③，而其他地区则需要外购能源才能满足本地区的能源需求。

在叶利钦时代，政府已经注意到利用能源规制地方的可能性。但是叶利钦政府的能源政策，并未在规制地方独立性方面发挥应用的作用。为了摆脱独立初期的债务负担，并躲避苏联解体阶段形成的大量能源三角债，联邦政府同时将大量地方能源消费企业（主要是热电保障企业）和能源生产企业，剥离到地方主体控制的公司当中。这使得地方政府第一次取得了协调辖区内能源生产商和消费者的政策主导权，进而取得了对境内能源产品价格的定价权和调配权。为了解决棘手的能源三角债问题，地方政府以高级“协调小组”的形式，将境内的能源消费企业和能源生产企业，用行政手段统一起来。通过强制抬高境内能源产品的价格和对地区外的能源产品设置准入壁垒的方

① 例如作为俄罗斯主要的油气产区，秋明州以 2.4%的人口占据了 2009 年俄罗斯 GDP 的 9%、2010 年固定资产投资的 11.5%。鞑靼斯坦、巴什基尔和科米共和国依靠丰富的油气资源，占据 2009 年俄罗斯 GDP 产值的 2.8%、2.0%和 0.9%，其他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区的比值只在 0.5%以下。见陆南泉主编：《俄罗斯经济二十年（1992-2011）》，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第 280 页。

② 阿列克佩罗夫：《俄罗斯石油：过去、现在与未来》，石泽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年，第 70 页。

③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Russian Ministry of Fuel and Energy, Administration of Chelyabinsk Oblast, “Russia’s energy efficient future: a regional approach”, Paris: OECD, 1997, p.117.

式^①，形成了完全独立的地方能源循环体系。地方政府或利用这一体系节约出的资金大规模采购合适的廉价能源，或利用这一体系节约出的能源扩大出口以换取更多的资金。联邦政府在能源领域的主动收缩，给予地方政府一个很好的控制境内经济权力的机会。

在国家能源政策的整体规划上，叶利钦政府也缺乏定力和长远眼光。在俄罗斯独立初期，政府便制定了有关国家能源治理的整体政策文件《新经济条件下国家能源政策构想》（Концепция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России в новы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условиях），并在 1992 年的 9 月以政府令的形式正式发布。但是这一文件的落实遇到了很大的困难。苏联解体引发了俄罗斯能源综合体大规模的资金危机和生产危机的爆发，以至于整个 1992 年俄罗斯政府发布的关于能源领域的详细指导政策，均是如何发放工资、调整行政机构等反危机临时措施。最明显的例子是当年的 26 号政府令，这份名为《关于在石油、天然气和石油制品的开采、加工、运输使用领域采取紧急措施》的文件，集合了 10 个以上的中央部委联合为能源产业纾困^②，可见能源产业面临的危机有多么严重。但是在能源产业远未恢复元气的情况下，叶利钦政府却于 1995 年出台了《到 2010 年俄罗斯能源战略基本纲要》的政府令，和《关于燃料—能源综合体到 2010 年实施能源政策和结构调整的基本方向》的总统令^③。这些文件严重偏离俄罗斯能源产业的实际，把产业发展重点放在降低能源损耗和开发国外能源合作潜力等难以落实的方面，并保留了大量苏联

① 例如，为了保护境内的煤炭生产企业，车里雅宾斯克州的煤炭价格一度高达 90 美元/吨，与当时俄罗斯可以出口到欧美的煤炭价格相差无几，有关于这一时期俄罗斯地方政府如何在地方能源部门建立充分的权威，可以参见 V.Voronin, “Regional Energy Utilities: Problems in Combining Producer and Consumer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Russian Ministry of Fuel and Energy, Administration of Chelyabinsk Oblast, “Russia’s energy efficient future: a regional approach”, Paris: OECD, 1997, pp.117-118.

②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 от 01.06.1992 г. № 371: О неотложных мерах по энергосбережению в области добычи, производства, транспортировки и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нефти, газа и нефтепродуктов. 见俄罗斯政府网站 <http://government.ru/docs/all/2862/>

③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10 года. Основные положения, Об основных направлениях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политики и структурной перестройки ТЭК РФ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10 года. 见俄罗斯政府网站 <http://government.ru/>

时期不切实际的能源项目。^①这些政策文件除了在出口方面对国内油气企业有所松绑之外，并没有帮助俄罗斯能源产业尽快恢复，反而损害了俄罗斯能源产业吸引外资的能力。

与叶利钦时代相比，普京政府对于能源治理的认识更加务实。普京政府在 2000 年颁布的第一个能源政策文件《到 2020 年俄罗斯能源战略基本纲要》，承认了俄罗斯依赖能源的现状，并把能源治理的首要重点放在尽快恢复俄罗斯能源产业的比较优势，即尽快恢复和提升油气开发和生产方面。2003 年，俄罗斯颁布了《到 2020 年俄罗斯能源战略》政府令。^②在这份能源治理的政策文件中，提出了俄罗斯能源战略的四大长期目标：能源安全、能源效率、经济性和生态安全。同时明确首先的工作目标，是加强俄国内能源产业的发展，认为俄国内能源产业的有序发展是稳定俄罗斯能源安全的先决条件。能源产业的发展格外强调全国性的集中开发生产，这种技术上的“集权需求”，与俄政府对国内央地关系的集权需求不谋而合。在这份文件的指导下，俄罗斯政府对于能源治理的重视，反过来也促进其动用能源治理工具在处理央地关系上有所作为，并主要在四个方向上展开：

（一）避免国家能源重点资产失去控制

2000 年 2 月，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发表的报告表明，俄罗斯已经意识到其油气综合体是保障国家财政收入和外汇稳定的重要保障。俄罗斯能源部认为，国家对于重点能源综合体的发展已经失去了控制，俄罗斯主力油气田储量与开采量的比值不断下降，私营公司对于油气资源不可持续的开发活动，严重威胁俄罗斯未来的经济安全和国家安全。因此，在 2000—2003 年间俄国内反复讨论的《俄罗斯 2020 年前能源战略》文稿中，明确增加了对于维护重要油气资源的关注。

对于当时的俄罗斯能源工业来说，最重要的油气资源是以秋明油田和乌

① Черныш Ю.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2030» Как Фактор Стабилизации Электро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го Комплекса// Известия Волгоград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техниче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4. №4.

② Основные положения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стратегии Росс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0 года,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ая стратегия России на период до 2020 года.见俄罗斯政府网站 <http://government.ru/>

连戈伊气田为代表的西西伯利亚产油区。^①苏联在 70—80 年代对这一地区的集中开发，使得西西伯利亚产油区成为苏联/俄罗斯油气生产的基干力量，帮助苏联石油年产量从 2 亿吨跃升到 6 亿吨的水平。但是，经过 90 年代私有化浪潮之后，该产油区被相当数量的私营石油公司所占据，国家石油公司处于边缘化的地位。原本负责对地区石油公司进行监督的俄罗斯石油公司，在 1995 年还被剥离成一家专门承接难以开发的油气资源的普通油气公司。政府管理的混乱和私营公司的无序开采，导致这个主力油气基地连续多年出现了石油产量下滑。

1993 年俄罗斯启动了对西西伯利亚产油区苏联油气工业系统的私有化工作。原本，根据 1992 年 1403 号总统令^②，这里被分拆成较大的四个垂直一体化公司：卢克石油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苏尔古特石油公司和尤科斯石油公司。很快，在私有化浪潮中，除俄罗斯石油公司外的其他三家公司变成了私营公司，成为俄罗斯寡头的重要资产。而俄罗斯石油公司由于分到的是以储备性为主的资产，开发投入较大，于是在 1995 年借着个别私有化的政策，将其西西伯利亚资产剥离成几个小的私营公司：欧纳科石油公司（ОНАКО）、西丹科石油公司（СИДАНКО）、秋明石油公司（ТНК）和西伯利亚石油公司（СИБНЕФТЬ）。这些小公司很快成为境内外资本围猎的对象，诸多俄罗斯富豪仅仅依靠倒卖这些小公司的股票便大发横财。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俄罗斯油气资源开发投入却一直累积欠账，导致 2001 年石油价格新的景气周期开始阶段，俄油气产能无法灵活应对国际市场需求，实际产量反而出现小幅下跌。因此，俄罗斯政府在这一阶段的目标，是重整俄罗斯主要油气生产基地的秩序，保障国家对主要油气田的控制能力。俄政府主要通过国有能源公司重新收购、引导可靠的私营企业兼并重组和引入外资进行大规模开发三个模式来实现这一目标。

俄罗斯政府重新确立了俄罗斯石油公司的战略地位，给予其债务重组和获得优质资源区块的特权，并对诸多私营公司股权拍卖活动颁布“量身定做”

① Лисицына Е. Н.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я Истории Нефтяной и Газовой 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Сибири и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 Извес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им. А.И. Герцена. Выпуск №.123/2010.

② 见克林姆林宫网站 <http://www.kremlin.ru/acts/bank/2417/page/1>

的规定。在俄罗斯政府的鼎力支持下，俄罗斯石油公司成功控制了欧纳科公司和西丹科公司的主要资产，在西西伯利亚产油区实现了国有资本的回归。俄罗斯政府还鼓励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公司等资本雄厚的国有企业，进入这一地区进行兼并活动，为此，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集团并购了西伯利亚石油公司，并将其打造成自己的石油板块。

俄罗斯政府并非对所有私营企业都采取敌视政策，俄政府信任那些由技术专家控制的私营公司，卢克石油公司和苏尔古特石油公司均属于此类情况。两家公司实际控制在苏联时期就形成的企业管理层手中，这样的管理层专心于对自身资源的合理开发，较少参与金融工业寡头的权力资本游戏，得到了当局的信任^①。因此上述两家公司也得以优先与俄石油和俄气置换部分资源，以优化自身在西西伯利亚的产业布局。

最后，维持主力油田生命力的主要措施，是保持足够的勘探开发投入。为了在执政初期就尽快恢复西西伯利亚产油区的生产效率，并保持可观的储采比以稳定外界通过油气收入判断俄罗斯经济前景的信心，普京政府也灵活地引入外国资本帮助其对该区域进行重整。2003年，俄罗斯政府同意英国石油公司（BP）和俄罗斯阿尔法财团组成的联合体，兼并重组该地区的核心油气生产企业秋明石油公司。^②经过多次资产置换，秋明石油公司此时主要掌握的是一些资金需求量很大的待开发资源，引入英国石油公司不仅可以盘活这些待开发资源，还可以向外界展示俄罗斯的经济环境，以利于吸引更多的外资。2003年，英国石油与阿尔法集团正式成立秋明英国石油公司，成为俄罗斯境内少有的油气合资企业。

除了这三种模式以外，俄政府还采取了特殊的强制政策，包括对尤科斯

① 但是这种信任是极其有限的，以苏尔古特公司为例，俄罗斯媒体已经曝光出该公司的现金存款长期被限制存放在俄国内的三大国有银行。而其总裁 Богданов 甚至明确表示，只要俄罗斯总统需要，该公司随时可以转变为一家“人民的”公司。但是即使这样，这家公司依然无法摆脱被俄罗斯石油公司兼并的传闻。见 Путин нацелился на Сургутнефтегаз. 13 мая 2015 г. <https://insider.pro/ru/article/29461/>

② 有学者认为，秋明油田的资产自苏联时期起便处于地方精英与管理精英结成的联盟实际控制之下。见 Некрасов В.Л., Хромов Е.А. Партийные, Региональные И Ведомственные Группы Интересов В Формировании Политики Освоения Западно-Сибирской Нефтегазовой Провинции (1961–1965 гг.)// Вестник Том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08. №.2.

石油公司的司法打击，并配套俄罗斯石油公司对其资产进行强行收购。尤科斯公司占据了西西伯利亚产油区核心的一处石油生产基地——涅夫捷尤甘斯克区块。这个区块从 1977 年开始便成为苏联/俄罗斯油气工业领域最重要的生产基地，年产量在 3000 万-5000 万吨左右。但是尤科斯的实际控制人霍多尔科夫斯基，表现出了与联邦政府对抗的态度。他强力插手地方事务，在 1998 年尤科斯与涅夫捷尤甘斯克市市长的税务纠纷中，与地方政府公开对抗；在出口石油管道项目中，企图绕开俄罗斯石油运输公司单独建设；还公然认为普京政府的税收政策加重了企业负担，并拒绝缴纳税款。霍多尔科夫斯基为了达到自己的政策主张，积极联络鞑靼斯坦共和国等资源区地方政府，还与美国的石油公司保持合作，他在能源领域的种种“去联邦化”行为^①触发了俄罗斯政府的司法反击，俄罗斯安全部门以税务问题为名将其逮捕。紧接着，俄罗斯政府设计双重拍卖的模式，让俄罗斯石油公司低价获得其在西西伯利亚的油气资产，巩固了国家在该地区的控制力。但是，这种政策所带来的强大的威慑力，抵消了俄罗斯吸引英石油进入该地区投资的努力，直到 2006 年之前，外国资本很少投资俄罗斯能源产业。

（二）高税负与管道配额的歧视政策

地方能源公司的开发收入，在俄罗斯地方税权不充足的背景下，构成了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而俄国境内分离倾向较大的自治共和国往往拥有较多的油气资源。因此，联邦政府如果能抓住地方能源公司发展的控制权，就能在处理地方分离难题时占据一定的优势。在俄罗斯的自治共和国和地区中，拥有规模较大能源公司的地区主要有：鞑靼斯坦共和国（Татнефть，鞑靼石油公司）、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Башнефть，巴什石油公司）、伊尔库茨克州（Иркутская нефтяная компания，伊尔库茨克石油公司），以及位于西伯利亚和远东地区的小型地方能源公司。俄政府把前三者视为重点管制的对象。

鞑靼斯坦共和国不仅拥有丰富的油气资源，还拥有完整的石化加工能力

^① 有关于尤科斯与俄中央政府在能源领域的矛盾可以详见 Richard Sakwa, *Putin and the Oligarch: The Khodorkovsky-Yukos Affair*, London: I. B. Tauris, 2014, pp.47-56.

和向里海方向进出口的油气管线。在其能源基础雄厚的背景下，该共和国也是俄联邦主体中除车臣外最具有分离倾向的地区，从 1992 年开始就在教育、外贸自主权和税收权力等方面与联邦政府不断对抗。叶利钦政府为了集中力量解决车臣危机，给予了其较多的让步。鞑靼石油公司也是历史传统悠久的苏联能源工业骨干企业，到 2000 年，已经发展成为俄罗斯第五大油气公司。该公司在俄罗斯能源系统中具备一定的不可替代性，因为它是俄罗斯南部和沿里海国家部分地区主要的成品油和天然气供应商。该地区的油气进出口网络与其构成相互依赖的关系，这使得政府很难通过管道网络管制该公司的经营活动。因此，联邦政府所实行的策略是，增加鞑靼石油公司的税负，以加重其经营难度。2000 年，鞑靼石油公司的开采税负占净利润的比重高达 19%。作为一个地方石油公司，这一税负水平比卢克石油公司（16.7%）和俄罗斯石油公司还要高（18.5%）。^①在过高的税负背景下，鞑靼石油公司被迫提升其油品价格，其原油牌价和石油制品价格长期位居俄国内市场第一位，进一步降低了自己的竞争力。2006 年以后，由于里海地区能源产品普遍提价，鞑靼石油公司遭遇经营危机，俄罗斯政府趁机大比例收购该公司股份，最终使得国有股份占比达到 56% 左右。从此，鞑靼石油公司名义上由鞑靼斯坦共和国政府管理经营（董事长和总经理均由共和国政府予以安排任命），但是实际的所有权掌握在联邦政府手中，联邦政府可以依据形势随时收回管理权。

巴什科尔托斯坦共和国的情况与鞑靼斯坦共和国类似，而它发表主权声明的时间甚至比鞑靼斯坦还早（1990 年）。与工业发达的鞑靼斯坦相比，巴什基尔共和国更加依赖能源原料的开采，该行业在其 GDP 中所占比重长期达到 10% 以上。俄联邦政府给予该地区更多的税收优惠，但这并不意味着巴什石油公司可以借助低税率获得更好的发展。实际上，巴什石油的原油销售高度依赖俄罗斯石油运输公司和天然气工业集团的运输系统。在 2008 年之前石油价格飙涨的背景下，俄油和俄气不断挤压巴什石油进入骨干油气管道的份额，并要求其签署代理销售协议。巴什石油公司的油气外运外销权全

^① Институт финансовых исследований. Оценка налоговой нагрузки на российские нефтяные компании в 2000 году. Москва, 2002.

部被俄石油和俄气控制。俄气还利用自身的垄断地位，要求巴什基尔共和国开放上游油气资源市场，在当地设立资源开发公司，与巴什石油进行竞争。2014年，俄罗斯政府以检查联邦资产的名义，突然宣布巴什石油公司相当大比例的股份属于联邦资产，由联邦资产管理署予以收缴，俄政府由此强化了对巴什石油公司的控制权。

与鞑靼石油和巴什石油相比，实力更弱小的伊尔库茨克石油公司（Иркутская нефтяная компания）等小型地方能源公司，大都依靠引入外资或金融寡头财团来延续经营。^①俄政府不仅允许俄气和俄罗斯石油运输公司对他们公开实施入网歧视政策，压缩他们油气产品的外运空间，还频繁安排联邦资源管理部门检查其引入外资的标准是否符合俄罗斯的法律。俄在引入外资问题上的刚性政策，堵住了地方能源公司借力外资打破劣势的可能性。在不断收紧地方能源公司发展空间的过程中，随着对于能源领域控制的加强，俄罗斯政府还把部分属于中央的能源公司资产，“奖励”给能与中央保持一致的地方政府。2015年底，俄罗斯开始向车臣政府移交原隶属俄罗斯石油公司的格罗兹尼石油公司及相关的一些资产，这被视为对于长期紧跟中央政府的车臣总统卡德罗夫的奖励。^②

（三）对国家油气公司的重组和改造

2004年别斯兰人质危机不仅暴露了俄罗斯混乱的地方安全管理体系，而且还显示了联邦机构行动能力的孱弱。为此，普京一方面签发命令将地方政府领导人的任免权再次收归中央，另一方面也在联邦层面开展重组工作。

① 伊尔库茨克石油公司成立后，发展一直受到资金的困扰，伊尔库茨克政府只得将其控股权转让给当地的汽油批发大亨Николай Буйнов，但其接手后依然无法解决资金困局，见俄媒体Ведомости对其专访：Николай Буйнов, Мы зарабатываем деньги старомодным способом – мы их просто зарабатываем// Ведомости. №.3977 от 09.12.2015。为了解决资金困境，并规避相关的法律限制，该公司自2008年开始，逐步采取在总公司只配置少数外资股东，在旗下的经营核心资产的子公司大量引入外资的结构。见Goldman Sachs, получил долю в Иркутской нефтяной компании, <http://neftegaz.ru/>和ЕБРР поделился долей в «ИНК-Капитал», <http://www.vsp.ru/economic/2013/08/30/535395>及该公司官网 Структура холдинга, <http://irkutskoil.ru>

② Добыча Кадырова Чечня берет под контроль местную нефтяную отрасль. <https://meduza.io/feature/2016/02/16/dobycha-kadyrova>

2007年，普京签发了一系列关于组建国家公司的联邦法案，在原子能、高新技术和基础设施领域，建立了一系列不以盈利为目的的特殊国家公司。^①与此同时，虽然通过直接建立油气国家公司的方式实现中央对地区严密的能源控制是一项诱人的选择，普京政府还是否决了在油气领域建立同样法律性质的国家公司的做法，而是继续坚持其国有控股的盈利模式。普京政府意识到，像过去一样单纯依赖低廉的能源价格来赎买群众的支持和地方政府的忠诚，已经难以为继。俄罗斯国有油气公司应该发挥其赚钱功能，改善政府的财政收入，并为未来的油气资源开发储备资金。2007年，政府首次颁布了放松天然气价格管控的文件。^②在放开天然气价格管制的同时，联邦政府有权制定地区间差异的系数，这一系数可以决定联邦各个地区获得天然气成本的高低，间接实现了对地方政府的能源控制。

在进行市场化改革的同时，俄罗斯加强了对主要油气公司——俄罗斯石油公司、卢克石油公司和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集团的控制。联邦政府以注入资产、划拨未开发的资源区块和直接购买股份的形式，在这些公司中巩固了自己的持股优势。

（四）实现对央地关系能源治理工具的法制性巩固

在普京的头两个总统任期内，俄罗斯重新修订了《资源法》和《大陆架法》。而在普京担任联邦政府总理期间，主持联邦政府相关部门研究并正式颁布了《外国投资具有国家安全和国防意义战略产业的指令》和《联邦意义资源清单》。上述四个法律性文件构成一个完整严密的资源控制框架：《资源法》和《大陆架法》将地方开发本地资源的权利基本剥夺，而俄罗斯国有能源公司的开发活动也必须在政府许可之下进行。而《指令》和《清单》则主要针对苏联解体前后产生的历史遗留问题：在私有化改革进程中，大量的私营资本和地方政府通过合法的途径控制了很多资源的开发权利，俄政府担

① 俄罗斯国家公司的法律地位远远高于一般的国有企业，其破产不受法律限制，活动不需向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报告及负责。见中国驻俄罗斯商务参赞处网站：“俄罗斯‘国家公司’特点”，<http://ru.mofcom.gov.cn/aarticle/jmjg/zwjrg/200806/20080605575870.html>

②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РФ «О совершенствовани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я цен на газ» от 28 мая 2007 года, №.333.

心这些资源的开发会受到外部力量的干预和支持，影响联邦政府对地方资源的主导权。因此俄政府借助《指令》和《清单》，为外部资本划定了包括油气资源在内的 42 个禁区，确保在资源开发过程中，外部力量的介入可以得到控制。

2006 年，俄罗斯以《保护竞争法》（О защите конкуренции）替换独立初期的《反垄断法》。这部新的法律文件不再把能源产业视为一个具有自然垄断的法外之地，强调应在能源的零售和上游原料供应方面保持充分的竞争。根据新的法案，俄罗斯联邦反垄断局分别于 2008 年、2009 年和 2012 年发起三次反垄断执法行动，整治对象就是油气企业。俄罗斯政府在这几场反垄断执法中，治理范围之广和手段之严厉均是历史罕见。包括俄罗斯石油公司、俄罗斯天然气工业集团、秋明英国石油公司和苏尔古特石油公司等企业均遭到处罚。俄罗斯政府采取这样的反垄断执法行动，主要针对的是俄油气公司在地域和地区间形成的价格联盟或资源同盟问题：包括俄油、俄气在内的公司受利润驱使，与资源所在地政府或资源所有方企业订立非法的攻守同盟，排挤其他企业进入该地区进行能源开发工作^①。这种固化利益的地区同盟显然也是对联邦制度的变相挑战，正因为如此，俄罗斯政府根据《保护竞争法》拆散油气公司之间的私下联盟，巩固俄中央政府对油气管网的主导权。

但是，上述法案的配套实施再次恶化了俄罗斯吸引外资的环境。在这些法案的支持下，俄罗斯强力部门对秋明英国石油等大型合资公司展开了旷日持久的调查，且处罚措施明显偏重。联邦政府在具体的处置过程中，甚至动用特警突然搜查办公室，强行拘捕企业的工作人员。^②由于不堪承受这样的

① 实际上，这种私下的攻守同盟并非出于俄气俄油等公司高层领导的主观意愿，而属于私有化和机构重组过程监管不力造成的历史遗留问题。例如，2000 年以后大量的地方天然气输配企业虽然经政府整顿后并入俄气，但其实际的管理权和经营权依然被地方企业、地方政府领导和当地黑恶势力所把持，以获取分销市场上的丰厚利润。见 Николай Макеев. Газовая отдушина. «Газпром» решает экспортные задачи за счет рядовой кухарки// Профиль. №.34. 15 сентября 2008. С.88-91.

② Милиция проводит обыск в главном офисе ТНК-ВР в Москве. <https://newdaynews.ru/economy/169581.html>

制度性歧视政策^①，2013年英国石油公司将秋明英国石油公司中的股份，全部出售给俄罗斯石油公司。

四、结语

出于对地方分权趋势的担忧，俄罗斯中央政府并不满足于宪政体制已有的安排，在“国家能力维护型”的联邦主义模式下，一直努力寻求合适的治理工具加强其国家能力，即国家控制地方的能力，并遏制地方分权趋势。但是俄罗斯中央政府同时在立法及法律、行政管理和经济及财税三个层面遭遇常规治理工具的选择困局。面对上述困局，俄罗斯中央政府基于主要分离地区均为资源丰富地区的现实考虑，动用能源工具遏制地方经济独立性，通过在宪政制度下名义上的政治分权和能源治理下实质上对地方经济的集权，俄罗斯中央政府变相实现了自己规制央地关系的目标。但是这种非常规的工具选择，也严重削弱了俄罗斯地方经济发展的活力，构成了俄罗斯国家治理的新难题。

随着中俄贸易与投资的不断增长，俄罗斯的资源类项目也得到更多中国企业的青睐。大量的中国企业在尝试考察对俄罗斯的资源类项目投资过程中，习惯性地依据中国的央地治理分析框架来看待俄罗斯的央地政策，造成了许多误解和损失。本文研究的些许结论，希望可以帮助重新审视俄罗斯的央地治理逻辑，更好地为中俄关系发展服务。

【Abstract】 The effect of Russian governance on relations between central government and local governments has always been questioned. As the country with the largest territory in the world and the most federal subjects, Russia has not managed to release economic potentials and achieve local diversified

^① 2011年，在BP与俄罗斯石油公司开始就股权转让展开接触之际，包括俄罗斯本国媒体在内的许多媒体曝出，BP公司最早在2008年已经预计俄政府会对其展开系列性围剿，见 Петр Канаев, Ольга Алексева. ТНК-ВР готовится к разделению, <https://www.gazeta.ru/business/2011/01/18/3494770.shtml>. Александра Терентьева, Российские акционеры ТНК-ВР проверяют сделку ВР и «Роснефти» на нарушения, http://www.vedomosti.ru/business/articles/2011/01/19/partner_ne_nuzhen

development like that of China. In this paper, the author holds that different from China, Russia has always set its main goal as hindering decentralization when governing relations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Only limited by its federal constitutional system, Russia has formed a “national-capacity-preserving federalism”. Politically, it admits decentralization guaranteed by the constitution, while on the other hand it seeks to obtain control of local governments through diversified governance tools. Therefore, Russia’s relations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have long been challenged by the tendency of its local government’s independence and meanwhile Russia’s stability and development have also been threatened. The main reason lies in the fact that Russian faces a dilemma in choosing conventional tools while governing the relations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Against the backdrop of federal constitutional system,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an only regulate local governments according to the constitution;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Communist Party led to more local administrative resources controlled by local elites; the liberalism economic concept mainly characterized by non-interference adhered by the central government, in addition to its ignorance of rigid federal tax system and disordered “federal-local” protocol system, completely destroys its fiscal leverage tools. In order to overcome the above-mentioned difficulties, based on the reality that local authorities rely on the energy industry, Russia’s central government chooses energy governance as a non-conventional tool in dealing with relations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By controlling key assets of national energies, together with high-tax policy limiting local capabilities in exporting oil, gases and discriminatory policies in pipeline quotas, the central government could regulate effectively local governments, taking the national gas companies as main platform. Besides, results in governing relations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have been consolidated as well in energy tools by legislation.

【Key Words】Relations between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 Russia,

Russian Energy Governance, Russian Government

【Аннотация】 Результаты управления отношениями между центром и местными органами власти в России всегда ставились под сомнение, являясь крупнейшей страной мира по площади и обладая наибольшим количеством федеральных единиц, Россия не проводила, как это сделал Китай, стимулирования местн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активности и диверсификации развития. В данной статье утверждается, что, в отличие от Китая, главной целью России в управлении отношениями между центром и местными органами власти всегда было сдерживание местной децентрализации, однако только в рамках своей федеральной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й системы. В России сформировался «федерализм поддержания национального потенциала»: в политике признаются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ые гарантии децентрализации, в то же время наблюдается стремление воспользоваться различными инструментами для достижения контроля над местными органами управления.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центром и местными органами власти в России постоянно сталкиваются в вызовом тенденций обретения независимости местными органами власти и ставят под угрозу стабильность и развитие страны. В основном это происходит из-за дилеммы выбора традиционных инструментов в отношениях между центром и местными органами власти: в условиях федеральной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й системы центральн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и может только, основываясь на списке, в рамках конституционной власти регулировать местные органы власти. Вслед за распадом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наибольшая часть ресурсов местной администрации попала в руки местных элит, и была сформирована узкая локальная система разделения власти, центральн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пыталось путём системы налогообложения регулировать местные органы власти, однако жёсткие концепции либераль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экономикой, с невмешательством в качестве основного принципа, жёсткая федеральная налоговая система, и

запутанная архитектура «федеральных – мест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 полностью подорвала данные усилия. В целях преодоления данной ситуации центральн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России, основываясь на привычных для российских местных властей реалиях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ой отрасли, выбрало управление энергией в качестве нетрадиционных инструментов управления отношениями между центром и местными органами власти; начиная с контроля над ключевым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ми активами энергии, проводя дискриминационную политику повышения налогов на местный экспорт нефти и газа и квот на трубопроводы, опираясь на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нефтяные и газовые компаниями в качестве основной платформы, осуществило эффективное регулирование местных властей центром, и приняло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о, закрепляющее использования энергетических инструментов для управления отношениями между центром и местными органами власти.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Отношения между центром и местными органами власти в России, управление энергией в России, российское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о

(责任编辑 张昕)

中亚安全**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利益与公民的安全保护***

张杰**

【内容提要】近年来中亚国家呈现出安全威胁更大的不可预见性和不确定性,安全形势日渐复杂。随着全球化时代的发展,国家利益与合作国的利益交织。因跨国经济体的出现,使得境外主权国家的领土上出现了与己甚至与第三国相关的共同利益体,以及安全命运共同体。随着中国与中亚国家经济联的密切性增强,共同利益与安全不断增多。一国境外利益与安全相互承载,国内安全与海外利益安全互为命运共同体。上述安全在很大程度上要依赖所在国的相关资源和多元化途径获得。安全保护最好的方法是事先预防。因此,国家间加强双边的、多边的乃至地区组织框架内的安保合作,可使安全命运共同体和从事跨国经济活动的参与者,在面对跨国非传统安全威胁时,能获得共同安全、综合安全的双赢。

【关键词】中亚跨境油气管线 中亚地区安全 上合国际警务合作

【中图分类号】 D822.3; D815.5 **【文章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9-721X(2016)05-0179(27)

* 本文系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防范新型恐怖主义的地区警务合作”(项目批准号:13BGJ025)的阶段性成果。感谢匿名审稿人的修改意见,文中疏漏之处由笔者负责。

** 张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国际警务执法学院教授。

一、引言

在中国与世界交往的历史上，从未像今天这样迫切地需要寻求海外安全保护。保护理念是基于对各色保护主体的不同功能的认识、不同对象对安保的差别性需求而形成和发展的。海外安全保护正在从传统意义上对官员、代表团利益的特定对象的保护，发展到对更广泛更普通的公民、企业、机构受众对象的保护。这反映出中国在海外的核心利益的转移以及更加明确化，即包括当下中国积极外交战略下不断增多的走出去的企业、机构、大型的设施、工程、项目，以及支撑各种类型企业和机构的具有中国国籍的自然人。他们以商业代表、首席执行官、私企法人代表、商人、贸易商、劳工等各种身份活跃在中亚各国。他们综合地构成中国在海外的利益体。本文所谈及的保护对象就是这个利益体和其他所有公民。

我国海外企业的安全保护的契机与挑战并存。第一，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提出及上海合作组织的成立，为中国崛起时代发展新型国际关系提供了重要的对外战略平台，并可能为“海外安保”这一新型公共产品的诞生与发展提供时代性契机。第二，共同维护中亚地区的安全环境，体现出新地区安全观——相邻国家和地区的安全是自我安全不可分割的部分，彼此构成安全的命运共同体。第三，中国油气集团在海外开展国际合作的五大合作区之一的中亚地区，能源需求国、供应国与设施经由国拥有共同利益，但保护安全的能力并不均衡。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提供更多“海外安保”公共产品正逢其时。

（一）共同安全与综合安全

从国际环境看，美国对中东地区的注意力在减少。早在 2006 年，美国负责中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鲍彻曾说，未来美希望建设新的能源管道，确保在中亚的企业家获得发展所需的能源，并期望南亚人可以获得哈萨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的油气资源、乌兹别克斯坦的地热资源、塔吉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水电能源等。中东欧未来的能源管道建设，也正在跨欧亚大陆桥上悄悄形成现代化的交通—能源运输网。

以中亚为核心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目标内涵，不仅包含商品交流，还包括民间交流、智库沟通、战略协同，以及海外能源供给、跨境物流、商品物资的往来与技术、理念、软实力、文化的交流互鉴等。而这一切都需要综合安全和共同安全作保证。

古丝绸之路的重要精神内涵是和平共处，“和平”在当代的内涵，应该是大小国家平等、不控制中小国家、不排斥其他大国，“共处”表示有合法入境等资格的人、财、物的安全，处在可控的有效的被保护体系内。应对非传统安全的安保，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中国在推动以经济为核心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过程中，应有安全保护机制相配合。因为恐怖袭击的对象呈泛化趋势：即便袭击出自一个组织、袭击目标特定，受伤者也往往非属同一国籍。各国无法对恐怖主义取得一致认识，并时而处在关于反恐法律权限与法域的争论中，这比起“恐怖主义阵营不分你我”的发展程度，似乎是落后了。威胁安全的活动越发具有合作性和联合性。安保对象的复合性、综合性决定了安保行为体的多元化和共同化。人类安全的正义保护，需要呼唤更多打破界限（政治的、法律的）的、富有创新的国际合作。

（二）安全边界与利益边界

今后 10 年可能是决定中华民族百年命运的关键时期。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推进，必将使更多公民和涉及能源、矿业、金融、公路、建筑、通讯等众多领域的中国企业进入中亚市场，如中石油、中国路桥公司、华为公司在中亚地区均有分公司。^①安全除“本土安全”的具体内涵之外，还衍生出利益安全这一抽象内涵，并构成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利益的范围不再局限于传统上的国家主权领土上的地理范畴。跨境油气管道、设施、援建企业等，并不以其身处境外而丧失中国利益边界之内的属性。从能源受益度看，中国是重要分享者，但不论能源供给国还是途经国，均进入利益边界内。世界的联系越是紧密，利益的边界越是彼此重叠，利益独赢越来越难，共同获得是大势所趋。中国境外利益是“疆界外边界内”，与他国共载。

^① 马里：“中国力量带动中亚五国提供贷款援建大批基础设施”，《世界新闻报》，2010年6月11日，<http://gb.cri.cn/27824/2010/06/11/5005s2883045.htm>

从历史的时空看，关于人类安全概念的研究，可以追溯到冷战后，安全的内涵包括能源安全、资金安全、人身安全、设施安全、交通安全、自然灾害中的安全等等。在人类物质文明得到极大提升的今天，人的安全与财、物安全互为一体。“人类安全”一词最早出现在 1994 年联合国发表的人类发展报告中，这标志着安全内涵首次从国家扩大到个人。因此，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相互承载；国家安全与海外公民安全互为命运共同体；境外企业和公民的安全、与驻在国国家关系的稳定互为内涵。

从保护的對象讲，安全包括了设施安全、利益安全、人的安全以及企业驻地的安全。

（三）根本威胁、基本威胁和衍生威胁之形态

基本威胁的形态表现为对中企的财物打、砸、抢，对财物所有人、保管人、看护人或持有人实施胁迫、殴打、捆绑、禁闭、伤害，直至杀害等行为，或为使当事人即刻交出财物而对其实施绑架等强制行为。社会冲突如果长期得不到很好的解决，就会滋生出暴力、危险的犯罪土壤。一些企业和公民是冲突的直接受害者，一些则是被误伤。衍生威胁与附载于公民的国籍国的固有特性有关。除了以上两种威胁形态之外，还有根本威胁之形态——恐怖袭击。以上三种威胁形态在海外都有表现。在不同地区，三种威胁表现的程度有所不同。三者可以互相重叠地表现在同一被保护对象身上。衍生威胁、基本威胁和根本威胁对人身安全、国家利益安全的威胁程度逐步加大，根本威胁更易引起国家层面的重视，因而支出更多的投入；而对于基本威胁和衍生威胁，投入的成本往往逐步降低。然而，不可忽视的是一些衍生威胁和基本威胁会转化成根本威胁，或者根本威胁是以基本威胁或者衍生威胁的形态表现出来，因此，根本威胁往往具有更大的杀伤力和更持久的影响，治理起来，将更加困难和复杂。

（四）多元的海外安全保护途径

之所以海外安全保护越来越被关注，是因为它的效果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落实海外安全保护，因其复杂而不易被落实，也逐步被人们逐步关注和

认识。这不仅向各驻外使领馆提出挑战，也向国家海外保护的整体能力提出挑战。于是，通过什么途径达到保护的目地，越来越成为人们关注、重视的事务。人们对安全的预防措施的需求变得更加务实。在现阶段，海外安全保护的途径主要包括如下类别：警务合作、领事外交、私人安保、企业内保。其内涵彼此有别，而正是这种多元的内涵共同支撑着海外安全保护的实践。

警务保护突破了外交保护和领事保护的敦促、提醒等传统模式的内涵，从执法领域挖掘对境外利益免遭袭击的保护资源，正逐渐成为一种新的安全保护途径。当然，中国有自身的瓶颈问题，执法机关条块分割的格局是数十年前为应对传统安全而设定的，时至今日未发生大的变化。^①非传统安全与传统安全最大的不同点，是前者特征时常变换、难以把握。例如，人、财力、技术资源相当有限的中亚地区的恐怖组织已发展至“恐毒结合^②”、“毒资恐^③”的境地。虽然中国与中亚国家的警务合作不断加强，但并未穷尽安保途径，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已迫近见招拆招的地步。能源输送与供给是推动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物质途径之一。管道的安全性越来越受到资源国和沿线国高度关注。跨境企业需充分依靠和利用沿线国资源，遵守国际惯例，按照商业模式加强管道安全保护。跨境油气资源输送的安全一般依托国际保险联合体、自保基金或商业保险模式，由其承担盗油或管道破坏的损失。^④

然而，这无法代替现代意义的警务保护、私人武装安保、企业内保的功用。从技术上说，因油气被盗窃或输送管线遭破坏而产生的油气输送量损失一般记录在需求国账单上。从社会安全角度看，刑事暴力袭击、恶意破坏活动、油罐爆炸、炼油装置泄漏起火、闪爆事故，将严重威胁沿线人、财安全，造成污染环境，而供能中断会扰乱下游企业和居民生活，甚至引发社会恐慌，给中国能源安全和地缘安全带来负面影响。同时，一国海外利益安全状况，

① 张彬：“中国警察网公安改革：机构设置与编制标准问题是关键”，《中国警察网》2014年5月22日，<http://news.cpd.com.cn/n3559/c23163811/content.html>

② 恐怖主义与毒品犯罪相结合。

③ 贩毒得来的收入用于从事恐怖主义活动。

④ 一般自保的份额所占比较小，投保商业保险占比较大。自保是企业内部设置的，还称作安全生产保证基金，即安保基金。国际上普遍的做法是投保商业保险。自保还是商保，能源企业要通过风险评估来确立。从商业保险的种类看，包括财产险、营业中断险和公众责任险（即对第三方财务及人身损失险）。

折射出该国国际的软实力、地位和受欢迎度。

商业保险追求事后经济赔偿，武装安保已超越它，追求事前用武装吓退危险进攻，注重防范与预防；警务保护重视对危险、破坏因素的控制和消除，并追究犯罪分子责任，甚至武力打击，它比商业安保更能应付安全威胁的残酷性。

“预防重于打击”的世界警务理念时代，对全球流动的人口与资本的安保对策，是对日益猖獗的跨境犯罪的重要反击。美国经济发展中也经历了因本土安保力度加大而使犯罪活动空间被挤压至海外的过程，它在向全球推出经济实体的过程中，经历了海外安保危机的阵痛，直至最终形成系统的海外安保机制。在古丝绸之路重启的今天，中国也因经济体向境外空间拓展之需而面临着对境外安保市场的迫切期待。

境外安保是国家保护责任的体现，是国际刑事管辖理论中被保护管辖权、属人管辖权的重要实践。对境外安保的传统认识，是基于对外交与领事保护层面的理解，实践中多用于对官员、代表团、国有资产等特定对象的保护，多通过外交途径的敦促方式完成。外交保护的本质，是依赖高层可迅速调集资源优势的特别保护，其功用有多大值得商榷，而且特别做法不能兼顾众多商业体的安保需要。领事保护侧重于信息提醒、法律协助、领事探望、撤侨等事务，它是以人为核心的。对跨境油气管线、设施、援建工地等物的要素的事前或事后安全保护，需引入更多元的保护途径，在实践中挖掘安保效率。

因此，为降低、消除境外利益和公民所受到的威胁而通过警务联络渠道协助接受国查明线索、联合取证、联合制止和打击犯罪行为，对嫌疑人实施逮捕、遣返，并为预防犯罪而采取防范性措施的活动，已然成为警务保护的主要内容。其主体不限于请求国的警务机构，而扩大至被请求国的警务机构。警务保护是驻在国与派遣国双方的责任和义务。中国特定国情下，它是国内企业内部安全保卫^①部门的监督指导功能的境外延伸。中国海外警务保护的实践已取得不少突破，2011年1011湄公河惨案后，中、老、缅、泰四国警察联合执法机制建成，突破了我国警察历史上从无携武器赴境外联合执法的

① 我国公安机关内设指导监督企业内部安全保卫职能的机构。

记录^①。2014年5月在越南中国企业被打砸后也是由中国公安部出面敦促越南公安部高层追捕犯罪分子；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发生骚乱事件中，中国警务联络官在现场指挥了大规模的撤侨工作。^②

二、威胁我国在中亚地区的海外利益、企业^③和公民的安全的要素

威胁一国在海外企业和公民安全的形态是多元的，如公民或某一实体的利益安全受到所在国行使权力的行政机关、司法机关违反国际法行为的侵害，或受到刑事犯罪、诸如恐怖袭击等非传统安全问题的直接侵害，或来自毒品、轻小武器走私的间接威胁。

（一）在中亚地区有安全保护需求的中国利益与公民

我国在中亚地区有着什么样的国家利益、企业、公民存在安全保护的需求呢？从被保护对象的存在形式看，包括：1、设施型的，如，管道、设施的安全保护；2、运作经营活动型的，比如，驻外企业的场地、作业场地、施工过程中的反恐安全保护。3、公民个体型的，如，派出去的劳工、现场作业的外派劳工。第1、2种对象的共同点是以物的形式存在。但是保护的目的是可延伸至与物密切相关的人、以及相关的动态事务，如，人的活动。这是因为，第一，物的安全是要依赖人去保护，其中也包含了保护设施的人的安全。第二，作业场地的安全保护的不仅是保护作业场地的物，也是为了保护作业中的人——中国公民。第三，人们所处的工作岗位和生活场所也属于被保护的對象。

① 张杰：“中国公民湄公河被害案 对海外公民安全的执法保护之启示”，《四川警察学院学报》，2012年10月。

② “驻外警务联络官剪影”，《新华法治》，2012年12月28日，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12-12/28/c_124146005.htm

③ 在国资委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年底，其监管的110余家央企中已有107家在境外共设立8515家分支机构，分布在全球15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中80多家央企已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设立分支机构。央企境外资产总额、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分别占中央企业总体的12.7%、18.3%和8.6%。“十二五”以来，中央企业境外资产总额从2.7万亿元增加到4.6万亿元，年均增长12.2%。主要涉及电力、轨道交通、建材等领域。参见：李锦，“解读李克强‘一带一路’及国际产能合作批示精神”，<http://mp.weixin.qq.com>

谈到中国公民的具体范围，就更加广泛，不仅包括企业派出的员工，还包括在中亚从事商业贸易等活动的中国公民。他们有的虽然不是央企、而是以民营企业甚至个体企业走向中亚的，但是他们均为中国公民，因此均属于被保护对象。因为公民在境外的安全程度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他的国籍所属国。

在被保护的资格上，中国作为主权国家给予的保护管辖权不因公民在中亚的活动种类、性质、出境目的、以及所属的企业身份等而有任何差别对待。这是由一国公民在境外享有国籍所属国的被保护管辖的法律地位决定的。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提出与落实，再次叠加了该地区中国公民的安全属性，影响着中国公民的安全度。与此同时，从公民出境后的安全属性看，他可能因属于某中国企业外派员工，从而附着特有的安全属性，其安全度必然附着该企业承载的安全属性。因此，国籍、身份、活动种类赋予不同人、企业性质赋予不同企业以不同的安全度，同时也会消耗不同的安全成本和安全投入。

因此，从保护的不同路径来划分安全保护对象的类别，基本可分为人和物。例如，比起人的安全度和安全防范需求，物的安全度及其所构成的安全需求是截然不同的。以威胁我国在中亚的基础设施、能源管线安全的要素为例，可将其分为如下三类：一是基础设施和运输管道，因自身建设质量、年久失修等原因会损坏。二是自然灾害破坏。油气管道的特点是跨区域、长距离。中亚多山地及矿物采空区，发生暴雨导致的山洪、泥石流、山体滑坡等自然灾害时，途经该地的管线极易受损。2004年3月14日，阿拉木图的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项目工人住地遭泥石流袭击，有28人被埋，9人遇难。三是第三方破坏，这是安全防范的重点。由非法施工、占压、违章操作、非法打孔、盗油盗气、非法占井、故意破坏和暴恐袭击等造成的管道爆裂，会给周边居民生命财产造成巨大损失，影响油气供应，导致企业停产。备受安全困扰的主要是易燃、易爆的跨境能源运输系统、铺设管道及建筑施工单位。物的安全与人的安全又相互影响，构成一体，不可分割。因此，对分散在中亚各国远郊、河畔、沙漠、孤山荒漠地带的设施、管线，相关人员的安保预防要求就升高了。因为从图中可以看到，此地暴力组织盘根错节，不易

预防。前往上述地区流动作业的钻井队、修井队工人易成为被袭击目标。这里人的安全系数与他们附着的企业身份有着密切关系。其人身安全被破坏的可能性与普通刑事案件中被抢劫、被暴力袭击的人的安全危险系数不同。不论是从企业、个人还是从国家间的警务合作上，都要为前者这种附着更高安全危险系数的人与物等提供更多的资源和成本。因此，人的安全是企业安全的根本，是海外安全保护对象的最基本的构成单位。人的安全与企业、设施、运营的安全不可分割。这也可以从图 3 中国走出去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分布情况中看到，在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中国企业数量在一带一路沿线国中所占比重最大。因此，国家在中亚地区的利益安全保护对策如果取得成功，不但对整个“走出去”战略的推动有实际意义，而且对在其他地区的安全保护做法也将产生示范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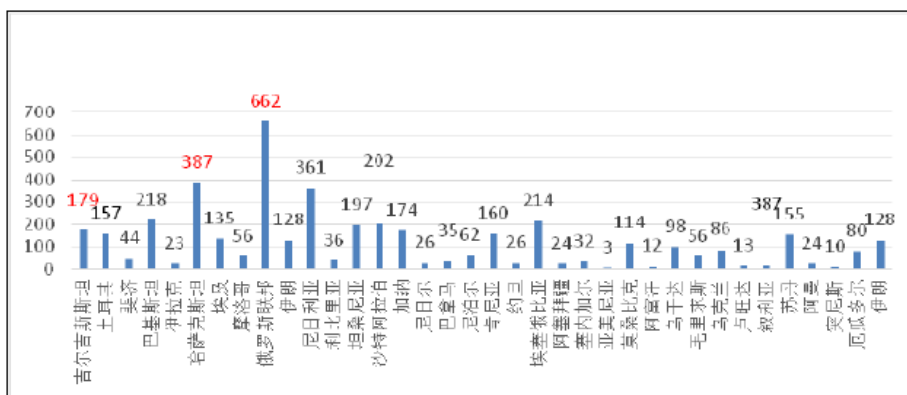


图 1 中国走出去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的分布情况

资料来源：根据商务部 2016 年提供的数据制作而成

众所周知，用油轮运油的方式成本高，受气象、海域争端及海盗威胁等因素影响较大。而自中亚进口的石油通过陆地管道运输，受地缘因素影响较小，且经济、便捷，管道运输已是世界公认的第五大运输方式。然而，管道运输除了面临打孔盗油等治安风险外，还受当地非传统安全的威胁，如恐怖主义威胁。因此，在中亚地区寻找多元化的安保对策，是转移海上运输能源安全风险的一种途径。

实际状况也反映出，中国在中亚的利益重大、安全攸关。中国与油气、矿产资源丰富的中亚地区互补性极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推动中国在该地的能源管线、基础设施、道路等建设有序开展。2014年5月亚信峰会发表的《中俄联合声明》，表明了普京总统对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理解，消除了俄方认识上的疑虑，中资企业赴中亚开拓市场的热情正在被点燃。然而，近年国家资源民族主义、贸易保护主义明显抬头，能源关系的政治化刺激了能源资源安全危机的形成。

根据北京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马修博士和贝茨吉尔博士的研究数据，中国石油投资和开展工程服务的国家中，有20个被中国外交部或国际专业安保机构评定为较高风险国家，国有企业聘用的30万名工人身处其中。^①（2007年以来，苏丹发生的上千起安全袭击事件中有50%属于油田治安案件。^②）

中亚大部分国家是中国“一油三气”项目跨境能源管道的起始国和经由国。^③中国天然气途经非传统安全形势严峻的费尔干纳山谷，能源设施面临着被盗窃、被破坏和遭受恐怖袭击的危险，国家层面的防恐措施尚有漏洞，缺乏系统的防恐安全风险评估，未全面系统地设置安全岗位人员。“一油三气”经过的路线为：A、B线起于土库曼斯坦阿姆河右岸、经乌兹别克斯坦边境、中部和哈萨克斯坦，到达中国。C线长30公里，起于土库曼斯坦，主体途经乌兹别克斯坦边境的格达伊姆，后经过哈萨克斯坦南部到达中国。D线起于乌兹别克斯坦，主体经塔吉克斯坦北部和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到达中国。

① 李春辉：“中国石油开展海外防恐安全培训纪实”，《中国石油报》，2013年2月11日。

② 韩树举等：“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海外项目防恐安全管理探索与实践”，《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2009年增刊。

③ “一油三气”指中哈原油管道和“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项目。“一油”指西起里海的阿特劳，途经阿克纠宾，终点为中哈边界阿拉山口，全长2798公里的原油管道项目。“三气”指A、B、C三条经由土库曼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进入中国境内的天然气输送管线。其中，A、B线气源国为土库曼斯坦，经乌、哈南部，从阿拉山口进入中国的霍尔果斯，管线总长度在中亚地段为2018公里，其中，在哈境内长1300公里，土境内长188公里，乌境内长530公里；C线，哈、乌为气源国；D线位于“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位置上。

（二）中亚地区影响我国国家利益、驻外企业和公民安全的特定因素

中亚地区影响安全的因素表现在哪里呢？中亚地区存在着威胁我国利益安全与公民人身安全的特定性因素。

首先，上述三种威胁形态在中亚都有具体的表现形式和案例。

基本威胁。近两年岁末年初，吉尔吉斯斯坦发生若干起勒索、抢劫中国公民财物案，作案手法多是先击伤被害人致其无力反抗，后实施财物抢劫。行凶者不乏中国籍公民。有些激进分子或既得利益丧失者的侵袭行为并非专门针对中国利益和公民。暴力袭击和冲突形成的原因各异：或因政治动荡、企业内部矛盾，或因抱有不满意情绪的雇员与中国承包商发生冲突，或因生产资料的占有不均，或因族群、部族之间所持立场观点相左，或因各自利益团体代表间的矛盾深重。不断增多的各种中国经济体和公民不幸成为冲突中的受害者。吉尔吉斯斯坦两次权力交替期均引发骚乱动荡，并使中国公民、商铺遭受打、砸、抢。

衍生威胁。2006年2月5日比什凯克附近村落由不同族群孩子的偶然纷争而起的冲突中，上百人持木棍、石块袭击中国公民，致6人受伤。事后，吉尔吉斯斯坦当局派出250名警察平息暴乱。^①从移民规律看，外来族群的活动总是会给特定生存环境带来某种影响。任何族群的新近融合均会产生一般性的人与人之间的冲突。中国族群所依附的商业体、社会活动（如，能源开采活动）与中亚社会发生多层博弈和竞争，矛盾演变的烈度与特定社会对该外来族群的习惯及其国籍国的印象、评价、认知、接纳程度有关，不同国家的行为特点、人文背景、政治理念等与两国公民间的冲突演变密切相关。除此以外，外来族群的安全也与别有用心之人的挑拨有关。藏身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的东突恐怖组织抛出的中国威胁论、掠夺资源论等排华声音，就起到了混淆当地社会视听的作用。

根本威胁。中亚本身就是恐怖主义策源地，核心地区是费尔干纳盆地。恐怖组织袭击设施是传统上惯用的手段之一。中国公安部公布的第一批认定的“东突”恐怖组织之一——东突信息中心，曾经直接指挥策划对中国境内

^① “中国移民吉尔吉斯遭围攻，起因于小孩抢座位”，<http://chinese.people.com.cn/GB/4088270.html>

输油管道、天然气管道、铁路等大型民用设施进行爆炸等恐怖破坏活动。

该地区恐怖组织的发展也得益于周边国家混乱的治安形势。恐怖组织得以生存下去的伸缩空间和缓冲地区具有较大的延伸性，即可延伸至南亚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政府控制不到的米拉厘（音译）地区（北瓦济里斯坦中心地带）的城市中，活跃着一个由中亚国家和北高加索国家来的人员组成的组织。世界 80% 的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在从高加索到中亚以及南亚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一带。“当地作为一个不大的省，有 2 万个穆斯林学校。他们拒绝非穆斯林进入，这些学校里约有 4000 多人受到了良好的武装战斗的训练。”^①

中亚地区的恐怖组织尽管受到一定打击，但仍有发动袭击的能力。^②一些学者将中亚定为一级风险类别地区^③。2000 年 5 月，境外“东突解放组织”为筹钱款，在比什凯克纵火烧毁了中国商品市场。当下，恐怖袭击目标有泛化倾向。一般而言，国家政治冲突中的反政府组织往往把有相当影响力或与本国政权关系良好的外国国家利益和公民作筹码，通过威胁其安全向当事国政府索取政治利益或经济利益。中国海外利益正在或已经满足这一条件，成为恐怖分子觊觎的政治筹码和“肉票”。中国商务部 2013 年五月数据显示，87% 的侵害人身安全案发生在中亚、南亚、西亚和北非。

2016 年 4 月 13 日，纳扎尔巴耶夫总统在访问土耳其时说，分裂不利于人类的共同利益，我们将通过“伊斯兰坚决反对恐怖主义声明”，把恐怖主义与伊斯兰教明确区分开来。然而，这一地区极端势力抬头，影响了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国际恐怖主义及极端势力向中亚渗透的势头可能还会使中亚地区恐怖主义发展进一步恶化。

其次，从国别上看，不同国家有特定的威胁安全的因素，且个别国家安全环境有所恶化。

塔吉克斯坦是个以穆斯林人口为主的国家，是宗教极端势力渗透的主要

① Андрей Грозин. Ислам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http://www.materik.ru>

② 邢世伟：“拉登之死对东突影响不大”，<http://news.bjnews.com.cn/2011/0508/117983.shtml>

③ “3 名中国工人在巴基斯坦白沙瓦遇袭身亡”，<http://world.people.com.cn/GB/5961515.html>

目标之一，不能排除出现零星恐怖袭击的可能性。塔吉克斯坦受南亚邻国阿富汗战乱不断的影响深重。2010年起，针对警察、外国企业的袭击活动不断，这始终是中国企业安全防范的重点地区。2015年岁末临近新年之际，危害人身安全的事件不断发生，并呈恶化趋势。

东突恐怖分子在哈萨克斯坦的渗透力极强，近年举办数次研讨会，散布反华信息和谣言，使得中国在哈的大型油气项目承载的安全风险上升。哈萨克斯坦南部向中国输送天然气管道的途经之地奇姆肯特州早已成为其活动中心。

吉尔吉斯斯坦薄弱的政治生态使国家治安形势长期处于脆弱状态，2012、2013年发生多起暴力抢劫中国公民的案件。据吉尔吉斯斯坦安全部门信息，2011年初破获的恐怖组织“吉尔吉斯斯坦社会”，在2010年下半年到2011年年初策划实施了一系列恐怖事件。^①还有来自高加索地区和来自于中亚国家近在咫尺的南亚国家巴基斯坦、阿富汗的新的恐怖组织和极端组织，基本上在中亚至南亚的新月弧形地带活动。

总的来说，中亚国家都存在抢劫、暴力袭击等刑事案件发生和三股势力威胁的情况。二者对安全的威胁是有区别的。刑事案件的安全威胁更为现实，时有发生。中亚国家的民众对自己的治安状态始终显得高度自信，对所发生的中国员工、企业、公民受伤害案，报道得很少。中国公民的安全感在中亚不高的原因是有客观因素的，即中国公民的安全认知与中亚人不尽相同。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以来长时间的治安稳定、秩序良好状况，多数公民鲜有亲身经历被伤害的事件。而在中亚国家，中国公民、企业均有被盗、被抢的案件发生。在当地人看来，此类案件的发生数量是可以容忍和被接受的。从这一点看，我国公民、企业外派员工等，在安全防范安全方面需要有更多的心理准备和行动上的准备。

可以说中亚地区的恐怖主义袭击的威胁往往是潜在的，而伊斯兰国在中亚的发展状态加速了潜在威胁向显性威胁转变的趋势。

^① Кыргызстан Глава ГКНБ назвал экстремистскую организацию, стоящую за последними громкими преступлениями. 17.01.2011. <http://www.fergananews.com/news.php?id=16683&mode=snews>

（三）以伊斯兰国为例，根本威胁、基本威胁和衍生威胁在中亚的表现

伊斯兰国在中亚地区的发展形势非常严峻。作为根本威胁的伊斯兰国，在中亚地区往往以基本威胁和衍生威胁的形态存在。该组织中，来自阿富汗、巴基斯坦、叙利亚的武装分子和中亚的恐怖分子联合起来，它对中亚地区的安全威胁应该尽早引起足够重视。^①它对中国在中亚地区的利益和公民的安全威胁，应该说是现实的，而非潜在的。

首先，它对中亚五国的安全秩序构成影响的表现如下：第一，它在哈里发^②思想指导下，欲在所有穆斯林土地上建立一个包括中亚地区在内的统一的伊斯兰国，中亚国家已经被伊斯兰国宣布为颠覆世俗政权建立哈里发的一个地理目标。^③尤其是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受其影响较为严重。在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都发生了打出伊斯兰国标语的事件。2014年8月乌兹别克斯坦塔什干大桥上打出了伊斯兰国旗帜的标语。2015年1月塔吉克斯坦发生了号召人们开展反政府圣战的活动。^④一些数据表明，大约有200-300名来自吉尔吉斯斯坦北部的公民参加了伊斯兰国，南部奥什则更多。第二，最新资料显示，伊斯兰国武装分子数量约10到20万，作战机械装备几乎超过所有中亚国家装备数量的总和，其人力若动员起来，有人估计最多可达到1.5万人之多。他们持有的武器大多数是在进攻伊拉克武器仓库时得到的，所以，武装人员持有不同种类的武器，包括狙击步枪、迫击炮、重机枪、反坦克炮、火箭筒、坦克和地形军用车，这样的装备足以支持它拿下一个领土不大的小国。有一个伊斯兰国所属组织«Маверанахр»的作战小组专门负责破坏中亚国家的完整性，在乌兹别克斯坦等地都出现

① Хорасан на пороге Чем опасен для России приход «Ислам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Среднюю Азию. <http://lenta.ru/articles/2015/06/01/khorasan>. 俄罗斯阿富汗问题专门代表扎米尔·卡布罗夫在2014年9月提到，“阿富汗塔利班欲在伊斯兰国旗帜下活动，有上百名伊斯兰国武装分子进入了阿富汗，并在此建立了办公室。”

② 2014年9月26日乌伊运组织的首领吾斯曼·果齐宣布和伊斯兰国联合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建立哈里发国家。

③ «Ислам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оценка рисков для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http://presidentlibrary.kz/?p=2727&lang=ru>

④ Глобальная коалиция по борьбе с «Исламским государством» 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http://cominf.org/node/1166506302>

过。^①

其次，从公安学视角看，伊斯兰国对中亚地区的安全威胁现实而迫切。笔者不认同“伊斯兰国对中亚地区的威胁是潜在的而非现实”的说法。尽管一些资料显示他们在欧洲和土耳其的发展势头比在中亚更猛，在中亚地区更突出的表现是招募和圣战宣传。然而，基于公安学理论判断，它的威胁是现实而迫切的。

第一，对于犯罪而言，尤其是恐怖主义活动，不论是潜在的还是现实存在的，都应该将预防它作为治理的逻辑起点，在它处于招募阶段、勾连的阶段，就要将其消灭在萌芽状态。世界各国的警务活动及国际警务合作的重点都在发生重要的转型，即从传统的打击犯罪为主向预防犯罪为主的进程转变，预防重于打击。不论是从治理非传统安全问题的成本看，还是从非传统安全威胁给人们带来的伤害看，预防的价值正在被世界各国实践部门和理论界所关注和重视；

第二，从恐怖主义危害看，一旦发生，就表明该阶段反恐失败。因为恐怖主义犯罪不同于毒品犯罪，毒品犯罪可以在控制下交付（即借助于情报，强力部门在犯罪嫌疑人不知情的情况下对毒品交易的过程进行秘密跟踪和监控，以便获得证据或在毒品交易现场实施抓捕）的手段之监控下发生。这一活动的发生，有利于案件的侦破，可以使犯罪嫌疑人从幕后走到台前。然而，反恐的目标是不让暴恐活动发生，且暴恐事件的消极影响不止于事件的结束。因此，预防成功即表明反恐成功，尽管前期预防活动不为人所知。

第三，一地暴恐行动伤及的是多国公民的安全。在调查巴黎恐袭、天安门“10·28”案、以及“11·20”的马里丽笙酒店恐袭等一系列暴恐案中，不难发现，任何一国境内的暴力袭击事件所威胁的生命，已不限于驻在国一国的公民，而是全球各国公民都可能成为被袭击的对象。因此，伊斯兰国对中亚地区产生的任何治安、安全上的威胁，必定会影响到中国的利益与企业。

第四，恐怖组织的招募、计划实施的地理范围之广度不受该组织所处的地理位置限制；同时，恐怖组织的相互交织关系和互为吸收的可能性，使得他们针对的目标更宽泛。从叙利亚等地返回的人员不见得一回来就拿起武器

^① «Ислам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оценка рисков для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反对自己的政府，然而从这时起，与政府对抗的活动就开始了。

具体而言，伊斯兰国在一个地理范围（中亚地区）招募、培训、融资活动所伤及的对象并不限于在该地理范围内活动的人，可能是其他地区的。也就是说，恐怖势力威胁安全的范围并不等于他活动的势力范围，他们通过招募、传播思想、培训武装分子、甚至融资活动等把威胁扩大到更大的范围，甚至全球。因此，其行为随着时间推移，客观上向中亚地区的穆斯林发出了无声召唤和示范，尽管目前尚无具体量化数据。从它在南亚的活动看，已证明了它的这一能力和活动效力的可能性：它已把阿富汗的一些组织收入自己麾下，其中包括乌伊运、东突恐怖组织，并吸收了一部分塔利班队伍，在阿富汗北部占领了几个县。^①由此可见，伊斯兰国在扩张和吸收能力上展现了较大的包容性，这是它不同于其他国际恐怖主义组织的特征，也是它被认为是哈里发发展的新阶段的原因。它强大的包容性使得宗教文化相通的中亚地区被渗透的脆弱性变得更加复杂。

再次，中亚地区治安安全属性的脆弱性使得伊斯兰国这一根本威胁形态以其他形态存在成为可能。

当一个根本威胁形态的事物以看起来不那么危险的基本威胁或者衍生威胁的形态出现时，往往会被各个主权国家忽视或者事后才觉察。

第一，治安安全属性的高低可以从三个客观的观测点来考察，或者说，安全属性的高低取决于三个观测点：一是资源的丰富性，二是政权的稳定性，三是对外依赖度。三者缺一不可，相辅相成，共同构成某一地区的安全属性。当资源丰富、政局稳定时，外部因素的安全威胁和内部因素的安全侵袭都是有限度的，国际因素的影响也会是有限度的；当资源丰富而政局控制能力不高时，该地区的安全属性降低，且这种情况下，外部因素的侵蚀性更大。中亚国家多数是资源丰富而政治不稳定的地区，它客观上极易成为外部因素的侵蚀目标。由于经济的全球化及中亚五国所处的欧亚大陆的特殊地理位置，其治安形势受国际政治经济等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大。

同时，中亚地区安全属性的脆弱性还体现在其较弱的政府控制力上。中

^① Багдасаров: ИГ в Афганистане представляет очень серьезную угрозу. 23 Декабря 2015. <http://www.tvc.ru/news/show/id/83371/?amp&>

亚任何一国发生漏洞，都会触发整个金字塔崩溃。^①外企、外国人在一国的安全度和被保护力度，与该国的政府控制力有关系。例如，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包括南亚的巴基斯坦，政府控制能力均很弱。如，巴基斯坦的中央政府对下面各省、地区政府的控制力很有限。^②中亚部分国家存在政治体系结构功能分化不足的现象，民众对于政权的不满情绪往往通过街头政治、甚至暴力的行为来表达，而非通过政党或政治代理人的方式释放，这给国家政治稳定带来了困扰。2015年9月塔吉克斯坦的巴达赫尚地区出现的由前国防部副部长发动的暴乱事件就是例证。“当一个权威性的分配价值的系统受到极其沉重的压力，以至于再也不能承受时，该系统就会崩溃。”^③

第二，伊斯兰国的敛财手段给中亚地区的治安带来了巨大的隐患。

当前，理论上存在所谓的伊斯兰国模式下的极端主义组织从阿富汗进入中亚地区建立哈里发、攫取石油和天然气资源的可能性。^④在伊斯兰国的计划中，就包括了在俄罗斯和中亚找到供给其活动的资源。^⑤出于积累资金的需要，其敛财手段给中亚地区的治安带来了巨大的隐患。主要是通过抢劫、走私石油、偷车、抢银行、收集，走私、敲诈勒索、绑架勒索等违法犯罪活动获得的。^⑥

一些中亚国家管理和控制复杂局势的能力薄弱，治安管理水平不高，治安、刑事犯罪形势易受外界影响而变得十分复杂。从犯罪学原理看，一个地区的治安与犯罪形势的恶化会产生恶性循环，会吸引更多的国际性犯罪组织的藏匿和活动。伊斯兰国的恐怖主义行径在中亚地区往往以“衍生威胁”或“基本威胁”的形态存在，而这些“根本威胁”的活动，未能引起各方足够重视。

① Хорасан на пороге Чем опасен для России приход «Ислам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Среднюю Азию

② 郑刚：“中巴经济走廊亲历(下)：别犯‘不可侵犯’之错”，<http://pit.ifeng.com/dacankaobieqinfan/1.shtml?from=groupmessage&isappinstalled=0>

③ 包毅：“中亚国家政治发展进程中的政治稳定与政治危机”，《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2016年第1期。

④ Андрей Грозин. Ислам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Центральная Азия. <http://www.materik.ru>

⑤ Хорасан на пороге Чем опасен для России приход «Ислам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Среднюю Азию

⑥ Там же.

如若如此，将不仅对在那里的中国企业和公民的利益安全产生威胁，而且将对中国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实施本身构成战略性的破坏，这是中国发展所不能容忍的。

第三，与此同时，全球经济的整体低迷，造成发展中国家出现失业潮，对社会安定构成威胁。受国际经济、政治大环境的影响，中亚国家经济状况受到俄罗斯等特定国家经济状况影响，而经济状况往往影响着国内治安形势的变化。经济水平的降低，会导致治安、犯罪形势恶化，而且这种影响的效应、效果的表现有一定滞后性，因此会被决策者忽略。

中亚地区正在经历着经济状况趋坏的可能。国与国之间政治关系的紧张以及经济制裁，对互补性较强的双方的经济发展的消极作用是双向的；而一国受经济制裁的影响会传导给与该国经济关系密切的国家和地区。

尤其不能忽视俄罗斯经济发展受阻的消极影响传导给与其有着密切经贸关系的中亚国家。例如，它造成大量的在俄罗斯务工的塔吉克人、吉尔吉斯人返乡。又例如，塔吉克斯坦目前的经济也处于低迷期，无法满足庞大的就业需求，这也会导致社会治安状况恶化。中亚五国作为较统一的经济体，经济困境导致的治安压力会蔓延和传导到他国，中亚国家治安管理能力的薄弱会加速这一传导过程。这对海外华人的财产安全构成一定威胁。例如，民风普遍淳朴、民众大多乐于助人的塔吉克斯坦，近两三年华人居住地没有发生特别突出的恶性事件。然而，2015年偶有发生入室抢劫、偷窃车内财物的事情。

中国正在推进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必将使更多的企业走出去，更多的中国公民投入到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商业活动中，而在上述情形下，他们成为上述威胁所指的对象范畴的可能性在加大，难免不与上述的客观形势发生碰撞。因此，它对中国利益与公民安全的威胁是现实的，而非潜在的。

对于中国和中亚国家而言，亟须考虑采取行动与否、采取何种强度的合作行动，才能够满足保护安全目的的先知性、前置性和预防性。因此，毫无疑问，伊斯兰国在中亚地区的发展状态应该至少纳入到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的信息层面的监控之下，并且要更加紧密地与中亚国家合作、甚至在上合组织框架内应对这种威胁。

三、中国在中亚海外安保的目标分类与分级保护

中国企业和公民长期处于和平状态，习惯了在和平、稳定的政局下开展经营活动，缺乏对政治动荡环境和变化中的政局安全风险的理性认知，这使得他们在境外开展经济活动的过程中，重视与政府部门的沟通多于与社会底层、民间组织建立和发展关系。无论是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的中亚国家，还是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抑或是国际警务合作的力量，对高强度反恐都不太适应，准备不足。当保护者与被保护者在意识上、行动上的准备均不足时，商业安保所要应对的环境危险度在上升，压力增大。

保护的主体、保护的途径是多层次的。从企业的体制形式看，中亚地区保护的主体分为如下层次：一是走出去的国企，如，中石油、中铝、中信建设、中元国际、中工国际、华为、中兴等 20 余家国有中资企业在中亚开拓业务。二是在中亚的中国私营企业、民营企业等。

不同类型的企业面临的安全防范点，一是大型的基础设施、油气管线、矿物场等，国企、央企多需面对此类安全防范，因为他们和所在国的合作大多是合资形式，受到驻在国政府强力部门有序保护的投入较多，面临的较大安全风险是来自反对派、极端主义威胁，任何一次极端暴恐活动，都会给其造成重大损失，因此安全保护的主体是防范为先。二是经营、环保政策、资金等带来的安全风险。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实施离不开民间资本的投入，这更能密切与所在国的经济联系。独资企业、民营企业在驻在国与社会面接触密切度高于国企，但缺乏国家层面的直接保护，所以更要关注当地环保政策、经营风险、资金安全等，安全防范要更多借助当地的商业安保资源。

从受安全威胁状况看，保护主体为自然人时，分两类层次：一是派出的企业员工。他们不同于一般的旅游者、经商者，其安全性和安危敏感度与所属海外中国企业具有同一性，对他们安全保护的主体与所属企业具有一致性。二是以旅游、经商、就业为目的出境的公民个人。他们安全防范点在于防范个人遭受暴力抢劫等问题。最近若干年的年底，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均发生过一些中国公民因遭受财务抢劫而受伤的案件。

针对上述情况，保护的途径主要有四种：各国强力部门的合作、政府政

策的引导、中亚国家安保资源的使用、侨民撤离行动。它们构成系统性的保护体系，目前发展空间还很大。

（一）完善国际警务合作的法制环境和合作机制

中国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不能单一地推进经济活动，还必须关注该地区的中国企业和中国公民所处的安全环境的变化。因而，应加紧推动与中亚各国的双边和多边警务合作，以及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的国际警务合作。在战略上，将地区警务合作视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实施的一部分，作为保护海外中国公民安全与国家利益安全的战略性对策；而在战术上，将警务合作、增强私人安保投入等多元化手段作为维护该地区治安形势、预防各类刑事案件发生、惩处跨境犯罪的必要的具体对策。

中亚国家多与中国邦交良好但政局不稳定，中国与其警务合作虽算顺畅，但保护跨国企业和境外人员安全的合作机制尚未建立。中亚各国警务执法理念、专业技能、装备能力等方面均显不足。同时，由于部分中亚国家实行中央集权制，政治不稳定，法制不健全，且不为中国企业家所熟悉，契约意识不强、执法不力，腐败现象严重，因而有些企业试图回避制度约束，游刃于法律规范畴之外的非理性博弈中。^①甚至一些中资企业因与前任政府或当局政府关系密切而成为反对派或新政府遏制或打击的对象。

作为理性大国的政府，其角色扮演显得非常重要。中国商务部、外交部职能所达不到的空间很大，国际警务合作部门发挥其特殊功能迫在眉睫。^②在顶层设计中，中国应充分利用政府间合作平台，完善旨在减少境外公民和企业面对安全威胁的顶层法律制度，与中亚国家签订有利于向海外企业和公民提供安全保障的双边和多边协议；通过中国政府与东道国政府的警务内政部门之间，或国际（地区）组织之间签署双边安全保护协议、多边保护合作协议等，为保护中国跨国企业的安全提供法律保障。

同时，注意加强在双边、多边、地区组织（如上海合作组织框架内）

^① 秦靖：“情报，安保，政商关系：一路一带大手笔应该吸取的三大教训，2005年4月2日，<http://mp.weixin.qq.com/>

^② 同上。

等的多层次的合作。

此外，中国还应和中亚强力部门就如下问题加强细节的调查与监控：例如，伊斯兰国如何从中亚国家招募和吸收人力，谁来招募，是该组织独立招募，还是通过乌伊运、伊扎布特或者什么样的组织在当地的基层机构来招募。目前，专门就伊斯兰国在中亚活动问题的治理的国际合作还较匮乏，无论是集体安全条约组织还是上合组织，就该问题的具体合作未见公开报道。无论如何，应该开展更加务实的国际合作了。

（二）强化以保护走向中亚的企业和公民安全为目标的政府引导行为

关于国家层面对于保护赴中亚的中国公民安全的认知，可以从一些国家高层领导人或国际合作中找到参考依据，例如，2014年11月4日吉尔吉斯斯坦总统阿坦巴耶夫在谈到伊斯兰国对中亚国家威胁问题时表示，要采取严厉的惩处和预防措施防止伊斯兰激进主义引起恐怖威胁。他认为，政府主管部门应该联合起来为保护公民的安全而采取严厉的和专门的措施。^①在2009年5月签署的上海合作组织《首次公安内务部长会议关于打击跨国犯罪的联合声明》中，就该组织的各方保护公民安全的责任有这样的表述：各方将采取措施及时相互通报发生在本国境内针对其他上合组织成员国公民的严重犯罪，在保护成员国公民免受犯罪活动侵害方面加强合作。2015年6月在杜尚别举行的第三次公安内务部长会议中，专门讨论了保护各国公民和机构合法权益的问题。这些，为保护中亚地区的中国公民的安全奠定了法律基础。因此，中国国家政府在推动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时，更应强化以保护那里的中国企业和公民安全为目标的一系列引导行为。

首先，传统的官方外交已不足以应付中亚国家的政治、社会安全局势。政府应引导企业开展企业外交，在重叠利益有限的情况下，与所在国社会、环境部门等制定共同目标，扩大重叠利益区域；增加组织化的能力增加保护资源，即从国家层面发展和培育中国在海外的非政府组织土壤，从宏观层面促进和发展中国境外民间团体，引导公民建立海外的民间商会、海外投资者

^① Хорасан на пороге Чем опасен для России приход «Ислам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в Среднюю Азию.

协会等社会组织，这是润滑与海外社会关系的桥梁，并成为某种消息来源，也利于与境外企业建立联系，沟通信息。

其次，政府部门要积极引导企业提高警惕性，防范安全威胁，加强安保团队的培育与管理，提供有关安全威胁的资讯等，辅导设立预警的标准。中国公安部、商务部、外交部等从事对外交往的部门，可通过驻外领事部门、商务处、警务联络处等，将境外安全威胁和风险方面的信息及时传送给企业，必要时建立与企业共享的中亚国家政策与安全信息平台。一旦发现安全威胁的可能性增大，要帮助企业及作防范，就海外企业所面临的安全风险防范与应对途径做指导。例如，近年来哈萨克斯坦越来越重视环保，应提醒在哈开拓市场尤其是矿物、能源市场的企业就此做好防范风险的准备。警务部门可以通过公开招标程序将海外公民保护、突发事件处理等政府服务外包给市场。政府和社会应该从资金、市场、人才、理念、知识等多方面给海外商业安保企业一定的扶持。如，研究机构、大学与智库和企业建立联系，开展交流与合作，在智力资源方面提升中国海外安保企业的风险评估能力。

再次，中国企业赴中亚地区的生存法则更多的是套用其在国内的生存法则，这在政府控制力弱的国家中容易导致自身水土不服，而实际上政府控制力弱的国家对外企政策的不确定性更大。因为中国企业习惯了政策稳定性和确定性好的经营环境，且更依赖走上层路线在中亚发展中国家建立关系。具体而言，风险往往通过如下环节表现出来：政府换届、反对党、利益群体示威、所签协议重新审查甚至重来、治安风险、犯罪高发、行政效率低下等。这些风险转嫁到企业身上后，则提高了经营成本。例如，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中亚五国政府部门的行政效率普遍比中国低。要想规避风险，就要在项目设计上，把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都考虑进去。

企业对新的海外环境的行政程序不熟悉，也会构成一种风险；企业派出的员工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复杂的宗教习俗、种族关系与民俗禁忌不熟悉的话，也面临着安全风险。

政府在这里应该起到引导的作用。外交关系良好不代表两国人民之间在宗教、民族、文化、社会习俗等方面的障碍可以忽视和淡化，相反，每个企业和个人都要用心学习。应避免因为无知、不习惯等而成为积累负面情绪的

因子，避免导致潜在的社会文化冲突。从这个角度讲，对企业和员工的培训，不是企业自己的事情，而应该上升到国家层面，政府应该把眼光放远一些，从更长远的利益去考虑，向企业提供参考意见、信息和建议。例如，一是通过国家间协商，完善企业可雇佣当地员工的最优化比例数；二是提出有关驻在国宗教、文化等培训教育计划与标准等综合的战略对策；三是整合相关国家的安全信息数据和资源，向企业提供项目设计的时间成本、经济成本、安全评估等参考建议。

（三）警务人员在撤侨行动中的价值体现与发挥

撤侨是指在公民自愿基础上，一个国家的政府通过外交手段，对海外处于骚乱爆发、战乱冲突、自然灾害严重、生命安全受到威胁的地区的公民实施领事保护、警务保护，甚至军事武装保护，以便将本国公民撤回本国政府的行政区域的行为，同时它又是一种人道主义救援。2010年6月17日，中国政府派往吉尔吉斯斯坦共9架次包机，完成了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撤侨行动，保护了1299名中国公民的安全。

撤离的对象，是侨居海外的已取得居住国永久居民身份、仍保留本国国籍的公民。^①撤侨的条件，包括快速的应急性、较强的国力、国家保护公民的意识和态度。这些条件缺一不可，否则，即便有公民深陷战乱，国家也不大会派出人力物力实施撤侨。^②客观上，“被保护的对象安全与否”影响中国实施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成功着陆的权重在加大、相关性在加强。同时，国力的增强和公民安保需求的加大，使得国家对在中亚地区的利益和公民保护意识不断增强。

警务人员在中亚地区开展撤侨实践中的保护价值体现在以下环节：

一是通过对公民法律身份的认定而行使警务保护的责任和义务。

首先，我国驻中亚的警务联络人员要向混乱状态下的驻在国政府的强力部门、甚至社会进行公关，例如，一国政治争端突；起、冲突爆发，世界各

① “中国海军赴也门撤离中国公民，还有哪些中国人在也门？”，<http://www.aiweibang.com/yuedu/19747819.html>

② 同上。

国公民在密集时间同时撤离，警务外交公关显得十分重要，驻外警务人员在使馆指示下要为数量庞大的中国公民加开出境专用通道。

其次，驻在中亚国家的中国警务人员要在骚乱的现场对被撤回人员身份加以认定。^①如，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的撤侨现场由中国驻外警务联络官指挥。身份认定的必要性在于，人员撤回国内，这对中国而言，其本质是一种入境，对驻在国而言，这一行为本质是出境。因此我国警务人员不论是在安集延事件还是吉尔吉斯斯坦的两次政权更迭的混乱状态下，都担负起制作带有当地官方文字的临时回国证明，该证明是由撤回人员护照复印件加贴持证人照片、加盖骑缝章构成。必要时他们要现场办理护照（或者护照的替代证件）。^②

再次，我国驻外警务联络人员要对撤侨对象的范围加以确定。对此，我国尚无特别明确的法律界定。2006年，中国政府在所罗门群岛爆发骚乱后所采取的撤侨行动，还协助撤离了非中国籍的华人。^③2010年，出于人道主义精神，将人身安全处于危险境地的某吉尔吉斯斯坦籍人员撤入中国境内。现场的种种情况都可能发生，对警务人员的应变能力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对此我国需要从立法上逐步完善。

二是在武装冲突中最大限度地保护拟撤离人员的人身安危。

撤侨行动复杂而有规律可循，撤侨方式包括海、陆、空三种类别。驻外警务联络官一般要从三方面做好准备工作，一是准备足够的水和防寒衣物，尤其是在发生骚乱和战乱地区；二是在当地征集车辆，并在车辆上临时标注中国国旗等能使公民较快识别的标志；三是准备防弹衣，因为在奔波联络事务过程中有时不得不穿越冲突地区或遇到武装分子。但是最好区别于武装分子，最好不要戴头盔，尤其不要带武器。必要时酌情配备防弹车，或配备随从武装人员，以防止当地人趁乱抢劫、伤及人身安全。四是制定向出境口岸集结的路线，摸清靠近边境的路线和交通情况。

① 2015年3月也门撤侨现场中中国驻外边检人员赴外确定公民身份。

② 对于没有护照而又现场临时决定撤回的公民，比较麻烦。在实践中，曾有一次在边检口岸，飞机即将起飞，大批公民没有护照，齐唱国歌证明。出境的中国人必备的知识是学会中国国歌，有时候这意味着生命。

③ “中国海军赴也门撤离中国公民，还有哪些中国人在也门？”

此外，撤侨事后安排上，一般由使馆、中资施工单位与驻在国政府、武装力量协商，对中国海外企业与财物实施移交看管，现场详细清点工程进度及留存工地上的建筑物资，保证撤离之后未完的项目不会受损，以便在局势好转后，在适合的条件下，中资施工企业可以回去继续完成项目。

根据中亚地区的政治脆弱性的客观状态，驻外警务人员必须要从过去的撤侨活动中不断总结经验，为保护海外利益与公民的安全做足经验上、思想上的准备。

（四）上合组织跨境油气管线安保机制的构建

不是所有的安全威胁都能用撤侨来化解的，更多的安全要借助当地私人的、商业性的安保资源来换得。中亚国家武装力量薄弱，受南亚邻国不利的安全形势影响，多数企业聘雇当地或国外的私人安保公司。

然而，中亚经济发展亟须在区域组织介入下构建更加成熟和务实的安全保护机制。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已在为跨境安保积极行动。以俄罗斯为首的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引导各成员国雇佣军和私人安保的境内外活动，且制定更详尽的行为准则。中国依托上合组织关注和落实境外利益安保事务的进程已经开始。2009 上合组织公安内务部长会议签署的《关于合作保障上合组织成员国境内石油和天然气管道安全的决议》，和 2010 年国务院批准加入的《上合组织执法安全合作部级联席会议制度》，均为安保机制的构建奠定了基础。同时，上合组织与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以及联合国联合构建共同安全的空间是广阔的。^①

上合组织应着重对各国安保公司活动的监督、许可证制度、警察或军事监视准则、独立监察制度等方面给予关注，并促进中亚安保服务职业水平的提高，研究最佳安保方案和地区标准；建立安全危机处置中心，预警预测，通过联网的探头和终端自动获取被保护对象的安全信息，设立基站昼夜岗的联络，24 小时轮值监控，定期报告；借助卫星、短波通信技术实施监控、通讯受理、信息分析；提高通信保障科技含量，实时卫星接收，结合卫星遥

^① 张杰：“中亚有组织犯罪发展的潜在危险性分析”，《新疆大学学报》，2008 年 3 期，第 93 页。

感技术掌握动态信息，用卫星照片实时监控大型能源管线安全。对重要设施借助太空监测，实施动态定位；建立视频沟通会，以快速分析和反应。

人类进入了主权国家关注人类安全的时代。预防重于打击，“安南所曾呼吁的免于恐惧的诉求”的最好方法是预防。^①中国作为地区大国和上合组织成员国以及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倡议国，促进沿线国家的私人安保市场和资源的开发利用正当其时，这也将为安全保护效力的提升贡献不可忽略的价值。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Central Asian countries have witnessed more and more unpredictable and uncertain security threats. The security situation is becoming increasingly complicated. During the globalization era, national interests are intertwined with cooperating countries. Due to the emergence of trans-national economies, there appear community of interests or even of security related with one country or the third party on the territories of sovereignty countries beyond borders. They increase with more economic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China and Central countries. One country's overseas interests are co-related with its security. So is the case between domestic security and overseas interests. The above-mentioned security, to a great extent, depends on related resources and multiple approaches in related countries. The best way for security is to prevent in advance. As a result, when countries strengthen their security cooperation under the bilateral, multilateral or even regional organization framework, people within the security community or transnational companies, while facing transnational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threats, could obtain common security and win-win results in comprehensive security.

【Key Words】 Cross-border Gas Pipelines in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n Regional Security, International Police Cooperation within the SCO

【Аннотация】 В последние годы страны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① 联合国 2003 年成立了国际人类安全委员会，参见联合国 威胁、挑战和改革问题高级别小组 2004 年 12 月提交的报告《一个更安全的世界：我们的共同责任》。

представляют собой большую угрозу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характеризуются непредсказуемостью и неопределённостью, ситуация в област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становится всё более сложной. С развитием глобализац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ые интересы и интересы стран-партнёров переплетаются между собой, возникновение транснациональных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объединений привело к появлению на территории зарубежных суверенных государств сообществ интересов, и даже таких сообществ с третьими странами, а также сообществ по вопросам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след за ростом экономических связей между Китаем и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ей количество таких сообществ также возросло; иностранные интересы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страны тесно связаны между собой, внутри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зарубежных интересов являются одним целым. Данная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во многом зависит от ресурсов и диверсификации их источников в конкретной стране. Лучшим способом защит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являются профилактические меры. Таким образом, страны укрепляют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в област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в рамках двусторонних и многосторонних механизмов, а также в рамках региональных организаций, что обеспечивает людям, занятым трансграничной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ю, и людям, сталкивающимся с транснациональными угрозами не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доступ к общей и всеобъемлюще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 Ключевые слова 】 Трансграничные нефте- и газопроводы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безопасность в Центральной Ази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сотрудничество полиции в рамках ШОС

(责任编辑 王海燕)

俄罗斯研究 (双月刊)

ИЗУЧЕНИЕ РОССИИ

RUSSIAN STUDIES

2016年第5期

(总第201期)

主管：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主办：华东师范大学

主编：冯绍雷

出版：《俄罗斯研究》编辑部

地址：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华东师范大学理科大楼A403

邮编：200062

电话：021-62233816；021-62238113

传真：021-62232113

电子信箱：russiastudies@163.net

排版：华东师范大学俄罗斯研究中心电脑室

印刷：上海展强印刷有限公司

发行：本刊编辑部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CN31-1843/D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9-721X

网络电子版代理：中国知网

网址：www.cnki.net

· 公开发行 ·

定价：30.00元